乌兰夫传

（1906—1988）

《乌兰夫传》编写组

王树盛　撰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有志少年

从呼和浩特(原归绥）出发，沿呼(和浩特）包(头）公路西行 50 公里，是土默特左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再向西南走 15 公里，在土默川腹地，有一个蒙汉族同胞穿插居住的塔布赛村(旧称塔布子)。这就是乌兰夫的故乡。

据传，塔布赛村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最初，这里只有乌兰夫祖辈一户姓云的蒙古人居住，后来有四户出来找生路的山西农民在这里落户。有了这一蒙汉四五户人家，才有了塔布之称，即汉语五家村的意思。五户人家住在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上，任牧任耕，一代一代友好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和友谊。以后，又不断有内地逃荒农民迁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时而也发生农牧矛盾，但为了共同生存，都互谅互让，不碍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当时的情景正像民谣中唱的:“蒙汉是一家，不分我你他。同喝一井水，共赏草地花。”

1906 年 12 月 23 日，乌兰夫诞生在塔布村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叫庆春，入私塾馆读书时取名云泽，在苏联留学时起俄名拉谢维奇，在土默川搞地下工作时化名陈云章和乌云达赉，在新三师时多称其字时雨，到延安后改名乌兰夫。

乌兰夫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两人，由祖父主持家政。

祖父云根元，是云家由放牧为主转为种田为主的第一代。当过村里的保十户，即管十户人家的小头。读过私塾，学过汉语，是一位通情达理、性格耿直、心地善良的老人。

父亲云明亮，因排行老二，人们习惯地称他云二明亮，读过私塾，蒙汉兼通，幽默诙谐，爱讲笑话，精通农活，勤于耕作，不惜力，不争利，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

母亲长长(音 zhǎng)，娘家也姓云。没有读过书，把全部精力和爱都倾注在家人和孩子们身上，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服侍老人，抚育子女，对长子乌兰夫尤其钟爱。她具有旧式妇女的美德，是一位农家贤淑女子。

伯父那木齐，读书较多，文化底子比较厚，爱好书法，懂蒙汉两种语文，胸襟坦荡，性格开朗，曾代塾师教过乌兰夫和他自己的儿子云润，教学认真，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云根元老人对当时社会的污浊和不平等现象，对蒙古民族的日渐衰落，很愤懑。他用我国传统的伦理治家和教育后代，子女们本分、孝敬，有文化、能劳动。每个人都奋力为全家人的生活操劳。一家三代和睦相处，能吃饱穿暖。儿孙们健壮聪颖，这对云老汉是莫大的宽慰。

乌兰夫的先辈在大青山前后游牧，后来定居在土默川。这里是绵延数百里的一块冲积平原。它西濒黄河，三面环山，大黑河由东北而西南穿过，盛夏无酷暑，隆冬不严寒，水丰土肥，是宜牧宜耕、气候宜人的好地方。历史上它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扬鞭跃马，纵喉牧歌，过着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大约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内地破产的汉族农民开始流入土默川，但直至 19 世纪都是自由流入谋生的。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加，流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对牧场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20 世纪初，清王朝为了转嫁“庚子赔款”的负担，有组织地移进大批破产农民，在武力护卫下强行开垦。经过 1902 年到 1908 年的武力强垦，土默川的草场几乎全部被破坏，蒙古族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不得不转牧为农。从此，土默川变成了农业区。这一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进步的。但是，武力强垦危及牧主阶级的利益，也造成绝大多数蒙古族劳动人民破产。强迫牧民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他们

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是极其痛苦的。

开垦后的土默川，汉族居多数。蒙汉劳动人民相依为命，友好相处。刚刚转为种田的蒙古族牧民有养畜经验，新迁来的汉族农民有耕作技术。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蒙汉劳动人民的汗与血流在一起，共同浇灌着这块新开垦的土地。可是，即将覆亡的清王朝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政权的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和盘剥蒙汉劳动人民，搞旗县并存、丈地换照等，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致使生活在这片肥田沃野上的蒙汉劳动人民难得温饱与安宁，蒙古族人民的境况更加悲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离间，促使蒙汉劳动人民觉醒。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斗争绵延不断。

乌兰夫出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强垦土默川的高峰期，全国和内蒙古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那样一种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乌兰夫渡过了他的童年。乌兰夫的长辈们不一定有把他培养成为民族和国家栋梁的想法，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将来的情况尽可能好一点，盼望儿孙们能有出头之日。让乌兰夫和其叔伯哥哥云润读书，使他们日后不只是会种地、放羊，还能长出息，这是祖父的主张，也是伯父和父母的心愿。乌兰夫很感谢他的祖父和父辈，是他们作出的这种抉择为他创造了一生发展的最初条件。

在全家支持下，乌兰夫 4 岁时就同其堂兄云润一起，跟伯父学念《百家姓》《三字经》。8 岁那年，他和堂兄到离家 4 公里路的温家村私塾馆读书。第二年春天，因为私塾馆姓白的先生歧视蒙古族孩子，他们就回家继续跟伯父念。第三年，祖父下决心请了山西崞县一位姓贺的先生，在家里教了他们两年。贺先生走后，他们到离家 5 公里路的小里素村私塾馆念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念完了私塾课程。

乌兰夫读私塾的时间总共有 4 年多，受业塾师包括伯父在内主要

有三位，其中有两位是汉人。他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性质和作用却各不相同。一位是白先生，他教死书，死教书，而且趋炎附势，瞧不起穷人家孩子，歧视蒙古族孩子。这位先生对待学生的不公正态度使乌兰夫觉得很委屈，很伤他的自尊心。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了这样一个问号，很长时间解不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另一位是伯父，他教得认真，讲得明白，时间也掌握得灵活，有空多讲，没空少讲，农忙了就下地干活。他对乌兰夫和云润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不管是在学习中还是干活时，常说些鼓励他们的话，时而还文绉绉地讲几句趣话逗他们乐。乌兰夫觉得伯父有知识，既严肃又随和，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先生。他很尊敬伯父，不仅跟他学识字，还学他的脾气、性格，甚至一举一动。伯父集中了乌兰夫祖父和父亲的长处，对乌兰夫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位，那就是贺先生。他和蔼热情，没有先生架子，同情受苦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读过私塾，还上过洋学堂，知识面宽，书教得活，除“四书五经”外，还讲算术、自然、地理，并且给他们讲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历史上一些蒙古族英雄人物的故事。乌兰夫很愿意听贺先生讲课，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对乌兰夫很有影响和启发。三位塾师中贺先生留给乌兰夫的印象最深刻。他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教师。”

童年乌兰夫要强、听话，很讨人喜欢，长辈们都夸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很合群，又刚直，从不招人惹事，无论是蒙古族孩子还是汉族孩子，都愿意和他一块玩耍。塔布村蒙汉穿插居住已有很多代，孩子们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他们一块追打、嬉戏，其乐融融。不过有的孩子恼了打起架来，也会骂“小鞑子”，甚至偶尔会有几个孩子一

起哄骂。每逢这种情况，乌兰夫总是带着不愉快的神情悄悄离去，并默默地思量:大家一起好好玩该多好，干嘛要打架，干嘛还要骂“小鞑子”?他自尊心很强，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孩子们之间不记仇，打了骂了就过去了，不一会又凑到一起，摔跤、打土仗、捉迷藏，依然如故。这里的气氛同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的情况恰恰相反，谁要想把这些孩子分开，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乌兰夫 13 岁以前，活动的范围就是塔布村及其周围，接触的主要是家人、塾师和一起读书、一块玩耍的孩子们。在这不大的天地、有限的接触中，他已初尝人间甘苦和社会的不平。这些在他的童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投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美好的”和“不愉快的”记忆深镌心田，不时地撞击着他的思绪。他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在想:天下人谁也不要欺负谁，都像祖父、父亲、伯父、贺先生那样公正、讲理，该有多好！为什么有人要欺负别人?为什么我们家受了欺负爷爷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说“老鞑子打官司场场输”?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打架还骂“小鞑子”?像我们高高兴兴一块玩的时候那样，不分你我不是很好吗?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反映了乌兰夫童年的渴望和追求，也显现了他童年思想上的困惑。

乌兰夫和云润一块读完私塾后，云润就跟伯父下地干活了。乌兰夫年纪小，还干不了什么，便去姥姥家住了一阵子。姥姥很疼爱他，舅舅们也很喜欢他。大舅章元，有些文化，懂点中医，经常给本村和临近村子的乡亲们看病。乌兰夫平时爱学好问，零打碎敲地跟他学了不少知识。二舅金元，在归绥城土默特旗总管衙门当录事，干抄抄写写的差使。他读书比较多，又在城里衙门做事，在乌兰夫姥姥家，也包括乌兰夫自己家，算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也的确比其他人知道得多，看得远一些，所以家里人和亲戚们都信服他。贺先生走后让乌

兰夫和云润到小里素继续读书，就是他的主张，并说服乌兰夫一家的。乌兰夫和云润私塾读完后，又是他建议并劝说乌兰夫祖父和其他家人同意，于 1919 年秋送他们去归绥城报考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所高等小学校坐落在归绥城南文庙街，所以俗称“南高”。它直属土默特旗总管衙门，是当时归绥地区蒙古族的“最高学府”。学校学制 4 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蒙古文等，师资条件比较好，教学也比较正规。归绥城和临近的一些蒙古族孩子很仰慕这所学校，想求学的都来这里投考。乌兰夫和云润不负二舅和家里人的一片苦心和厚望，都以比较高的考分被录取。

乌兰夫进“南高”时 13 岁，正由蒙童进入少年期，是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乌兰夫到归绥读书，对他的提高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塔布村到归绥，从家中到校园，离开朝暮相伴的父母来到年龄不相上下的同学中间，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接触面宽了，眼界扩大了，学习条件好了，同他原来在家中读私塾时的情况相比，就像小鸟飞进了山林，天高了，地也大了。他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进校就埋头学习。他对“南高”的各门功课都感到新鲜，老师讲课他听得很认真，早晚自习也抓得很紧，很少和同学一起遛街，除了在操场上练练身体以外，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见他学习这么刻苦，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书呆子”。“书呆子”不呆，他知道少年时光珍贵，绝不让它白白流逝，无论什么干扰都动摇不了他抓紧学习的决心。他日复一日努力不懈地学习，终于换来了良好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更好。他偏爱数学这门课，教数学的王老师也很喜欢他，常出些难题让他演算。他也很愿意抠难题，有时抠得废寝忘食，曾因熄灯后还抠数学题受过老师的批评。乌兰夫在“南高”刻苦攻读 4 年，1923 年 10 月以优异成绩毕业。正是这 4 年苦读，乌兰夫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文化知识的底子，为他以后的学习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使他受益终生。

乌兰夫进“南高”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他在“南高”读书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初建，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之中，国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归绥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蒙古民族是热爱祖国、珍重团结的民族，纵然反动统治者对他们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和盘剥，外来势力也肆意挑拨民族关系，但他们的团结爱国之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们总是把本民族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华大家庭中其他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革命运动这里都热烈响应。五四运动以后，归绥地区群众的革命情绪一直很高涨。“南高”虽然是一所高等小学，但当时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多数同学都是已接近成熟的青年。这里的毕业生不少都升学到北京蒙藏学校，他们经常传来北京的消息。在他们的影响下，这所学校的同学革命热情很高，颇有土默特旗“小北大”的味道。

乌兰夫在同学中是年纪比较小的，但他个头大，身体壮，功课好，又很诚实，同学们很愿意和他交往。他虽然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也愿意与同学交往。进校没有多久，他就与赵诚、奎璧、多松年、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又结交了在归绥中学读书的同乡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他们经常抽空在一起交谈议论，交换想法，这使乌兰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明白了不少原来不明白的事理。他发现，困扰他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同学。他曾向二舅提问的“为什么蒙古族人就比汉人低一头”，他曾想过的为什么穷人受欺负，为什么社会这样的不公平等，他的这些同学也想过。他暗下决心学知识，长本事，长大以后救蒙古族人和受苦人，甚至认为蒙古族人受欺负是因为没有文化，因此立志要好好学数学，以后当数学教师，帮助蒙古族人提高文化，使他们以后不受欺负。这些事他的这

些同学也想过，只是怎么救法想得不一样。从此他明白了，不甘于蒙古民族衰落，向往民族平等、民族兴旺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而是有很多，甚至有不少人正在积极寻求实现自己想法的途径和方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乌兰夫逐渐摆脱了童年环境造成的压抑情绪，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入“南高”一年多之后，在思想活跃的进步同学的影响和感染下，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乌兰夫第一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1920年参加归绥学联组织的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集会。这次还是同学动员他去的。到了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就不同了，他积极主动地参加。在游行过程中，归绥学联负责人李裕智给了他一本《新青年》，回校后他反复认真地读，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对其中打倒军阀、反对“二十一条”的内容，看了以后心里觉得亮堂了不少。后来他又看了“二十一条”全文，更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愤慨，情不自禁地把刚看过的“二十一条”撕了个粉碎。同年9月，归绥学联组织学生游行，反对天津商人沈文炳用日资在归绥办电话局和建电厂。1923年5月，归绥学联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斗争，砸了抗拒学生清销日本货的“盛记”洋行。归绥学联组织的这两次声势浩大、震惊归绥城的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归绥各界的支持，显示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威力，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两次斗争中，乌兰夫都是积极分子。他受李裕智委托，在“南高”进行了串连和发动，在游行中他带头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在捣毁电话局、发电厂工地和砸“盛记”洋行时，他都按照学联的部署，面对面地同依附日本资本家的商人、老板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的吉雅泰，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他们这一段经历时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归绥搞学生运动的时候，乌兰夫年纪小，但个头儿大，嗓门高，我们总是要么

让他打着旗走在游行队伍前边，领着大伙往前走，要么就叫他在中间，带着大家呼口号，是很有影响，很有号召力的。”乌兰夫在“南高”的 4 年，是他长身体、长知识、长见识的 4 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努力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经受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初步锻炼。在斗争中他逐步觉醒，开始懂得了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各民族的穷人都受压迫、受剥削，整个中华民族正在任人宰割。身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蒙古族青年，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蹂躏自己的祖国，欺辱自己的民族！拯救国家和民族，只有大伙一块起来，就像对付依附日本资本家的沈文炳、“盛记”洋行那样，对付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刚刚步入青年的乌兰夫，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苦苦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踏上革命征途

1923 年 10 月，乌兰夫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他一起考入这所学校的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有吉雅泰、李裕智、奎璧、多松年、佛鼎、康根成、赵璧臣、孟纯、云润，还有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青年特木尔巴根等。

北京蒙藏学校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这所学校是北洋军阀政府开办的，直属于北洋政府蒙藏院，专门招收蒙古族和藏族学生，目的是要把这批青年培养成为他们统治内蒙古和西藏的代理人。但事与愿违，这里却出了不少反动统治者的掘墓人——共产主义者。乌兰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乌兰夫被编入初中部第四班。初中部的课程除多一门蒙古文外，与普通中学一样。乌兰夫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即从 1923 年 10 月至 1925 年 10 月。这两年正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个高潮之中，也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结合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气势磅礴的群众革命斗争相继出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军阀盘踞争夺的北京和北方的形势也在迅速变化，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下，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离开广州前于 11 月 10 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接着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配合，发起“国民会议运动”

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此同时，军阀段祺瑞的临时政府与“废约”相对抗，发表“外崇国信”声明，并与国民会议相对抗，召开“善后会议”。为了反对和挫败“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协助孙中山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和反革命在针锋相对地激烈较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正在由南方推向北方，以锐不可当之势涤荡着中华大地。

北京蒙藏学校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气氛一直很浓，反对北洋军阀丧权辱国和学校当局压制学潮的斗争始终不断。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李大钊等很注意这所学校，对蒙古族青年更为关心，经常派人或亲自到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思想，提高学生的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并在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领导这里的学生运动。

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学校是很难正常上课的。虽然乌兰夫很爱学习，但自入学以来几乎没有静下心来学习过。不过，这并不等于虚度光阴，恰恰相反，乌兰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并迅速地成长起来。他有在归绥“南高”参加学生运动的基础，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在北京和蒙藏学校的革命气氛感染下，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学潮和革命斗争。无论是发生在蒙藏学校以内的学生运动，还是社会性的革命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这时乌兰夫正如春禾遇甘露，在湿润的土壤里、和煦的阳光下，迅速茁壮成长。

1923 年秋开学不久，李大钊派人到蒙藏学校接触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送给他们《新青年》《向导》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给他们讲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以后，李大钊又亲自到学校同他们交谈，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蒙古民族受压迫和日渐贫困、

衰落的原因。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听了以后受到很大启发。他们初步懂得了民族不平等、人民受苦受难，根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铲除社会不平等，就要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在李大钊等的直接教导下，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原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中有些人，包括乌兰夫在内，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党组织决定在蒙藏学校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乌兰夫于 1923 年 12 月由韩麟符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乌兰夫入团不久，参加了北方党组织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举办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在李大钊等同志的亲自辅导下，他第一次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基础》，初步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基本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自觉性。由于乌兰夫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很好，1925 年 9 月，党组织批准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乌兰夫由一个追求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4 年冬，北方党组织请外蒙(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达瓦作报告，介绍外蒙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情况。达瓦着重讲了在苏联帮助下，外蒙古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共和国，赶走了帝国主义，清除了白俄匪徒，不再受北洋军阀大汉族主义和封建王公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受苦的贫苦牧民翻了身，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上了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听了以后心情很激动。报告结束后，他们请达瓦到宿舍，大伙围着他问了很多他们想知道的事和想象中的问题:国家领导人中有没有普通牧民?老百姓能不能向政府提意见?牧民现在怎么放牧以及生活怎么样，都搞了些什么新建设?等等。达瓦有问必答，听的人越听越

起劲，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内蒙古该怎么办。有的说外蒙革命前的情况和内蒙古差不多，因此要像他们那样闹革命，“独立”、建“共和国”；有的说按孙中山先生说的办，搞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有的说要像苏联那样，搞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联邦制，建立中华大联邦。至于革命胜利后怎么建设，过什么样的生活和自己想干什么，那就更是五花八门，各有憧憬，充分表现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乌兰夫边听边思索，他想:内蒙古和外蒙古是不同的。内蒙古靠近内地，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数地方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的情况，无论是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与汉族同胞和内地有紧密联系。况且外蒙古革命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发生的，而我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正在胜利发展，怎能一切都照外蒙古的做法办呢?内蒙古有内蒙古的情况，学习外蒙古是学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经验。于是，他说:“我们应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军阀打倒。我们以俄为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建设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乌兰夫的这些想法,作为一种观念尚属萌芽,还不能说已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由此可见他心系蒙古民族、胸怀中华民族,说明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青年。

1924 年 4、5 月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取消蒙藏学校学生官费并停发校服。学校党组织发动学生起来斗争。校长章武同情并支持学生，被当局撤职。学生们被激怒了，列队到蒙藏院请愿，要求恢复学生官费和章武校长的职务。蒙藏院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反而派来官僚政客王维翰任校长，压制学潮。学生们更加愤怒，赶走了王维翰，又列队到蒙藏院找总裁贡桑诺尔布王爷讲理。贡桑诺尔布害怕学生，采取敷衍态度脱身溜走。随后，蒙藏院又派来当过警察局长的金永昌

当校长，想让他用强硬手段，把学生们的劲儿压下去。但结果是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强。金永昌被迫改用软的手段，说好话欺骗学生。学生们看出了他的用心，没有上当，把他也轰走了。北洋政府看到用压的办法不行，特别是在国民革命正由南向北胜利发展的时候，怕把事情惹大了无法收拾，最后只好派来一位同情学生的知识分子吴恩和来当校长。由这位新校长出面与当局交涉，恢复了学生官费，学潮才告平息。蒙藏学校的这次学潮，乌兰夫一开始就参加了，直到取得胜利。他和同学们一起，两次到蒙藏院找贡桑诺尔布讲理。在驱赶王维翰和金永昌两个压制学潮的校长时，他带头罢课，当面质问王维翰、金永昌，揭露他们用压和骗两套手法对付学生的伎俩，牢牢把握斗争方向，发挥了一个青年团员在斗争中应发挥的作用。这次学潮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恢复学生官费，这关系到每个学生的直接利益，所以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同学们心一直很齐，斗志也很旺盛。经历了这次学潮，联想在“南高”参加学潮的情景，乌兰夫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大伙一条心，团结起来一块斗争，任凭多么嚣张的恶势力，也能战胜。

1924 年至 1925 年，北京的革命气氛很活跃，社会上的群众性革命活动很多。北方党组织为了锻炼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特别是党团员，经常让他们参加这类活动或做服务工作。在这期间，乌兰夫参加过纪念二七大罢工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参加过悼念列宁大会的服务工作，并观看纪录片《列宁的葬礼》，参加过欢迎孙中山北上的筹备工作和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参加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服务工作等。这些活动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的，目的是借这种机会和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革命影响，推进国民革命。对参加这些活动或服务的青年来说，这既是受革命教育，也是向社会学习的好机会。

乌兰夫参加这些活动和服务工作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举行悼念列宁大会时，乌兰夫和佛鼎、云润把门检票。当苏联大使馆人员到会时，他们一看是外国人就警惕起来，把几个外国人挡在门外细细盘问。因为语言不通，弄不清是什么人，好一段时间没有让他们进门。使馆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写了个条子递进去，里边派人出来接时乌兰夫等才放他们进场。后来乌兰夫他们知道了挡住的是苏联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既感到不好意思，又觉得好笑。在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乌兰夫和多松年、康根成被抽到北京党组织东城区办事处帮助工作。具体任务是登记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员。当时国民党内部情况很复杂。为了保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确定不让国民党右派参加大会，以防他们破坏和捣乱。党组织向乌兰夫等负责登记的人员作了这样的交代，还给了他们一份北京地区国民党右派的名册。乌兰夫他们在办理登记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总怕有什么疏漏让国民党右派的人混进来。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并没有什么标记，虽然手中有一份名册，实际做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登记时来了一个姓张的，乌兰夫看他面熟，即刻想起曾见过他在街上同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学生争论过。这个人支持“善后会议”，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像是一个国民党的右派。于是他们马上认真起来，不给他登记。这个人破口大骂，还找来几个和他一伙的人同登记人员吵闹。任他怎么吵闹，就是不给他登记。这时，乌兰夫他们查看了国民党右派名册，果然有这个人的名字，就当场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他。这个人闹了一阵子，自知无趣，只好懊丧地走开。在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乌兰夫和康根成等还到北京大街上贴标语。贴标语时遇上了军阀政府的警察，这时乌兰夫他们已有了些斗争经验，巧妙地支走了警察，很好地完成了张贴标语的任务。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和服务工作，乌兰夫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明白了不少原来似乎明白但又不甚明白的道理。最主要的收获是从沸腾的民众情绪中，看到了国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憎恨之情，它爆发出来的力量能把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污浊和黑暗彻底铲除。懂得了革命是要有牺牲的，要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他从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中烈士们用宝贵的生命重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唤醒更多的民众奋起的壮举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知道了胜利来之不易。他逐渐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团结奋斗，几经失败最后才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也得像他们那样，把全国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勇敢地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只有亲身受过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人，才更懂得民族平等的价值。乌兰夫他们这批先觉悟的蒙古族青年，身在北京却时刻想着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1923 年冬，因为清丈地亩而被剥夺了土地、加重了税赋的土默川一带蒙古族群众，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乌兰夫等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知道后，积极支援和配合请愿代表。他们抱着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极大愤恨，到北京的一些大学去串联，呼吁同学们声援。同时还和请愿代表一起到蒙藏院，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这一处理蒙古族事务的机构站在蒙古族同胞一边，帮助伸张正义。不料蒙藏院和军阀政府同其地方政府一样，根本不顾蒙古族同胞的死活。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获得什么结果，却显示了蒙古民族为反对压迫和剥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精神，也使这些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初试锋芒，显露了一下头角。

1925 年初，乌兰夫和多松年、奎璧等创办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蒙藏学校蒙古族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后，中共北方区委就考虑如何通过他们开展内蒙古的工作。为了在内蒙古

传播马列主义，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唤醒蒙古族同胞，北方区委决定依靠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办一个刊物。李大钊派邓中夏、赵世炎选人。他们选中了乌兰夫和多松年，他们两个又找来奎璧。在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领导和支持下，三个人很快就把这个刊物办起来了。乌兰夫他们认为组织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是对他们的信任。这既是开展内蒙古工作的必要舆论准备，也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所以干得非常起劲，非常认真，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把这个刊物办好。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 3 期，但很有特色，在内蒙古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古农民》的办刊目的和指导思想很明确，在第一期上有一篇 16 个字的文章、即:“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还有一篇《为什么办这个报》，讲了内蒙古蒙汉族农民有三个坏命运，第一个坏命运是军阀的压榨剥削，第二个坏命运是王公的专制压迫，第三个坏命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这个刊物设了“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栏目。在“外蒙古人民的生活”栏内的《外蒙古情形的开篇话》中，把外蒙古革命胜利后的情况与内蒙古作了对比之后说:“内蒙古人民也要像外蒙古那样打倒军阀，打倒王公，赶走帝国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蒙古曲”一栏中有这样一首诗:“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还有一首:“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乌兰夫等几个青年人就是用这样鲜明的态度，通俗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向内蒙古的蒙汉族群众指出了受压迫、受剥削、受苦难的根源，向群众宣传要过幸福的日子，就得自己起来打倒军阀、王公和帝国主义的道理。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刊物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内蒙古无数蒙汉族农民的心，像草原上的春雷，唤

醒了内蒙古大地。作为内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

1925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发起了“五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6 月上旬，中共北方区委派乌兰夫和绥远特区工委负责人吉雅泰一起赴归绥，发动声援“五卅”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他们到归绥后，经过宣传、酝酿，通过绥远学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一个多月的声援“五卅”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整个归绥城沸腾起来了。中小学学生游行、集会、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通电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募捐钱物帮助死难烈士家属，还组织宣传队深入附近农村宣传。这次群众反帝爱国斗争，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这是乌兰夫第一次参加组织、指挥群众运动。斗争的胜利使他深受鼓舞，也使他看到了内蒙古和蒙古民族的希望。乌兰夫和吉雅泰回北京向中共北方区委汇报了归绥声援五卅运动的情况后，李大钊给予了高度赞扬，并高兴地说:“内蒙古地区的革命烈火终于燃烧起来了!”

1925 年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蒙古问题议决案》，提出注意内蒙古的工作，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同时作出了帮助建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决定，以这个党广泛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以利于开展内蒙古的革命活动。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对建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10 月 12 日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乌兰夫以北京蒙古族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还有吉雅泰、李裕智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宣告成立，通过了宣言和党纲，分析了内蒙古的情况和革命形势，明确了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王公，确定了联合中国国民党和汉族人民，共同完成国民革命任务的斗争方针。这次代表大会和内蒙古国民革命党

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的革命运动。乌兰夫和其他年轻的共产党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一方面起了贯彻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内蒙古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如何解救蒙古民族，完成内蒙古的革命任务增强了直接感受，提高了革命自觉性，坚定了革命信念。

乌兰夫在北京蒙藏学校的两年，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革命。因为实际上他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革命活动上。但是，他懂得革命需要文化，所以不肯放弃一切可以抓住的学习机会。在校期间，乌兰夫和多松年、奎璧、高布泽博等曾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为实习而办的“乐群补习班”补习文化课。在路途远、时间紧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坚持学习，直至补完应该学习的课程。这不仅表现出了乌兰夫青年时代的学习精神，也考验了他的决心和毅力。

全面看乌兰夫在北京蒙藏学校的两年，应该说是他踏上革命征途，确定一生走什么道路的两年。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蒙古族的不少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之路的同时，也在寻求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乌兰夫正是在北京蒙藏学校的这两年中，找到了跟着共产党走，向俄国人学习，救祖国、救民族的道路。他认准了这条路，并懂得了只有和中华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蒙古人民才能求得解放。乌兰夫这棵幼苗是革命先辈、我国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在蒙藏学校发现的。他们对他寄托了无限希望，并对他进行了精心培养。乌兰夫没有辜负祖国和民族的期望。他从这里踏上革命征途，并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三、在苏联的四年

1925 年 10 月，乌兰夫赴莫斯科。他在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年初结业留校做教学翻译工作，1929 年 6 月回国。在苏联他学习和工作近 4 年。

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中大，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联共(布）为帮助中国培养大革命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而举办的。1925 年 10 月 7 日，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的顾问米哈依·鲍罗廷在国民党第六十六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中山大学的决定，随即成立选拔学生委员会，开始选拔学生。选拔的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中山大学 1925 年 11 月开学，为等后到的学生，1926 年 1 月才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革命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等。为应急需，学校采取速成培训的办法，学制两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民党于 1927 年 7 月 26 日声明与中山大学脱离关系，撤回了国民党送去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对中山大学作了调整，把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到中山大学。1928 年中山大学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中大和劳大先后办了 4 期，共培养学生 1200 多名，1930 年停办。

乌兰夫是中共北方区委选送的。他与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等一起，于 1925 年冬离开北京，经上海取水路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旅行 20 多天抵莫斯科。同时到达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李培芝、李伯钊、朱务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马骏、张锡媛等，共 300 多人。他们是首批到校的学生，到校不久即开学。乌兰夫被编到第六班，学号 51。

刚开学时，学生不懂俄语，教师不懂汉语，用俄语授课，再用汉语翻译，教学进度很慢。乌兰夫为了学好各门功课，首先下功夫学习俄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成了同学中俄语学得比较好的人之一，基本上克服了语言障碍，能听懂老师用俄语讲课。乌兰夫是抱着一颗拯救蒙古民族、为内蒙古和中国革命出力的赤子之心，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寻求革命真理的，所以学习一直很努力。他想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但比较偏重的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特别对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有关民族解放的论述更感兴趣。在学习中，他不死背词句，经常联系他在家乡、在北京接触到和看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蒙古民族为什么衰落，中国为什么受帝国主义欺负，工人和农牧民为什么受苦，地主和资本家为什么剥削，以及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解决这些问题等，把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本来中山大学的学习环境应该是好的，学生们也应该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但事实并非如此。有那么一些学生，或由于认识问题，或因品质不怎么好，总是搬弄是非，制造麻烦，再加上当时联共和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矛盾，也影响到中山大学，致使校内风波迭起。

开学不久，在中山大学建立了联共支部局，但它不承认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的党籍。针对这种情况，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共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分部。而旅莫支部主要负责人任卓宣思想很“左”，反对学生学习俄语和理论，把认真学习的学生诬为“学院派”；在党的组织生活中纠缠生活上的小事，要求党员互相打“小报告”，搞得不少人心理紧张，谨小慎微，不敢学习。副校长米夫为了控制中山大学，想搞掉中共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分部，把中山大学党组织置于学校所在区的联共区委领导下。当时中山大学的情况是:校长卡尔·拉狄克不经常在学校，只是有他的课时才去学校讲课，后来

反“托派”时被撤销了校长职务。学校的日常工作由副校长米夫主持。他主要依靠联共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克夫和王明等做工作。教学工作由教务主任阿古尔负责。阿为了从中国学生的实际出发搞好教学，多依靠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同学中比较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做工作，教务工作组织得很有条理，很得同学们的好评。米夫和阿古尔有矛盾，这就形成了中山大学的所谓“教务派”与“支部派”的对立。两派长期争斗甚至昼夜争吵，有时一连争吵好多天。好好学习的学生对这种搞宗派、没完没了的争吵很反感，不参加这种争吵。米夫和王明他们把这部分同学称为“中间派”“第三势力”。米夫与王明在人品上属于同一种类型，两人一拍即合。王明的确是一个能背诵教条、很会唱高调的人，这就更得米夫的赏识和器重。

1926 年夏，米夫和王明首先挑起了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争论。王明大谈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旅居国党组织领导。经过四天争论，结果解散了中共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分部，中山大学党组织划归学校所在区的联共区委领导。王明因为在这次大争论中“立了功”，在米夫的吹捧和支持下当上了中山大学公社主席。以后他更有恃无恐，利用学校领导间的矛盾，肆无忌惮地大搞宗派活动。

1927 年夏，王明又挑起了反“教务派”的斗争。王明向米夫建议，利用支持联共支部局的人，争取“第三势力”，整阿古尔及支持他的人。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斗争结果，阿古尔的教务主任职务被撤销，搞垮了所谓“教务派”。之后米夫升任校长，王明的靠山更硬了，他也进了联共中山大学支部局，后来闹得就更凶了。

1928 年夏，王明等制造了“江浙同乡会”案，与反“托派”结合起来，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硬给一些学生扣上“托派”“反革命”的帽子，把他们或遣送回国，或逮捕，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

工。对“江浙同乡会”问题，周恩来、瞿秋白等亲自作过调查，弄清了是王明他们为搞宗派整同学制造的假案。瞿秋白等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多次到中山大学讲话，支持多数学生，批评王明和联共中山大学支部局，并曾建议撤销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米夫和王明等对此怀恨在心。1929 年夏，他们又挑起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斗争，矛头直指瞿秋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争，把中山大学搞得人人自危，气氛异常紧张，不少人无心学习。同学们非常气愤，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背后骂王明是米夫的走狗，说米夫是王明的保姆。

乌兰夫对米夫利用王明等搞得校无宁日很讨厌，对王明投靠米夫搞宗派整同学很不理解。他很同情被整的人，但又不好说什么。他不参加这种斗争，有时不得不参加会议时，也保持沉默。他想，我们远离祖国到苏联，是来学习的，是求革命真理的，不是来整人吵架的。多难的祖国和民族在期待着我们，如果在异邦这样浪费时光和青春，何以面对在国内斗争的同志和苦难的同胞！他时刻不忘出国前李大钊同志的叮嘱：“首先要锲而不舍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祖国在期待着你们，蒙古民族在期待着你们”。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不顾什么“学院派”“中间派”“第三势力”一类的流言，不管别人怎么胡折腾，他力排干扰，努力学习。课堂学不成时就在宿舍学，宿舍学不成就到图书馆去学，白天不能学就晚上学，总之是想尽办法不使学习受到大的影响。他既忠厚又爱学习，从来不打别人的“小报告”，所以他和多数同学的关系都很好。蒙古族同学就更喜欢他，都愿意同他交往。就是在校内宗派活动搞得凶的时候，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也是正常的，学习生活也是充实的。

乌兰夫在中山大学的两年时间，除了在课堂上外，主要是在图书

馆和体育场渡过的。乌兰夫喜欢晚上读书，常常读到同屋同学督促他睡觉时才作罢。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实际上他是把图书馆作为“避风港”，特别是在搞宗派的人吵闹厉害的时候，只有在图书馆才能比较安静地看书。他在这个“避风港”里认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他都在图书馆认真读过。在图书馆读这些原著，是课堂学习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的自我补充，不少爱好学习的同学都采用了这一办法。这种学习上的自我补充，对乌兰夫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乌兰夫爱好体育运动，喜欢打排球、篮球等。他身材高，体力好，是中山大学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无论是校内赛球，还是到校外打比赛，都少不了他。他把打球看作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他一直是校队打球的积极分子。在体育场活动，是他调剂精神的主要方法。看书看累了，就到体育场活动一阵子,精神缓过来了就再看书，两者相辅相成。他长期坚持这样做，既保证了有充沛的精力学习，也把身体练得越来越结实。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适应国内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学习军事。1927 年夏，中山大学安排学生先参加了两周军事训练，而后分别送军校学习。乌兰夫和伍修权等先在莫斯科南郊的塔拉索夫斯基参加军训，接着又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训的内容主要是操练、行军、野营和学习射击。在步校主要

是学习军事理论、战略与战术、指挥和兵器使用等。在军训中，活动量和训练强度都很大，有些学生的身体支持不下来。但乌兰夫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身体素质很好，又有平时爱运动的底子，摸爬滚打都行。乌兰夫参加军训和在步校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学到了军事基础知识，初步学会了使用一般武器，具备了参加武装斗争的基本条件。在军事学方面的这些基本知识，对乌兰夫回国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战争时期从事武装斗争、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27 年 9 月底，乌兰夫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结束学习回中山大学后，组织决定调他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教学翻译。与乌兰夫同时到东方大学做翻译工作的有罗世文、孙冶方、陈昌浩、甘泗淇。在那里学习的有从内蒙古去的赵诚和佛鼎。后来又有白海风、朱实夫、乌献文(乌力吉敖喜尔)、额尔顿毕力格、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德力格尔、阿得赫、高布泽博、纪松龄等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到东方大学学习。乌兰夫先在东方大学军事班，两个月后又到政治班，后来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入中山大学时，他也一同回到了中山大学，继续做教学翻译工作。在东方大学，他主要担任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列宁主义和苏维埃建设等课程的课堂翻译。在中山大学，他主要是翻译政治经济学课，包括把用俄语授课的教师讲的课程译成汉语以及在语言不通的师生间对话时进行互译。翻译是语言互相不通的师生间教与学的桥梁，翻译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乌兰夫知道自己的作用，觉得肩上担子很重。为了做一名合格的教学翻译，他努力冲破两道“关卡”，即课程内容关和语言关。要准确翻译俄语教师讲的课程内容，首先要自己学通弄懂。为了把课程内容译好，乌兰夫不分昼夜地做课前准备，反复琢磨课程内容，力求理解得深刻准确。为了译好政治经济学课，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部俄文版的

《资本论》作为案头书。这部《资本论》可帮了大忙。他经常用它同授课内容对照，保证了课堂翻译的质量。在语言方面，作为俄汉翻译，他既要掌握俄语，又要精通汉语，语音还得准确。乌兰夫从小生活在土默川，讲的是一口受山西地方语影响的土默川话，有些语音不仅来自南方的学生听不懂，就是北方的学生也听不清。所以，开始阶段他在课堂翻译时，无论怎么咬音嚼字，还是有同学听不清楚。为了保证翻译效果，乌兰夫决心攻下语音关。他主动向北京话讲得好的同学学习，苦练“京腔”。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多久他的语音就比较准确了，虽然还不是标准的北京话，但同学们都能听懂。这一关攻下后，乌兰夫如释重负，不再因为语音不准而心理紧张。乌兰夫曾说:“在课堂做教学翻译使我受益匪浅，要译好就得学好，可以说我要比同学们早学一个晚上，而且我是反复地学，特别是我觉得对自己用处大的东西还要多学几遍，如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问题就是这样。通过课堂翻译，取得了教学同长的效果。翻译一次就等于学习一次，反复地译就是反复地学，这就学得更扎实，更深刻了。我这点理论底子就是这么学来的。”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乌兰夫被抽调到大会的秘书处参加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这时候乌兰夫已有了些翻译工作的实际经验，也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具备了担当此任的水平。他认为自己参加六大文件的翻译工作，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是自己的幸运和光荣，工作非常认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分担的翻译任务，得到了大会秘书处的好评。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强调了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是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的十大纲领。六大确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文件翻译是分段进行的，乌兰夫虽然没有得到全部文件，但从经手翻译的部分中，也大致了解了会议内容，后来听了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传达，对六大精神和国内斗争形势就知道得比较全面了。他拥护六大确定的路线，关心国内斗争，尤其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更加放心不下。

党的六大结束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莫斯科召开。团的五大结束后，苏联共青团中央邀请与会代表到各加盟共和国参观。代表中的一位上海青年工人去明斯克，乌兰夫给他做翻译，一同访问了明斯克。在明斯克，他们参观了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这次参观访问，使乌兰夫大开眼界，深受教育。他亲眼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苏联人民迸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看到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他想:十月革命前，苏联人民在沙皇和后来的资产阶级统治下，同中国人民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帝国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俄为师”，实在是太有道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无论是内蒙古的革命还是全国革命，要取得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但是我们不是孤立的，苏联人民是真诚地支持我们的。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支持我们，只要我们能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坚持正确的路线，前仆后继地斗争下去，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从明斯克回来后，乌兰夫的心情一直不平静，总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问题。

乌兰夫在莫斯科期间，见过斯大林，听过斯大林、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苏联领导人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讲演，参加过庆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活动，声讨过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参加过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游行，参加过

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听一次讲演，每参加一次活动，乌兰夫都深受鼓舞和教育，一些感人至深的活动和讲演，一直铭刻在他的心中。乌兰夫80高龄时曾有这样两段回忆：

“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消息传到中山大学时，我们正在上课。同学们闻讯一跃而起，纵情欢呼，热烈地互相拥抱，欢庆胜利。顷刻间，全校同学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涌进了学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散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工人、机关干部、市民参加到我们的游行队伍中来，与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有些苏联青年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乌拉!’‘中国革命乌拉!’游行队伍来到共产国际大厦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又有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表讲演，其中以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讲话最有鼓动力，最打动人心。他挥舞着拳头说：‘上海现在已经在中国人民手里了。可是，当革命军开进上海时，他们可以看到英国士兵设置的铁丝网。现在中国，革命仍处在胚胎阶段，反革命势力还没有被驱逐出去，张作霖的军队仍威胁着武汉。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日益发展壮大，无疑它是可以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和困难的。莫斯科的工人，向上海革命的无产阶级表示祝贺并致以兄弟的敬意。’他警告帝国主义，在必要的时候，苏联无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到达联共中央大楼前的广场。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接见了我们，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傍晚我们才返回学校。”

“四一二政变一个月后的5月13日，斯大林同志亲临我们中山大学作报告。大家希冀斯大林同志能解释中国国内发生的问题，指出今后中国革命的方向。斯大林站在讲台上，依然是那么沉着庄严，深

邃的两眼射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光芒。他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解答了同学们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他指出:‘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并说:‘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不断被台下的掌声打断。斯大林在百忙中抽身到中山大学来向我们报告中国革命的局势这一行动本身，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时间过去了 60 年之后，他还记得如此清晰，可见当时给乌兰夫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件事对他感染之深和鼓舞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六大以后，乌兰夫的心情一直不平静。1928 年下半年，和他同时去莫斯科的同学大部分已陆续回国。一想起国内的斗争和内蒙古革命，他就坐不住，很想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带回祖国，带回内蒙古，到人民革命斗争中去实践。

四、扎根于群众之中

1929 年 9 月，乌兰夫回到阔别 4 年之久的内蒙古，很快就在土默川站住脚，扎下根，把被敌人扑灭了的内蒙古革命烈火又点燃起来。

回国前，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书记瓦格湟，同乌兰夫及与他一同回国的佛鼎、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德力格尔谈了话，除给他们介绍了国内斗争形势和内蒙古的情况外，还给他们布置了四项任务:一是在农民、工人、士兵中发动和组织革命运动；二是联系地方上分散的共产党员，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三是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扩大党的组织；四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武装游击队。同时，瞿秋白和马吉尔授权他们，并承认他们在内蒙古建立和发展的党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的党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叮嘱他们要秘密开展工作，注意培养革命干部，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在乌兰巴托办一所干部学校。由于内蒙古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为他们的安全着想，瞿秋白和马吉尔指示他们同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阿莫嘎耶夫联系，组织关系也留在那里。

回国途中路经乌兰巴托时，他们向阿莫嘎耶夫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布置的任务，并同阿一起研究了回国后的工作问题。按照阿莫嘎耶夫的意见，回国后，乌兰夫和佛鼎去绥远，特木尔巴根和朋斯克去热河，德力格尔去察哈尔。在绥远建立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任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工作，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奎璧同他们一起回国，由他负责宣传与联络。对在乌兰巴托办干部学校的问题，考虑到一时动员不出那么多的人到乌兰巴托学习，决定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设一个内蒙古班。干校什么时候办，根据情况发展，以后再定。

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布置的任务和所提的要求，以及阿木嘎耶夫的安排，中共西蒙工委的佛鼎、乌兰夫、奎璧三人，途经大青山北部的武川县时，在白少泉村的一个姓王的老乡家开会，确定乌兰夫和奎璧负责大青山以南土默川地区，代号一区；佛鼎负责大青山以北地区，代号二区；李森和三得胜负责包头地区，代号三区。同时确定，工作初期以隐蔽调查情况为主，相互间尽量不接触，实在需要碰头时，通过李森联系。开完会，他们就开始分头行动，很快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开展了起来。

乌兰夫到土默川后，以自己的家为落脚点，回到了塔布村。这时候乌兰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他先在家里呆了几天，与家人略享一下天伦之乐，而更主要的是想观察动静，以便决定如何行动。过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迹象，他就以赶车、捡粪、走亲、访友为名，在本村和附近村子串联。在串联中，通过与乡亲们和亲友们交谈，他了解到，1929 年春天，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党组织就被破坏了。革命同志有的被捕，有的牺牲，保留下来的也都停止了活动。他们中多数人积聚着满腔怒火，想等待时机跟敌人算账；也有一些人因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而消沉下来。敌人依然到处肆虐，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城乡。面对这样的情况，乌兰夫想:革命真是处在低潮啊，怎么办?既不能受一些同志愤怒情绪的影响而盲动，更不能因敌人的凶残和少数人失去信心而气馁。他深思慎掂，反复思量，拿定主意稳扎稳打。具体做法就是联络革命同志，宣传革命，教育群众，建立、发展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培养干部，聚积力量，待机行事。按照这样的想法，他开始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地下革命斗争。开始阶段，他先在归绥至包头之间的村镇宣传我国南方工人、农民和工农红军纷纷起来斗争的革命形势；介绍苏联和蒙古的革命经验，和他在那里亲眼看到的工人、农民和牧民翻身过上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用绥远地区白色恐怖的

严酷事实，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本质，讲解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在内蒙古应该怎样起来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等革命道理。群众听了乌兰夫的宣传和讲解，心里又亮堂起来，一些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思想消沉的人重新振奋起了精神。很快，在忽洞沟门、阿麻板申、白塔、美岱、黑沙兔、沙尔沁、把什、毕克齐、台阁牧、东甲兰营一带，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以村镇为基点的革命网络。与此同时，佛鼎、奎璧和李森等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因叛徒告密，奎璧回家时被捕。之后，敌人又去抓乌兰夫，幸得妻子云亭和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他才及时躲避脱险。

1930 年初，乌兰夫和李森到伊克昭盟同奇子俊取得联系。奇子俊在蒙藏学校与乌兰夫是同学，是由共产国际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回内蒙古工作的。这时，朱实夫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与乌兰夫接上了头。接着，乌兰夫又与在他之前从苏联回国的赵诚、云润联系上。至此，由共产国际派回的人基本上都联系上了，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奎璧被捕后，佛鼎从后山来土默川。在他主持下，由乌兰夫、云润等参加，开了一次会。会议决定:一、设法了解奎璧被捕后的情况；二、由佛鼎和云润送 20 多名革命青年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经过了解，知道奎璧在监狱里表现很好，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出来。佛鼎和云润把 20 多名青年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共产国际决定:云润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佛鼎调回苏联工作；佛鼎调走后，西蒙工委书记由乌兰夫接任。陪佛鼎、云润送学员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三德胜回来后，向乌兰夫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三项决定。

乌兰夫脱险后，在“老一团”隐蔽了一些日子。“老一团”是一支蒙古族部队，士兵和下层军官大多是贫苦农牧民的子弟，是为了混饭吃才当兵的。他们重民族感情，同情并支持革命。李森在这个团当

过排长，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经常利用这支部队掩护革命同志。这年春天，乌兰夫和李森去伊克昭盟与奇子俊联系时，回来的路上曾遇见这支部队的一位带队出走的排长孙录，经过做工作，从这个排选了包括孙录在内的五、六名青年军人，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以后他们又发展了曾掩护过李森的一位排长廉仲入党，使这支部队成了革命同志的一个立足点。这次乌兰夫在这里躲避搜捕，为他创造了在这支部队做工作的机会，成了他做军队工作的最初尝试。乌兰夫了解了部队的情况，结识了一些人，并向他们作了革命宣传，使他们更加倾向革命。

1930 年开春时，乌兰夫在自己家里主持召开了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实夫、奇子俊、三德胜、李森、赵诚、张丙三、陈老四等 10 多人。乌兰夫的结发妻子云亭，除照顾他们生活，为他们服务外，还带着 8 岁的女儿云曙碧、5 岁的儿子布赫在门外放哨。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又一个晚上。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认真分析了绥远地区的斗争形势，根据绥远省当局征收“锅厘税”激起群众不满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群众工作有一定基础的村镇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锅厘税”斗争；同时还决定，继续选送青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培养内蒙古革命需要的蒙古族干部。会后不久，因为受“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有人主张在归绥城搞暴动。乌兰夫认为，绥远地区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前几个月的工作仅仅是对群众的初步发动，革命力量尚未聚集起来，军队里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没有武装力量，不具备发动武装暴动夺取归绥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组织一些同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斗争，用以锻炼群众，逐步扩大革命力量。如果盲目干条件不成熟的事，等于自我暴露，必然造成无谓的牺牲。他说服了急于起事复仇的同志，避免了盲目行动，保证了群众革命斗争的稳步发展。乌兰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说明他对六

大路线和六大所指出的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冒险主义，有较深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已是一个有理论修养的脚踏实地的革命者。

1930 年 8 月，乌兰夫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向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莫嘎耶夫汇报回国后的这段工作，同时看望了在那里学习的内蒙古青年。阿莫嘎耶夫充分肯定了他们这段工作的成绩，同意西蒙工委确定的工作任务和采取的斗争方针，鼓励他们在内蒙古努力打开一个革命的新局面。乌兰夫很感谢阿莫嘎耶夫的鼓励和支持，听了他的话信心更足了。汇报了工作之后，乌兰夫很快返回内蒙古。

回到内蒙古后，他又在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向同志们传达了汇报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在土默川建立农民协会的方案，决定待多数农民觉悟后，发动反“锅厘税”斗争。然后，乌兰夫和其他同志分头深入到群众基础好的村子去做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们就在美岱召、毕克齐、沙尔沁、把什等十几个村子建立了农民协会，在老农会会员的带动下，有不少提高了觉悟的农民加入到农会组织中来。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了，群众也觉得有了主心骨。

有一天，乌兰夫正在把什村召集农会会员开会，遇上两个收税的人来催要“锅厘税”。乌兰夫告诉这个村的农民协会负责人山庆子，让他跟乡亲们说，坚决顶住，不能交“锅厘税”。山庆子是个年轻人，很有点闯劲。他很快出去爬到房顶上鸣锣高喊:逼税的人又来了，我们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交税！?大伙都顶住，谁也不要交，把收税的人轰走！乌兰夫听着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山庆子有胆量，敢斗争；着急的是山庆子这样莽撞，怕他出事。在农会会员们的带动下，全村人齐心一块斗争，要税的人没有办法，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天，收税的人领来警察为他们助威。正巧乌兰夫认识这个警察，给他讲了些群众生活艰苦的道理，把他支走了。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

过了几天，又派警察来抓山庆子。乌兰夫事先得到了消息，派李森通知山庆子躲开了。警察不认识山庆子，把山庆子的父亲当山庆子抓了去。关了好多天，他们才发现抓错人了，要放老汉出去，可是老汉怎么也不走。他还说，在这里好歹还有口饭吃，回家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不如在这里。这位老人的话，反映了当时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也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尖刻讽刺。

把什村反“锅厘税”斗争的胜利，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鼓舞了群众。此后，附近村子的人都想起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认为在较大范围内发动抗“锅厘税”斗争的条件成熟了。于是，在山庆子父亲被释放，官府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刚想松一口气的时候，乌兰夫在美岱召三德胜家召开了十多个村子的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会议总结了把什村斗争的经验，布置了发动反“锅厘税”斗争的工作。会上，大家情绪激昂，有不少人夸奖山庆子，骂逼税的人和警察是一帮孬种。乌兰夫一边听大伙议论，一边沉思。当大伙兴致勃勃地说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说：“把什的斗争胜利了，我和大家一样高兴。这是大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被破坏，国民党抓人杀人搞白色恐怖以来，第一次显示我们农民群众的力量，起到了我们发动反‘锅厘税’斗争的演习作用。这次演习成功，为其他村子的斗争提供了经验。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把什的斗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它有没有什么缺陷，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在今后的斗争中注意的地方。依我看，这次斗争胜利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山庆子敢斗争的精神和全村农民的团结一致。敢斗又团结一致，敌人就不得不退缩了。不足的地方也有，这就是山庆子的胆子太大了。他上房敲锣大喊，好处是振奋了全村人，使更多的人参加到斗争中来，但这样做太危险了。我当时就攥着一把汗，很怕万一催税人看到了是山庆子带头，警察就可能马上来把他抓走。幸好他们当时还没有发现，

来的那个警察我以前又和他打过交道，他也觉得收‘锅厘税’理亏，才没有出事。事后他们虽然知道是山庆子带头，但他们不认识山庆子，又把他老子错当他抓走了，事情才算过去。这叫‘无巧不成书’，巧事碰到一起了。但是不能每次都碰巧哇！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以后再组织斗争的时候，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只能在后边指挥，不能太暴露了。我们不能光看到敌人无能，还要想到敌人凶残。这叫敢斗、会斗，既要能打击敌人，又要会保护自己。”大家听了都觉得乌兰夫说得有理，认识得到了很大提高，斗争的信心更坚定了。这次会议决定:凡是农民协会力量强、群众工作基础好的村，都起来抗“锅厘税”。党组织通过农民协会领导的抗“锅厘税”斗争，在土默川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绥远省和土默特旗国民党当局被搞得摸不着头脑，被迫让步，对那些抗交“锅厘税”的村子也就不声不响地不收了。抗“锅厘税”斗争的发起和胜利，标志着被扑灭了的内蒙古革命烈火又燃烧起来了。斗争的胜利，使群众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而敌人却对群众革命风潮的再起感到惊恐和沮丧。

乌兰夫从苏联回来，本来敌人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反“锅厘税”斗争的兴起，更使敌人怀疑与他有关，敌人对他越来越注意了。但由于他扎根于群众之中，群众保护他，他又注意地下斗争的方法，敌人的怀疑没有实据，也不好动手。1930 年上半年，敌人大搜捕，又抓了一些共产党人，却仍然没有搞清楚四处皆发的反“锅厘税”是怎么搞起来的。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向乌兰夫下手。警察突然到塔布村乌兰夫家搜捕。这天，乌兰夫正好没有在家，敌人扑了空。他们在家中乱翻一通，企图找到什么共产党嫌疑的凭证。七翻八翻，他们终于找到了乌兰夫从苏联带回来的那部俄文版《资本论》。他们不识洋文，产生疑惑，恶狠狠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乌兰夫妻子云亭急中生智，顺口说:“这是孩子爷爷的《圣经》。”领头的警察不信。云亭又说:

“不信你问孩子他爷爷。”云明亮老人说:“不是《圣经》，你说是什么?”土默川有天主教堂，有的警察见过神父的《圣经》，也是和这差不多的洋文，便无可奈何地把《资本论》扔了。敌人这次到乌兰夫家搜捕，一无所获，只好懊丧地离去。

乌兰夫从苏联带回来的这部《资本论》“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在莫斯科，它给了乌兰夫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提高了教学翻译的水平。乌兰夫对这部《资本论》很有感情，从苏联回国轻装就道时没有舍得丢掉。回国途中进入内蒙古草原再次减轻行装时，他把它埋在沙滩，后来设法取回来交给云亭珍藏。这次事件后，为防万一，云亭又把它转给乌兰夫的姐姐保存，全国解放后才“完璧归赵”。乌兰夫对这部《资本论》久经战乱浩劫，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感到喜出望外，一直作为心爱的“宝物”珍藏着。现在，这部书已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被收藏起来。

乌兰夫从 1929 年秋落脚土默川到 1931 年秋的两年中，不辞辛劳，不顾安危，为把内蒙古的革命烈火再次点燃起来，四处奔波。他和同志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们在土默川、在内蒙古播撒了革命火种，初步发动了群众；在不少村镇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适时地组织和引导了群众斗争；动员了几十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让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烈火，在越来越多的觉悟了的群众心中又熊熊燃烧了起来。这两年，对乌兰夫来说，是他独当一面，独立工作的开始。在斗争中，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增长才干，不断走向成熟。敌人怀疑他，害怕他，却抓不住他，对他毫无办法。而群众则越来越信任他、爱戴他，原来一些人认为他出国留学回来背粪筐、赶大车是无大志、没出息的误解也逐步消除了。知道了他是在为蒙古民族、为内蒙古同胞办大事的，群众无不交口称赞。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展开和中国共产党在内

蒙古影响的扩大，云泽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五、营救王若飞

1931 年秋天，王若飞作为中共西北特委书记回国。9 月到达包头，在泰安客栈和乌兰夫接头。和王若飞一同到包头的还有吉合。

乌兰夫在莫斯科和王若飞接触过。那是 1928 年六大过后不久，乌兰夫在一个饭馆吃饭，正好王若飞和他的夫人李培芝也去了。通过李培芝的介绍，乌兰夫和王若飞结识。在异国相遇，又志同道合，两人谈得很投机。在交谈中，王若飞询问了一些内蒙古的情况和蒙古族风情。乌兰夫尽自己所知作了介绍。王若飞听得很有兴趣，表现出了对内蒙古和在苏联学习的蒙古族青年的极大关注。他鼓励乌兰夫，在搞好工作的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革命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还讲了不少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王若飞的举止言谈表现出了坚毅、深沉、潇洒、博学的革命家风度，乌兰夫很自然地产生了敬佩之情。那次接触，双方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包头泰安客栈再次相见，两人都难以抑制内心的高兴，情不自禁地互道别后之情。随后，王若飞谈了他回国的任务，乌兰夫向他汇报了回国两年来工作的情况。王若飞对乌兰夫等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能站住脚、扎下根，经过短短两年的努力，建立、发展了党和革命群众组织，把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并同敌人展开斗争，感到十分满意，充分肯定了他们取得的成绩。这是乌兰夫回国两年来，第一次在国内见到上级领导并汇报工作。他听了王若飞的话后，力量倍增脸上浮现着幸福的微笑。

王若飞回国的任务是开辟包括内蒙古西部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工作，首先要办的一件事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系的西北地下交通线，并建立这条交通线上的包头国际交通总站。关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王若飞对乌兰夫说，“九一八”日寇侵占

东三省后，国内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已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在全国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根据这种形势，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需要发一个《告蒙汉各族同胞书》，发动蒙汉群众抗日。为了广泛地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可以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通过它去联系更多的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这个组织的名称要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可不可以叫“平民革命党”？至于叫什么合适，要好好考虑一下。他还说，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得准备武装斗争，这就要注意做军队的工作。对已初步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也不能放松，要继续做好。群众工作是我们组织抗日和各种斗争的基础，对这一点在任何时候思想上都必须明确。王若飞讲了这些以后，问乌兰夫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乌兰夫表示完全同意王若飞的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党的外围组织叫“平民革命党”，由王若飞草拟《平民革命党宣言》。乌兰夫负责筹建包头国际交通总站，并由他担任总站站长。尔后他们就分头行动了。

乌兰夫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老一团”找地下党员廉仲，与他商量建立包头国际交通总站的事。乌兰夫向廉仲讲了王若飞的意见后，提出拟用廉仲在包头的一处房子改成一个卖麻的店铺，以开麻店为掩护，承担交通总站的任务。廉仲赞成乌兰夫的意见，并答应由他负责把房子改建成麻店。两人商量好以后，就匆匆分手。

当天晚上，乌兰夫就到泰安客栈向王若飞汇报。王若飞认为他们行动很快，考虑得也很周到，同意他们的设想，同时嘱咐抓紧把包头国际交通总站建起来。接着王若飞把他拟的《平民革命党宣言》草稿交给乌兰夫，乌兰夫看后认为写得很好，就这样定稿了。把这两件事办妥以后，王若飞让乌兰夫给他全面介绍西蒙工委地下党和农民协会

的组织状况及活动情况，并提出想和地下组织的一些主要同志见见面。起初，乌兰夫为王若飞的安全着想，不主张他同更多的人接触，由于王若飞坚持，乌兰夫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以后，乌兰夫在一个条件比较好的餐馆定了三桌饭，集合了20多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以聚餐的形式同王若飞见了面。虽然王若飞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多数同志也并不知道他是谁，但看到了坐在面前的这些生龙活虎、精神饱满的革命同志，王若飞感到十分高兴。他以庄重的笑容，满意而欣慰的神态，表达了他对同志们革命精神的赞誉和所寄予的无限希望。

此后，乌兰夫按照王若飞的意见，在归绥、包头一带继续领导群众开展反“锅厘税”斗争。他还亲自起草了《告土默特旗蒙民书》，通过地下党员和农协会员散发出去，号召蒙古族人民行动起来，和汉族同胞团结在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和盘剥，使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烈火燃烧得更旺。

王若飞部署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在包头一带作了了解后，扮成收买大烟土的商人，又去五原了解河套一带的情况。乌兰夫派曾在“老一团”当过连长又熟悉河套情况的三德胜陪同，为王若飞作掩护。他同时安排吉合去伊克昭盟，打听陕北红军的情况，争取同他们取得联系。1931年11月中旬,王若飞对河套一带的情况作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后回到包头，准备去宁夏，想尽可能早一点把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展起来。乌兰夫指定李森为王若飞做西行准备，并让他负责护送王若飞到宁夏。乌兰夫准备在王若飞起程的那天早上，去泰安客栈为他送行。不料前一天夜间，王若飞被敌人抓走了。

乌兰夫到泰安客栈从看门人口中得知王若飞被捕后，便机警地佯称是来找黄掌柜(当时王若飞化名黄敬斋）谈生意的，并说黄还欠他

大烟土钱，警察抓走了他，欠的钱怎么办呢?得赶快去找他要钱。趁看门人去打电话叫警察的一刹那，乌兰夫抽身就走。为防万一，乌兰夫一边跑一边把身上带的《平民革命党宣言》草稿吞进肚里。脱险后，乌兰夫马上到“老一团”找李森，把王若飞被捕的事告诉他，并立刻分头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王若飞由苏联回国到包头只有两个来月，在这两个来月中，他做了大量工作，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使在这里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有他在，乌兰夫和同志们都觉得心里有底。对王若飞被捕，乌兰夫感到十分不安。他虽然曾劝王若飞注意安全，尽量少露面，但毕竟是在包头，是在自己工作的区域内出了事，总觉得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责任感和战友情，使乌兰夫深感内疚并深深自责。但他并没有为这种心情所困扰，而是从革命大局和党的事业出发，决心尽一切可能营救王若飞。

乌兰夫对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同志作了隐蔽部署后，就让李森设法了解王若飞被捕和关押的情况。李森通过关系了解到，王若飞从五原回包头时被敌人的特务发现，被跟踪、盯梢，而后被捕。随后，敌人把他押往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后来关进绥远监狱。王若飞是知名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很难隐瞒，所以他索性堂堂正正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大义凛然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对中共西蒙工委领导的地下党情况，他只字不吐，所以，地下党组织没有因为他被捕而遭受破坏。乌兰夫由于常同王若飞联系，已为敌人所注意，并被敌人通缉。但因为他生长在内蒙古西部，群众基础很好，又注意隐蔽，所以长期周旋在敌人身边，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过。乌兰夫回忆他这段经历时说：“托马克思的福，我这个人命大，王若飞同志被捕后，敌人很想把我抓住，却无可奈何于我。”

摸清了王若飞被捕和关押的情况后，1931 年底，乌兰夫和朱实夫以及几名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同路去乌兰巴托，向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鲍尼考夫汇报王若飞被捕的情况，并请示如何进行营救。鲍尼考夫听了汇报后，很重视这件事，也很理解乌兰夫想尽快营救王若飞出狱的急切心情。他指示要尽全力营救王若飞，营救方法是用钱打通有影响、能起作用的国民党官员的关系。如果经费不足，可以随时派人去取。乌兰夫和鲍尼考夫想法一致，为了尽快展开营救工作，汇报完后他们就立刻返回内蒙古。

敌人逮捕王若飞后，觉得是获得了一个大胜利，想乘势抓更多的共产党人，气焰十分嚣张。乌兰夫和朱实夫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没几天，朱实夫就在归绥被捕了。乌兰夫为了躲避敌人，以买树为掩护，去托克托县转了几天，而后才回到归绥近郊一带打听王若飞在狱中的情况。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乌兰夫联系了几个有活动能力的人，想通过他们去做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一些头面人物的工作，让这些人保释王若飞。但这些人知道王若飞是中共要员，不敢出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越来越意识到营救王若飞的难度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见效，便转而考虑做监狱内的工作，以尽量使王若飞在狱中少吃苦头。于是他找孟纯商量，拟利用打入绥远监狱任二科科长的孟纯妹夫任子华这个关系，一是让他以合法身份在生活上尽量关照王若飞，二是通过他让在包头铁路工作的地下党员张有明打入监狱做收发工作，以便同狱中的王若飞联系。任子华接受了任务，这一设想得到了实现。通过这条线，乌兰夫知道王若飞住的牢房潮湿，担心他日子久了搞坏身体，叫云亭赶做了一件棉腰子，送进狱中给王若飞穿。这件棉腰子，饱含着乌兰夫和云亭的同志之情，表达了蒙古族同胞对王若飞的深情厚意。王若飞接到棉腰子，摸了又摸，看了又看，他深深地理解这是

同志们和蒙古民族对他的关心、期望和信任。

铁窗锁不住真理。王若飞以共产党人特有的坚强意志，在狱中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革命道理，组织政治犯同敌人斗争，使貌似强大的敌人胆寒，令有正义感的目睹者起敬。王若飞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消息，不断由张有明带出，乌兰夫通过地下党组织传给同志们和革命群众，每一个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乌兰夫铺设了任子华、张有明这条线，铁窗内外就信息畅通了。乌兰夫给王若飞递进条子，告诉他地下党组织及时采取了隐蔽措施，没有受损失，地下斗争在继续；组织和同志们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他，支持他和狱中同志的斗争。王若飞也给乌兰夫传出条子，告诉组织:敌人已知道他的身份，目前还不会杀他，但也不会轻易放他出来。希望乌兰夫不要为营救他而奔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抓好。铁窗内外，蒙汉革命同志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肝胆相照，显示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体现了渴望解放与幸福的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王若飞是为了领导大西北和内蒙古的革命斗争而来的，但他在宏图未展、壮志未酬的时候，就身陷囹圄。乌兰夫把营救王若飞出狱看作是关系内蒙古、大西北和全国革命的一件大事，深感责任重大。尽管王若飞一再嘱咐乌兰夫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为营救他而奔走，乌兰夫也知道营救王若飞难度很大，可是在他认为还没有尽到最后努力之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罢休。

1932 年 3 月，乌兰夫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就赶赴张家口，找德穆楚克栋鲁普王爷驻张家口办事处主任补英达赖，因为乌兰夫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想让他帮助营救王若飞。乌兰夫见了补英达赖，向他说明了来意，补英达赖听了以后惊恐不已，连说这事办不了。乌兰夫对他表现出的这种态度并不觉得意外，于是向他告

辞，返回了土默川。

7 月，乌兰夫和地下交通员毛仁子、侯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再次向鲍尼考夫汇报营救王若飞的情况。鲍尼考夫听了乌兰夫的汇报，看了王若飞写的条子后说:“这个问题已报告共产国际，你先在这里等一等，等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以后再说。”

这一等就是几个月。乌兰夫既惦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又想着营救王若飞的事，心中十分焦急。利用这段空闲时间，他看望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的内蒙古青年，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形势和内蒙古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还与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等蒙古族青年谈话。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的安排下，乌兰夫参观和访问了一些城镇和牧区。等到年底他们才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一定要营救。如何营救主要在上边，现在正在想办法。鲍尼考夫对乌兰夫说:你们已作了很大努力，看来这样不行，你亲自跑来跑去很危险，回去后不要再跑了，选一个好隐蔽的地方，开展工作。以后我们派联络人员在边卡上同你们联系，你也不要亲自来这里了。

1933 年 3 月，乌兰夫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土默川。这时朱实夫已获释。乌兰夫在家中召集孟纯、赵诚、李森、张炳三和朱实夫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王若飞被捕前的部署，研究了如何继续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关于营救王若飞的问题，虽然共产国际说由上边想办法，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哪怕有一线希望，也想试试看。安排好工作后，乌兰夫又去了张家口，想通过在同盟军孙殿英的 41 军当政治部主任的韩麟符做傅作义的工作，让傅出面放王若飞。乌兰夫找到韩麟符向他讲了要营救王若飞的事以后，韩答应得很痛快，说路过归绥时找傅作义说这件事。乌兰夫听了很高兴，觉得大有希望，就在 41 军住下来等消息。不久，41 军西调，乌兰夫随他们一

同到了归绥。这时他又催问韩麟符营救王若飞的事怎么样了。韩只是说正在想办法，并不见有什么行动。等了好多天，乌兰夫再找韩麟符时，他就支吾着推托了。乌兰夫看出了韩麟符的心思，不再相信他，也不想再求他了。利用关系托人营救王若飞屡屡碰壁，乌兰夫觉得这条路走不通了，虽然他还不甘心，但面对这样的现实，已无法可想，也只好作罢。

虽然王若飞依然在狱中，但自 1931 年 11 月王若飞被捕，到 1933 年冬乌兰夫离开 41 军，在这两年中，为了营救王若飞，乌兰夫两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找共产国际代表，两次赴张家口求朋托友，可以说不辞辛苦，不顾安危，想尽了办法，尽到了责任。在营救王若飞这件事上乌兰夫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和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表现了他胸怀民族和革命大局，对党、对革命同志的一片忠心。

六、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不准抵抗的命令，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方针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进攻上海，1933 年 2 月 17 日进攻热河，继而进攻察哈尔，侵略魔爪步步紧逼。内蒙古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蒋介石依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连用重兵“围剿”工农红军。在此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决议、文告和宣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义愤填膺，民众抗日怒潮高涨，先后发起“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推动下，1933 年 4 月 26 日，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师出征，收复察北大片失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爱国军民。具有爱民族、爱祖国光荣传统的蒙古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对蒙古民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与日寇勾结，引狼入室，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早有警惕。1932 年和 1933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西部地区先后建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绥远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等民众抗日组织，发动和组织蒙汉族人民团结抗日。蒙汉族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昂。

以乌兰夫为主要领导的中共西蒙工委一直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王若飞被捕前就指示中共西蒙工委和乌兰夫注意做军队工作，准备武装抗日。在日本侵略者进攻热、察时，共产国际又指示乌兰夫把主要精

力转到包括争取德王抗日在内的民族工作方面来。根据王若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早在 1933 年前，乌兰夫就在“老一团”和孙殿英的 41 军中宣传抗日，并在这两支部队中发展了地下党员。1933 年 4 月，乌兰夫和朱实夫在张家口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和察哈尔御侮救亡会成立大会；6 月又参加了由察哈尔御侮救亡会发起、在张家口举行的抗日御侮群众大会。大会提出了武装保卫察哈尔和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为了便于发动蒙汉族群众抗日，救亡会准备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1934 年初，乌兰夫到归绥土默特高等小学任教，以这所学校为基地，同已在这里任教的奎璧一起，开展地下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德王的工作和准备建立抗日武装方面。

德王，即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袁世凯称帝时曾加封亲王）兼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具有民族主义思想，标榜蒙古民族自治和振兴，想建立蒙古大帝国，当成吉思汗第二，是一个在蒙古族各阶层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国民党政府想利用他推行自己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他实现其“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华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首先争取他抗日，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也要力争推迟他降日，以赢得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乌兰夫和中共西蒙工委想尽一切办法掌握德王的态度和动向，并对他施以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内蒙古，批准了内蒙古各盟旗驻北京联合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提出的《蒙古盟旗组织法》。德王起而反对，并派人到京、汉、宁等地揭露该“法”意在加强对蒙古民族控制的实质。随后蒋介石亲自召见德王，想利用他统治内蒙古各旗。但因为蒋介石不想给他实权，德王认为蒋介石不信任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拉拢下，1933 年 7 月，

他发起了“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由他总揽内蒙古行政大权。迫于日军进攻热、察的形势，蒋介石怕难以控制德王而造成内蒙古形势恶化，准允德王组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百灵庙蒙政会”），还颁布《蒙古自治办法原则》，表示同意给内蒙古地方自治权力。蒙政会由达尔罕旗札萨克郡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任主任。德王任秘书长，掌握实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拉住德王为他们的“满蒙”政策服务，极力挑拨德王与国民党的关系。德王为了实现其建立蒙古大帝国，当成吉思汗第二的野心，急速向日本靠拢。自 1934 年下半年起，德王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日渐公开化。1935 年 11 月，他访问伪满洲国，向日本和伪满洲国要求援助。1936 年 2 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伪蒙古军司令部，他成了伪蒙古军总司令；5 月在化德建立伪蒙古军政府，他任总裁。在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拉拢德王，德王在两者之间动摇，直到他叛国求荣，出卖民族利益，公开当蒙奸的这段时间里，中共西蒙工委一直在做争取他的工作。为此，乌兰夫曾两次亲自到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

当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它的特务机关，加紧拉拢、收买德王，大肆挑拨蒙汉关系。德王明显向日本靠拢的时候，1935 年冬，乌兰夫与奎璧一起去了百灵庙。不巧德王去了西苏尼特他的王府，没有遇上。于是，他们便到蒙政会保安队了解了一些情况，向士兵和下层军官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过了几天，乌兰夫又和李森去百灵庙，通过朱实夫引见，同德王见了面。乌兰夫用乌云达赉化名，以教师身份，拜会德王。

同德王见面后，他们先寒暄了几句。乌兰夫说德王搞自治，是为振兴蒙古民族首举义旗，本人表示钦佩，特来拜访。德王听了这几句

话觉得美滋滋的，但却表现出了十分傲慢的样子，自诩什么振兴蒙古民族是时代重托。尔后，乌兰夫又试探性地问他“高度自治”准备怎么搞。德王因为利用了蒙古族各阶层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不满情绪，这时候已掌握了蒙政会的实权，又取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有点得意忘形，竟然说什么国内对蒙古族自治从来不感兴趣，总是说长论短，没有人支持，愿意“帮助”蒙古民族的只有日本人。他还自我标榜说:“自治真意，实因事急境迫，日暮途穷，志切自救救国，不得不急求自决，以补救危亡。”

针对德王的这种态度，乌兰夫说，蒙古民族自治、振兴，是蒙古民族自己的事，主要靠自己，不必管别人感不感兴趣，况且偌大的中国，真心帮助蒙古民族的朋友会有的。日本人侵占东北三省，还想侵占内蒙古和全中国，不会帮助蒙古民族自治、振兴，他们是绝对靠不住的。德王听了以后辩解说，蒙古民族很穷，蒋介石不支持，傅作义不用说支持，他还想把我们吃掉。蒙古民族自治、振兴，要有钱、有武器，这些从哪里来?日本人肯“帮助”我们，也只有利用日本人的“帮助”，才能完成蒙古民族的自治与复兴。乌兰夫看出德王投靠日本的决心已定，到这种程度已很难劝说，于是用历史上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先例告诫他，希望他不要重蹈历史罪人的覆辙，欲依靠日本人搞自治须三思而后行。德王听了很不耐烦，怒气冲冲地说:“千秋功罪由我承担，不用别人教训!”

谈到这种地步，乌兰夫觉得已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乌兰夫他们虽然最终没能把德王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路上拉回来，但是摸清了他的意图和想法。乌兰夫认为这次接触是有益的，是对德穆楚克栋鲁普动向的一次直接侦察。

与德王告辞后，乌兰夫就去蒙政会保安队找云继先、朱实夫等，同他们一块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在掌握德王的蒙政会保安队，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方面，中共西蒙工委和乌兰夫早有准备。为此，乌兰夫花费了很大精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1933 年夏季，德王在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打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旗号，这正符合长期遭受大汉族主义压迫的蒙古族各阶层的想法。蒙古民族的大多数人都视其为“义举”，不少有志民族复兴的蒙古族青年都投于他的麾下。在他的部属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民族正义感的，也有不少是蒙古族的热血青年。针对这种情况，乌兰夫和中共西蒙工委采取的方针是争取德王与做爱国官兵的工作同时进行。倘若德王能争取过来，这支部队就可以成为抗日的力量；如果德王投日，其有正义感的部属认清了他的面貌，就不会再跟着他走，可以顺势把这支部队转变为抗日的蒙古族部队。此前，德王从北平、南京招募了一批进步青年，开办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培养军官，拟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乌兰夫的叔伯妹夫云继先做教官。云继先因为吃不透德王底细，是否应聘拿不定主意，去找乌兰夫商量。乌兰夫正想能有进步青年进入这支部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云继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 1923 年曾在蒙藏学校加入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尽管后来丢了关系，但思想依然是进步的。如果他能到学生队做教官，既可以了解德王的动向，又能用进步思想影响学生队学员。于是，乌兰夫明确支持并动员他接受聘请，还嘱咐他到任后要尽力做争取德王抗日的工作，坚持抗日立场，对学员进行抗日教育。云继先接受乌兰夫的意见，很快到了德王的学生队。

继动员云继先到学生队后，乌兰夫又先后派共产党员朱实夫、赵诚、云清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云蔚进入蒙政会保安队。这些人进入部队前，乌兰夫跟他们每个人都谈了话。他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各

族劳动人民长期友好相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这当中也有我们蒙古民族的一份功劳。爱民族和爱祖国是一致的。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既要关心蒙古民族的兴衰，更要热爱我们古老而文明的祖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以后，又进攻热、察，他们的野心是侵占内蒙古和全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蒋介石不抵抗，蒙古民族中也有一些败类认贼作父，我们要和汉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乌兰夫给他们讲了祖国观念和民族大义之后，又向他们明确提出要求: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适当方式做德王的工作，争取他抗日；二要把广大官兵视为自己的弟兄，把他们作为工作的重点，用团结抗日、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启发、教育他们，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抗日的信心；三要想法掌握德王的动向和部队官兵的心理状态，注意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有什么情况及时同他联系。

这几个人打入保安队后都很快站住了脚。他们有才华、有能力，云继先和云蔚又是专门学习军事的，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德王的信任和器重，逐步在广大官兵中树立起了威信，掌握了这支部队的实权。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揭露德王投日的阴谋，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做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

乌兰夫见德王后，把争取他抗日遭到拒绝的情况跟云继先、朱实夫、云蔚、赵诚等说了。云继先等认为德王已争取不过来，保安队的多数人是为复兴蒙古民族而来的，看到德王与日本人勾勾搭搭，都很后悔，不想再跟着他干。他们想马上举行暴动，把保安队拉过来，改编为蒙古族抗日武装。乌兰夫认为，德王尚未公开降日，保安队内部和社会上的群众工作还做得不充分，马上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但乌兰夫知道，云继先等早有举事念头。他们听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就曾想成立响应队，被乌兰夫劝阻了。现在他们决心要举行军事暴动，乌兰夫觉得已很难再劝阻，只好因势利导，争取举事成功。对

举事后的出路，当时有三种主张:一是占领百灵庙，在那里坚持斗争；二是把暴动部队拉到陕北去投奔红军；三是争取傅作义支持，部队拉到大青山以南休整，就地坚持抗日。乌兰夫全面分析了形势，认为在百灵庙坚持斗争和去陕北都做不到。考虑到当时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是主张抗日的，在长城抗战中他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并曾发过“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豪言，如果暴动能取得他的支持，把蒙政会保安队变成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是有可能的。经过商量以后，确定由云继先和朱实夫去找傅作义，然后看傅作义的态度再考虑如何行动。

在云继先和朱实夫找傅作义商谈的过程中，乌兰夫和中共西蒙工委以土默特高等小学为基地，以发传单、演唱、演戏等多种形式，在归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2 月初，乌兰夫得到了打入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的毕力格巴图尔的报告，说德王为与日寇进一步勾结，到伪满洲国访问去了。这就说明德王已公开投降日寇。于是，乌兰夫让在土默特高等小学工作的地下党员奎璧、进步青年克力更等，把德王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编印成传单，送到保安队，同时还让其内弟云生阁和高凤英等在社会上散发，揭露德王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打入保安队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军官一起，在揭露日寇侵吞内蒙古及全中国的野心，德王所谓“高度自治”“复兴蒙古民族”的实质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对士兵和下层军官进行团结抗日的教育，使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官兵认清日本人对蒙古民族的“关心”是别有用心的，德王所谓想借日本人的支持“复兴蒙古民族”是和溥仪一样想当儿皇帝。帮助他们认清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全国各族各界奋起抗敌的形势，以提高他们抗日救国的民族觉悟和信心。经过社会上的广泛宣传，归绥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各族各界团结抗日的气氛。这就为保安队起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35 年底，为了团结抗日，应傅作义之邀，中共中央派共产党

员潘纪文等到傅作义部队工作。经潘纪文介绍，乌兰夫做了傅作义的俄文秘书。但乌兰夫没有进入傅部序列，他主要是用一定时间给傅作义翻译《真理报》和塔斯社等发表的主要新闻和文章。这样就使乌兰夫既能直接接触傅作义，又能有时间上的灵活性，有利于开展地下工作，也便于争取傅作义对保安队起事的支持。

1936 年 1 月，云继先和朱实夫到乌兰夫家，谈了他们同傅作义联系的情况。他们告诉乌兰夫，向傅作义讲了德王投靠日本，引狼入室，保安队准备在百灵庙举行暴动，脱离德王，把部队拉出来，使其变成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之后，傅作义很高兴，表示完全支持，并让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曾载厚和 35 军旅长金中和同他们一起商定有关暴动的具体问题。他们和曾、金一块研究后，决定于 2 月 22 日夜间 11 时半行动，由 35 军派汽车接暴动部队出大青山。乌兰夫认为取得了傅作义的支持很好，同意他们商定的行动计划，同时对云、朱说，要抓紧进行准备，一定要把行动前的工作搞好，做到万无一失。为了保证暴动有坚强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务求成功，乌兰夫又讲了三点意见：一是由云继先担任暴动总指挥，并向暴动部队中的骨干宣布，以确保举事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二是要严守秘密，注意观察和掌握德王的动向，以便做到随机应变；三是要对倾向于德王的人采取团结的方针，向其申明大义，争取他们脱离德王参加暴动，但对个别敢于抵抗的死硬分子，则要坚决除掉。同时决定由李森担任联络员，负责乌兰夫和中共西蒙工委与暴动部队之间的联系。

暴动前夕，德王同日寇勾结，在他的德王府建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其间，德王把百灵庙蒙政会中的骨干都召到苏尼特右旗他的王府中去了，百灵庙只留下稽查处处长李风诚看守。这为暴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当暴动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乌兰夫收到了情报，得知德王在归绥的特务发现了保安队准备暴动的情况。他

们准备把云继先和朱实夫调到伪蒙古军司令部，把保安队编入伪蒙古军。德王在百灵庙的鹰犬也加强了巡逻和警戒。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要先下手了。乌兰夫掌握到这些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刻派李森赶赴百灵庙通知云继先和朱实夫，建议他们提前一天行动，使暴动抢在德王下手之前进行。云继先和朱实夫在百灵庙看到的情况证实乌兰夫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于是他们接受了乌兰夫的建议，决定提前一天行动。

1936 年 2 月 21 日晚 10 时，在云继先、朱实夫指挥下，德王一手经营起来的蒙政会保安队打响了武装暴动的枪声。他们干脆利落地处决了稽查处长李风诚，控制了新兵大队队长云秉章，释放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了德王的电台，打开军械库分发了枪支弹药，然后按预定计划集合部队，由云继先宣布暴动和暴动队伍的编队及各编制单位的负责人。接着，他们让暴动部队饱餐一顿之后就撤出了百灵庙，部队朝归绥方向进发。

暴动部队行至距百灵庙 50 多公里的岔岔村和二份子村休整，等待 35 军迎接的汽车时，不料被 35 军 421 团包围，强缴了暴动部队的械，而后才把他们拉下山。乌兰夫从联络员李森那里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即刻去找傅作义询问，并要求他下令发还收缴的暴动部队的枪支。傅作义说，德王知道百灵庙出事后，派出他的袍子队尾追。尾追的袍子队被击退后，德王又派飞机到暴动部队驻地撒传单，进行煽动、欺骗、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怕生变故，35 军才不得不把他们的枪缴了。傅作义作了说明后，要乌兰夫代他向云继先解释，希望能谅解。乌兰夫觉得傅作义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同时提出，既然已把暴动部队拉到山前，现在就应该把武器发还给他们。傅作义答应了乌兰夫的要求，同时提出邀云继先和朱实夫见面，商谈有关暴动部队的一些重要事宜。

乌兰夫先把傅作义的承诺和邀请告诉了云继先，然后又把朱实夫、赵诚、云蔚等请来，一起分析傅作义的心态，研究云继先和朱实夫见傅作义时需要讲的主要问题。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的表现，乌兰夫认为他是一位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争取在他支持下把这支暴动部队建设成蒙古族抗日武装。在乌兰夫主持下，经过研究，拟定在云继先朱实夫会见傅作义时主要谈以下问题：一是郑重明确地向傅作义说明，暴动部队在他领导下进行抗日；二是请傅作义下令马上将收缴的武器还给暴动部队；三是要求绥远政府按月给暴动部队拨发粮饷，及时补充武器和弹药；四是给暴动部队确定番号，保证原建制不被拆散，保持其蒙古族抗日武装的性质。在傅作义会见云继先和朱实夫时，云、朱讲了商定的以上几个问题，傅作义都答应了下来。绥远省政府发布了命令，决定将暴动部队编为“绥境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收缴的武器也很快还给了保安总队，所需军备和粮饷，按月造册在绥远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取。百灵庙举事的成功和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的建立，饱含着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和爱国军人云继先等的心血。云继先等直接领导、指挥了暴动和部队的组建。乌兰夫等共产党人为暴动明确了方针、策略和指导思想，通过派入部队的共产党员，实现了对这次举事的政治领导。客观地看，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正是两者的结合，保证了暴动的胜利和蒙古族抗日武装的建立。

百灵庙暴动的胜利和蒙古族抗日武装绥境蒙旗保安总队的创立，鼓舞了爱国官兵和蒙汉族同胞的抗日精神，痛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德穆楚克栋鲁普。但是，认贼作父的德王并不善罢甘休。1936 年 9 月，德王密令潜藏在这支部队的亲信章文锦，利用部队供应差、生活苦和部分官兵的不满情绪，拉拢一些贪图享受、立场不坚定的人，大造云继先的谣言，破坏他同官兵的关系，策动叛逃。章文锦把一部分

人煽动起来后，深夜绑架了云继先。他们软硬兼施，想迫使云继先把部队再拉回德王那里。云继先大义凛然，怒骂德王和章文锦，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章文锦恼羞成怒，令士兵开枪杀害了云继先。然后，他带着一些土匪出身的兵痞和受其蒙骗的人逃往大青山，投奔德王。乌兰夫得到云继先被害、部分人叛逃的消息后，马上赶赴蒙旗保安总队驻地。1000 余人的部队只剩了 100 多人。除了章文锦带走的人以外，一些正直的土默川籍的士兵都暂时回家了，留下来的都是思想进步、抗日态度坚决、不听章文锦煽惑的排以上军官。这批留下来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们痛恨章文锦一伙残酷地杀害云继先，痛惜刚刚建起的蒙古族抗日队伍毁于一旦，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唉声叹气，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乌兰夫的心情也很沉重，但他很镇静，给留下来的人做了安抚和稳定情绪的工作后，立刻打电话向傅作义报告了蒙旗保安总队发生的事。傅作义听后非常生气，决定让 35 军马上派机械化部队追赶章文锦带走的那部分叛逃的人。部队追到乌拉忽洞敖包一带，把章文锦带的叛逃人员包围。先向他们喊话，揭露德王和章文锦的阴谋，动员他们回头。民族败类章文锦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德王走卒，他继续欺骗威胁跟他叛逃的人，并组织反抗。经动员劝说无效，追赶的部队就地消灭了顽抗者，只有章文锦等少数几个人逃走后投奔了德王。

乌兰夫把追击章文锦的情况告诉了留下来的人以后，大家很受鼓舞，情绪又振奋起来。乌兰夫因势利导，鼓励大家说：“抗日救国，复兴蒙古民族是不容易的。德王利用章文锦策反我们的队伍，就是斗争艰难复杂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一次血的教训。云继先将军壮志未酬，以身殉职，你们这些留下来的人都是我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要继承云继先将军的精神和遗志，坚决抗日到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严惩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蒙古民族的败类。只要有我们这批

坚决抗日的骨干在，就一定能把蒙古族的抗日部队再重新建立起来。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们在团结抗日的道路上前进!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一定会胜利!”经过乌兰夫这样一动员，大家的劲头又鼓起来了，不少人情不自禁地高呼:坚决抗日到底！为云继先将军报仇！激愤昂扬的情绪重现在战友们的脸上，大家又满怀信心地投入了重建蒙古族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7 年初，国民党中央派白海风来归绥，负责在绥境蒙旗保安总队所剩人员的基础上重建这支部队。傅作义让乌兰夫帮助办这件事。白海风加入过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参加过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乌兰夫和中共西蒙工委全面分析了白海风的情况，认为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关系，但因过去受过我党教育，依然是思想进步的蒙古族爱国军官。而且他又同乌兰夫是旧交，由他出面重新组织这支部队，符合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有利于把这支部队建成蒙古族抗日武装。于是，西蒙工委决定让乌兰夫配合白海风，重新组建这支部队。

在重新组建的过程中，乌兰夫利用熟悉部队情况，在部队骨干和土默特籍士兵中有影响的便利条件，接受章文锦策反、云继先被害的教训，特别注意了部队素质、政治工作与地下党的工作。为了保证部队的素质，乌兰夫等到土默特旗动员品质好的回家士兵归队，同时又动员不少爱国青年到这支部队当兵;选了一批党员和有培养前途的进步青年进入这支部队，到排、连、营做领导骨干；配备了政工人员，乌兰夫出任政训处代理主任，亲自抓训练工作。当时乌兰夫和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就是抓这支部队，在这支部队的各个环节上都安排了党员，建立了地下党委，乌兰夫任地下党委书记。由于乌兰夫和地下党组织采取了这些措施，蒙旗保安总队重建后，部队素质提高了，真正成了我党指导和掌握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队伍。

1937 年夏天，部队重新组建的任务完成以后，在土默川进行训练。部队的训练由乌兰夫主持。他利用政训处代理主任的合法身份，除了对部队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 1935 年 8 月 1 日发布的《八一宣言》等文告的精神，对抱着抗日救国思想进入部队的青年官兵进行团结抗日的教育。在训练过程中，乌兰夫亲自讲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内蒙古和全中国的野心，以及德王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介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全国各族同胞奋起抗敌御侮的形势，宣讲中华民族和蒙古民族不容欺辱的英雄气概和优良传统。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启发官兵的民族觉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明白爱家乡、爱民族和爱祖国的一致性，懂得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怀着对祖国、民族和父老乡亲的一颗忠心，学好本领，准备英勇杀敌。乌兰夫主持的部队训练，在营、连、排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带动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明显提高。傅作义虽然担心部队“赤化”，但对重新组建的队伍一起步就有这样的变化，也不得不从内心里叹服和表示满意。乌兰夫在这支部队建立地下党组织和训练与教育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为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在团结抗日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在抗日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抗击，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新形势下，为防备日军和德王的伪蒙古军西进，傅作义调蒙旗保安总队驻守百灵庙，监视敌人。乌兰夫随队前往。不久，在日军配合下，伪蒙古军向百灵庙推进。为保存蒙古族抗日武装的实力，乌兰夫向白海风建议撤出百灵庙，把部队转移到固阳。白海风接受了乌兰夫的意见，让朱实夫把部队带到固阳，他和乌兰夫回归绥向绥远省当局汇报。部队在固阳驻防期间，德王又派章文锦潜来策反，被云蔚发现后即刻将其扣押，在他身上搜出了德王写给朱实夫的策反信。朱实夫和云蔚等都非常气愤，马上报告白海风和乌兰夫，请示如何处置。白海风和乌兰夫决定立即处决章文锦，以慰藉被他杀害的云继先将军的英灵，振奋军心。在伪蒙古军西进、日军进攻归绥的前夕，枪毙章文锦，是给德王的一次沉重打击。广大官兵视此举为白海风和乌兰夫坚决抗日的表现，抗日情绪受到很大鼓舞。

1937 年 10 月初，归绥吃紧。绥远省由马占山主持在包头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保卫归绥和绥远防务。白海风和乌兰夫应邀出席。会议决定蒙旗保安总队参加保卫归绥作战，同时为适应战时需要，决定将这支部队扩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独立混成旅下辖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和前不久由傅作义部队调给的一个炮兵连扩建成的炮兵营。扩编后由白海风任旅长，乌兰夫代理政治部主任。趁部队扩编，乌兰夫征得白海风同意，在团里增设了政治主任。部队年初重建后，地下党

组织又新发展了一些党员。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领导，更有效地贯彻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在乌兰夫领导下，进一步健全了部队地下党组织。旅党委仍由乌兰夫任书记，同时在各连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扩编后的蒙旗独立混成旅，由固阳开赴归绥前线，准备参加保卫归绥作战。按照包头军事会议的总部署，蒙旗独立混成旅的战斗位置是：炮兵营同兄弟部队的两个炮兵团，布置在城南的大黑河北岸，作为第一道防线；骑兵团和步兵团在归绥城南沿马路布开，与兄弟部队在城东、城北的布防相接，构成第二道防线。乌兰夫身着军装和白海风一起到前沿指挥部队构筑工事，做好阻击侵略军的战斗准备。乌兰夫还与政工人员一起深入连队，做好官兵战前的思想工作。由于乌兰夫领导的地下党在蒙旗独立混成旅认真贯彻了团结抗日的方针，战前工作做得深入细致，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十分高涨。

在做好部队工作的同时，乌兰夫还很注意动员群众。在地下党的发动和组织下，归绥的民众抗日运动不断高涨，各族各界都行动起来，在街头宣传抗日和为抗日而募捐的人到处可见，“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团结一致，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呼声四处可闻。全民抗日怒潮对抗日官兵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蒙旗独立混成旅和兄弟部队一起枕戈待旦，随时准备痛击日本侵略者。

日军进犯归绥的主力是关东军 26 师团的黑石联队和德穆克栋鲁普、李守信指挥的伪蒙古军的 3 个师。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大部分调去山西参加太原保卫战，日伪军认为归绥空虚，可轻易侵占，便气势汹汹地向归绥进犯。10 月 11 日，敌人在归绥外围的凉城和武川与门炳岳部等中国守军接触，门部伤亡惨重，撤了下来，凉城、武川沦入敌手。之后，日军继续推进，直逼归绥。敌人估计归绥守军主要分布在

城东和城北，企图从城南插入。10 月 12 日夜间，敌人进到城南大黑河时，不料遭到蒙旗独立混成旅的顽强阻击。正当侵略军欲涉水渡河北进时，蒙旗独立混成旅炮兵营和兄弟部队的两个炮兵团一起开炮，集中火力向进犯的日伪军猛烈轰击，敌人即刻乱了阵脚。他们地形不熟，摸不清我军底细，又是夜间，被迫龟缩在大黑河南岸，向北岸胡乱打炮。乌兰夫和白海风分析了战况和敌情，乘敌人慌乱、我军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借助夜幕，组织骑兵冲过大黑河，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天亮后，敌人又发起进攻。10 月 13 日，我军隔水同敌人炮战了一天。在战斗过程中，乌兰夫和白海风一直在前沿亲自指挥，这对蒙旗独立混成旅全体官兵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在疯狂残暴的侵略者面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侵略者几次发起攻击都没有攻过大黑河。蒙旗独立混成旅在大黑河有效阻击敌人的消息传到归绥城，各族各界同胞都很感奋。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把军用物资送到前沿阵地。妇女和青年学生组成慰问队，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劳抗日军队。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誓死不作亡国奴的坚定信念，把蒙汉各族抗日军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大黑河畔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乌兰夫站在大黑河畔的阵地上，望着这片就要被残暴的敌人吞噬的土地，看着他熟悉的一张张被硝烟熏黑了的战士的面孔，不禁怒火满胸，感慨万千:战友们，同胞们！为了坚持长期抗日，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片用鲜血染红的阵地。日本强盗，不要高兴得太早！蒙古民族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容欺！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收复失地，把你们驱逐出中华大地！

为了保存实力，10 月 14 日下午，在马占山统一指挥下，蒙旗独立混成旅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撤出战斗，转移到包头西郊。敌人侵占归绥后，继续向西推进，直逼包头。马占山和傅作义所属部队决定向河套方向撤退。蒙旗独立混成旅向哪里去?这直接关系着以后能否

坚持抗战和部队的生存及发展。白海风想依靠马占山，主张随马占山部队一起撤往河套地区。乌兰夫认为，马占山和傅作义虽然都主张抗日，但各有自己的算盘，如果随他们去河套，必然为他们所控制，这支蒙古族部队抗日的手脚就会被束缚起来，最后还会被他们吃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坚持长期抗战。所以，乌兰夫不同意白海风的主张。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呢?乌兰夫对此作了全面分析和充分考虑。一是北上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原中共西蒙工委受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直接领导，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密切关系，它地域辽阔，又有苏联作后盾，日寇不敢轻易冒犯。如果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日后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路途遥远，中间隔着浩瀚的戈壁，又有日伪军阻截，上千人的部队通过沙漠地带困难很多，即便能过去，以后与敌作战也很不方便。权衡利弊，乌兰夫放弃了这一想法。再就是南渡黄河去伊克昭盟。那里与陕北毗连，可以先到陕北与八路军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中央和八路军的领导和支持下，可以根据形势发展，就地守土抗战。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伊克昭盟，蒙古族人口比较集中，有农有牧，有水有草，历史上曾是成吉思汗的战场。它背后有陕北根据地作依托，前面有黄河天堑，有利于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队伍，坚持长期抗战。

在关键时刻，为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乌兰夫主持召开地下党委紧急会议，向同志们讲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乌兰夫的分析和主张。会后，乌兰夫按照地下党委的一致意见，继续做白海风的工作。但白海风和参谋长常永生仍坚持去河套。此时日伪军已逼近包头，敌机不停地在我驻地上空盘旋侦察和轰炸，情况万分紧急。从部队前途和抗日大局着想，乌兰夫决定听取部队骨干的意见并做他们的工作。他出面请各团团长和政治主任开会，就部队向

何处去的问题交换意见。乌兰夫给他们分析了形势和提出自己的主张后，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这时乌兰夫心中更有底了。他以老朋友的一片赤诚，开诚布公地对白海风讲:“现在形势紧迫，但把部队开向哪里有两种主张，一是你和常永生的意见，去河套，我和多数官兵认为这是一条死路。再就是过黄河去伊克昭盟，道理我已讲过几遍，不必再说。究竟向哪里去，需要你慎重考虑，马上作出决断。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去河套，我也不勉强你，愿意跟你去的人你带走，同意去伊克昭盟的我们一块走，这事由你看着办。”白海风知道这是乌兰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他摊牌，自己的主张没有几个人赞成，硬把部队往河套拉是拉不动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只好同意乌兰夫的意见，很快下达了过河命令。这是关系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前途的重要决策。在关键时刻，乌兰夫依靠地下党委集体的力量，做了官兵的工作，又说服了白海风。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包括采取的措施和做法都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充分显示了乌兰夫的远见卓识和处事能力，为蒙旗独立混成旅以后的发展壮大和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开辟了道路。

1937 年 10 月 16、17 日，蒙旗独立混成旅在白海风和乌兰夫指挥下，分别在白海子和昭君坟渡口过黄河，踏上鄂尔多斯高原，进入伊克昭盟。晚秋的塞外，气温已降到零度。乌兰夫和白海风身着单薄的军衣站在黄河南岸，举目回望，北风呼啸，黄涛滚滚，侵略者烧杀抢掠的乌烟笼罩着包头和整个北部天空；被践踏的土地在呻吟，被蹂躏的同胞在呐喊；乌兰夫心潮澎湃，默默自语:破碎的祖国，苦难的同胞，不要忘记这国耻民辱，挺起胸膛，继续战斗，把日本强盗驱逐出去，神圣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

10 月 18 日，部队到达达拉特旗展旦召，遭到暗中同日本勾结的康王武装的伏击。康王受日本人指使，组织了号称三个团的旗武装，

专门截击路经该旗的抗日军队。但他的旗武装人数不多，装备很差，又不懂战术，不是蒙旗独立混成旅的对手。为了先教训而后争取康王，使他不在卖国投日的路上走得太远，乌兰夫和白海风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战术和策略，亲自指挥还击。接火没多久，康王就不敢再打下去了，很快派一名喇嘛举着白旗出来讲和。因为在遭伏击时团长朱实夫受伤，白海风一时气愤，拒绝求和，想杀掉喇嘛，狠揍康王武装。乌兰夫从抗日大局出发，劝白海风说:教训康王要适可而止。历来不杀使者，代表康王前来求和的使者不能杀，只要他们认输，不再打，给我们让路就可以了。这样有利于争取康王，至少争取他保持中立。能做到这一点，就为以后我们开辟这里的工作，坚持长期抗日打下了基础。白海风接受了乌兰夫的意见，同康王进行谈判，与他达成了互不干涉的协议。同时了解到，17 日后勤人员和辎重过河时被劫掠，也是康王武装受日本人指使所为。通过谈判，康王把劫去的人和东西也都如数送了回来。蒙旗独立混成旅对康王武装的妥善处置，表现出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气度，也给康王的旗武装和当地蒙汉族群众宣传了各族各界团结抗日的道理，播撒了抗日的种子。

乌兰夫和白海风带领蒙旗独立混成旅，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穿过了鄂尔多斯高原，到达了陕北府谷县哈拉寨，暂时停下来进行休整。在转移行军途中，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但部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沿途蒙汉族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同胞，视这支部队为蒙汉各族同胞团结抗日的象征。部队在所经之处，起了团结抗日的播种机、宣传队作用。蒙旗独立混成旅在人烟稀少的鄂尔多斯高原，胜利完成行军转移任务，这主要是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地下党委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政治工作人员坚持抗日救国思想教育，地下党员吃苦在先，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结果。在这方面，白海风和其他军事指挥人员无不信服、赞叹。这就进

一步提高了乌兰夫和地下党在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中的威信，为以后地下党的工作和部队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蒙旗独立混成旅在哈拉寨休整一个多月。部队刚进寨时，老百姓都躲避了。后来才知道，不久前曾有一部分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从这里经过，吃喝抢掠，骚扰百姓。乌兰夫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建议白海风派云蔚带人去追那支路过的国民党部队。云蔚带人追上了那支国民党部队，把他们抢的东西要回来，还给了老百姓。这一行动使老百姓看出蒙旗独立混成旅与那支部队不同，是真正保护老百姓的抗日军队，都主动烧水做饭慰劳军队。部队住下以后，乌兰夫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要求地下党员带头帮助老百姓干活，维护群众利益。部队的实际行动，换来了老百姓的信任与拥护。在哈拉寨休整期间，准格尔旗王爷派人来瓦解部队。乌兰夫得知后，把来人叫到旅部，明确指出他们瓦解部队是破坏抗日，破坏蒙古民族团结。给他们讲了同是中华儿女，成吉思汗的子孙，大家团结起来，巩固蒙古族抗日军队，共同打日本鬼子的道理。他们听了，自知来瓦解部队理亏，灰溜溜地走了。没过多久，马占山派他的部队悄悄来哈拉寨，想吞并蒙旗独立混成旅。乌兰夫得到消息后，马上找白海风商量，建议部队迅速转移，离开哈拉寨，免生不测。白海风认为乌兰夫讲得有道理，果断地作出立刻转移的决定。蒙旗独立混成旅刚离开哈拉寨，马占山的部队就来了。由于乌兰夫判断正确，部队行动迅速，终于保住了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

离开哈拉寨后的行军途中，乌兰夫召开地下党委会议，研究部队转移的方向。乌兰夫和地下党委一致主张，把部队开到离八路军较近的战时动员委员会所在地山西河曲。会后，乌兰夫向白海风提出了这一建议。白海风很赞成，下令部队朝河曲方向前进。河曲县抗日领导机关得知蒙旗独立混成旅来河曲的消息后，马上布置欢迎。部队到河

曲时，只见街上贴满了“欢迎蒙旗独立混成旅”和“蒙汉族团结抗日”等标语，由青年和儿童组成的秧歌队和腰鼓队载歌载舞地欢迎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老百姓早给腾好了房子，准备了慰问品，使战士们感到如同到家一样的温暖。全民动员一致抗日的浓厚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

把部队安顿好以后，乌兰夫建议白海风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去要供给和装备。白海风走后，乌兰夫去八路军 120 师，以便同中共中央联系。1938 年 1 月 18 日，乌兰夫在山西岢岚县找到了 120 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混成旅的情况，同时讲了他 1929 年回国后在内蒙古开展地下斗争的情况。甘泗淇听后很高兴，马上发电报告党中央。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大意是:为使这支部队更容易取得中央政府的援助，更容易在内蒙古地区扩大发展，成为内蒙古民族抗日的基本队伍，就要:(一）立即改变用我党的党务委员会半公开地来领导该部队的办法，在今后只有用更广泛的群众组织如抗日救蒙会等，才可以团结内蒙古王公平民一致抗日，才可以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二）部队中我党组织仍需秘密存在，党在该部队的领导应该更加巩固，但工作方法需要彻底转变，以适应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巩固与扩大全蒙抗日团结；（三）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新委任的绥蒙宣慰使署，并尽量争取每一个抗日的王公，如沙王或阿王为司令，才更容易号召，更容易发展；（四）部队须拥护中央政府蒋阎及北路军司令傅作义，表示拥护并受其指导和援助，与其他各部队进行诚意的联络；（五）对德王及伪自治政府不宜简单地提出反对口号，应具体指明日寇侵略事实，善意批评德王错误，要求德王及伪组织内的王公平民回头抗日；（六）部队多派代表与蒙汉各方发生关系，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注意多培养蒙古族干部，才更易减少别人的疑惧，更易发展。接到中央复电后，乌兰夫立即回部队向党员传达，研

究贯彻中央指示的方案。

乌兰夫自 1929 年由苏联回国，到 1938 年同党中央取得联系，9 年来第一次得到党中央指示，字字句句都感到格外亲切。他跟同志们说，党中央的指示，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教给了我们方法。这不仅是对我们、对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的关心，也是对内蒙古和整个蒙古民族的关心。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按照党中央指示建设好这支部队，带领好这支部队。要做到像党中央要求的那样，使其真正成为“内蒙古抗日军队的基本队伍”。乌兰夫从 120 师回来时，带来了 120 师支援的棉衣、棉鞋和经费。120 师的支援，对这支正处在困难中的蒙古族抗日军队，真是雪中送炭。官兵们穿上发给他们的棉衣、棉鞋，暖在身上热在心里，高兴得跳着喊感谢云主任、感谢 120 师。乌兰夫说，应该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他们是我们蒙古民族的真正朋友，是抗日的中坚。要把他们的支援、关心变成力量和行动，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好好向八路军学习，坚决抗战到底。

1938 年 4、5 月间，毛泽东通过神木党组织发来邀乌兰夫去延安汇报工作的电报。乌兰夫立刻起程去延安。在延安，他遇上了王若飞。两位老战友互通了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分手以后各自的情况。王若飞说:“那时我曾建议你抓武装，你们搞起了这样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路子走对了。”乌兰夫说:“这也多亏你的及时教诲指点，功劳还得归你。”两人互相谦虚的谈笑，都表现出了对有这样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第二天，高岗通知乌兰夫到他办公室，同时被邀去的还有白海风。年初，白海风去南京找国民党中央政府，途中获知南京失守，他又赶到武汉，再由武汉来到延安。毛泽东要接见乌兰夫和白海风，听取他们两人的汇报。高岗领着他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他办公的窑洞里笑盈盈地同他们握手，谈笑风生地问他们部队的情况和蒙古民族的生

活与风情。高高兴兴地聊了一阵后，乌兰夫汇报了蒙旗独立混成旅建立、发展的经过和现状。白海风谈了他向国民政府要供给的情况，还告诉毛泽东，国民政府同意蒙旗独立混成旅扩编，给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的番号。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简略地讲了全国抗日形势之后，语重心长地对乌兰夫和白海风说: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逐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现在正处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时期，你们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接受国民党领导，争取中央政府的供给、发展壮大这支队伍。你们这支队伍是蒙古族抗日武装,不宜长期住在神木，要回伊克昭盟去，在内蒙古地区坚持抗战。这样有利于发展这支队伍，扩大这支队伍的影响。要以这支队伍的抗日模范行动，影响带动内蒙古地区的蒙汉族群众，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要把你们的部队作为培养干部的学校，多培养一些蒙古族干部，以备抗日战争和胜利后革命发展需要……

乌兰夫和白海风都是第一次见毛泽东。毛泽东那革命领袖的风度和气质，推心置腹而又无拘无束的侃侃长谈，使他们从内心里感到既可敬又亲切。乌兰夫的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从全国抗日形势，八路军挺进敌后，想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想到他在莫斯科接触过的王明，感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就有了希望。他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毛泽东的接见和教诲，使乌兰夫力量倍增，使他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发展壮大这支蒙古族抗日队伍，把这支队伍带好，扩大内蒙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内蒙古的革命力量，用坚强的斗争去迎接胜利。这时候的乌兰夫，已经是有丰富斗争经验，接近成熟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他在高兴和充满胜利信心的同时，也觉得身负千钧，担子很重。他知道完成毛泽东和党交给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事事周密，处处慎重，扎扎实实地工作，稳稳妥妥地前进。

听取毛泽东的指示后，白海风的思想也有很大提高，对乌兰夫也更加信服。乌兰夫与他研究了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并同他交换了部队改编和扩大发展的意见后，两人便很快返回神木。在神木，乌兰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地处塞外的鄂尔多斯高原，春天来得晚，5月，恰是牧草吐绿、山花遍野的时节。1000 多人的蒙古族抗日队伍，迎着和煦春风，浩浩荡荡地开回伊克昭盟。部队进入伊克昭盟后，驻扎在察克图一带。在这里，乌兰夫协助白海风把蒙旗独立混成旅扩编成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

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扩编成新三师后，下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白海风任师长。乌兰夫征得白海风同意，在扩编过程中，按照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系统。团设政治主任，营、连都设了政治工作干部。政工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下党员。这时全师的地下党员已发展到 100 多名。为了加强地下党的工作，更好地发挥地下党组织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作用，建立并充实了新三师地下党委。党委委员由蒙旗独立混成旅时的 5 人增加到 7 人，仍由乌兰夫任书记。各个连队都建立了地下党支部。1938 年 11 月，党中央决定建立以赵通儒为书记的中共伊盟工委，乌兰夫为工委委员。为便于同地方工作协调配合，新三师地下党委归中共伊盟工委领导。

日军侵占归绥、包头以后，已不能再长驱直入地推进。抗日战争在这一线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伪军在沿黄河的达拉特旗、柴登、杭锦旗等地安了据点，凭他们占领着城镇和主要交通线的优势，不断向伊克昭盟蚕食和骚扰，还企图利用蒙奸动摇和瓦解抗日力量。抗日战争处在更加复杂和更加艰苦的时期。乌兰夫作为中共伊盟工委委

员、新三师地下党委书记，为了使新三师能在鄂尔多斯坚持长期抗战，他和部队地下党组织在新三师坚决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毛泽东对新三师工作方针的指示。

首先，在白海风的支持下，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为使新三师进一步革命化，真正成为八路军式的蒙古族抗日军队，乌兰夫请八路军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罗贵波、农运部长徐文烈来新三师帮助做整顿工作。乌兰夫以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的合法身份直接领导整顿工作。通过整顿，既提高了地下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又解决了部队中部分人存在的军阀作风，如打骂士兵、侵犯群众利益、腐化堕落以及不注意团结民族上层等问题。部队在河曲、神木休整时，已学习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次整顿以此为基础，又组织全体官兵学习了《告全国同胞书》，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官兵们懂得抗日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如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军人。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党内抓了个别党员私自在桃力民设卡，向过路商人强行要钱，影响军民关系的典型事例；在后勤、政工系统，重点抓了个别军需人员克扣、侵吞战士菜金，有的军官随便关押和打骂战士的问题；在师、团领导中，重点总结了错误处决一名札萨克的经验教训。部队通过对这些影响大的问题的剖析和处理，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八路军，做八路军式抗日军人，为蒙古民族增光的热潮。通过整顿，师、团主要领导看到了部队同八路军的差距，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对错误处决一名札萨克的问题，白海风后悔地说，如果当初听老云的话，答应沙王的请求，放了那位同沙王关系密切的札萨克，沙王就不会和我们对立，也不会使一些民族和宗教上层因惧怕我们而与我们疏远。真是一时不慎铸成大错，自己孤立了自己。乌兰夫看到党员和官兵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白海风等也认识了过去的错误，非常高兴。他说，这次整顿成绩很大，效果很好。我们整顿的

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部队素质，使新三师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部队。过去做错了的事能换回教训就好。今后，我们要以自己的抗日模范行动影响蒙古族广大群众，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同我们一道抗日。要向八路军学习，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罗贵波和徐文烈也给这次整顿以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是新三师在抗日道路上前进的一个重要起点，巩固和扩大此次整顿的成果，新三师一定会成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模范军队。

白海风支持乌兰夫和地下党委领导的这次整顿，在新三师产生了深远影响。部队学习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除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主动搞好同驻地群众的关系外，乌兰夫和地下党委还通过部队政治工作系统，派出大量官兵深入农村牧区，帮助地方抗日政权发动群众抗日，建立农牧民和青年、妇女、儿童抗日救国组织；组织民兵和抗日武工队；开办抗日小学和识字班；组织宣传队、演出队，通过写标语、办墙报、唱歌、演戏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通过这些活动，新三师的官兵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蒙汉各族人民视他们为子弟兵、保卫者，主动送粮草、柴炭支援部队，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新局面。新三师在伊克昭盟蒙汉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鄂尔多斯高原成了新三师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根据地。乌兰夫亲自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多次请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到新三师参观、座谈，跟他们讲民族大义，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新三师的抗日行动，真心实意地为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而战斗的事实，感动了不少上层人士，使他们由怀疑甚至敌视，转为拥护、支持。有一位活佛竟毅然从军到新三师工作。

乌兰夫还很注意同友军的关系，主动配合友军对敌作战。1941年初，傅作义派105师师长率部队攻打日伪军在柴登的据点，因遭敌人伏击而失利，柴登没有攻下。傅作义大为震怒，令105师必须攻下，

如再失利要就地正法师长。师长怕攻不下，亲自到新三师求援。因为傅作义部队曾与新三师发生过摩擦，白海风等不想支援。乌兰夫认为支援傅部攻打柴登据点，是团结抗日的需要，也是做友军工作的好机会。他说服了白海风等主要军事指挥人员，动员地下党员带头执行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最后由白海风下令派一个炮兵连支援 105 师。在新三师炮兵连的配合下，105 师拔掉了日伪军在柴登的据点。这一行动改善了新三师同傅部 105 师的关系，同时拔掉柴登据点也巩固了新三师的前沿阵地。支援 105 师攻打柴登，体现了新三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遵循团结抗日方针的诚意，在友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8 年 11 月中共伊盟工委建立后，在鄂尔多斯高原很快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形势。当时驻守伊克昭盟的军队除新三师外，还有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和部分马占山、傅作义部队。为了发展新三师这支最大、最强的蒙古族抗日武装，使其保持伊盟抗日主力地位，地方党组织和各级民众抗日组织帮助它进行了扩充。到 1939 年底，新三师的兵员由 1000 多人发展到了 2000 多人，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为了发挥其抗日主力军作用，有效地抗击日伪军，保卫伊克昭盟，乌兰夫建议白海风在张高明圪旦建立前线指挥所，由共产党员朱实夫任总指挥，统一指挥新三师主力对敌作战。乌兰夫和白海风经常到前线指挥所，与朱实夫一起检查防务和研究作战方案，还到前线给守卫在阵地上的官兵做思想工作，要他们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消灭来犯之敌。在前线指挥所的指挥下，新三师布防在前沿的部队反蚕食、反骚扰，多次击退日伪军的进犯。其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在 1940 年夏季，伪蒙古军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在日本指挥官指挥下，袭击新三师张来顺营子阵地，企图冲破新三师防线向伊克昭盟深入。新三师守卫部队机智勇敢地投入战斗，打得敌先头部队不知所措，慌忙败退，后续部队不能前进。新三师部队乘胜出击，把

日本指挥官打下了马，进犯的伪蒙古军乱作一团，弃尸败逃。这次守卫战的胜利，大煞了日伪军的威风。新三师在伊克昭盟也更受蒙汉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乌兰夫坚持不懈地在新三师做政治工作，在他和地下党委的努力下，这支部队虽然番号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下的一支以蒙古族人为主的抗日军队，被人们誉为不在八路军序列的“八路军”。乌兰夫在这支部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发展和影响，这支部队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他们以制造摩擦来威胁新三师，并派奸细和特工人员进行瓦解，但都没有成功。顽固派仍不甘心，他们使出“调虎离山”计，由胡宗南下令调新三师去甘肃靖远休整。乌兰夫看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一方面在党内进行了揭露，一方面说服白海风，以抗日前线需要为由拒绝西调。最后，胡宗南竟密令白海风处决乌兰夫，强令新三师西调。白海风是个讲义气的爱国军人，把实情告诉了乌兰夫，并让他看了密电。无奈之下，乌兰夫把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从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定让乌兰夫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离开新三师去延安。离开新三师去延安的事，乌兰夫当时不便向白海风明说。白海风虽然能揣摩个大概，但也不好直问。乌兰夫想以送妻子和孩子回家为名，向白海风请假脱身。白海风心中很矛盾。他知道以目前的处境，乌兰夫已不可能再在新三师呆下去，但这支队伍是乌兰夫帮助他搞起来的，在几次紧要关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在乌兰夫帮助下渡过难关和作出决定的。没有乌兰夫，新三师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白海风想到这些，又想到多年相处形成的友谊，以及他深知的乌兰夫的才智和品德，怎么也不情愿让他离去。白海风不肯痛痛快快地准假，乌兰夫和妻子云亭为此都很焦急。最后还是云亭出面请白海风夫人多淑秀向白求情，白海风才准假。

乌兰夫和云亭结婚后，乌兰夫因追求革命真理和投身革命事业，没过几天安定日子。云亭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她通情达理，支持革命，理解丈夫。日寇侵占归绥后，土默川即沦在敌人铁蹄之下。因为乌兰夫抗日，敌人烧毁了他家的房子，使乌兰夫全家老小无处安身。在党组织帮助下，乌兰夫的长女云曙碧、长子布赫去了延安。随后，云亭才带着二子乌斌、三子乌杰来到丈夫身边。云亭和两个孩子在新三师随军住了两年多，因为处在战争时期，战事和公务繁忙，乌兰夫也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现在，乌兰夫就要离开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新三师，云亭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辆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马车上，他乘马相随，这时候，他似乎突然发现了妻子的贤淑和孩子的可爱，想到自己的工作中包含着妻子的大量付出，他感到欠了妻子和孩子们许多许多，恨不能一下子把过去欠下的都补偿给他们。云亭也在仔细地打量着丈夫，炯炯有神的双眼，高大魁梧的身躯，骑在马上显得那样威武、英俊。他瘦了，额头和眼角都增添了皱纹，看上去面容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这是他为祖国、为民族，风风雨雨终日操劳的印痕。她心疼得不忍再细看，于是低下头去，亲昵地抚摸着孩子，心里在默默地说:我和孩子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平平安安，一切顺利，能为祖国和蒙古民族多做些事，我和孩子就心满意足了。

车和马越走越快，渐渐就要远去了。乌兰夫从翻滚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回望新三师驻地，远眺鄂尔多斯高原的山川和大地，似有很多话要留给同志、战友和蒙汉族乡亲。乌兰夫满怀对祖国、对民族的未酬之志，离开了新三师，离开了伊克昭盟，奔赴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华民族抗日的心脏——延安，投入新的战斗！

自 1938 年 5 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乌兰夫和白海风率部回师伊克昭盟，到 1941 年乌兰夫被迫离开新三师去延安，他在黄河之滨坚持抗战整整三年。这三年，他和新三师地下党的同志们一起，共同谱

写了一曲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凯歌。他坚定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认真贯彻了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与白海风合作，带领新三师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战。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伊克昭盟各族、各界、各阶层，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为蒙古民族树立了爱祖国、爱民族、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的榜样，促进了蒙古族同胞的觉醒。他以新三师这支蒙古族军队为基地，发展党的组织，培养蒙古族干部，送蒙古族革命青年去延安学习，为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后内蒙古革命的大发展，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抗日前线的三年战斗生活，特别是处在新三师那样一种特殊情况下，乌兰夫更成熟了。他进一步懂得了在复杂的情势下，须以战略眼光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更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进一步懂得了要成就民族革命的大业,必须唤起更多人的觉悟，团结更多的人，包括敌对方面能争取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进一步懂得了作为领导者，必须胸怀广阔，除了同志间要以诚相待、密切合作，还要善于和朋友、友军合作共事，广泛团结有识之士与自己共同奋斗。这三年的前线抗战.在乌兰夫的革命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八、在延安的四年

1941 年 8 月，乌兰夫到达延安。不久，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延安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是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设有教育、总务两处。乌兰夫任教育处长。学院的任务是培养有革命觉悟，有一定文化和理论水平，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坚决抗日，能联系少数民族群众，有志于投身少数民族解放事业的民族干部。第一批学员有 200 多人，包括蒙古、回、藏、苗、彝、满等少数民族，也有部分汉族青年，其中蒙古族最多，占学员总数的 40%。学员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距比较大。为便于组织学习，除设一民族研究班外，其余学员按文化程度编班，学制视工作需要而定。课程分文化和政治两大类。文化课有汉语、民族语文、自然常识和史地知识。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础知识、中国少数民族和党的民族政策等。学院的师资力量很紧张，专职教师有限，院和教育处领导都讲课。乌兰夫是主要的授课教师之一。

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半年多，正值学院初创时期，各方面条件很差。乌兰夫有在内蒙古开展革命工作缺乏干部特别是缺乏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感受，很理解毛泽东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重要意义。他决心和其他同志一起，努力把延安民族学院办好，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地培养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所需要的少数民族干部。

乌兰夫与王铎等同志密切配合，参照他曾学习和工作过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王铎等同志学习和工作过的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办学经验，根据延安民族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学员特点，协助院领

导制定了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原则及有关制度，使这所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的民族学院，很快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乌兰夫除主持延安民族学院教务工作外，还承担一部分理论课程的讲授任务。由于他理论基础好，又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授课时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道理讲透，既生动又活泼，很容易为学员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很好。乌兰夫除了授课外，还经常参加学员的学习讨论会，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讲革命故事和斗争经验，讲蒙汉族英雄人物的革命事迹和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启发学员的革命觉悟。乌兰夫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给全院教师和教学工作以很大影响，使学员们很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坚定了政治方向和抗日决心，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不少人出校后迅速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和领导骨干。

乌兰夫很关心学员。他经常到学员住的窑洞，嘘寒问暖。特别是对年纪小的学员，他既做师长又做家长，想方设法照料他们。他还经常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劳动和文体活动。学员们觉得他可亲可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常常围在他身边问这问那，而他总是有问必答，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他平素给学员们讲得最多的是要时刻想着沦陷区的同胞和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要努力学知识、长本领，时刻准备到前线、到抗日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力量。乌兰夫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有关教学中的一些问题，除同教务人员研究外，他还亲自征求各班和学生会干部以及学员的意见。这种民主作风不仅使学院的教学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切合实际，也为教学人员和学员们作出了好样子。乌兰夫还经常给学员们讲民族团结和艰苦奋斗，而且身体力行。他是蒙古族人，学员中蒙古族人最多，但他对他们并没有格外照顾，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各族学员。在他影响下，不同民族的学员团结得很好，延安

民族学院成为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他和学员们一块劳动时，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总是带头干。他衣着朴素，生活上也不讲究。为了节约灯油，常常摸黑跟学员们谈心或座谈。身教胜于言教，乌兰夫在这方面的模范行动，在学员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学员的负责态度和认真踏实的治学精神，在延安民族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离开了，教师和学员都对他十分留恋。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乌兰夫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部学习，参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为了搞好整风运动，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了 20 多个学习材料。其中除毛泽东为开展整风运动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外，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这次整风运动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乌兰夫把参加这次整风运动视为学习、总结、提高的好机会。他认真学习规定的学习文件，联系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斗争的情形，联系他回国后在实际斗争中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经历，反复地进行思考。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这样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党的作风，清除党内存在的、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和损失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这两个主义赖以藏身的党八股，是非常必要的。它对党的建设和推进中国革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乌兰夫学习了毛泽东为号召整风而作的三篇报告，豁然开朗，解决了自己曾经想过，但又找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比如内蒙古革命和全国革命一样，屡受挫折，多松年、李裕智等不少革命先烈壮志未酬、英勇牺牲，根

本原因在哪里?乌兰夫曾不止一次地苦苦思索过。学习以后清楚了，造成那样惨痛的局面，不只是因为敌人强大凶残，也包括我们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讲演中所说的“主观主义”。认识到这一点，乌兰夫更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他下决心在整风运动中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过去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像毛泽东讲演中要求的那样，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

在整风学习中，乌兰夫特别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同毛泽东号召整风的三篇报告对照起来学习。他认为，三篇报告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统一在一起的结晶。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精辟地指出了解决办法，是讨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檄文，是克服主观主义学风的指南，是战胜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文风的锐利武器。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 20 多年磨练已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经过整风，全党掌握了这一“指南”“武器”，就会端正学风、文风；党内生活就能保持正常，中国共产党就会更加坚强，战无不胜。乌兰夫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抱着满腔革命热忱，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三篇报告。他反复琢磨毛泽东的那些主要论点，越琢磨越觉得精辟，并渐渐融合、渗透到了自己的头脑里。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厌恶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只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到处夸夸其谈，热衷于搞派别活动，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回国后的地下斗争中，他不赞成一些人不顾客观条件，凭感情蛮干。过去，虽然他不能接受有人说他“学究”“缺乏革命胆量”，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服对方。整风学习后，乌兰夫的认识提高了，对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那些人是犯了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也就是毛泽

东所指出的学风、党风不正。经过整风学习，乌兰夫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更加成熟了，政治上更加坚强了。

乌兰夫在延安的 4 年，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的最艰苦时期转向准备战略反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存在着坚持团结、积极抗战、抗战到底与破坏团结、消极抗战、妥协投降的斗争。通过各种形式，动员各族各界同胞行动起来同抗日消极、反共积极的顽固派作斗争，坚定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坚持抗战到底，是所有抗日志士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乌兰夫是勇敢地担当此任的一分子，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39 年 6 月为防止日寇破坏，将成吉思汗灵榇西迁时，乌兰夫和白海风就派出了新三师部队武装护灵。灵榇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940 年初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毛泽东亲自为“成吉思汗纪念堂”题了字。1944 年 4 月又由乌兰夫主祭，在延安祭奠成吉思汗。这些活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蒙古族各界的欢迎。它对动员蒙古族同胞团结抗日起了重要作用。1941 年 11 月，乌兰夫以蒙古族代表身份，参加了朱德总司令主持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1943 年 8 月和 1945 年 5 月,乌兰夫先后在延安参加了为蒙古族爱国志士和抗日英雄那素滴勒盖、哈诺墨拉举行的追悼会。后者由乌兰夫主祭，他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乌兰夫在讲话和悼念文章中，高度赞扬烈士的功绩和斗争精神，愤怒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欺压蒙古民族，迫害、屠杀蒙古民族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和抗日英雄的罪行，号召蒙古族同胞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解放蒙古民族、实现民族民主自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民族平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乌兰夫在延安期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做民族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处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受中共中央西北局委派，分别于 1942 年冬和 1944 年 8 月，两次到伊克昭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那里的主要问题。

伊克昭盟紧靠陕北和宁夏，是陕甘宁边区北部边缘的门户，也是通往内蒙古和晋绥的要道。自抗战开始，国民党一直用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1940 年和 1942 年曾发起两次反共高潮，制造磨擦和武装冲突，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反共高潮虽然被打退了，但国民党顽固派并不甘心。他们对伊克昭盟居心叵测，特别惧怕蒙古族人民跟着共产党走，派了大量公开的和秘密的特务，胁迫宗教界和民族上层反共，极尽其破坏抗战之能事。伊克昭盟游击司令章文轩和警备司令陈长捷气焰都很嚣张，长期与定边、盐池、三段等解放区处于对立状态。1942 年冬，形势进一步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去伊克昭盟了解情况，研究对策。

乌兰夫经过实地调查，摸清情况后，同当地党委和民众组织一起，研究了缓和这里形势的方案。乌兰夫认为，大敌当前，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必须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把国民党军队看成是铁板一块，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有民族正义感的，坚持反共、不想抗日的是少数。蒙古民族中，包括上层在内，绝大多数是不赞成反共，愿意抗日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了，有些人可以争取过来，这里的局势可以缓和。因此，只能做争取工作，不可僵持和激化，给顽固派以口实。乌兰夫按照自己的看法，向当地抗日组织和领导这里工作的中共三边地委建议:选派有经验、懂政策的适当人员，下功夫做顽固派想控制的阿拉庙活佛和游击司令章文轩的工作，主动和他们讲团结，向他们申明民族大义，争取他们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维护抗日大局，不为顽固派所利用，不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只

要他们能摆脱特务控制，同我们搞好关系，顽固派就孤立了，他们搞磨擦、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就会破产。三边地委和当地抗日组织接受了乌兰夫的建议，派人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同章文轩及国民党驻军的关系，把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了。乌兰夫此次伊克昭盟之行成绩很大，避免了一场冲突，保住了伊克昭盟解放区，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也提高了乌兰夫在伊克昭盟群众和蒙古族各阶层中的威信。

1944 年夏秋之交，乌兰夫受中共中央西北局委派，再次到伊克昭盟。其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发展，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困难的阶段已经渡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乌兰夫到伊克昭盟后，看到这里的变化很高兴。他分别在乌审旗、三段地和城川三个工委听了汇报，又作了实地考察，认为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巩固、发展这里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特别是政权和经济的建设，努力扩大解放区，把伊克昭盟解放区建设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乌兰夫认为，伊克昭盟的工作基础很好，又是内蒙古没有沦入敌手的一块地方，发展余地很大。把这里的工作搞好了，不仅对抗日，而且对以后解放整个内蒙古都有重大影响。于是他建议，恢复抗战初期曾建立的中共伊盟工委，代替三边地委统一领导现有的三个工委和整个伊克昭盟的工作。这样对发展抗日力量和开展伊克昭盟工作都会更加有利。乌兰夫的建议被中共中央西北局采纳了。1945 年初重新建立了中共伊克昭盟工委，直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为便于开展工作，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三边办事处”。这一组织措施加强了对伊克昭盟的领导，使伊克昭盟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一建议的提出，以及被采纳后所发挥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乌兰夫的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乌兰夫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经过了延安整风和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决议，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和空前团结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最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乌兰夫在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参加了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讨论，听了毛泽东在这次讨论中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这次讨论、毛泽东的讲演和以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统一了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乌兰夫有实践经验，有理论基础，善于学习和思考，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他在延安的 4 年，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历史经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发展的时期，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完整思想体系，形成并日臻完善的时期。这对乌兰夫在理论上和

思想上、政治上的提高和成熟，对他逐步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至关重要的。乌兰夫曾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锤炼革命者的熔炉。有不少有志之士和同志都是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苏联取经 4 年，回国参加实际斗争 12 年，正是延安的 4 年使两者熔炼到了一起。就我来说，要讲革命觉悟，讲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有了些觉悟和认识。”的确，在出国前，在苏联，他读马列著作，学习革命理论，接触的都是书本里的东西。回国后的 8 年地下斗争和 4 年鄂尔多斯抗日，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但在认识上也还基本上是处于感性阶段。经过延安整风学习，经过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讨论，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的很多讲演和文章，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是认识中国革命，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乌兰夫说:“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对内蒙古的社会及其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是在延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演和文章的启示和点化下，才达到一定深度的。在这以前，可以说是一知半解。虽然革命热情也很高，斗争也很坚决，但基本上还是凭直觉，凭朴素的感情，还处在自在的必然王国之中。经过在延安 4 年的学习和总结，才向自由的王国大大跨进了一步，才成了一个比较自为的，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有了一定驾驭能力的革命者。”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乌兰夫在总结内蒙古自治区 40 年经验的时候，曾向帮助他总结的工作人员回顾说:“回想起来，我觉得提高最大最快的阶段是‘七大’前后。在这段时间中的提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的方法；二是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三是懂得了怎样去实现革命的任务。”

对毛泽东观察问题的方法，乌兰夫是非常留心的。去延安以前，在鄂尔多斯抗日前线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

等军事著作时，他就不只是学习其中深邃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还注意掌握其中全面分析、揭示事物本质、抓关键问题的方法。到了延安，带着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他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的著作，使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有了突破性的升华。乌兰夫说：“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树立起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才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矛盾双方共寓于一体的斗争统一规律。这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在我思想上才算扎下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上的成熟必须伴以理论上的成熟，只有理论上成熟了政治上才是坚定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乌兰夫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关键。

乌兰夫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他早年渴望民族解放投身于革命，从苏联回国后为实现民族解放又置身于地下斗争和参加抗日战争，而后又到革命圣地——延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一步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和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乌兰夫说：“在革命道路上，我是由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自觉的。说实在的，青年时期投身革命，是凭感情被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卷进来的。虽然那时候对于革命也是积极热情的，但还不能说是已经达到了自觉的程度，确切地讲还是不自觉的。由苏联回来后，参加保卫归绥作战和在伊盟坚持抗日，感情的成分还是很大的，自觉的程度还是不够。只有到了延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经过学习毛主席的论著和总结以往的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启迪下，对于中国革命和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才有了本质的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时候，也只有到了这时候，才算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乌兰夫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才更加自觉。

对于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中国革命中各民族一起与共同敌人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中华各民族，建设新中国。在早年，因为受苏联影响，中国共产党曾提出过以“联邦”形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逐步明确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说明一些重大问题时，指出:“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乌兰夫在学习《论联合政府》时，对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学习得特别认真。乌兰夫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的主张，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也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观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代表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乌兰夫完全拥护毛泽东讲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

乌兰夫虽然亲身经受过民族压迫之苦，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蒙古族共产党人，一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民族观观察和对待民族问题的。他一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统一的观点；一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实现中国革命的总任务中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一贯主张中华各民族共同解放，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的时候，他对民族问题的这种思想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了。1945 年 5 月 8 日，乌兰夫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悼念哈诺墨拉的文章中说:“在毛泽东同志光辉旗帜的指引下，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帮助下,我们蒙古人民是有光明前途的。”“我们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蒙古民族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

下，为实现联合政府，为争取蒙古民族的自治自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民族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结论，这就是乌兰夫和与他同代的蒙古族共产党人经过 20 多年的追求找到的真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压迫，蒙古民族的先进人物，包括锡尼喇嘛、嘎达梅林等，带领蒙古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苦苦求索，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

在革命圣地延安的 4 年，使已经过 20 多年革命斗争磨练的乌兰夫更加成熟了。党更加了解他，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特别是学到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党以最大的信任把内蒙古革命的大旗交给了他。乌兰夫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满怀信心地接过了这面大旗，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和一批在延安的蒙汉族老战友一起，昂首阔步地重返哺育他的土地——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为造就一个新内蒙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九、重返内蒙古

1945 年 5 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以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彻底垮台而胜利结束。苏联政府履行其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日作战的承诺，8 月 8 日对日宣战。8 月 10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对日宣战。在斯大林的部署下，苏联红军从西面、北面、东面同时出兵中国东北，很快进至松辽平原，实现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分割包围。同时苏蒙联军出兵中国华北长城以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盘踞在这里的日军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疆伪军开战。日本政府慑于苏蒙联军和我抗日力量的强大威力，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被迫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17 日，日本关东军向苏联红军提出停战建议，8 月 20 日，被全部解除武装。9 月 2 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坚持 8 年的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在关内的侵华日军和伪军并没有缴械。蒋介石欲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于 8 月 11 日发布命令，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又令伪军“维持治安”，令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在日伪军拒不向我人民军队缴械的情势下，为收复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发起大规模的战略反攻作战。在华北的敌后战场上，贺龙、李井泉指挥晋绥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进攻归绥及附近地区；聂荣臻指挥晋察冀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与苏蒙联军配合，进攻张家口及周围地区。全国人民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为人民军队在战略反攻中的每一胜利而欢呼；同时，对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的倒行逆施，对战后“中国向何处去”，又不无忧虑。

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加强对绥蒙地区的领导，开展绥蒙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报中央批准，在山西省偏关县建立了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日本宣布投降后，为准备收复绥远省和归绥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发布命令，又委任乌兰夫为归绥攻克后的绥远省主席兼归绥市市长。那时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与全国同胞一样，既为日本宣布投降而高兴，又为祖国和蒙古民族战后向何处去而忧虑，就在这样的时刻，乌兰夫受命于党中央。他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沉重。他的心中装着 200 万蒙古族同胞和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装着战后祖国和蒙古民族的前途。现在，他肩负党中央和灾难深重的蒙古族同胞的重托，就要离开延安，奔赴他曾为之出生入死的内蒙古大地，将在祖国北部的这块土地上，带领不甘受奴役、欺凌的同胞，为走向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8 月的西北高原，干燥而炎热。乌兰夫和与之同行的战友们紧张地准备着，全然不觉盛暑酷热。乌兰夫打点好简单的行装，告别了留在延安的家人和战友，带领一批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锤炼的领导骨干，随吕正操将军率领的部队，由陕北黄土高原北上。他们东渡黄河先到山西偏关，再经雁北、绥东，继续朝东北方向挺进。9 月初，到达已由八路军控制的属晋绥解放区的商都县。

从延安登程后，大家都如久离家乡的孩子，归心似箭，恨不能立刻赶到。乌兰夫的心情尤为急切。他们一路朝行暮宿，扬鞭跃马，很少休息和停留。行军途中，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同群众接触，宣传战略反攻的大好形势，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参加八路军，收复国土，彻底埋葬日本帝国主义。途经晋西北、绥东沦陷区时，大家目睹了被日寇摧残蹂躏 8 年的国土，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无不义愤填膺。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乌兰夫的心情更难平静。触景生情，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从百灵庙暴动，到创建蒙古族抗日武装；从归绥保卫战，到鄂尔多斯

拒敌。桩桩往事，历历在目。战士奋勇杀敌的身影在晃动，战友阵前殉国的壮烈场面在浮现。他时而昂首抒怀，时而沉思无语。途中，乌兰夫不断听到前线传来的战况和消息。为收复归绥市和绥远省的广大地区，贺龙、李井泉正在指挥晋绥解放区的八路军主力，猛打盘踞归绥城和绥远省的日伪军。由于蒋介石不让日伪军向八路军缴械，收复归绥和绥远的仗打得很激烈。他真想一跃到前线，和顽强战斗的将士一起，痛击不肯放下武器的顽敌。

由于蒋介石与日伪合流，退守在绥西黄河后套的国民党军队从河套赶来归绥，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傅作义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一起抵抗八路军攻打归绥。面对抗日战争战略反攻时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调整了战略方针，把战略重点转向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战后的新局面。根据中央新的战略部署，贺龙、李井泉指挥的晋绥解放区八路军主力放弃了强攻归绥的计划，转向夺取附近县城及农村。归绥未克，乌兰夫绥远省主席兼归绥市长的职位也没有到任。

根据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为便于对绥蒙地区的领导，绥蒙政府由山西偏关迁到了绥东商都县。在乌兰夫领导下，绥蒙地区的蒙汉族群众积极配合晋绥解放区八路军主力进行反攻作战。按照党中央调整后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很快解放了丰镇、集宁、凉城、和林、清水河、陶林、武川、卓资山等县城及附近的广大农村，并配合苏蒙联军和晋察冀部队，消灭了盘踞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的日伪军。

在商都县，乌兰夫和绥蒙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与吕正操、姚喆将军一起，会见了苏蒙联军负责人。会见时，乌兰夫等首先对苏蒙联军出兵中国，帮助中国抗日表示欢迎和感谢。苏蒙联军负责人对中国军民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坚持抗战也表示敬佩。随后，双方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通报了敌情，共同研究了协同作战，彻底消灭日本侵

华军和蒙疆伪军的方案。在会见中，乌兰夫对翻译一时译不清和说不准的话，给予了指点，并用俄语向苏蒙联军负责人问候，同他们交谈。苏蒙联军负责人听后感到十分惊讶，都伸出大拇指说:“奥亲赫拉绍!奥亲赫拉绍!”（俄语“很好”的意思）当他们知道乌兰夫20年前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工作，并做过俄语教学翻译后，倍感亲切，特别是对乌兰夫时隔多年俄语还讲得这么流利，非常敬佩。告别时，他们同乌兰夫热烈握手、拥抱，充分表现了中、俄、蒙三国人民在战斗中凝成的真诚友谊。

商都地域辽阔，有农有牧，素有塞外小粮仓之称。可是，经过日寇八年践踏，商都的经济已近崩溃。无论是城镇工商业者，还是农民牧民，都濒临破产。蒙汉族老百姓大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地在死亡线上挣扎。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八路军来了，有了自己的民主政权，虽然缺吃少穿的日子一下子还改变不了，但他们总觉得有了奔头，有了希望。蒙汉族老百姓都很热爱人民军队，拥护民主政府，干部和战士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乌兰夫是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候补中央委员，又是蒙古族人，更受蒙汉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乌兰夫十分清楚，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饱含着信赖和期望。他下决心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让他们能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他和副主席杨植霖及有关工作人员一起，想方设法了解群众生活和社会情况，掌握敌情，分析形势，制定符合绥蒙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对当时的绥蒙工作，乌兰夫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日伪军不向我们缴械，窜来归绥和包头的国民党军队还同日伪合流向我们进攻。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绥蒙地区的任务主要是保卫解放区、巩固解放区、扩大解放区。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乌兰夫认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放手发动蒙汉族群众，检举和处置罪大恶极的蒙

奸、汉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救济灾民，组织生产，支援前线，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积极培养、大胆提拔蒙古族干部和当地干部，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乌兰夫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和上述设想，在商都全面部署了绥蒙地区的工作。绥东、绥南新解放地区的蒙汉族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部队的东进，起了阻滞作用，成了晋察冀边区指挥中心张家口西边的一道屏障。

为了巩固解放区，地方政府在新收复的地区普遍开展了发动群众，检举、审判汉奸、蒙奸的斗争。10 月 7 日，在左云县召开了公审汉奸的万人大会。乌兰夫亲自参加，并讲了话。当宣布候补中央委员、绥蒙政府主席云泽讲话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乌兰夫身穿延安做的普通制服，高大的身材显得格外庄重朴素。他轻快地走上讲台，潇洒地鼓掌、挥手，答谢群众的欢迎。待场内静下来后，他用洪亮的嗓音，亲切的语调说:“同胞们！乡亲们！在八年抗战中你们吃苦了！我对在残酷的环境下坚持 8 年抗战的同胞们、乡亲们表示最亲切的慰问!”场内顿时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乌兰夫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痛斥了汉奸、蒙奸卖国投敌，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罪恶。在乌兰夫揭露、痛斥日寇和汉奸、蒙奸犯下的十恶不赦的罪行时，不断有人带头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血债要用血来还!”场内群起响应。在群众的激愤情绪达到高潮的时候，乌兰夫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目前形势，讲述了斗争任务，号召蒙汉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加入民兵组织，保卫家乡，保卫解放区。乌兰夫的讲话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对左云、雁北乃至整个绥蒙地区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延安来了一位云泽主席的消息，在群众中很快传开了。

十、解决“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

苏蒙联军帮助我解放了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广大地区后，在苏蒙联军中某些人支持下，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等，于 1945 年 9 月 9 日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温都尔庙成立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除伪蒙疆的一些上层人物外，还包括一部分受蒙蔽的追求民族解放的蒙古族青年。该“政府”宣布成立后，就派人到牧区蒙古族群众中宣传他们搞独立的主张，大造分裂祖国的舆论；还派代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请求援助，制造国际影响。当时美国还发表了苏联、蒙古支持内蒙古建立“共和国”的消息。国民党也借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为贯彻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以利于“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战略方针的实施，中共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

10 月上旬，乌兰夫赶到张家口见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刘澜涛等领导同志，聂、刘向乌兰夫传达了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介绍了已掌握的在西苏旗建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情况和察蒙（系指察哈尔省的蒙古工作）情况。解决“临时政府”的问题宜快不宜慢，聂、刘和乌兰夫都主张尽快出发。考虑到乌兰夫的安全，刘澜涛提出派些军队随乌兰夫去。乌兰夫认为解决问题主要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主要是做思想工作，单枪匹马去虽然有危险，但这标志着我们的诚意，如果带军队去，很可能引起对方疑心，不利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聂荣臻和刘澜涛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同意了他的意见。需要带什么人，具体带谁去，他们让乌兰夫自己定。虽然

定下来不带军队，但聂荣臻、刘澜涛心里一直不踏实，总为乌兰夫的安全担心。临别时，他们紧握着乌兰夫的手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乌兰夫充满信心地说:“请你们放心，等着听好消息吧!”

乌兰夫决定只带奎璧、陈炳宇、田户等几个人去西苏旗，稍做了些准备就轻装出发了。

塞外春迟冬早，10 月虽然尚属晚秋，但天已很冷。乌兰夫一行迎着蒙古高原吹来的西北风，向西北方向行进。为了赶时间，他们日夜兼程，300 多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

西苏尼特旗的温都尔庙，位于锡林郭勒盟西部的干旱沙漠草原地区，人烟稀少，经过日伪近 10 年的统治，缺吃少穿的牧民多远走而去，大庙周围很少见到人，风起沙飞，显得格外荒凉、凄惨。到了温都尔庙，只见“临时政府”的人们，还真在那里忙碌着“办公”，上班下班还有人敲钟。

见此情景，乌兰夫风趣地跟与他同去的奎璧等说:“这个装模作样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还满正规哟!”

“人家是‘共和国’嘛！不正规怎么像‘共和国’呢?”奎璧笑着答道。

他们这么一说，把大家都逗乐了。

乌兰夫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中央委员、绥蒙政府主席又是内蒙古有名的老共产党员，30 年代初，为营救王若飞就和这个“临时政府”的主席打过交道，此次执行解决该“临时政府”的使命，宜直接与其头面人物正面接触。所以，一开始他就和补英达赖见了面。

一见面，各自寒暄几句后，乌兰夫就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补英达赖知道来者不善，但自恃打着“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独立旗号，又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取得了苏蒙联军某些领导人的同意，刚接触时，他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架势，趾高气扬

地说:“建立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是蒙古人的意愿，临时政府是民主选举的，苏方、蒙方都同意。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干涉，你们凭什么管?有什么资格插手?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受汉人欺负，日本人来了又受日本人欺负，已经受够了！日本人垮台，我们蒙古人不想再受别人摆布!现在刚刚建立起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谁也休想破坏！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不都是汉人！我们都不相信，都不欢迎!现在我们只相信自己，谁也不要想再欺骗我们!我们蒙古人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谁不知道你们是真共产党，假蒙古，你们连蒙古话都不会说，还算什么蒙古人!”而后，补英达赖更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临时政府刚建立，要办的事情很多，没有时间陪你们。不过你们既然来了，愿意呆就呆几天，我们以礼相待，如果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影响我们的工作，那对不起，只能悉听尊便了。”

随乌兰夫去的人听了这些话都很气愤，但看到乌兰夫不动声色，他们硬压着火没有吭声。乌兰夫一直神情自若，他洞察到补英达赖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内心很虚，他最怕的是揭穿他的老底和谎言。乌兰夫胸有成竹地扫视了一下周围，朝补英达赖笑了笑说:“补英达赖先生，听了你说的这些话，引起我不少想法。我想先提几个问题，请先生考虑。请问先生，你所说的‘蒙古人的意愿’，是指哪些蒙古人?你所说的‘民主选举’，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说的苏蒙方同意，具体说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国民党、共产党都一样，都欺负蒙古人，有什么根据?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

稍作停顿，乌兰夫又加重语气说:“补英达赖先生，你说我是共产党这不错，说我是假蒙古凭据是什么?请你把凭据拿出来！看来补英达赖先生不欢迎我们。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我们是奉中共中央

之命来解决自己民族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解决好自己民族的问题。我们既然来了，就要把问题解决好，不把问题圆满解决，我们是不会走的。”

乌兰夫针锋相对的提问，铿锵有力的语言，触动了在场的“临时政府”人员的心。随乌兰夫去的同志也受到很大启发，心中更有底了，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心。而补英达赖等人则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显得不知所措。听乌兰夫说完，补英达赖不得不说：“云泽先生请不要误会，我们之间是可以商量的。我只是想，我们蒙古人的事，该听听乔巴山的主张，怎么解决内蒙的问题，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来以后再说。”乌兰夫仍然保持严肃态度，弦外有音地说：“请好好考虑一下我提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里也明白。该怎么想，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请好好掂量掂量，可不要聪明人办糊涂事，到时候别后悔哟！”

初步接触后，乌兰夫召集同他一起来的同志开会，对面临的问题认真作了分析。他认为，“临时政府”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不是偶然形成的。补英达赖等人在蒙古人中还有一定影响。多数蒙古人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加上日伪时期和以前的反动宣传，不少人对共产党存有疑虑。一些追求民族解放的蒙古族青年，因为对内蒙古的过去和现在缺乏了解，很难不受他们蒙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蒙联军中又有人支持他们，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分析了这些情况后，乌兰夫又说：“看来我们的对手觉得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影响，又有某些人的支持，要和我们争斗一阵子，想分个高低。我们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不过，我看他们是枯木残叶，经不住几晃。现在的问题是看咱们怎么个晃法。我的意见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争取‘临时政府’里的青年人，让他们了解真相，认清大势，不再支持少数想搞独立的人，这是挖它的基础。再就是同苏蒙联军支持他们的人直接谈，

讲明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请他们尊重我党意见，不做有损于我党和内蒙古民族利益的事，这就叫断它的腰。一棵树被挖了根，断了腰，你们想想它还能站得住吗?”

乌兰夫不紧不慢、有理有据的分析，博得了同志们的交口称赞。他说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和意见。最后，他总结说:“既然同志们同意我的意见，咱们就这么办！你们先在下边和他们的人接触，特别是多和他们中的青年人接触，宣传我们党的主张，讲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他们的觉悟。由我出面约见苏蒙联军有关负责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然后根据‘临时政府’多数人的思想状况，再和他们一块谈。要想办法打动多数人的心，把他们中的多数人争取过来。到那时候再找补英达赖谈，看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再作最后定夺。”

这时候，乌兰夫决定把在商都的克力更再调来，以增加我们做工作的力量。克力更得到通知后，很快赶到了温都尔庙。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通讯条件也很困难。面对复杂的斗争，乌兰夫只能靠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提出对策，作出决断。为排除干扰，力求顺利解决这一问题，乌兰夫很快约见了苏联驻蒙古副顾问尼古拉也夫。

尼古拉也夫很傲慢，一副救世主、教师爷的架子，一开始就以教训人的口气说:“你们的内蒙古应该独立，我们解放了这里，补英达赖建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我们同意的，你们应该支持，不要干涉他们的事。”他还讲了一通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补英达赖这样做的理由。

乌兰夫听了以后，用俄语说:“尼古拉也夫同志，苏蒙联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包括内蒙古的察锡盟在内的我国广大地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对内蒙古的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中国和你们苏联不同，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上，我国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内

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成员。对于少数民族的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革命胜利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党在早年曾经设想过革命胜利后实行联邦制，但后来在实践中认识到，那样做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也不符合少数民族的意愿，已经被否定了。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配合我们的工作。”

乌兰夫耐着性子反复讲了这些道理后，尼古拉也夫还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意见，不同意撤补英达赖的“临时政府”。乌兰夫火了，和他吵了起来。乌兰夫正色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我受中共中央之命，来这里解决在你们支持下搞起来的这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我已经向你讲了我们党的主张。我们党不主张内蒙古独立，不同意建‘共和国临时政府’。苏联和蒙古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这样搞,在我们国内和国际上对我们党都有不良影响。我说的话是代表我们党中央的，你的意见是不是代表联共中央?如果能代表联共中央，请你写下来!”

尼古拉也夫呆呆地听着乌兰夫说，他既不肯改变自己的主意，也不敢说他能代表联共中央。乌兰夫适可而止，缓和语气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以后再谈。”

和乌兰夫一块去的同志，包括后来赶来的克力更，也都紧张地工作着，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与“临时政府”的人接触交谈，取得了明显成效。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对补英达赖产生怀疑，思想开始变化，想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乌兰夫听了同志们了解的情况后，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约“临时政府”的青年一起座谈。在座谈时,乌兰夫肯定了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热爱蒙古民族、追求民族解放，是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指出，他们对中国和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不了解，对当前国内、国际斗争的复杂性不了解，只凭热情很容易上当。

为了启发他们，乌兰夫给他们讲内蒙古革命历史，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卖身投靠、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乌兰夫说的很多事情和道理，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越听心里越亮堂。在交谈中，乌兰夫拿出一张《晋察冀日报》给他们看。他们从上面刊登的汉奸、蒙奸名单中，发现了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和补英达赖等人的名字，都感到很惊讶。乌兰夫因势利导，在青年们思想剧烈波动的时候说:“曾经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人，不反省自己的过去，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者，就成了蒙古民族利益的代表，对这样的人我们能相信吗?”“我们是要为自己的民族着想，蒙古族是要自主，是应该有代表自己民族利益的政府。但是，现在这个‘临时政府’不行。它的人员构成，特别是主要成员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不想马上撤‘临时政府’，那就要改变它的成分，换主要领导人，让受蒙古族农牧民和各阶层人士拥护、有革命斗争经验、真正代表蒙古民族利益的人参加进来。”这是乌兰夫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了各类人员的思想状况和他们的接受程度后，构想的拟分两步走的解决办法。其目的是:先进入这个“临时政府”，把它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掌握起来；随后，视情况作进一步解决。

实践证明这个构想是正确的，在当时，它既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又能最终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经过几天的接触和交谈，“临时政府”的多数人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时局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对乌兰夫和他带去的人，对补英达赖等曾跟随德穆楚克栋鲁普效忠日本的人，也都有了认识。工作做到了这一步，支持补英达赖的苏蒙联军负责人思想已有所转变，又因收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查问此事的电报，也不再固执己见。乌兰夫和奎璧等商量后，又征得补英达赖和“临时政府”多数人同意，决定就地重新选举“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

坐落在内蒙古西部干旱沙漠草原上的温都尔庙，10 月份很少有不见飞沙的日子。如有天助，选举这一天风歇了，荒沙也静了。大庙里“临时政府”的人员和乌兰夫带来的同志都忙忙碌碌，他们挂起了彩旗，布置好场地，要重新选举了。

选举揭晓，乌兰夫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主席，奎璧等当选为委员，补英达赖也保住了委员职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民族政策，乌兰夫以其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胆略，成功地改组了企图搞内蒙古独立的“临时政府”。乌兰夫当选主席后，“临时政府”里的青年人都很敬佩他，部分中间派和偏右的人，迫于大势也不得不接受他的领导。为有利于最终解决问题，乌兰夫决定把这个“临时政府”迁到八路军控制的察哈尔省张北县。他跟大伙说:“苏尼特右旗是纯牧区，没有粮食，牧民的牲畜被外蒙军队赶走了不少，肉食也很缺乏，咱们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庙里，吃的烧的都成问题，长期在这里呆下去，右旗的困难必然会越来越大。从长远考虑，我主张把‘临时政府’迁到张北县去。张北县属察盟地区，以农为主，离牧区不远，又靠近张家口，生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也便于对外联系。”大伙觉得乌兰夫说得有道理，绝大多数人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很快就行动，用两辆大卡车，把“临时政府”迁到了张北。到张北后，乌兰夫就去张家口向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汇报工作。临行前，他告诉“临时政府”的人，“共和国临时政府”暂时停止活动，以后怎样开展工作等他回来再说。

从此以后，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再没有活动过。用乌兰夫的话说，叫做“让它悄悄地自生自灭了”。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驳斥江青一伙诬陷乌兰夫反党叛国，想搞“蒙古大帝国”、当成吉思汗第二，曾以他处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为例明确地指出:“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乌兰夫同志去处理某些人搞的‘内蒙古人民共和

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他单刀赴会，不发一枪一弹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充分说明在维护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他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定的！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对一个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过大功的少数民族干部，怎么能说他反党叛国搞民族分裂呢?”周恩来的这一评价，使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哑口无言，这也是给予乌兰夫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

十一、创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清朝和北洋政府时期，内蒙古各盟、旗实行分治。1928 年底至 1929 年初，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被划分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行省。日本侵占东北建伪满洲国后，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了兴安总省等。内蒙古名存实亡。蒙古民族长期置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分割统治之下。蒙古族劳苦大众和社会各阶层，渴望民族解放、民族统一和民族自治。多少蒙古民族的仁人志士曾为之奋起斗争，但都因为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的指导而失败。一些抱有个人野心和政治目的的人，利用人们追求民族解放的心理，打出各式各样的“独立”“自治”旗号，把蒙古民族引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维护国家统一、拯救中华各民族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把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专门作了论述，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乌兰夫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他不负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期望，和广大劳苦大众一起，在内蒙古首先实施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1945 年冬，国民党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在重庆举行国共两党和谈。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和平诚意，既有利于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又不失时机地解决内蒙古的问题，1945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几次电报协商，决定在解决内蒙古的问题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群众团体，也带有政府咨询机关的性质，由它统一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第二步，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基础上，再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实施第一步任

务期间，在具备条件的盟和旗先建立地区性的盟、旗自治政府，分别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关省民主政府领导。同时决定，乌兰夫留在张家口，统一负责内蒙古的蒙民工作。中共中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中说：“同意先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各省区之蒙民可成立地方性质之自治政府，分别归绥、察、热省政府领导。各盟旗自治政府目前可进行以下工作，如颁布简明纲领，建立地方武装，提拔培养当地蒙古干部，检举蒙奸，举办有利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及社会公益等建设事业。”“暂规定大的方针政策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及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而以乌兰夫同志和两个中央局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至于蒙古干部，应统一由乌兰夫分配。”“西蒙情况，望随时电报中央，晋察冀、晋绥及冀热辽均应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内蒙问题。”

为了实施中共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在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以后，乌兰夫在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和支持下，与派往内蒙古工作的干部一起，着手筹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为了使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把可以团结的蒙古族同胞最大限度地团结在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旗帜下，乌兰夫等在蒙古族各阶层中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不少在日伪时期效忠过敌人的人，也被争取了过来。原伪蒙疆自治政府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经济部长吉尔嘎朗、交通部长穆克登宝、察哈尔盟副盟长哈斯瓦齐尔、蒙疆银行副总裁墨尔根巴图尔等，自愿集会座谈，反省自己的过错，揭露日伪所犯罪行，表示愿意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愿为实现蒙古民族的真正解放、自治出力。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使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具有深

厚的群众基础，乌兰夫除派出共产党员和干部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解自治运动的性质外，1945 年 11 月 12 日，他还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在谈话中，他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性质与任务，还讲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王爷的问题。乌兰夫说，内蒙古地区数十年来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呈现着极端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群众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内蒙古工作的具体步骤，一方面主张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大力帮助其进步和发展，要把涣散着的人民组织起来，在军事上，要帮助建立一支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地方性的民族军队；另一方面，基于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原则，又主张蒙古民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密切的联合与合作。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说: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蒙古族广大人民的需求而正在着手筹备成立的，代表广大群众利益和统一领导群众运动的组织。它愿以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民族政策为奋斗目标。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的人民，使之组织起来，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自治运动联合会协助热、察、绥省政府，多多兴办对于蒙古人民有利的事情，大量救济灾胞，发展学校，改善畜牧业。至其最终的目的，则为彻底实现内蒙古的自治，建立一个包括各个阶层的民主的统一的地方政权。摆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面前的这一历史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但有全内蒙人民的共同努力，深信它一定能光荣地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内蒙古人民有决心也有信心，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光明的大道。

乌兰夫的这次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人民的信心，预告了一场改变内蒙古命运的狂飙即将席卷北国大地。

1945 年 11 月 6 日，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筹委会为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在思想、组织和物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在思想工作上，乌兰夫提出要作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思想发动，使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民族政策和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深入人心，让更多的蒙古族同胞自觉地、主动地投入到自治运动中来；要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隔离、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反动政策的罪行，揭露他们的欺骗宣传，蒙古族同胞认清共产党与他们的本质区别，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坚定地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道路。

在组织上，乌兰夫主张要最广泛地团结蒙古族各阶层。自治运动联合会既然是带政府咨询机关性质的群众团体，就应该有广泛的群众性、代表性，其成员是以进步分子为中坚，还要包括中间分子和在日伪统治时期曾跟随德王做过错事已承认了错误的人，也包括愿意走民族解放、民主自治道路的王公、贵族和喇嘛。总之，除了与蒙古人民为敌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等少数蒙奸外，都欢迎，都团结。要用自治运动联合会这面旗帜把蒙古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共同走民族解放之路。

在筹备工作期间，乌兰夫很关心文件和物质方面的准备。他认为这是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和意图，实现蒙古族同胞意愿的实际体现，是开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具体保证。他要求负责这方面筹备工作的人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等主要文件，都是在乌兰夫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起草这些文件的过程中，乌兰夫要求工作人员逐项、逐句、逐字地反复琢磨，文字表达要准确、明白，要写出既符合党中央指示精神，又符合当时内蒙古情况，真正代表绝大多数蒙古人心愿和利益的文件

来。接待代表的准备工作，他也亲自过问。那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张家口刚解放，百废待兴，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乌兰夫要求尽最大努力把代表的接待工作和代表开会期间的生活安排好，特别是在服务态度上，一定要做到真诚、热情，使每个代表都能感受到自治运动联合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在乌兰夫领导下，经过整整 20 天的紧张准备，各方面工作都已就绪，代表着分别属于绥远、察哈尔、热河、宁夏和东北三省各盟、旗蒙古人的 79 名代表，先后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大会对代表资格确定了三条标准:一是在蒙古人民中有声望的；二是对内蒙古解放运动有贡献的；三是参加过抗日的。按照这三条标准，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乌兰夫等 79 名代表全部合格。从 11 月 21 日开始，全体代表分组研究提案，讨论会章。11 月 25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了议事规程、会场规则和选举办法，决定 11 月 26 日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出乌兰夫等 9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位于长城脚下的张家口，历史上就是外蒙和内蒙与内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它同内蒙古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1925 年夏秋之交，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后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那次大会的召开和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建立，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革命，对蒙古族劳苦大众的觉醒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主要负责人白云梯等也紧紧追随他们叛变了革命，但该党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曾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是不可磨灭的。20 年后，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在这里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其意义非常重大。

1945 年 11 月 26 日，张家口阳光灿烂。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远来庄礼堂隆重开幕。远来庄礼堂彩旗飘动，气氛十分热烈。上午 10 时，代表着 200 万蒙古族同胞的 79 名代表面带笑容，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会场。当乌兰夫等主席团成员和刘澜涛、成仿吾、张苏等晋察冀边区及察哈尔省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乌兰夫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刘澜涛代表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仿吾代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张苏代表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先后作了重要讲话并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大会在乌兰夫主持下，开得很成功。

11 月 27 日，到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11 月 28 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乌兰夫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执委。同时当选的还有奎璧、乌兰等 5 人。同日，大会还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及全体代表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和给全国各族、各界、各政党及全国同胞的反对内战通电。最后大会举行闭幕式，乌兰夫代表当选的执行委员致闭幕词，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胜利闭幕。

1945 年 11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了首次执行委员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常委。乌兰夫当选为常委。同时当选的还有奎璧、克力更等 10 人。常委又一致推举乌兰夫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主席。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期间和成立大会上，乌兰夫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不倦的精神工作着，用坚定的立场、明确的态度感染着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内蒙古问题，用他已认识到的内蒙古现状、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他 20 年奋斗的亲身体会，启发、教育大家。关于内蒙古的现状，乌兰夫说：“今天的内蒙古，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在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都呈现着极大的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群众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关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他又十分明确地总结说:“这是历史上的民族压迫，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造成的。”

关于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乌兰夫说:“在历史上，蒙古民族反抗压迫、追求民族解放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在明末清初，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英雄林丹汗、葛尔丹等。到了 20 世纪，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全国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内蒙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又出现了像李裕智、多松年、锡尼喇嘛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的斗争除不可排除的历史原因外，都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或指导思想错误而失败了。但他们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当前的斗争，乌兰夫说:“我们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得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真心热忱帮助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我们要努力工作，唤醒和组织内蒙古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内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只有这样，蒙古民族才能彻底解放，内蒙古革命才能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乌兰夫关于内蒙古革命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为蒙古民族各阶层多数人所接受，进而贯穿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各项文件中，并在内蒙古广大地区贯彻实施，这标志着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水平和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预示着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乌兰夫专门讲了目前工作，分十项谈了基本任务和工作方针:一是在政治上，发动和组织群

众，建立盟旗区域性自治的民主政府和区乡政权。分别在热、察、绥民主省政府领导下，发展各盟旗的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经过盟旗的区域性自治，达到全内蒙古的自治。二是在军事上，先恢复和组织各旗保安队，广泛组织民兵，在此基础上，组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肃清境内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社会秩序。三是经济政策:其一是提倡合作事业，取缔奸商在蒙地的不等价交换和欺骗贸易，实行有利于蒙民生计的公平交易、互利互惠。其二是改进畜牧业的饲养和管理方法，奖励耕地，发展手工业，培养蒙民劳动观念。其三是搜集敌伪资财，创办有益于内蒙古人民的事业，救济贫苦人民。四是在文化教育上，生产与学习结合，建立内蒙古学院和工作人员短训班，实行普及方针。原有学校在志愿原则下，以夜校、普及巡回识字方式，扫除文盲。五是设立小型医院，免费为蒙人患者治病，改造旧医务人员。适当解决兽医问题，减少牧畜死亡。六是信教自由，保护喇嘛财产。七是在民族问题上，揭露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离间民族关系的阴谋，蒙汉劳动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处理蒙汉杂居地区的土地问题，照顾蒙汉族人民的利益。八是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使蒙古人民真正认清民族解放的道路。九是彻底肃清蒙地法西斯残余势力，改造伪政权中的人员，使之为蒙古民族服务。十是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涉通商问题，繁荣内蒙古经济。

这十个方面，概括了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全部工作，明确了工作重点和各方面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保证了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各级干部有目标、有组织地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自治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推向了一个新高

潮。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内蒙古各阶层群众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它的成立使内蒙古的群众革命斗争在组织上不仅达到了统一，而且得到了加强。日本投降后，在察哈尔盟和乌兰察布盟建立的解放委员会，在大会期间主动宣布取消原组织，接受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在温都尔庙建立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因其大部分成员被吸收进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也自行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统一了蒙古族各阶层的意志，使蒙古族人民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乌兰夫在大会上的致词、讲话和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指明了内蒙古群众运动的方向，明确了当前的斗争任务和奋斗目标，坚定了蒙古族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信心。内蒙古的 200 万蒙古族同胞开始团结起来，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内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结束后，大批干部和领导骨干到各盟旗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贯彻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的精神。根据形势需要和现有力量，乌兰夫确定先抓四件大事:一是筹办内蒙古军政学院；二是筹备设立盟和旗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和支会；三是救济贫困的蒙古族同胞；四是创办《内蒙古周报》。在战后有利形势下，在晋绥、晋察冀、冀热辽三个边区领导的支持下，在各盟旗先进分子的帮助下，自治运动像春潮一样，迅速涌向内蒙古全区域。

内蒙古革命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干部。培养军政和经济等管理干部已成为当务之急，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后不久，内蒙古军政学院就在张家口建立。乌兰夫兼任院长，晋察冀中央局派朱荣任教育长、刘景平任院务处长，齐永存任教务处长。院下设军政部、行政部和中学部。首次招生军政部和行政部各招 100 名，中学部招 200 名。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主要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

府》和内蒙古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等。这所学校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乌兰夫多次亲自给学员作报告，讲形势，讲民族政策，讲内蒙古革命和自治运动的任务。这所学校在全国和内蒙古革命进入一个新高潮时创建，为内蒙古革命、为自治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到解放战争爆发，八路军被迫撤出张家口为止，学校共培养军政和各方面管理干部 500 多名，为实现内蒙古彻底解放，为夺取内蒙古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给自治运动联合会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联合会在组织建设上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针，即先在各旗建立支会，然后再建盟分会。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联合会先开展了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和绥远省乌兰察布盟的工作。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首先在这几个盟及所属旗相继建立了旗支会和盟分会。旗支会和盟分会除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外，主要是办对蒙古族群众有利的实事。由于当时蒙古族同胞缺吃少穿，生活十分困难，救济灾民成了最突出的任务。张家口支会成立后，一次就发放了 2500 公斤救济粮。1946 年春节前，察哈尔省政府一次拨出 5000 石粮食，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发放给了察哈尔省的蒙古族贫困同胞。这些工作在蒙古族群众中影响很大，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帮助蒙古族人民的，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代表蒙古人利益的，是蒙古人自己的组织，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威信，为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革命运动需要革命舆论，革命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导。乌兰夫很重视舆论工作，在他支持下，熟悉新闻工作的勇夫、丁士毅、石琳等被调到《内蒙古周报》社工作，《内蒙古周报》很快办了起来。《内蒙古周报》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机关报，作为联合会的喉舌，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联合会主张、推动自治运动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联合会还建立了内蒙古文工团。文工团集中了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在周戈、布赫等领导下，他们深入草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自治运动联合会后，在乌兰夫领导下，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很快成为发动群众，积聚革命力量，领导和推动内蒙古革命的旗帜和核心。

十二、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统一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虽然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代表参加，但限于斗争形势，东部各盟旗的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当时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形势和整个东北一样，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向那里扩张其势力，当地的王公贵族、地主、牧主和日伪统治时期的官僚、军警残余势力，也想摇身一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继续他们的反动统治。各种反动势力既互相勾结，又自成体系，贪婪地抢占地盘，笼络自己的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一些蒙古族进步人士和一批渴望民族解放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地同日伪残余及反动势力斗争，欲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由于日伪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一贯欺压蒙古族而形成的民族隔阂，致使蒙古族中的进步人士和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青年，对汉人也多存有戒心和顾虑。他们不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也缺乏了解。他们想走一条既不依靠国民党，也不依靠共产党，靠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民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内外蒙合并或内蒙古独立自治”的道路。

日本投降后不久，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发起重新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该党东部本部的名义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提出了内蒙古和外蒙古合并的主张，并派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络。在他们主持下，1946 年 1 月 16 日，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由该党领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推举原伪满洲国兴安总省主席博彦满都为主席，发布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和《东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该政府于 1946 年 2 月 25 日正式宣布成立，同时还组织了由它领导的东蒙古自治军，控制了内蒙古东部的多数盟旗。

为了争取内蒙古东部这支力量，以利“控制热察，发展东北”的

战略方针的实施，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知达等去王爷庙工作。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东部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1946 年 2 月，西满分局决定建立东蒙工委，张策任书记，对外称八路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同时，为稳定西满和内蒙古东部局势，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民主联军对东蒙自治军的影响，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还邀请东蒙古自治军司令阿思根到郑家屯会商，并就两军关系签订了《吕阿协定》。这些工作对这支力量逐步靠近中国共产党，以致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他们中的核心人物要走自己的路的想法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也不是一下就能改变过来。1946 年初，冀热辽部队经赤峰去林西一带开辟热北根据地，当部队进至巴林右旗大板一带时，遇东蒙古自治政府所属和子章部队拦阻，并称那里属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管辖，不让八路军进入，一时关系紧张。八路军持克制态度，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部队暂缓前进。

对内蒙古问题，中共中央一直持慎重的态度。1945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曾电示东北局林彪、黄克诚，西满分局李富春和冀热辽分局程子华等，指示:“西满和热河的蒙古民族对我态度之好坏，为我西满及热河成败发展决定条件之一，望你们十分注意研究这一问题并通令早对蒙古民族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1946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电称:“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引起了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提出独立自治口号。林(彪）前所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过左，我们不能赞成该党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应劝告改变方针，并对国民党谣言设法加以揭破。”

1945 年 12 月初，东蒙古进步青年包玉昆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的派遣，长途跋涉到张家口找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联系，谋

求解决内蒙古民族解放问题。乌兰夫接见了他，并与之进行了交谈。通过交谈，乌兰夫对东蒙形势有了初步了解。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当时东蒙情况，乌兰夫向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决定派刘春带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去内蒙古东部宣传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以谋求内蒙古东西部在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自治运动。

1945 年底，工作团从张家口出发，经承德、赤峰，辗转赴东北。因路上遇土匪拦截，工作团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工作团在热河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向东北行进。到达东北后，工作团先到郑家屯向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开展工作，而后才去王爷庙。此时已是 1946 年 2 月初，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已于半月前成立。工作团到王爷庙后，就按临行前乌兰夫的部署和李富春的指示，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人接触，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共商如何在内蒙古统一开展自治运动，以谋求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工作团和东蒙工委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赞成东西部统一开展自治运动，并同意派代表赴承德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共商此事。于是，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的同志同时起程，赶赴承德。

东蒙工作团尚在途中时，乌兰夫在张家口接连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和我冀热辽程子华部队遇和子章部队拦阻的急电，要他速去处理此事。此时，冀热辽分局也来电告知，东蒙工作团的同志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已同时起程赴承德，请乌兰夫速去承德主持同东蒙代表的谈判，顺便解决与和子章部队的冲突问题。在此期间，乌兰夫又接到东蒙工作团关于东部形势及开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乌兰夫征得聂荣臻同意后，于 1946 年 3 月下旬，率部分拟参加同东蒙代

表谈判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赶赴承德。

乌兰夫到承德时，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的同志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已先期到达。这是一次代表着内蒙古东西部 200 万蒙古族同胞的重要聚会，双方代表将共商整个内蒙古如何统一开展自治运动，共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它将是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关系蒙古族同胞命运，是同战后中国共产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实施休戚相关的大事。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都十分重视。分局书记程子华和省委书记胡锡奎对接待代表及会议有关问题亲自作了周密安排。

乌兰夫刚到，程子华和胡锡奎等领导就来看他。一见面，程子华就握着乌兰夫的手风趣地说“‘王爷’，你可来啦！我们早就盼你了，一遇到民族问题，我们心里就觉得没有底。你这位党的民族问题专家一到，我们就踏实多了，这可要托你老兄的福，该你‘显灵’了!”

乌兰夫也边笑边说:“程大将军名震四海，要我‘显灵’，那可要全凭你撑腰了!”

“我看哪，福是要托，腰也得撑！现在正该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文质彬彬的胡锡奎在一边慢条斯理地说。

听了胡锡奎这几句话，程子华又笑哈哈地说:“唉呀！还是老胡这大知识分子会说话，把咱们都拴住了，谁也甭想跑!”

几个领导同志风趣地交谈了一阵子后，程子华又说:“怎么样，‘王爷’！东蒙来的人和工作团的同志的住宿已经都安排好了。你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吧！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我的身体底子很好，不觉得累。我想先看看东蒙来的代表，晚上和工作团的同志们谈谈，争取尽快开展工作。子华同志，对如何做工作的问题，我想听听分局和省委的意见，请你指示。”乌兰夫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

“这里有关民族问题的情况，我们都提供给你。内蒙古东西部的问题，整个内蒙古问题的解决，党中央已有指示。方针和基本原则都明确了，现在主要是贯彻和做工作的问题。这你是最有经验、最权威的，主要是靠你呀！至于有些问题需要商量时，可以一起研究。分局和省委主要是尽地主之谊，给你们当后勤，做服务工作。和子章不让我们的部队进入热北，他们的部队同我们发生冲突的问题，怎么解决你考虑一下，争取尽早接触。”

先简单交谈后，乌兰夫就在程子华、胡锡奎等陪同下，去看望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

他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望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每一位负责人及随行工作人员，同他们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虽然大都是初次见面，但民族感情紧紧维系着他们。大家无拘无束，都感到热乎亲切。

当见到特木尔巴根时，乌兰夫一下认出了他，马上说:“这不是老张(特木尔巴根原来的汉名叫张成）吗?”

特木尔巴根听后一愣，两眼盯着乌兰夫仔细打量了一会后说:“你是云泽吧?”

两位老相识在这样的场合相逢，格外激动。两人紧紧地握手，互相拍打着肩膀，兴奋不已。在场的人无不为他们久别重逢而高兴。程子华说:“真没有想到你们俩是老朋友。故友重逢，可得好好叙叙旧，亲热亲热了!”

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特木尔巴根说:“我听说 1929 年咱们一块回国的西部同志都牺牲了，你已经不在了。还传说共产党让一个汉人冒充你云泽的名字来内蒙搞自治运动。原来你这个云泽是真的！不是假的!”特木尔巴根说着笑了起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乌兰夫和大家一起笑了一阵后说:“我这个云泽可是地地道道的真云泽，一点

也假不了。在西部坚持斗争的同志是有不少人牺牲了，可我这个人命大，几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过。看来这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还不要我，想让我留下来再多干几年革命！”

“你这个云泽在就好了。我们这么多年不见面了，又经过了那么多复杂的斗争，可是得要好好叙谈叙谈。”特木尔巴根感慨地说。

“是呀！是得好好叙谈叙谈。有不少大事需要咱们办哪！先考虑考虑，好好酝酿一下，改日咱们再慢慢谈。”说完，乌兰夫和程子华等与特木尔巴根握手告辞。

乌兰夫、程子华等领导人到住地看望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人，影响更大。乌兰夫等走后，他们就议论：“共产党的官就是不一样。云泽主席举止不凡，从言谈就能看出是咱们蒙古人中的佼佼者。程司令那么高的地位，真没有想到一点架子也没有，是那么平易近人。他谈吐真有大将风度，那么干脆，那么风趣。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有一批这样的人物主事，何愁大事不成！”

这次会见，使不少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心中激起波澜。这一席话，正是当时在场、后来长期任内蒙古妇联主任、又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的乌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忆述的。她还说，乌兰夫和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的初见，那次东西部共商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会谈，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受益匪浅。

1946 年 3 月 29 日晚，乌兰夫听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的汇报。工作团东行时途经承德，从冀热辽分局、热河省委的介绍中，对东蒙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到西满分局见李富春请示工作时，又听了大致情况的介绍；到王爷庙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人员直接接触后，掌握的情况就更多了。他们了解到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持下匆忙建立的这个政府成员很复杂，虽然进步与比较进步的人士和青年知

识分子居多数，但左右这个政府的主要人物则多是伪满时的上层军政人员。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民族主义思想较重，也有个别反动人物。由王爷庙来承德的路上，工作团的同志与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同行同住，朝夕相处，彼此有了较深的了解，有的同志还与思想敏锐的东蒙青年交了朋友。乌兰夫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赞扬说:“你们已掌握的情况，对分析全局、确定工作方针具有重要意义。你们真正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随后，乌兰夫和他们一起连夜分析形势，研究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乌兰夫首先作了分析。他认为解决这个自治政府的问题，不同于解决西苏旗温都尔庙那个“临时政府”的问题。那个“临时政府”是个空架子。这个自治政府已形成了它自己的一套东西，背后还有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建立了由他们领导的自治军，并已控制了一定地区。他们派代表谈判，说明他们也希望统一内蒙古的自治运动，但他们想的统一，并不是按照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统一于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而是要按照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方针，把整个内蒙古的自治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虽然他们欲搞内外蒙合并的念头因外蒙不支持已打消，但要搞内蒙古自成体系的高度自治，即独立自治，仍是他们的主导思想。况且，某些已占据相当地位的人也未必愿意退下来。根据这种情况，乌兰夫提醒大家要有做艰苦工作，甚至激烈争论的准备。同时，乌兰夫也指出，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有 200 万蒙古族同胞的支持，充分发挥这两大优势，工作做好了，就一定能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工作团的同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家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夜已经很深了，但大家的热情丝毫未减。乌兰夫站起来，踱了几步说:“我们的任务是贯彻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实现 200

万蒙古族同胞的愿望，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根据全国的斗争形势和内蒙古革命的现状，完成这一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把自治运动在全内蒙古普遍开展起来，为实现内蒙古的民族区域自治创造条件；第二步是把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待各方面条件都成熟时，再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内蒙古全区的民族区域自治。从已经了解的和同志们刚才谈的情况看，重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刚成立的东蒙古自治政府，也主张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是一致的，这是个大前提。现在的问题是:由谁领导？统一于谁?要什么样的自治?什么时候实现自治?在这样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问题的核心是由谁领导和要什么样的自治，也就是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是独立自治，这将是争论的焦点。争论可能会是很激烈的，同志们应该有做艰苦工作的准备。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深入下去，耐心地做工作，绝大多数人会改变看法，接受我们的主张。在方法上，我的意见主要是分头在下边做工作，可以小范围座谈，也可以个别交谈。这样容易掌握真实思想，便于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会谈可以是对等形式，他们东蒙古自治政府派七名代表，我们自治运动联合会也出七名代表。但是工作对象不限于代表，凡是来的人都要做工作，争取把每个人的思想都做通。座谈和交谈属于预备会性质，待意见基本一致后，双方代表再正式开会。这样做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比较自然、顺利。如果同志们同意我的看法和意见，明天就和东蒙主要负责人商议。如果他们同意这种方法和程序，咱们就这么做，大家分头接触做工作。”

同志们都认为乌兰夫看问题很全面、很深刻，所谈解决问题的方

法也切实可行，都赞成这样办。

第二天，乌兰夫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负责人交换意见，他们也想先小范围和个别接触，便于宣传他们的主张，所以也同意这个办法。虽然双方各有自己的目的，但实现目的的方法和程序却不约而同。

不出所料，接触后很快暴露出了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有一点双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都主张内蒙古统一起来搞自治运动，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争论是坦率的，谁都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双方都是发自内心地想寻求实现自己民族自治的道路。

乌兰夫密切关注着双方接触的情况，他夜不成寐，时刻思索着怎样加快会谈进程，怎样才能打动对方主要人物的心?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小范围和个别接触中双方争论到一定程度，对方观点基本上都亮出来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召集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会的同志，分析情况，研究如何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以求尽快突破，推进会谈。

会上，参与会谈的同志全面汇报了座谈和个别接触的情况，为帮助与会同志把握全局，把问题吃透，乌兰夫又作了全面分析。“现在可以明显看出，会谈基础很好，但困难也不小，基础好就是都希望内蒙古统一，都追求本民族自治，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认识虽有很大差距，但态度都是坦率的、诚恳的。困难之所以不小，就在于他们形成那样一种观点，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改变起来很不容易，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受党教育多年，了解党，能理解党的方针和主张；而他们过去长期听的是反面宣传，日本投降后我们东北的同志虽然已经给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是初步的。对我们党他们还不真正了解，尚有疑虑，要改变他们的态度，使其接受我党主张，必须首先解除他们的疑虑，使他们相信

我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道理说服他们，否则，是改变不了他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和想法的。看来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争论的焦点是谁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是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办?还是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办?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在这个实质和核心问题上，我们不能迁就，也不能含糊，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十分耐心地去做工作，直至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接受我党领导。”略作停顿后，乌兰夫又说，“他们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不同，作用也不同，要重点做有影响的人物的工作。东蒙代表中影响大的主要是博彦满都、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这三个人中，博彦满都是原伪满兴安总省主席，他当东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自治政府的性质。一旦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认清这一点。对这一点，博本人也很清楚，他内心肯定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他对蒙古族人也会有负债感。所以，在对蒙古民族未来的问题上，他理不直，气不壮，没有多少发言权。可以说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主要问题上，他要看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的态度，甚至怕他们把他甩掉。哈丰阿原来是文职人员，有才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他善于思考，容易接受新东西，和特木尔巴根相依相存，在主要问题上，他要看特木尔巴根的态度。特木尔巴根和他们不同，20 多年前他就为内蒙古革命奔走，是 20 年代我党支持下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和我同时期去苏联学习时加入了联共党，日伪统治时期限于环境和条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见我后对此深感愧疚。他与博彦满都、哈丰阿等走到一起，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他是真心想为蒙古民族找出路。他和我又是旧交，只要道理讲充分，我相信是能把他争取过来的。只要他的态度变了，哈丰阿也会随之改变。他们两个变了，博彦满都就不可能再说什么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局就活了。

由此可见，特木尔巴根是重中之重，应该首先做他的工作。”

工作的重点对象明确后，乌兰夫又讲了从哪些方面做工作，他说：“要使他们接受我党的领导，按我党主张解决内蒙古问题，必须使他们认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认清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革命的关系，认清内蒙古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懂得内蒙古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特点。在这些方面明白了，要是真心为内蒙古民族解放着想，他们的心就不会不动，他们自然就会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的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实现，内蒙古革命才能走向胜利！”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回去后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床上默默地想着明天的工作，企盼着能有大的进展和突破。乌兰夫也在思考着明天与特木尔巴根交谈的内容。

第二天的工作果然很有成效。大家按照乌兰夫的分析和提示，摆事实讲道理，使不少东蒙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了窍。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向和他们交谈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问这问那，已不再是争辩，而是想知道得更多更深。

乌兰夫和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的个别会谈也很成功。他先约特木尔巴根，两位旧交坐在一起，引起对不少往事的回忆。乌兰夫说：“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你我都奔波多年，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辛酸。在艰难的斗争中苦苦求索，终于找到了真正关心和帮助我们的人。认识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内蒙古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蒙古民族的仁人志士和热心自己民族问题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还想另走自己的路，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坚持由这样一个党来领导内蒙古革命。到承德后，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同志已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我们的想法反复地讲了，现在看来有一些人还想不通，还不肯接受。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一个人某种观点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自然也不是一下子

就能改变。只能是尽量做工作，力求转变得快一点。老张，你对这种情况和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呀?”

“我好说，怕是有一些人一下子还转不过来，接受不了。他们对国民党不相信，对共产党也不完全相信，所以才又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又建了东蒙自治政府。这些都是刚搞起来，现在就让他们放弃，我看很难下得了这样的决心。”特木尔巴根有些不自在地说。

乌兰夫一听，知道他这是在以人喻己，这说明他的思想在斗争，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做工作，正是促其达到思想转变的最好时机。于是，乌兰夫顺着他的思想脉络，诚恳地说:“老张啊！不管别人怎么样，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在关键时刻，在关系内蒙古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要有自己明确的态度。”

接着，乌兰夫结合内蒙古革命的历史，充分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和基本政策。他从内蒙古革命史上的几经挫折，阐明中国共产党同内蒙古革命的关系；从 2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变革命给蒙古族同胞带来的灾难，说明内蒙古革命不能脱离中国革命的总轨道而另辟道路的道理；从内蒙古革命始终是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内蒙古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失败到胜利，直至以自治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内蒙古革命才能胜利。

乌兰夫讲述这些事实和道理时，特木尔巴根时而点头，时而沉思，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乌兰夫因势利导，剖析了重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指出其成分复杂，没有群众基础，政治主张不切时宜，也不符合群众的愿望。尔后，他以关心而又明确的口气说:“一些人想让这样一个党领导内蒙古革命，你想这能行吗?这个党根本领导不了内蒙古革命，它不会有什么前途，我建议你们主动解散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咱们一起搞内蒙古革命，为实现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共同奋斗！”

乌兰夫诚挚的态度，对内蒙古革命的深刻理解，对内蒙古前途令人信服的分析，渐渐地打动了特木尔巴根的心。“你说的道理我赞成。”特木尔巴根似乎精神了许多，慢性子的他变得痛快起来。特木尔巴根终于有了第一个态度。

党的领导问题谈通后，当前的自治运动和日后自治的性质，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对东西部统一起来后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特木尔巴根还是没有摆脱那个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乌兰夫又向特木尔巴根谈了国内斗争形势，向他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平谈判还没有破裂，蒋介石正利用内蒙古自治问题攻击共产党。为不给蒋介石以口实，先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这样对开展各项工作更为有利。只要掌握了领导权，实际工作能开展起来，全内蒙古的自治政府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再建立也无妨。乌兰夫特别指出：“东蒙古自治政府中伪满时的官吏占一半，主席就是伪满兴安总省的主席，它怎么能代表群众?群众怎么会拥护和支持?这叫什么民族民主自治?这个政府还是先撤销，这样对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对蒙古民族彻底解放，才会更有好处。”

“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乌兰夫见特木尔巴根若有所思，就问他。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你考虑得那么深，从大局出发，为内蒙古、为蒙古族同胞的长远利益着想，是该照你说的去做工作。”对内蒙古革命的历史转折有重大影响的两位蒙古族革命先驱，在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和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组织形式问题上，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特木尔巴根如释重负，感到轻松了许多，乌兰夫也为自己在完成一项重大使命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高兴，两位老朋友的手又

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

特木尔巴根从来承德时准备争辩，到接触后觉得缺理，又到放弃原来想法，下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意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其思想经历了一段曲折变化的过程。在完成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乌兰夫耐心地给他做了大量工作。他从内心里表示感谢，并觉得内疚和歉意。在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他鼓起勇气找到乌兰夫说：“我们在苏联时，我加入联共，现在要求把我这个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请你考虑。”

乌兰夫听了以后很高兴，他对特木尔巴根的历史情况和现在的政治态度都比较了解，认为把他转为中共党员对东西部统一起来开展自治运动很有利。当即就作了比较肯定的回答，并马上报告了冀热辽分局和程子华。报告很快得到了分局的批准。特木尔巴根知道后格外高兴，立场和态度也来了个大调整。他由原来的被做工作的对象，转而成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与乌兰夫等一起做东蒙民族上层和其他思想尚未转变的人的工作的力量。自此，会谈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木尔巴根态度的转变和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的事，很快传了出去。哈丰阿知道以后就坐不住了。他主动来找乌兰夫，表明他不再坚持原来意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同意自治运动联合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同时也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思想敏捷，内蒙古东部一些民族上层和青年知识分子信服他，他的态度如何，对全局影响很大。原预想在他身上还需要下点功夫，意外的是在特木尔巴根态度转变后，他采取了主动。乌兰夫想，这正说明先重点做特木尔巴根的工作做对了。乌兰夫听哈丰阿说完后，肯定了他的进步，并表示他本人同意哈入党。随后，乌兰夫把情况报告了冀热辽分局和程子华，他着重强调哈丰阿在内蒙古东部的影响，认

为作为特殊情况吸收其入党，不仅在会谈中对解决内蒙古统一的问题有利，对今后内蒙古革命和内蒙古东西部及各阶层的团结都有很大好处。分局同意乌兰夫的意见，很快作出了批准哈丰阿入党的决定。

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的立场转变后，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为明确认识、统一思想，便于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给东蒙代表做工作，乌兰夫和特、哈就有关实际问题又进行了交谈。乌兰夫重申了内蒙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分两步走的设想。特、哈两人表示赞成。关于东西部统一后开展自治运动的组织形式，乌兰夫提出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领导内蒙古东部的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东西部统一后，为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乌兰夫提出联合会增补东部的执委、常委和副主席，工作机构也适当扩充并增补人员；东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后，其原来管辖的盟、旗政府，分别接受所在区域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后来建立了兴安省政府)；东蒙古自治军统一归属内蒙古自卫军建制，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管辖，分别接受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及所在军区的领导和指挥。特、哈二人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很好，同意这些意见。哈丰阿还主动承担了给博彦满都通报情况并征求他意见的任务。哈、特估计多数人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并表示如少数人一下子接受不了，由他们负责去做工作。

博彦满都的态度不出乌兰夫所料，听哈丰阿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后，他说:“你们同意的我都同意，以后有什么事情能及时告诉我，我跟着你们走。”其他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几天的交谈，已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只有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才有光明前途，纷纷表示愿意跟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走。至此，东西蒙会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着会谈形势的进一步明朗，乌兰夫感到正式讲东西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乌兰夫和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商量后，并征得冀热辽分局的同意，于 1946 年 4 月 3 日，正式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乌兰夫主持会议并致词。东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通过了在乌兰夫主持下起草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

乌兰夫在致词中说:“东西两部内蒙古同志在这里能谈自治和民族如何解放的问题，从内蒙古解放运动的历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能站在自己民族的前途上和各位进步的代表谈话，我觉得非常快慰，并且意义非常之大。此次东蒙古代表同志为内蒙古的事各处奔走，为的是解放内蒙古，对这个我是很钦佩的。我们蒙古族人起来搞蒙古族人的事，第一个问题是要内部的统一，以这样的精神向前迈进，我想是无事不成功的……早在 20 年前，中国共产党就为内蒙古革命奋斗过。在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与蒙古民族要求自治与民族解放的愿望，不但精神一致，行动上也是一致的。只要站在对蒙古民族有利的立场上，去努力争取，那么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

博彦满都在讲话中说:“今天的会议是内蒙古民族最重要并且在内蒙古革命史上也是很光荣的一个会议。在过去的数百年中，蒙古民族受压迫，虽经多少次的奋斗，但终未得到成功。现在已经得到解放，自由了，环境是好的，时机已到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得到真正的解放了。……我们认为中共是为解放民族，为民主主义而努力的，中共的目的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跟随中共，在中共领导下而迈进。”

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把党的领导、自治运动的性质、组织形式，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善后处理，武装部队的归属等，都明确地写了进去。

在乌兰夫主持下举行的这次内蒙古东西部会谈，十分成功。由于预备会上的工作做得透彻、充分，到举行正式会议时，双方代表的意见已完全一致，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内蒙古革命，即内蒙古向何处去的所有重大问题。会后，乌兰夫将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向中共中央及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和西满、晋绥分局发电作了专题报告。

这次东西部会谈，在内蒙古革命史上称为“四三会议”。80 年代中期，乌兰夫曾回忆过这次会谈。在回忆时他专门讲述了这次会谈成功的原因和基本经验。对于成功的原因他说:“四三会议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进入高潮，中华大地光明和黑暗正在进行决斗的时候取得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了它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它不仅促成了内蒙古民族的统一，加快了内蒙古革命的进程，而且也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为党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树立了榜样，开辟了道路。它的意义和影响，随着历史的推移，必将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

对于基本经验他说:“就基本的来说，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三会议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次会议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才能获得解放。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四三会议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是坚持祖国统一。一部灿烂的中国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各少数民族，只有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有光明前途。四三会议坚持了这一条。也正因为坚持了这一条，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是坚持民族团结。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是国家繁荣昌盛、民富国强的基本保证。在一个民族中，民族内部的团结，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兴旺和发展。四三会议的成功是一支民族团结的交响曲。它为内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区

内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树立了榜样。第四是坚持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作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它的革命必然是中国整个革命的一部分。只有把它置于这一整体之中，它才能汇同全国革命的洪流一起汹涌前进。四三会议坚持了这一条，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坚决贯彻了这一条，内蒙古才成了在中国革命中首先取得胜利的少数民族地区。”

“四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问题，结束了内蒙古数百年分裂的历史，使蒙古民族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路，是内蒙古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乌兰夫的名字同“四三会议”紧紧连在一起，老一辈的内蒙古人提到“四三会议”就会想到当时的云泽主席。“四三会议”的成功，饱含着乌兰夫的智慧和心血，展现了他灵活求实的领导艺术和稳健刚毅的革命胆略。“四三会议”的成功，使内蒙古东西部的广大地域连在一起，扩大了解放区，给华北、东北我军提供了辽阔的战略后方，对实施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0 年代末，曾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书记的程子华将军回忆说:

“四三会议”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内蒙古，其作用胜过千军万马。它使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于以乌兰夫为主席的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之下，使东蒙大部地区成了解放区，东蒙古自治军成了我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卫军，不仅使热北发生的冲突自然解决，还壮大了我们的军事力量。自此，蒙汉同胞和军队紧密团结，共同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战略撤退和战略进攻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四三会议”的成功，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一胜利应该记头功的就是乌兰夫。

十三、创建中国第一个自治区

建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解决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问题，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团结了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各阶层人士，壮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解放区，这就为时机成熟时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基础。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内蒙古自治区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已现实地摆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内蒙古人民面前。身为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乌兰夫，深感责任重大。为成就这一北国千秋基业，在他领导下，自治运动联合会带领内蒙古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四三会议”后，乌兰夫到热河省蒙古族聚居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检查工作，慰问蒙古族同胞。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热河蒙古族同胞，见到乌兰夫十分激动，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自己的贴心人。所到之处，同胞们都簇拥着他，问这问那，有的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乌兰夫看到衣着褴褛而热情奔放的同胞，心里更是沉甸甸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同胞们说：“我们有了代表蒙古人民利益、为蒙古人民服务的自治运动联合会，只要我们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拥护、支援八路军，和汉族同胞团结在一起，积极清奸除霸，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就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乌兰夫在热河看望和慰问蒙古族同胞的消息，很快就在内蒙古草原传开，不仅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乌兰夫的名字，同时在蒙古族群众中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从 1946 年 5 月乌兰夫由承德回到张家口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至 9 月因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而撤出张家口，在这 4 个月中，乌兰夫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其他同志全力推进内蒙古的自治运动。重点是培

训干部，建联合会盟分会、旗支会及盟、旗区域性自治政府，组建自卫武装，发动群众，研究、制定政策。在乌兰夫领导下，这些方面的工作进展都很快。设在张家口的内蒙古军政学院和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吸收了大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村、牧区进步青年。这些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投入了自治运动的实际斗争，在方兴未艾的内蒙古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联合会组织和区域性自治政权建设方面成绩也很显著。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继锡、察盟建立分会后，又相继建立了兴安盟、呼伦贝尔盟、纳文慕仁盟、乌兰察布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分会和部分旗支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建立了区域性的盟自治政府。盟分会、旗支会和区域性自治政府建立后，很快投入工作，领导各旗、盟群众，贯彻“四三会议”精神，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各项工作。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虽然还没有破裂，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一直磨刀霍霍，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保卫内蒙古解放区，随时应付突变形势，乌兰夫十分重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建设，积极组建内蒙古骑兵部队和改造旧军队。起初，内蒙古自卫武装主要有一、二、三支队和四支队。一、二、三支队，是 1945 年冬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攻打归绥和包头时，由阵前起义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几支蒙古族游击队合编组成的。领导骨干主要是八路军老干部和延安来的蒙古族同志，原隶属于绥蒙军区，后来这三个支队被改编为骑兵独立旅，1946 年初划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主力。四支队是日本投降后起义的蒙疆伪军第九师，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整训回国后组建的，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驻守锡、察两盟之间。这个支队人数虽然不多，但经过整训，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1946 年夏季，主要是整训主力部队骑兵独立旅。该旅驻张北县，除就地整训外，大部分干部和战士分批进张家口内蒙古军政

学院学习。乌兰夫认为，这次整训关系着整个内蒙古自卫军的建设，为此他亲自作了部署。他明确提出了整训目的，即: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使其成为一支真正符合要求的革命军队。教育的重点是进行革命军队宗旨的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整训期间，乌兰夫几次到军政学院给在那里学习的指战员作报告。他联系实际讲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对革命军人的要求，讲全国和内蒙古的革命形势，讲历史上蒙古族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事迹等。经过这次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明显提高，成为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人民军队。这次整训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建设史上的一项大措施，对人民自卫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的影响。

内蒙古的 200 万蒙古族同胞，分布在属于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和东北各省、东西绵延万里的辽阔地域。有的在边远地区聚居，从事牧业；有的靠近内地和汉族或其他民族穿插居住，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内地发达地区落后。面对这样的现实，在交通不便、管辖多元、蒙汉分治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其难度可想而知。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唯有依靠正确的政策，把偌大区域内的蒙古族同胞的意志统一起来，舍此绝无他法。为此，乌兰夫东西来回奔波，同时，通过书信、电报等，加强与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和绥蒙区党委的联系，首先沟通情况，理顺内蒙古工作与各相关省区的关系。

接着，他组织党员和干部到群众中去，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符合内蒙古实际的各项政策提供依据。乌兰夫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在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和在内蒙古军政学院多次强调了这一问题，提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以群众观点、阶级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调查内蒙古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社会风情等重要问题。经过充分调查，反复认真研究，他认为内蒙古的革

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制定符合内蒙古实际的各项政策，并在内蒙古的革命实践中贯彻实施。关于政权问题，他指出:现在是建设新政权，改造旧政权，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主自治，政权的性质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关于蒙汉团结的问题，他认为本来蒙汉族的劳动人民是团结的，民族隔阂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和挑拨民族关系造成的。要消除隔阂，需要在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中长期坚持民族平等的教育。在这方面，当前的要求是:蒙汉族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清算出卖民族利益的奸细和败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积极推进自治运动，为建立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新政权而共同奋斗，以实现蒙汉两个民族的共同解放。关于经济问题，他说，当前内蒙古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不等价交换，生产力水平低。发展内蒙古经济要发挥内蒙古实业公司的带头作用，建立人民合作社，团结公平交易的商人，发展自由贸易，以等价交换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蒙古族劳动人民擅长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牧业经济。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他主张发展蒙古文化，普及蒙文教育，用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思想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关于内蒙古的土地问题，乌兰夫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后，于 1946 年 8 月 1 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分析了内蒙古土地的现状，提出了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畜牧区三种区域的不同土地政策。中共中央对报告予以充分肯定，并指示有关中央局和乌兰夫根据具体情况处置土地问题。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建立初期，在为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作准备期间，乌兰夫组织各级干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蒙古革命和将要建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性质，提出了改善民族关系，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解决内蒙古地区土地问题的意见。它对统一政策，发动群众，推动内蒙古革命，促进内蒙古自

治政府的建立，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段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它表现了乌兰夫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扎实的作风，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这段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为自治政府建立后系统地制定符合内蒙古实际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保证了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胜利前进。

1946 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爆发。9 月，国民党军队李文兵团从东线，傅作义部队和阎锡山部队从西线，同时大举进攻张家口。

张家口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机关所在地，是晋察冀边区的指挥中心，也是全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的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占优势，我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张家口。

9 月 19 日，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召开驻张家口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宣布撤出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向抗日战争时的根据地阜平撤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撤向锡林郭勒盟的贝子庙(今锡林浩特)。会上，聂荣臻分析了敌我力量和斗争形势，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同时积极准备有秩序地撤退。会前，聂荣臻约乌兰夫商谈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撤退问题。聂荣臻先告诉乌兰夫中央已作出放弃张家口的决策，并从战略上说明了放弃张家口对我方的有利因素。同时，聂荣臻建议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随中央局一同撤往阜平，这样有利于保护蒙古族干部，以适应日后内蒙古革命发展的需要。乌兰夫认真考虑后对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中央作出的撤出张家口的战略决策。至于联合会总会机关向哪里撤，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一定要以有利于对自治运动的指挥为前提。随中央局去阜平，就安全来说没有

问题，但离蒙古族居住的区域太远了，不便于开展工作。我想以去锡林郭勒盟为好。那里地域辽阔，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有回旋余地。其位置正处在内蒙古中间地带，与东部、西部联系都方便。当然，那里是纯牧区，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供给和通信联络方面都会有不少困难。不过蒙古族群众在那里，我们工作的基础在那里，只要依靠群众，我想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聂荣臻认为乌兰夫讲得很有道理，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和所属单位撤往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一带。同时，为加强在战争环境下内蒙古党的领导，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联合会机关党委改为内蒙古的地区党委，并赋予它处理战争和自治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由机关党委改为地方党委后的内蒙古党委，由乌兰夫任书记。

在乌兰夫的领导和部署下，联合会总会机关和所属单位，包括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在内，近千名机关干部和指战员，开始了紧张的战略撤退准备。各方面准备就绪后，1946 年 9 月 23 日，乌兰夫率领联合会总会机关部分干部离开张家口，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向贝子庙方向进发。其余大批人员和撤运物资的队伍，在刘景平指挥下，随后也离开张家口，向锡林郭勒草原挺进。

正当蒙古族群众已被初步发动起来，自治运动在各旗蓬勃发展的时候，联合会总会机关撤出张家口，这不仅使不坚定分子产生动摇，而且对群众也有很大影响。为稳定群众情绪，建立稳固的草原根据地，继续推动自治运动向前发展，乌兰夫和撤出的人员到达目的地后，不顾疲惫，立即投入了工作。在部署工作时，他提出目前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形势，讲明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把群众发动起来，团结各界和各阶层人士，继续清奸反霸，清除扰乱草原安宁的布利亚特匪徒，坚决打退和消灭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按照乌兰夫的要求，各

级干部很快分头下去做工作，自卫军部队很快作了战斗部署，进入战时状态。

在解放战争爆发的新形势下，为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革命的援助，乌兰夫把工作安排好以后，于 1946 年 10 月，亲赴乌兰巴托，拜见蒙古党政领导人乔巴山等。乌兰夫向乔巴山等介绍了解放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通报了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设想等。蒙方为表示对内蒙古革命的支持，援助了部分物资，并同意帮助安排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家属。乌兰夫这次乌兰巴托之行，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蒙方支援的物资虽然数量有限，但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内蒙古革命处于暂时困难的时候，也是十分宝贵的。

1946 年 11 月初，乌兰夫和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做联络工作的吉雅泰一同回国。到贝子庙后，乌兰夫先听取了前段工作情况的汇报，接着采取了一系列适应草原对敌斗争新形势的措施。

为建立巩固的察锡根据地，加强这一地区的党的领导，1946 年 11 月 7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党委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察锡工作委员会，任命王铎为书记，统一领导察哈尔和锡林郭勒两个盟的工作。察哈尔盟靠近张家口，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为加强党对该盟工作的领导，会议同时决定建立中共察哈尔盟工作委员会，由刘景平任书记。11 月 7 日和 9 日，乌兰夫还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六、七次常委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均以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云泽名义发布。

一是《关于成立巴乌军区的决定》。为了适应自卫战争的需要，统一巴乌地区的军事指挥，第六次常委会议决定在巴乌地区成立巴乌军区，统一指挥该地的军队。乌献文(乌力吉敖喜尔）任巴乌军区司令员，奎璧为军区政治委员。巴乌军区下辖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11、

12、17 三个师。

二是《关于察锡工作的决定》。第六次常委会议同时决定，在察锡两盟地区设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锡地方行政委员会，察锡政委会为总会的代表机关，同时又是地方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察锡两盟各地方行政和军事。特克希巴彦(王宗洛）任主任，松津旺楚克、王铎为副主任。

三是《关于总会机构的决定》。为便于集中领导，并能够抽出部分干部加强基层的工作，第七次常委会议决定将总会的机构作适当的变动，各部职掌及人事适当加以调整，以适应目前形势以及工作的需要。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在接到决定后，应根据决定的精神以及当地的需要，将各级机关部门的人事机构作必要的调整。会议决定联合会执委会共设六部:行政部(部长奎璧)、政治部(部长刘春)、军事部(部长乌兰夫兼)、财政经济部(部长特木尔巴根)、社会部(部长吉雅泰)、总务部(部长哈丰阿)。

乌兰夫果断地作出上述决策，不失时机地精简了指挥机关，强化了党的领导，充实了领导力量，统一了军事指挥。这对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和巩固察锡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措施的正确性，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宣布成立中共察锡工委和察锡行政委员会后，为了充分认识形势，明确斗争任务，统一党内和干部队伍的思想，坚定必胜的信念，乌兰夫先后主持召开了工委会议和政委会成立大会。在工委会议上，乌兰夫全面分析了察锡两盟的情况，张家口失守后的形势，当前任务和建立巩固的察锡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乌兰夫说:“察锡两盟，是内蒙古东西部连接的枢纽，是沟通东北、华北的重要通道。它的北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面是东北解放区，西面有晋绥解放区，南面有晋察冀解放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还是抗战胜

利后最早开展自治运动的地区，群众基础好。它地域辽阔，进可攻，退可守，有很大回旋余地。在这里坚持自卫战争，把它作为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基地，条件得天独厚，其战略意义不仅在内蒙古，而且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都非常重要。但这里气候不好，风大天寒，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而且我们没有在草原坚持对敌斗争的经验。”

对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了全面分析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坚决保住这块根据地，要创出坚持草原对敌斗争、建立草原根据地的经验，使这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决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插进一只脚！当前的任务有五项:首先是宣传斗争形势和建立察锡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意义；二是继续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联合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三是争取民族和宗教上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四是发展壮大自卫军，建立地方民族武装，坚决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五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速改造旧政权，建设新的民主政权，加强联合会分、支会的工作，积极推动自治运动向纵深发展。”

察锡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除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外，部分王公和大喇嘛也参加了。乌兰夫在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讲演。他透彻地分析了形势，讲了蒙古族同胞渴望民族解放的心情，讲了察锡地区所处地位和面临的局势、时代赋予的责任后，慷慨激昂地说:“在我们的自治运动正蓬勃兴起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罪恶的内战。他们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扼杀我自治运动，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已觉醒的蒙古族同胞，紧急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察锡根据地，维护自治运动，勇敢地投入神圣的自卫战争！察锡行政委员会是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察锡地区的代表机关，我相信，它一

定能担当起察锡地区的管理责任。希望你们立即行动起来，率领察锡地区全体军民，团结所有拥护自治运动联合会纲领，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各阶层人士，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胜利，为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奋勇向前！”

乌兰夫在察锡工委会议和察锡政委会成立大会上的两次讲话，增强了干部的信心，振奋了各阶层人士的精神，扭转了少数人一时出现的消极情绪，对察锡地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并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自 1946 年 9 月从张家口撤到贝子庙，至 1947 年初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东迁，乌兰夫一直在锡林郭勒草原和察锡军民一起坚持斗争，以察锡为基地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乌兰夫的领导和指挥下，察锡工委和政委会率领察锡军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稳稳地站住了脚。他们在赛汗淖尔等地打了几个漂亮仗，狠刹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消灭了经常骚扰草原的布利亚特匪帮，打击了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封建王公；改造了旧政权，建立了联合会旗支会和民主政权，建立了部分基层党组织，培养了干部，锻炼了根据地军民，扩充壮大了民族自卫武装；团结了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理顺了与各方面的关系。这就为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察锡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

考虑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要求，根据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战局发展的形势，1946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了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12 月 26 日复电，认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时机已成熟，指示有关中央局、中央分局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于近期内实现。在此之前，晋察冀中央局曾提出让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迁，将工作重点移向内蒙

古东部，准备在东部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此，内蒙古党委在乌兰夫主持下，对东迁和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决定派人先去冀热辽分局、西满分局和东北局汇报情况，联络、洽谈东迁事宜。同时，内蒙古党委和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机关紧张地进行东迁的准备工作。

为了不因领导机关东迁影响察锡工作，并使东迁顺利进行，东迁前，乌兰夫对察锡地区工作作了周密部署，并以内蒙古党委的名义发了指示。在指示和部署中，乌兰夫分析了形势，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释了东迁的理由和意义，提出了今后的斗争任务，同时号召察锡地区军民团结一致，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巩固察锡根据地，解放内蒙古，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努力奋斗。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情绪并没有因东迁而受影响，不仅使东迁顺利进行，还保证了察锡地区工作的正常开展。察锡军民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同他们一起战斗了半年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又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保卫察锡、建设察锡的新战斗！

1947 年新年刚过，乌兰夫和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从贝子庙出发，离开察锡地区，向内蒙古东部进发。大队人马，车辚辚、马萧萧，横穿锡林郭勒草原，先到热北林东，后又到兴安盟的王爷庙。所经之处都是解放区，沿途干部和群众热情地迎送、接待东迁的领导和战友。乌兰夫和东迁的同志们都深受感动。乌兰夫说：“东迁是一次同群众广泛接触的好机会，也是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使更多的群众了解了我们，我们也了解了群众，这就自然地增进了群众同我们的感情。”

为尽快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早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到达林东后，没有顾得上歇一歇，他就和冀热辽分局的同志交谈东迁和成立自治政府的问题，还在热北地委召开的

干部扩大会上作了报告。几天后，他们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2 月 14 日到达王爷庙。2 月 16 日、20 日，乌兰夫先后签发了《关于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及代表产生办法的通知》。3 月 3 日，他赶去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商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

在此期间，乌兰夫还先后在联合会东部总分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和王爷庙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到哈尔滨后又在东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联合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的几次演讲，都围绕一个主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群众觉悟提高了，东西部统一了，蒙古民族各阶层的团结加强了，蒙汉关系改善了，内蒙古解放区巩固和扩大了，已解放的盟、旗普遍建立了民主政权，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民族武装已建立起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7 年 3、4 月间，为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十分紧张地工作着。为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需要谈话和演讲；为确定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需要组织拟稿，请示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还要与各方面磋商。3 月，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其他主要负责人到哈尔滨，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下，专门研究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明确了自治政府的性质，就自治政府和参议会的组成原则和人选安排达成了协议。为了保证确定的原则和选举方案顺利执行，还建立了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党团组织。

1947 年 4 月 3 日至 21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在王爷庙召开。执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内蒙古一年多来开展自治运动的情况，以提高各阶层人士对内蒙古形势的认识；讨论修改《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以备提交将要召开的内蒙

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这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致开幕词，并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在参加讨论时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乌兰夫的致词、报告和解答，明确了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它是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内蒙古实行民族自治的区域，仍属中国版图；它只是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和其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政府，在自治区域范围内的蒙汉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一致，建立合作、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欢迎一切热心蒙古民族解放的人士参加自治工作，为实现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3 月底 4 月初，参加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王爷庙。乌兰夫让他们列席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了各项讨论。代表列席执委扩大会，参加各项讨论，认识得到了提高，对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为代表会议的正式召开所做的基本的思想准备。

1947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年头之末，东北战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向内蒙古解放区的大举进犯已被粉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聚集起来的蒙古族各阶层，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但是，在革命队伍中有少数人，在内蒙古革命领导权和实行什么样自治的问题上的认识仍不坚定，当代表会议将要进行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出现了反复，又把一年前承德会议上已经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说什么“内蒙古没有产业工人，不适合建共产党，应该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内蒙古革命”，背弃会前一致商定的选举原则，提出了“不选延安来的共产党老干部，不选日本投降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人，不选汉人”。由于少数人暗中活动，一时闹得会议气氛很紧张。

乌兰夫得知情况后，镇静地作了分析。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迟早要暴露的，现在暴露了也好，可以在会议期间予以解决。他相信绝大多数代表不会赞成他们那一套，经过做工作，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变化，这种倾向是能克服的。但工作务必认真地去做，绝不可掉以轻心。他说服了党内情绪激愤的同志，在西满分局的帮助下，通过会议党团组织，依靠代表中的党团员和已经觉悟的青年代表，就“内蒙古究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和“在内蒙古究竟成立什么样的自治政府”这样两个关系内蒙古和200万蒙古族同胞前途命运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大讨论。有一年多开展自治运动的实践，有去年“四三会议”思想工作的基础，多数青年代表一谈就通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原来商定的选举原则和方案的人越来越多，持反对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一场大讨论后，代表会议的气氛趋于和缓、正常了。但是党内和青年代表中的部分人，怒气却一时难消。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革命利益之所在，是实现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需要。此时，乌兰夫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气度，他又耐心地给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代表做工作，向他们解释:共同商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参议会的组成原则及选举方案是兼容并包的，有广泛的代表性。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觉悟了我们就欢迎。革命还是人多好，人多力量大。打美蒋反动派需要这样，彻底完成内蒙古革命的任务也需要这样，这是根本。无论做什么事，处理什么问题，都要着眼于这个根本。把这些道理讲明白后，党团员和进步的青年代表们都很顾全大局，站在维护内蒙古革命利益的立场上，自觉地服从革命的需要，主动与原先见解有分歧的人搞好团结。

在乌兰夫和会议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苦的思

想工作，代表们的认识普遍提高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一致通过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临时参议会组成人员。选举揭晓，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为议长，吉雅泰当选为副议长。原商定的政府委员、临时参议会议员候选人都光荣当选。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式与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同时举行。在隆重的自治政府成立典礼上，乌兰夫以政府主席的名义，代表当选的自治政府全体成员庄重地宣誓:“余等誓以至诚，为内蒙古人民服务，并为坚决争取自卫战争与解放战争之胜利，与彻底解放内蒙古而奋斗!”

《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一）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二）内蒙古自治政府，将团结区域内的蒙、汉、回等民族，联合一切赞助内蒙古自治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坚决粉碎美蒋反动派进攻和压迫，争取内蒙民族的彻底解放及中国各民族共同解放。（三）内蒙古自治政府确保人民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通讯之自由。(四）内蒙古自治政府对现在蒋占区蒙古同胞的悲惨境遇，及反抗蒋家暴政的英勇斗争，寄以无限同情，并尽一切可能积极支援。

乌兰夫代表全体政府成员所作的誓言和《宣言》中的四项郑重宣告，准确地揭示了内蒙古自治的性质，集中概括了自治政府施政的宗旨，体现了政府成员的意志和雄心。在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誓言和《宣言》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内蒙古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克服了两次内蒙古独立倾向，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群众，进行了有限度的民主改革，改造了旧政权，建立了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区域性新政权，开辟了辽阔的草原解放区，在中华大地上创建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级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

十四、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 26 天后，即 1947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建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6 月 14 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早在 1925 年，北京蒙藏学校就建立了第一个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这个支部的党员中，就有乌兰夫。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这个支部的党员，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和组织下，分别在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承德建立了内蒙古和绥远特区、察哈尔特区、热河特区四个互不隶属的党的工作委员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最早的党组织。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内蒙古地区最早建立的这些党组织，没有几年就被敌人破坏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和各族人民中，却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影响是深远的。以后，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残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革命总是此伏彼起。不同地域、不同形式、不同隶属关系的党组织始终没有间断过。这其中，包括 1929 年由共产国际直接组建并领导，先由佛鼎任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后来佛鼎出国，乌兰夫接任书记的中共西蒙工委；也包括抗日战争爆发后乌兰夫在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抗日军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组建并任党委书记的地下党委。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绥蒙地区的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建立了绥蒙区党委。抗战胜利时，在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地处东北、华北两大战略区后方的内蒙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开辟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与其

毗连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都派得力干部到邻近的内蒙古地区帮助开展自治运动，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在蒙古民族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一定区域的党的工作机构。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时，在内蒙古东部及中西部，已有中共兴安省工委和中共察锡巴乌工委，蒙古族党员已过千人。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是这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内蒙古的各阶层中，包括革命部队内部，对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的问题，却存在着分歧。这一关系内蒙古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每到关键时刻就要表现出来。1946 年 4 月，在承德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上，争论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当时，一部分人认为:“内蒙古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所以要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内蒙古革命。经过争论和耐心的思想工作，大部分有这种想法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转变了认识，主要代表人物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暂告结束，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解散战后在内蒙古东部刚刚建起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撤销由该党领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在内蒙古东部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总分会，由东部总分会领导内蒙古东部的自治运动。会后，乌兰夫向中共中央和有关中央局、分局报告承德会议取得的成果时，有这样一句话:“此次会谈，原则上虽获得一致，但在具体执行时他们不可避免有分歧和出入之处,希予注意!”

不出预料，一年之后，在王爷庙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又提出了这个问题，理由依旧。因为这两个会议的主要任

务是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不影响主要任务的完成，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留待以后解决。

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解决内蒙古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就迫在眉睫了。对于这个问题，乌兰夫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承德“四三会议”上，他就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大意是: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对于在内蒙古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关系问题，1947 年 3 月 14 日乌兰夫就曾发专电请示中共中央。电报中说:“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们提议成立内蒙古分局或内蒙古党委员会，受东北局领导。现在管东蒙、察蒙及绥北蒙古地方的工作(热河、伊盟、绥蒙工作在战争期间仍归当地党委领导)。是否妥当，请中央考虑指示。”处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考虑到蒙古民族各阶层的不同态度，包括入党时间不久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很不够，思想尚未真正转过来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对内蒙古建党问题是十分慎重的。为有利于团结内蒙古的蒙古族基本群众和社会各阶层，对内蒙古的建党问题曾作过多种设想，并反复同有关中央局、分局和乌兰夫商量，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至于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好，中共中央授权东北局根据实际情况商定。

为在内蒙古建党问题作出决断之前，尽力提高已入党的代表人物的认识，以求统一党内思想，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乌兰夫主持召开过多次党内会议，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耐心做思想工作，用理论和实践开导一时想不通的同志。在乌兰夫和其他老同志的帮助下，认识一时跟不上的同志，经过几次反复后，终于想通了，自觉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新入党的代表人物认识的转变，党内思想的统一，给东北局在内蒙古建党问题上的决策奠定了基础。但是，考虑到当时蒙古族各阶层，也包括一些党内同志的心理状态和民

族感情，东北局决定在内蒙古党的工作机构名称里不冠“中国共产党”，而叫“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领导权的前提下，采取的适应当时形势的灵活措施。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个名称，一直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194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经过战后一年多的争论和酝酿，内蒙古革命领导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从此，内蒙古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同内蒙古革命的关系不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朋友”“帮助”，而是领导了。

当时解放战争在激烈地进行，内蒙古还有不少盟旗在国民党统治下，或由邻近的解放区管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还不可能在所有盟旗范围内开展工作。但是，它是第一个具有内蒙古全区域性的党的领导机关，已赋予了它领导整个内蒙古区域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责任。这在内蒙古革命和内蒙古党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乌兰夫，这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蒙古民族的优秀代表，作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也自然而然地被公认为内蒙古民族的革命领袖。

内蒙古党的领导机关，虽然没有冠“中国共产党”，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认真地执行着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东北局的各项指示。乌兰夫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很强，重大问题都及时报告和请示东北局与党中央。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是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核心。乌兰夫深知，要广泛团结蒙古族各阶层和广大群众，首先领导核心要紧密团结，尤其是革命正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一点就更加重要。所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后，在乌兰夫主持下于1947年6月2日

所作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关于建党问题及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明确地写道:“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不再建立任何外围党。全体党员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加强党内团结，严格组织，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迎接伟大而艰巨的革命斗争。”7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机关的中共党员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6周年。乌兰夫在纪念会上讲话，庄严地宣布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喜讯，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三大革命战争证明她不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而且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因此她不仅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中，对于民族问题明确主张: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为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这次讲话中，他回顾了蒙古族同胞在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因为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失败的教训，阐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变化后，郑重地发出号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进行学习，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民族政策，了解内蒙古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历史事实。”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一成立，乌兰夫就特别强调党内团结和共产党在内蒙古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从内蒙古革命大局考虑，也是对曾有过不同认识的党内同志负责。就革命大局来说，需要让更多的人明白，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则，内蒙古革命就要走弯路，甚至夭折。对党内曾有不同认识的同志来说，需要提醒他们，要逐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即使思想上的坚定程度还不够，也要以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坚定起来，以免再犯错误。历史证明当时这样做是对的。党在内蒙古革命中的领

导地位树立起来了，党内同志的认识一致了，工委一班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带领着内蒙古人民踏上新的革命征程，勇敢地去迎接伟大而艰巨的革命斗争。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历史性转折时刻。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半(1947 年 6 月至 1949 年 12 月）中，正是中国革命，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推进，迅猛发展，以锐不可当之势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内蒙古解放区毗连的东北、华北两大战区的战局发展尤其迅速。而当时内蒙古自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内蒙古东部和中部，又都是刚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又肆意渗透和侵扰，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土匪和日伪残余势力仍很猖獗。而我们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建立，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还没有普遍发动和组织起来。怎样才能使内蒙古解放区跟上和适应全国和东北、华北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充分发挥内蒙古解放区的战略后方作用，是摆在乌兰夫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怎样去完成这一重大课题?乌兰夫为此呕心沥血，日夜奔忙。

那时候，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党的工委驻王爷庙。这是大兴安岭南麓的一个边陲小城，1947 年 12 月，更名为乌兰浩特市(蒙语红色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这里是伪兴安总省的省会；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集中了一批蒙古民族的有识之士和追求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成了东蒙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1946 年 1 月和 5 月先后建立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和兴安省政府也都驻在这里。现在，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革命的指挥中心。虽然这里一直是东蒙的政治中心，但在日伪统治下只是侵略和掠夺，不可能搞什么真正的建设，人民贫困不堪，市面也很萧条。乌兰夫在小城的兴安路东侧一所普通的平房内办公和

居住。就在边陲小城这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乌兰夫渡过了将近三个年头。这三年是内蒙古和全国发生沧桑巨变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日以继夜地操劳着，倾心竭智地运筹谋划着内蒙古革命的大计，直至取得完全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发表过多篇指挥全国革命的重要文告，其中最精辟、最有代表性的是:1947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0 月 10 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 12 月 25 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乌兰夫联系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和斗争形势，多遍认真学习，特别是对一些蕴涵着深刻道理，指导当前革命斗争的重要论断，他更是反复思考。诸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的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对解放区人民发出的号召:“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要求:“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对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这样一些凝聚着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掷地有声的经典论断，对乌兰夫的思想和智慧起到了开发作用，使他悟出了人民革命的真谛，引发出了他引导内蒙古革命走向胜利的思路。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文告、讲话为指导，乌兰夫一再讲内蒙古革命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主要问题。对关系内蒙古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他讲得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主要是:1947 年 11 月 15 日在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48 年元旦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任务》，1948 年 7 月 30 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古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乌兰夫在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既讲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力量，也讲了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首先明确提出:“内蒙古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革谁的命，谁来革命。”接着对内蒙古的社会性质作了分析，而后得出结论说:“内蒙古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内地的不同之处是“内蒙古的政治和经济落后”。对于内蒙古革命的任务，他说:“也是反帝反封”。“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反对封建势力。”对于革命力量，也就是谁来革命，他说:“只有贫苦农牧民才是反对封建势力最大的力量。所以要组织革命队伍，首先就要满足贫苦农牧民的要求，要解决他们的穿衣吃饭问题。”对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统一于进步，统一于革命。”“封建阶级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不过他们当中背叛自己的阶级，投向我们革命阵营的人，我们是应当团结的。”“我们非常欢迎有更多的出身于封建阶级的人来参加革命。”“封建上层分子要参加革命，首先要承认土地改革，拥护民主自由的原则，坚决反蒋、反美”。对于内蒙古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他说:“谁能代表工、农、牧民的利益呢?只有共产党。所以内蒙古的革命，也就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在《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任务》中，他总结了 1947 年内蒙古革命取得的初步成果后说:“中国革命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和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以及国际的有利条件，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下，我们全内蒙古人民，必须明确自己的新任务，争取新的胜利，争取解放全内蒙古。”对于新任务，他说:“我们在 1948 年的工作方针，是要配合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实现耕者有其田，使贫苦农牧民彻底翻身。”为了实现这一总方针，乌兰夫讲了要做的主要工作和必

须完成的任务。其中着重讲了平分土地和支援前线。对平分土地他说:“实现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在农业区，建立贫雇农领导，确立贫雇农的优势，团结中农，镇压恶霸地主的反攻倒算，防止奸细破坏。”对于支援前线，他说:“翻身人民要踊跃参军，壮大我们的军队；要积极参加战争勤务，动员好马、好枪上前线，保证前方有吃、有穿、有子弹，一切为了反攻胜利；要好好照顾伤病员、荣誉军人、军属、烈属，保证前方安心打仗。”

1948 年 7 月 30 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古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对蒙古民族发展的特点和内蒙古的社会性质、状况以及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作了全面分析，对内蒙古自治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对革命发展中革命队伍内部不同认识的争论，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成果及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作了科学分析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内蒙古消灭封建剥削的基本内容，根据游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政策。现将主要部分摘要如下:

消灭封建剥削的基本内容:

一、废除内蒙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取消一切封建特权及寺庙的土地所有权。

二、废除封建阶级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包括不负担公民义务和强迫征役、无偿占有劳动等。

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喇嘛不得享有公民以外的特权。

四、废除奴隶制度，一切奴隶均宣告解放，永远脱离与奴隶主的一切关系，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五、废除土改前乡村中除商业买卖债务外的一切债务。

六、畜牧区内实行放牧自由，按盟、旗行政区划自由放牧。

七、农业区实行耕者有其田，将原来一切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收

归公有，然后与乡村其他土地统一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

八、土改后，其他民族所有的土地一律不纳蒙租，但应与蒙古人一样，对自治政府有同等的公民义务，实行公平负担。

在游牧区的政策：

一、在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发展畜牧业，改善牧民生活。

二、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

三、实行民主改革，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游牧区经济。

在半农半牧区的政策：

一、农业占优势的地方，大中地主的固定垅地和牲畜分给贫苦农民，小地主与富农不动。

二、牧业占优势的地方，大牧主的役畜可以分配给贫苦农牧民，但畜群不分。

三、个别蒙奸恶霸的土地、牲畜、财产，经政府批准可以分配给农牧民。

四、半农半牧区农、牧业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根据群众愿望和自然条件的不同来决定，但必须保护牧场。

在农业区的政策：

一、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分配给农民，同时必须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蒙奸恶霸本人不参加分财产。

二、出租户口地的小地主，不斗争、不分其财产。

三、蒙古族富农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五十的，财产一般不动，土地只分其多余部分。

四、中农财产坚决不动，许进不许出。

这些根据不同类型的地区特点，分别提出并确立的不同政策，纠

正了不顾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民族特点，照搬农村土改的做法而发生的错误，把内蒙古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被人们概括为“三不两利”的牧区政策，对稳定牧区和后来牧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宗教方面的政策: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保护喇嘛庙，绝对禁止拆毁寺庙和破坏佛教经典、法具，不得侵犯庙产。喇嘛犯罪，由政府依法处理，不许斗、打、捕、罚，并提倡青年喇嘛上学，提倡喇嘛从事各种生产和行医治病等。

乌兰夫提出的上述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全国解放后，成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实行的“慎重稳进”政策的基础，正确地指导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反封建、废除奴隶制度的革命斗争。

在哈尔滨会议上，与会的内蒙古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充分地讨论了乌兰夫的报告，提高了干部的认识和政策水平，进一步统一了党内思想。

在解放战争进入高潮，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乌兰夫纵观全局，以解放全内蒙古，建设新内蒙古为主线，对内蒙古解放区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他把建党、建军、建政作为重点，在财经工作上提出了发展生产，提倡节约，扩大财源，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思路，还提出了培养干部、肃清残匪和研究城市工作等。1948 年和 1949 年两年间，内蒙古的整个工作就是按照乌兰夫的这一思路展开的。

作为党的工委书记，把全面工作布置后，为了保证主要任务和全面工作的实现，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建党和培养干部方面。

乌兰夫深知，实现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要靠党的组织及党员与党的干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后，迫切的任务是

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大力培养干部。

为了加强党对内蒙古中部地区的领导，1947 年 7 月，首先把原来的巴乌工委和察锡工委合并，建立了察锡巴乌工委，以便统一领导地处内蒙古中部的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巴彦塔拉盟和乌兰察布盟的工作。同时组建了纳文慕仁盟工委和兴安盟中心旗委。不久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任务的加重，于 11 月，将兴安盟中心旗委改建为兴安盟工委，同时组建了纳呼盟工委。一个月后，即同年 12 月，为适应呼盟取消地方自治政府，纳入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的新形势，加强党对纳呼两盟的领导，撤销了纳呼盟工委，分别建立了纳文慕仁盟工委和呼伦贝尔盟工委。至此，在当时已解放，并纳入内蒙古共产党工委领导的盟，都有了党的盟工委，健全了党的盟级领导机关。随后，又相继建立了王爷庙街和各旗党的领导机关。

有了盟、旗党的领导机关，经过干校、党校和干训班对各级干部的系统教育和培训，特别是通过减租减息，清奸反霸，支援前线和动员翻身农牧民子弟参军等群众运动，扩大了党在蒙古族群众和自卫军指战员中的影响，提高了干部、基本群众和自卫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创造了条件。

乌兰夫很重视抗战胜利前后，自发地起来追求民族解放，反对日寇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发动和发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及其他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前，个别发展的蒙古族党员，大都是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思想纯洁，反应敏锐，立场坚定。在筹备和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五一”大会期间，大都态度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保证了自治政府的顺利诞生。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建立后

的头一年，因为已有这样一批革命热情很高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作基础，发展党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到 1948 年 7 月，内蒙古各盟、旗的蒙古族党员总数已由一年前的 1194 名发展到了 4000 多名。这时候乌兰夫及时指出了在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有的党员质量不高，党员分布不均匀，农村、牧区党员少等问题。同时提出了今后在建党中“注意教育和巩固，并有重点地进行发展，要向内蒙古人民宣传党，要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他还明确具体地说:“在地方上，党员较多的地方，主要是进行教育、巩固工作，在巩固之后进行发展；没有党员或党员太少的地方可以发展。”“在军队中，像骑兵第一师这样党员很多的单位，一般可以放慢发展速度，加强教育，整顿组织，完善党的生活。”在农村公开建党的问题，“各盟可以选择一两个工作基础与党员质量好的支部，试验一个时期，培养典型，取得经验后进行”。

乌兰夫提出的上述建党原则和指导思想，对内蒙古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组织的稳步、健康发展和壮大，很快形成了内蒙古革命的核心力量。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党的坚强领导对内蒙古解放区的扩大、巩固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保证作用。下面我们以当时的内蒙古首府乌兰浩特为例，用以说明一般。

1946 年 12 月，派共产党员毕舒国到王爷庙街工作。1947 年 5 月毕调走，又派章泽等几名共产党员到王爷街工作。6 月 1 日，代街长王海楼入党。他是在王爷庙街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7 月 1 日，建立内蒙古共产党王爷庙街工委，章泽任书记。暑期利用学校放假机会，街委决定办教职员训练班，目的是培养干部和为发展党员、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作准备。为表示对这次训练班的重视，为把训练班办得更好，开学典礼时，章泽特意把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治政府主席

乌兰夫请来讲话。乌兰夫先讲了形势，又讲了对学习班的要求，给学员以很大鼓舞。章泽等领导干部和老同志亲自讲课，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学习班结束时发展了 19 名团员，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王爷庙街支部。同时从学员中选了一批优秀分子充实到各区成为领导骨干。提高了这批学员对党、对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的认识，为王爷庙街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建党初期，发展的党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党组织和党员都不公开，没有建立党支部，街工委直接领导党小组。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1 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在兴安盟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解放区开展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年底，王爷庙街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城区开展清奸反霸运动。经过这场群众革命运动，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认识到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求得翻身解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运动后期，全市的共产党员发展到了 37 名，建立了 7 个党小组。党的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12 月，王爷庙街改为乌兰浩特市，党的街工委也相应地改为乌兰浩特市工委。1948 年 11 月 16 日，市工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这时全市党员已发展到了 55 名。在党员大会上宣布了建立党支部。全市按地区和单位分别建了 6 个党支部。党小组由原来的 7 个增加到了 14 个。党员大会后，5 个市辖区中有 4 个区建立了区委。支部和区委的建立，使党的组织健全了，便利了党的活动，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有利于党的发展。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体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全市党员大会上，经过学习讨论《党章》，决定今后在乌兰浩特市要重点发展工人成分的党员。到 1948 年末，全市党员已发展到了 116 名。此时，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乌兰浩特市工委决定全市公开整党。经过三个月的整党，提高了党员

的素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了党。在公开整党的过程中，使群众更加认识了党，有不少积极分子申请入党。经过认真考察，接受了一批已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到党的队伍里来，使党又增添了新鲜血液，党的组织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1949 年 2 月，乌兰浩特的党组织和党员正式宣布公开。是年 4 月，全市党员已发展到 205 名，党支部增加至 8 个，党小组增加到了 26 个。党员中有工人、贫雇农，又有中农和知识分子，也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身于革命的干部和自卫军指战员。乌兰浩特的党组织，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建立的。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由个别党员——少数党员——几个党小组，逐步发展到基层党组织遍布全市，成为领导全市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的核心力量。

乌兰浩特市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内蒙古共产党在内蒙古各盟旗建立和发展的缩影，是乌兰夫从内蒙古实际出发提出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思想的具体体现。

作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乌兰夫做的另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就是培养干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时，已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时期。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解放区在不断扩大，无论是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大量的干部。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当地民族干部更为缺乏。靠外地支援干部是有限的，革命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当地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只能靠自己培养。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培养干部已成当务之急。乌兰夫一向重视培养干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 1945 年 12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刚建立时，就在张家口建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由他兼任院长。这一学院虽然只存在不足 10 个月，但已培养出 500 多名蒙古族军政干部，充实了内蒙古自卫军和各盟、旗的干部队伍。1946 年，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实现统一领导后，为了解决内蒙古东部的干部不足，在中

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支持下，在赤峰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学院，他又兼任院长。这个学院开学时，正值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赤峰地区的形势已很紧张。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他曾对自治学院教育长齐永存说:“要组织一批年轻力壮、有文化、表现好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以适应内蒙古地区军事斗争的需要。如赤峰地区形势恶化，就带学员就地打游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不管怎么样，培养干部是第一要务。”1947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将东蒙军政干部学院改为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乌兰夫以政府主席名义任命自治政府副主席哈丰阿兼任校长。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建立后，于 8 月 7 日决定建立内蒙古军政大学，乌兰夫兼任校长、政委。军政大学下设一、二两院。第一院在乌兰浩特，以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建立，其主要任务是轮训在职干部；第二院，从内蒙古自治学院调出齐永存等有办学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到齐齐哈尔筹建，主要任务是招收社会上有志于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青年，培养新干部。1948 年 9 月 9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建立内蒙古党校，乌兰夫兼任校长。

为办好先后建立的这几所院校，乌兰夫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政治与文化兼顾的教学方针，而且还亲自给学员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内蒙古革命。每逢开学、开班和毕业，或是革命形势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他都去做报告，给学员和教师讲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鼓励在校学员努力学习，要求奔赴工作岗位的学员积极工作。例如:在内蒙古军政大学二院开学典礼时，他作了题为《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报告，明确地提出“开办内蒙古军政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大批培养革命干部，以便推进民族解放事业与民主建设事业，使我们内蒙古民族与人民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在内蒙古党校第二期开学典礼时讲话，他对学员提出的要求是“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政策和策略；要广泛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注意虚心与努力，反对骄傲与自满。”在军政大学第一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时讲话，他勉励学员说:“到工作岗位后，把学到的理论变为行动，把学校的好作风带到各地区去，为老百姓做好事情。”1949 年 12 月，给内蒙古党校学员作《关于内蒙古革命问题与当前党的政策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蒙古民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历史上曾是一个英勇强悍富于战斗性的民族。由于长期处在异族统治压迫下，使蒙古民族不能得到顺畅的发展。但自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蒙古民族中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新思想，要求摆脱帝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与民族自主。目前，内蒙古革命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美蒋及其帮凶——蒙奸特务的统治压迫，打倒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废除封建阶级的各种特权，进行民主改革，实行人民民主。在农业地区，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在半农半牧区、游牧区削弱封建剥削，发展人民经济。实现上述任务，内蒙古的工人、贫雇农、中农、牧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基本革命队伍，但也应团结拥护内蒙古自治政府赞成改革的人士，以便建立广泛的内蒙古民族的反美反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大蒙奸、恶霸分子。”报告还指出:“内蒙古的基本政策主要是:承认内蒙古境内的土地与牧场为内蒙古民族所有，废除封建的土地、牧场所有制；废除封建阶级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奴隶完全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废除土改前地主、王公、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与牧民的一切债务；农业区实行耕者有其田，原来一切封建地主与庙宇所占有的土地一律收归公有，然后，与乡村其它土地一起，按人口统一分配给全体蒙汉人民，对一般蒙古族富农土地不动，坚决保护中农。土地分配后，立即承认各阶层人民对所分得与保留的土地有自由经营和特定条件下出租之权；牧区实行保护畜群，保护牧场，放

牧自由，在牧民和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的生活，发展畜牧业；在半农半牧区，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适当提高贫苦农牧民的生活，取消蒙租，但蒙汉人民对自治政府应有同等的公平负担与公民义务；信教自由，但喇嘛不许有公民以外的特权；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内蒙古境内的人民一律平等。”乌兰夫在百忙中到这些院校所作的演讲、报告，立场鲜明，观点明确，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很受学员和教职员工的欢迎，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教育。

在全国和内蒙古革命大发展时期，由乌兰夫提议创办并由他兼任院、校长的这几所院、校，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培养出了几千名优秀的革命干部，不仅解决了当时前方和后方、军队和地方急需的干部，而且也为革命胜利后自治区建设准备了领导骨干。作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乌兰夫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效，是超时空的，其深远影响充分表明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远见。

十五、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1947 年 5 月 1 日，乌兰夫庄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以刚当选的自治政府主席名义代表副主席哈丰阿及 19 名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这一天，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诞生。它比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诞生整整早两年零五个月。这两年零五个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同各解放区政权机关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民主政权。它们不仅不受国民党反动派把持的中央政府管辖，而且是以推翻其反动统治为目的的高度自治的区域性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其它解放区政权机关的惟一不同处，就在于它是以居住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蒙古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自治政府。它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开了先河，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当时主要是“民族自治”，还称不上是完整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还有不少地方在国民党统治下有待解放，已解放的地方为战时需要也由邻近解放区代管。所以那时称“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和“政府”之间没有“区”字。完整意义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两年零五个月，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当时内蒙古已解放的地区，多在东北解放区的侧后或与冀热辽、晋绥解放区穿插。东北、华北，乃至西北战局的发展，对内蒙古影响极大。同样，有一片巩固并不断发展的内蒙古解放区存在，对东北、华北以及西北战局的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斗争形势下，新生的内蒙古自治政府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乌兰夫很清楚，要办事，要很好完成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历史使命，

首先就要把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健全起来。这其中，内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工作机构的充实和健全，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

1947 年 5 月 2 日，即自治政府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乌兰夫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首先决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要工作部门主要领导人的配备。即:奎璧任民政部部长，特木尔巴根任财政部部长，朋斯克任公安部部长，高布泽博任教育部部长，王再天任办公厅厅长，松津旺楚克任参事厅厅长。紧接着于 5 月 16 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继续讨论自治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人事安排。随后又相继任命了一批自治政府主要工作部门的副职和中层干部。各工作机构的主要干部配备后，自治政府的工作就开始运行了。

当时，就全国来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好转，但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在内蒙古，对实行什么样的自治，各阶层的认识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也反映到党内。尽管在 1946 年的“四三会议”和 1947 的“五一”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和充分讨论后统一了党内思想，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也大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经选举产生了有广泛代表性的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但仍有少数死硬分子固守原有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内蒙古自治政权持敌视态度。在内蒙古革命即内蒙古自治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他们孤注一掷，要同内蒙古人民革命力量作一次最后较量。以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被任命为自治政府公安部司长的原兴安省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张尼玛为首，秘密建立了名为“内蒙古劳动农牧民革命前进会”的民族分裂组织。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暗中活动，企图打入内蒙古自治政府进而颠覆内蒙古自治政府。时任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社会部部长的王再天掌握这一情况后，及时报告了乌兰夫。为保卫内蒙古革命已取得的成果和新生的自治政府，经内蒙古共产党工委研究后，乌兰夫指示王再天亲自抓这一案件，要求在短期内

侦破并予以揭露。在王再天直接指挥下，经过艰苦、周密的工作，掌握了足够证据后，决定以内蒙古共产党工委社会部的名义，召集公安部干部和自卫军一师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令张尼玛交代问题。

内蒙古自治政府公安部是在原兴安省政府公安总局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人员大部分是日伪统治时期的旧警事人员。抗战胜利后，他们虽然进入了东蒙古自治政府，后又转入兴安省政府，参加了内蒙古自治运动，但有些人的原有立场并没有改变。

1947 年 8 月开始，在社会部部长王再天领导下，按照乌兰夫的要求，依据《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有关条例、法令，对自治政府公安部进行了彻底整顿。把参加张尼玛“前进会”阴谋活动的人和立场没有转变的日伪时期的旧警事人员，全部清理出了公安部。同时，请求东北局支援干部。东北局很快派来伍彤等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公安干部。以东北局支援的这批干部为骨干，再加上经审查留下的公安部原有人员，11 月重组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公安部。

自治政府公安部的整顿和重组，对保证自治政府的安全和转变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人的态度，以至稳定内蒙古解放区的局势，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有力措施的及时采取，促进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的贯彻实施，教育了参加自治政府的各阶层人士，提高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威信。

内蒙古自治政府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后，乌兰夫更加认识到了合理设置政府各工作机构的重要。1948 年 7 月，他在哈尔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应该调整自治政府的机构，充实干部，建立、健全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及工作。”经过一段酝酿，于 11 月 11 日他主持召开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和自治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在总结一年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自治政府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干部配备。决定设自治政府秘书长，以利于自治政府协调；增设财经委员会、工

商部、农牧部和交通部，以加强自治政府对财经、农牧业和工商、交通工作的领导。11 月 14 日乌兰夫签发内蒙古自治政府令，发布了机构调整后的人事安排，即:方知达任自治政府秘书长，奎璧任民政部长，特木尔巴根任财政部长，王逸伦任财经委员会主任，赵云驶任工商部长，高布泽博任农牧部长，哈丰阿兼任教育部长，朋斯克任交通部长，王再天任公安部长。12 月 16 日他又签发政府令，决定设卫生部，任命李本周为部长。这次机构调整和主要干部的配置，强化了自治政府的工作，人事安排更为合理，更加有利于发挥各自特长，更加有益于自治政府职能的发挥。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工作走上轨道以后，乌兰夫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盟旗和基层。内蒙古中东部广大地域是苏蒙红军帮助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当时，我们干部很少，苏蒙军撤走后，盟旗和基层政权基本上还是在王爷和日伪统治时期的旧人员手中。再加上国民党渗透，散兵游勇结伙为匪,持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组成了不少五花八门的小派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特别是呼伦贝尔盟，在苏蒙军撤走之前，以封建、民族上层和伪满官吏为主建立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后改称地方自治政府)，人民群众仍然受压迫和剥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要解救人民群众于苦难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把旧政权改造成为人民自己的新政权。怎样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乌兰夫从内蒙古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居住分散，群众觉悟低，社会情况复杂的实际情况考虑，对于政权建设问题提出农业区“自下而上”，牧业区“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他说:“建立政权是开展游牧区工作的主要环节，不掌握政权就发动不了群众，一切工作就难以进行。”“农业区建立政权是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游牧区则必须由上而下。”“在牧区工作要先从建政开始，委派盟长、旗长等。”“先建政，再发动牧民群众，这是牧区工作的特点之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48 年

上半年，他以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名义，先后任命额尔钦巴图为呼伦贝尔盟盟长，乌如喜业勒图为纳文慕仁盟盟长，乌力图为哲里木盟盟长，杰日格勒为兴安盟盟长。在兴安盟举行盟政府成立，杰尔格勒盟长宣誓就职庆典时，乌兰夫亲临祝贺并讲了话。他说:“我们的政权是新政权，是代表与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是内蒙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权形式。因此，政权工作干部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学会搞政权的一套本领，树立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在政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乌兰夫这几句话，既说明了内蒙古解放区各级政权的性质，又提出了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对当时内蒙古各级政权建设和做好政府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乌兰夫重视和关心下，盟级政府很快相继建立了起来。在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建政思想指导下，各盟政府认真地抓了旗和基层的政权建设。其中，开展工作较晚的呼伦贝尔盟的变化就是一例。

日本投降后，1945 年 10 月，在苏、蒙军支持下成立了以封建、民族上层和伪满官吏为主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盟所属的旗和苏木（乡）政权都原封未动。11 月东北局派中共党员苏林到海拉尔作社会调查，向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官员和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1946 年 5 月，苏、蒙军撤离回国，西满军区派部队接管滨州西线，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方针和民族、统战政策，取缔了这里的国民党组织，打击了他们的渗透活动。随后东北局又派中共党员郑北辰、高锦明等 20 多名干部来呼伦贝尔地区开展工作。6 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保护内蒙古东部刚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在兴安省主席特木尔巴根率领下，兴安省政府机关暂迁呼伦贝尔，在海拉尔市驻留了半年。此期间，特木尔巴根等同志在呼伦贝尔做了不少工作，向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

和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收缴了海拉尔市警察局和全市旧警察的武器，建立了群众武装纠察队；逮捕了潜藏在兴安省政权机关内部的国民党特务玛尼巴达拉。这些举措扩大了以乌兰夫为带头人的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支持和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打着不同旗号的反动势力。同年 11 月，经过东北局协调，中共党员高锦明、苏林进入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为委员，这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1947 年 5 月，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消息传到呼伦贝尔地区，引起很大震动，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更大。他们积极主动地到邻近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学习，寻找内蒙古民族解放的真理。所有以上这些工作的积累，都促使了呼伦贝尔向着进步的方面转化，使其逐步认识中国共产党，逐步向以内蒙古统一自治为特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的洪流靠拢。11 月，乌兰夫派他的老战友、内蒙古早期的中共党员吉雅泰到海拉尔，并以他为书记组建了党的纳(文慕仁）呼(伦贝尔）工作委员会。从此这一地区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开始在蒙古族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针对这一地区由于偏远、闭塞，战后受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观念影响较深，加上反动势力渗透，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交织，社会各阶层思想混乱的实际情况，以吉雅泰为首的纳呼工委于 12 月在海拉尔和牧业四旗开展了“一条心”运动。即要和共产党一条心闹革命，不能半条心和两条心。在这一运动中，广泛深入地大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民族政策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原来已做工作的基础上，再加上东北和全国革命大局的影响，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各阶层迅速觉醒，出现了各民族人民和各革命阶层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新局面。1948 年 1 月 15 日，乌兰夫签发内蒙古自治政府令，任命原呼伦贝尔

地方自治政府主席、日伪时期兴安北省主席额尔钦巴图为呼伦贝尔盟盟长。这一作法既团结了有影响的地方代表人物，也开始了对旧政权的改造，取消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建立了呼伦贝尔盟政府，顺利地实现了战后一直处于独立状态的呼伦贝尔盟纳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管辖。这一变化，对呼伦贝尔盟来说，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

额尔钦巴图就任呼伦贝尔盟盟长后，党的纳呼工委非常重视盟政府的工作，工委书记吉雅泰很注意发挥额尔钦巴图和盟政府的作用。经过一段工作和酝酿后，就按照乌兰夫提出的“自上而下”的牧业区建政原则，向牧业各旗派旗长，在旗长领导下改造旗和苏木政权，由改造后的新政权领导旗和苏木（乡）开展各项工作。这种作法效果很好，很快完成了牧业区新旧政权转换的任务，各项工作也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

下边节录几段当年老同志的回忆和典型材料，以现当年政权建设的情景：

“1947 年 11 月 2 日，内蒙古革命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吉雅泰同志受党的委托，肩负着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的希望，从乌兰浩特来到海拉尔。他以革命家的特有魄力和勇气，迅速推动了呼伦贝尔革命历史的进程。11 月 7 日成立了中共纳呼工委，11 月 20 日在海拉尔发动了‘一条心’运动，号召各族人士要和‘共产党一条心、和人民一条心’。针对‘呼伦贝尔地方自治’的特殊情况，在上层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积极的统战工作，即一方面针对‘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中的党派头子进行斗争，勒令他们向各族各界群众公开坦白、交代他们的历史罪恶和反动思想，解散其组织，并宣布停止他们的一切活动。另一方面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向有影响的封建上层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1948 年元旦，正式宣布取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划归内

蒙古自治政府管辖。同时改编了‘呼伦贝尔自治军’，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团；解散了‘呼伦贝尔青年团’，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呼盟本部。……派得力的党员干部都嘎尔扎布、德力格尔、巴图巴根、宝力根分别到盟政府、独立九团、青年团呼盟本部任职，迅速控制了全盟政局。”“至此，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翻开了牧区民主改革的新篇章。”“从 1948 年 4 月开始，先后调整了牧业四旗的旗长。任命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旗长:朋斯克达喜为新(巴尔虎）左旗旗长、孟和那苏为索伦旗旗长、都嘎尔扎布为新(巴尔虎） 右旗旗长、甫如布(贫苦牧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为陈(巴尔虎）旗旗长。并着手旧(旗）政权的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派阿尔斯郎、乌力吉达赛、巴图贺什格、珠儒木图分赴牧业四旗任公安局长，整顿和充实公安队伍。上述两点，为(呼盟）牧区民主改革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8 年初，纳呼工委在海拉尔召开‘章盖’会议，宣布对牧区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民族上层及牧主特权，建立民主政权，实行苏木达制。会后，盟政府即往各苏木下派苏木达，筹建苏木新政权。呼和淖尔苏木第一任苏木达贺喜格苏荣，苏木政府设有民政助理、牧业助理、公安助理和秘书，别有一名勤杂员。”“民主改革初期，在上级政府领导下，首先开始建政工作。1948 年 11 月，经召开牧民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将乌吉苏木正式改名为塔日根诺尔苏木，同时选出新的苏木达，苏木政府暂驻阿尔山庙。在选举产生苏木政府的同时，在全苏木建立了 8 个巴嘎，配备了巴嘎达。”“1948 年初，索伦旗政府派优力吉、米西卡两人到这一地区开展工作，进行建政宣传，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学习班，广泛听取牧民群众(包括富裕牧民）对建政工作的意见等。经与各方面人士和各巴嘎代表多次协商，于 1948 年 4 月召开牧民会议，经过民主协商，决定将孟根础鲁、阿贵图两个苏木合并，

成立伊敏苏木。选举阿拉塔为苏木达，格力格扎拉森为公安助理、优力吉任秘书，僧格、那木斯来、宝日础鲁、巴图道尔吉、哈木、尚嘎力任苏木助理。苏木下辖红花尔基、毕鲁图、阿贵图、维特很 4 个巴嘎，有 284 户，1020 人。在选举苏木政府的同时，选举了 4 个巴嘎的巴嘎达和公安人员。”

从上述两段老同志回忆和三段苏木建政典型材料中可以看出，乌兰夫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建政指导思想，完全符合内蒙古牧业区的特点，易于为社会各阶层和牧民群众接受，能较快地顺利把政权转移到牧区人民手中。牧业旗及牧区基层政权建立后，代表和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忠心耿耿地为牧区人民服务，深受牧区劳苦大众和社会各阶层的信任和拥护,树立了人民政府的威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已解放地区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在乌兰夫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内蒙古解放区自上而下已普遍建立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形成了完整的政权系统。属于政府的工作，上边有人管，基层有人做，内蒙古自治政府已能一呼到底，整个政权工作没有多久就基本上进入了轨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内蒙古自治政府只有党的领导，可以说是“无上级”的高度自治政府。它的工作依据除党的方针、政策外，只有一个《施政纲领》和《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自治政府的各项业务工作都亟待制定规程或条例，以使自治政府各工作部门和各级政府能有施政依据。身为主席的乌兰夫，在抓政权组织建设的同时，用很大精力抓了法规建设。

经过半年多实际工作的探索，于 1948 年 1 月 5 日首先制定并以乌兰夫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阵亡烈士抚恤条例》《优待革命军人家庭条例》《荣誉军人暂行优待条例》。这三个直接关系革命军人及其家属的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执行，对巩固部队，鼓励前方将士英勇杀敌起了

重要作用。同月 28 日，乌兰夫又签发了自治政府《关于统一收费和征税问题的命令》，还发布告颁布了《内蒙古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和《货物产销税暂行条例》。紧接着又发布了《缉私奖惩办法》《营业税临时征收办法》《公营企业及机关学校战时工薪标准暂行具体办法》等法规，9 月 1 日又发布了《征收公粮公草暂行条例》。这几个有关财经方面法规的发布，使内蒙古已解放地区的各级政府的缉私、税收、征粮、征草和薪水发放等工作有了统一标准和依据，也使干部和群众心中有底，有利于监督政府工作。同时也体现了自治政府注重战时群众合理负担，使战时有限的财力能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理。

11 月，乌兰夫又签署自治政府令，发布了《修正现行各级政府组织暂行编制(草案)》《健全自治政府会议制度与建立报告制度之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待遇暂行简则》。1949 年又先后发布了《土地执照颁发办法》《货物产销税暂行办法》《公产医院医药收费暂行优待办法》《牧畜管理暂行条例》《国有林育林费征收暂行办法》《工商所得税临时办法》等。这些法规的陆续制定和发布执行，一方面说明了战争时期乌兰夫在政府工作上就很重视法规建设，同时也表现了在他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工作正在不断朝着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在战争环境中，在全国和内蒙古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抓政府本身的组织建设和法规建设，正是为了强化政府，提高其工作效能，以求更好地完成主要任务。身为自治政府主席的乌兰夫，在这方面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从自治政府建立到 1949 年的两年多期间，他在不断解决自治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对政府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经济工作(生产）上，而注重这方面工作的目的，除了尽可能地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之外，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

1948 年元旦，乌兰夫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一九四八年

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第三、四两项都是讲的经济(生产）问题。他在第三项中说:“提倡工业生产，繁荣商业贸易，发展木材、食盐、粮食、牲畜皮毛四大特产的生产，以繁荣内蒙古人民的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工人、职员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第四项中说:“实行财经统一，建立健全合理的制度。提倡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组织军民大生产，支援战争，保证后方军民供给。”是年 1 月，在他主持下自治政府召开了财经工作扩大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总结经验，统一财经，树立群众观点，全力支援前线”的财经工作指导思想。

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扩大财源，支援前线，1947 年 11 月乌兰夫特意讲了开发大兴安岭林业资源的问题。他指出:“大兴安岭森林资源是内蒙古的财富，大兴安岭林区是内蒙古的经济基础。”并提出“合理开发和利用”,“建设、保护、管理好大兴安岭森林资源这块宝地，是林业工作者的惟一使命”。1948 年他又提出“以营林为主，采育结合，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方针，强调一手采伐，一手造林，做到青山长在，永续利用。对于发展盐业生产和营运的问题，他曾亲自与辽北省等邻近地区领导人联系，请给内蒙古群众运盐以帮助。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充分发挥了内蒙古的资源优势，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缓解了群众和自治政府战时的经济困难。

为了稳定土改后农民的情绪，以尽快发展农业生产，1948 年 5 月 5 日他签署了以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和自治政府联名发出的《关于确定地权发展生产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凡分得土地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均有土地所有权，均应把分得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提倡“组织起来，开展生产竞赛”。1949 年初，按照他签发的自治政府命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包括分给富农和地主的土地）颁发了土地执照。这就使农民心里踏实了，分到了一份土地

的地主和富农心中也有了底。这一措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生产的积极性，也使地主、富农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8 年 9 月 20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征购粮工作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正确认识与重视征粮工作。在征粮中要掌握党的政策，了解老百姓的困难，不能强迫命令。翻身农民踊跃纳粮，自愿拿出翻身后第一年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出的最好粮食，支持自治政府，支援前线打仗的子弟兵。

1949 年 2 月，在自治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市召开内蒙古第一届劳模大会。乌兰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前来参加大会的劳动模范，并设宴招待他们。在大会上乌兰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亲自给劳模颁奖。在致开幕词时他说:“召开这次劳模大会的目的是总结土改后的生产经验，逐步提高内蒙古的农牧业生产，繁荣内蒙古人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大力支援前线，为内蒙古工业发展奠定基础。”这次劳模大会，是对自治政府成立以来工作成果的检验，也是推动内蒙古解放区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949 年 4 月 21 日，乌兰夫在刘春、杰尔格勒等陪同下，冒着大兴安岭南麓料峭的春风，到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拉格代一带农村视察，同基层干部和翻身农民亲切交谈,了解备耕情况，号召他们行动起来，抓紧备耕，争取春耕、春播的胜利，夺取农业丰收。乌兰夫亲临农业生产第一线，给翻身农民和基层干部以很大鼓舞，使他们生产劲头倍增。

对于支前，乌兰夫一直把它作为自治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始终都在牢牢地把握着。他每次讲话都讲支前，真是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由于他的重视，支前已深入人心，成了各行各业和各阶层的自觉行动。下边是一篇 1948 年 10 月《内蒙古自治报》上发表的《乌兰

浩特掀起支前运动》的报道。

乌兰浩特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及各工厂等，在关内外一连串的伟大胜利鼓舞下，以无比的热情掀起支援前线运动。全市公私工商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已于日前发动起了 3.5 亿元的军鞋贷款运动，其中 10 余户公营工厂自动担负了 6.2 亿元。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及全市区、乡、市局各部门干部，亦均以实际行动迎接大胜利，市委亲自带头将半月的中灶伙食降为大灶。铁西区干部亦支援了前线。现仅据市属八个单位的统计，捐款已达 743 万余元。其他如教师、民青、第五完小、群众纺织厂、群众合作社、第二制米厂生产部、马车工会、聚丰皮革厂、贸易局纺织厂等职工及铁西区群众等，共捐款 1039.6 万余元，鸡鸭 130 余只，手巾、牙刷、牙粉、慰问信等甚多。铁西区群众，于 23 日欢宴全区军队，并提出认真解决军队困难，该区群众决定要把军队今年被水淹地，于上冻前完全给翻一遍秋茬，以便来年耕种。各工厂工友自动提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等口号，产量均超过以往水平。群众纺织厂织布工友李自亮、石桂珍等，仅在 6 日内一个人就多织了两匹布，线组每日加班两个钟头，全厂计划本月增产 3/10。军械厂于 20 日发动了全厂的技术竞赛。在工友一致努力下，已创出很多范例，如有的工友把 18 小时完成的任务仅于 14 小时半内完成，而且保证了质量。电灯厂工友及修建发电厂的工程队，为迎接 15 日的祝捷大会放长电，每夜加班到电灯灭时才休息，被服厂工友为争取于 25 日前后全部完成冬衣任务，现正抓紧赶缝中。另外自治政府系统各部门及兴安盟中心旗委、前旗政府等机关干部均正抓紧晒干菜，准备支援前线。

从乌兰夫作为自治政府主要任务抓的生产、支前两项工作的情况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其成效的主要标志是内蒙古解放区的人民觉醒了。他们在几经磨难中认准了中国共产党指引

的革命道路，并以内蒙古革命的带头人乌兰夫为核心，不分地域和部族地团结了起来，为全中国和全内蒙古的彻底解放而自觉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在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史上是具有跨越意义的。

十六、内蒙古人民武装的创建者和最高领导人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这一论断所揭示出的规律，同样适合内蒙古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从东到西普遍兴起了以追求民族自治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因为战后日伪残余势力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国民党反动势力又极力渗透，所以卷入这场民族运动的人员十分复杂。为了把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引向全国革命洪流的正确轨道，除进入内蒙古周边地区的我党我军领导机关派出干部进入内蒙古地区宣传我党主张和民族政策，使他们逐步了解和靠近我党外，党中央果断地决定派时任中共候补中央委员、绥蒙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主持整个内蒙古的蒙民工作，把内蒙古革命的领导重任放在他的肩上。

当时中国正处在光明和黑暗、民主和独裁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围绕着这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国共两党在谈判桌和战场上都在激烈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内蒙古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党中央和有关中央局、分局都很重视内蒙古民族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央与有关中央局、分局及乌兰夫曾多次来往电报，其中对建立内蒙古民族武装的问题也作了明确指示。1945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中说:“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步改造。”晋察冀中央局 10 月 27 日关于

察蒙情况及方针致中央并告冀察的电报中说:“组织蒙民之自卫武装，积极予以帮助。”随后于 11 月 27 日“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致中央电报中又说:“在盟旗政府下，成立蒙古人的自卫武装”。11 月 23 日《晋察冀中央局目前对内蒙古工作的几个要点》中的第三项专讲了军队问题，即:“准备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目前在各盟旗恢复和编制保安队，以便维持地方秩序。发展民兵的训练，民兵和保安队有了基础后，接着就要组织较大的地方性的自卫队。目前对于改造旧军队和训练军事干部，是各盟旗军事工作的重要任务。”

乌兰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做过兵运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策动了百灵庙暴动；抗战初期，他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控制了以百灵庙暴动部队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并同这支抗日的蒙古族军队一起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他很理解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对改造旧蒙古军和建立人民武装所作指示的含义，很重视建立内蒙古民族人民武装的问题。1945 年 11 月 12 日他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就提出了“要建立一支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地方性的民族军队”。同月 27 日他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讲《对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时又说:“组织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以肃清境内之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巩固革命社会秩序。”乌兰夫一直紧紧地把握上述精神，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这三年多时间里，他为建立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蒙古民族人民武装倾注了很大精力。

乌兰夫受命“主持蒙民工作”时，没有一兵一卒。1945 年 11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建立，他当选联合会主席兼任军事部部长。作为半党半政这个革命组织的最高领导和军事主管，他深知，在军事上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

在乌兰夫的努力下，组建的隶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第一

支部队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这个旅的组建，是经乌兰夫与绥蒙区党委和绥蒙军区主要领导人一起商定，在绥蒙军区帮助下完成的。1945 年秋，我晋绥和晋察冀主力发起绥包战役，虽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未克，但在我军影响下，华林泰率领的国民党陶林县保安团、云继珍和李秀山率领的国民党第 10 路军第 9 师部分官兵和林国梁率领的国民党第 10 路军伊克昭盟暂编保安师 2 旅 1 团的官兵弃暗投明，先后宣布起义。这三支以蒙古族为主的起义部队，被编为由绥蒙军区领导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 1、2、3 支队。晋绥、晋察冀两军区领导从内蒙古革命的整体利益考虑，拟以这三支部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统一的人民武装。两军区领导的想法，正和乌兰夫不约而同。1945 年 12 月中旬，绥察战役结束后，这三个支队奉命集结到集宁整训。此时，李森、李自勉、云正旭等领导的我大青山蒙古游击队，杨秀齐、李存义等领导的我绥东游击队，奇俊山、李景山、云德胜等领导的我绥西游击队，也按乌兰夫、姚喆指示到集宁集结。此时，经乌兰夫与姚喆、苏谦益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这三个支队和几支游击队的人员为基础，就地征招了一些农牧民子弟和青年学生入伍，又从绥蒙军区和延安来的老同志中选调了一些适合做军队工作的干部作骨干，组成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这是隶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第一支部队，组建时以八路军为榜样，遵循革命军队的宗旨，明确其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部队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旅、团建政治机关，连队设政治指导员。组建任务刚完成，国民党傅作义部就按蒋介石的密令进犯我集宁地区。党为了保护这支新组建的少数民族队伍，决定让其撤离集宁，到安全地带整训。1946 年 2 月，按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乌兰夫的部署，转移到张北县大囫囵一带继续整训。在整训期间，各级军事和政工干部及部分战士都曾到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学习，大都聆听过乌兰夫直接授

课，对提高这支部队的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这支部队长期活动在察锡盟地区，后来扩编成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6师。在内蒙古人民军队建军中，可以称得起是样板部队。

继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之后，1946年1月又组建了内蒙古人民游击队。这支部队的基础是老地下工作者乌力吉敖喜尔在抗战胜利前夕率部起义的原伪蒙古军第9师。“乌师”起义后，先被编为绥蒙第一军第一师，但苏蒙联军不同意就地改编，他们坚持先缴械，而后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整训。无奈，只好按苏蒙军要求，缴械后开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过了3个月整训后，于1945年底返回国内。乌兰夫知道这支部队的军事素质不错，装备也好，很重视它。这支部队回到国内后，乌兰夫就主动向晋察冀军区领导提出其归属和番号问题。经同军区领导一起与苏蒙联军代表尼古拉也夫研究，确定其番号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任务是保卫晋察冀军区与苏蒙之间的运输线，确保化德至二连段交通畅通。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解放战争爆发后，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1师，长期活动在巴彦塔拉盟和乌兰察布盟地区。

1946年3月底4月初，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在会议“主要决议”第四项中专讲了军事问题。即:“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军队武装，并处理关于内蒙古建军、整编、训练、人事等问题。鉴于目前的形势条件，规定各(内）蒙古军队应分别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一切内蒙古军队，必须使之真正为人民服务，成为保卫人民民主自治的人民武装。”按照“主要决议”的这一精神，1946年5月对内蒙古的民族武装部队进行了统编。

统编后各部队的番号是: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原内蒙古人民游击队，改称为内蒙古人民

自卫军第 4 支队；原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 1、2、3、4、5 师，分别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2、3、4、5 师；原东蒙古自治军兴安支队、6 支队、警卫团、教导团，分别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支队、6 支队、警卫团、教导团。东蒙古自治军番号取消，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省军区，负责管理统编后驻防内蒙古东部的人民自卫军各部队。兴安省军区司令员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军事部副部长阿思根兼，哈丰阿兼任政治委员。为便于作战指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省军区成立后，同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组成联合司令部，邓华任司令员，阿思根任副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哈丰阿任副政治委员。

1946 年 10 月张家口失守后，为适应察锡和巴乌地区的斗争形势，11 月在乌兰夫主持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专门研究了察锡地区的工作，决定把活动在锡、察盟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扩编为骑兵第 16 师，任命李秀山为师长，王铎为政治委员，在中共察锡工委领导下，坚持察锡地区的对敌斗争；在巴乌地区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4 支队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1 师，乌力吉敖喜尔为师长，关保扎布为政委；把海福隆率部起义后组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5 支队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7 师，海福隆为 17 师师长；同时建立巴乌军区，乌力吉敖喜尔任司令员，奎璧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巴乌地区的自卫军部队，开展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当选自治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11 月 26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 月 4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成立大会，宣布司、政两部正式建立。至此，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作战序列和指挥系统，在乌兰夫的组织和领导下，内蒙古人民军队的组建任务基本完成。

1945 年 8 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先后对日宣战后，在苏蒙联

军帮助下解放了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在行政建制上当时锡、察两盟归察哈尔省管辖。抗战胜利后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察哈尔省民主政府认真贯彻我党的民族政策，很关心锡、察盟人民，在察锡地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1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在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开展了这一地区的工作，很快建立了盟级自治政府，察锡地区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上层分子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他们勾结在一起，纠集反动势力公开与我对抗。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流窜在这一带的所谓郭团、白团两股匪徒。他们造谣生事，制造混乱，反对我党和民主政府，袭击我机关，杀害我干部，抢掠群众财物，到处为非作歹，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工作的开展。乌兰夫听了时任察哈尔盟盟长的陈炳宇汇报后，决心除掉这两股土匪。1946 年 3 月，他给组建不久正在张北县整训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下达了剿匪令。该旅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周密侦察，弄清敌情，迅速出击。此时正值郭团捉捕我苏剑啸等干部，抢占了地处交通要道的正蓝旗哈巴嘎镇，企图借此要冲控制察锡盟。以郭崇礼为首的这伙土匪正得意地胡作非为时，突然被我骑兵独立旅包围。这次剿匪作战出奇制胜，生擒匪首，全歼郭团股匪。白团匪帮得知郭团被歼后，凭他们熟悉地形，很快隐藏起来。我骑兵独立旅派出侦察人员，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敌人，借夜幕秘密运动靠近敌人，天亮之前就在宝昌县龙王庙一带把这股土匪包围了起来。当他们发现被我包围时，虽首先开枪，企图顽抗，但面对我数倍于他之军力，在猛烈的炮火下，已无还手之力。在我正义之师士气昂扬地跃马冲杀时，他们已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100 多人的股匪除 8 名被击毙外，全被我生俘。

这一剿匪仗打得很漂亮，为民除了害，稳定了察锡盟地区局势，

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牧民群众中的影响，为进一步开展察锡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乌兰夫得知后高兴地说:“解决得痛快!”并对骑兵独立旅予以嘉奖。

胜利之师凯旋归来，继续在张北整训。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全面内战。骑兵独立旅的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在整训中学军事，学政治，努力提高军政素质，苦练杀敌本领。

9 月下旬，在乌兰夫精心安排和部署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单位和部队从张家口撤到锡林郭勒盟腹地贝子庙。10 月国民党的军队占领张家口后，抢占了我察锡地区的多伦、宝昌、化德、康保等县城，并调重兵企图向我察锡根据地纵深进犯。在敌人大举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一些民族、宗教上层倒向了国民党。他们组织保安队、还乡团，公开与我对抗。而对我察锡根据地威胁更大的是以额尔钦道尔吉为首，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在锡盟腹地对我进行骚扰的布利亚特叛匪。再就是由察盟投靠国民党的丹巴、何文瑞带领的一股反动武装，作为国民党军队进犯我察锡根据地的先头部队，抢占了正蓝旗的哈巴嘎镇。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所谓的“察哈尔盟政府”，征兵征粮，修土城，建碉堡，想借通向察锡腹地的这一军事要冲，迎接国民党大部队，妄图一举吞噬我察锡根据地。敌人的一时嚣张，搞得察锡地区局势很不稳定，已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甚至叛变投敌。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稳定情绪，鼓舞士气，制定应对措施，乌兰夫亲自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周密地安排了如何保卫和巩固察锡。在分析形势时乌兰夫讲了察锡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了面临的困难和我们已做工作的基础与有利条件。为了扩大和加强我抗击敌人的军事力量，决定把骑兵独立旅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6 师；为了加强察锡地区对敌斗争和各项工

作的统一领导，决定建立党的察锡工委和察锡行政委员会；按照战时需要，调配了主要领导干部，决定由工作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王铎任党的工委书记、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骑兵第16师政委，由军事指挥能力强、革命意志坚定的李秀山任骑兵第16师师长，由延安来的老同志刘景平和寒峰分任骑兵第16师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后又由财经工作经验丰富的赵云驶和林蔚然分别为骑兵第16师代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任命在当地群众和各阶层中有影响的特克希巴彦(王宗洛）和松津旺楚克分别任行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了鼓舞士气和加重骑兵第16师全体指战员的责任感，乌兰夫特集体约见新任命的骑兵第16师领导人，以无限的信任和期望对他们说:“建立察锡根据地16师责任重大，16师要与察锡共存亡。有16师在则察锡在，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察锡地区的武装斗争。”这信任和重托给16师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对察锡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和动员后，新受命的党、政、军各级主要领导干部都迅速进入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动员和带领察锡地区的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万众一心地同残暴的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寒冬腊月，蒙古高原冰冻三尺，浑善达克沙地雪大人稀，部队行军、宿营、供给都十分艰难。但是，他们想起了乌兰夫主席兼军事部长的信任和重托，就信心百倍，在他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为保卫和巩固察锡根据地，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在乌兰夫领导下，我同敌打了三次硬仗，三战三胜。

1946年11月拔除敌人插在我察锡根据地南大门的一颗“钉子”。盘踞在哈巴嘎的丹巴、何文瑞匪帮，抢掠民财，欺压百姓，不仅是敌人插在我察锡根据地南大门的一颗“钉子”，也是试图向我大举进犯

的桥头堡。拔掉这颗“钉子”，摧毁这一桥头堡，对粉碎国民党军对我察锡根据地的战略进攻，保卫和巩固察锡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乌兰夫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丹、何匪帮，夺取哈巴嘎。11月初，乌兰夫令刚由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扩编成的骑兵11师和配属16师指挥的察哈尔盟地方部队第80团承担这一战斗任务。11师和80团接到作战命令后，火速运动，两支部队很快在距哈巴嘎12公里处汇合。两军汇合后，在11师师长乌力吉敖喜尔主持下，马上研究作战方案，确定了军力配置和作战部署。具体分工是:80团负责哈巴嘎以东地区的堵击；11师31团从哈巴嘎西南方向出击，承担主攻任务；11师33 团负责哈巴嘎东北方向的攻击任务。战斗打响后，31团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强攻，很快突破敌人防线，冲进镇内；33团从东北方向也很快冲进镇内。敌人失魂丧胆，弃尸而逃。我三个战斗团合力追击，在追击中又生俘敌多名。这次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以我获全胜而结束。经过这次战斗，我控制了哈巴嘎地区，打破了敌人以此为桥头堡向我进犯的军事计划。

击退国民党大部队对察锡根据地的进犯。国民党傅作义部为实现蒋介石控制热(河省）察(哈尔省）的战略企图，1947年4月中旬调集主力部队进逼，以流窜在我根据地的股匪为内应，妄图摧毁我根据地，搞垮我察锡领导机关。在乌兰夫统一部署下，我参战部队统一行动，密切配合，英勇作战。在敌人主力到来之前，拟作内应的股匪已被消灭。当敌人主力部队扑来时，我已做好迎战准备，把敌人诱进沙窝子后，狠击猛打，致敌损失惨重，被迫后撤退出了我察锡根据地。

这一仗狠狠教训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他们再不敢轻易进犯。察锡草原根据地固若金汤，岿然不动。

彻底消灭布利亚特叛匪，清除内患。布利亚特是蒙古族的一支，住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即现在的俄联邦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我们

这里说的布利亚特，是指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期逃入我国的一部分布利亚特人。他们最早居住在靠近中俄边境的今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后移居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以后，又西迁到阿巴哈纳尔旗境内，在巴彦锡勒一带自建了布利亚特旗。他们保留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手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内蒙古革命，培植反动势力，把布利亚特旗首领额仁钦道尔吉拉入国民党内，并封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初期，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锡林郭勒盟开展工作时，他们曾表示接受我党领导并参加了自治运动，1946 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后，额仁钦道尔吉投靠国民党，策动了布利亚特全旗叛乱，并形成了一伙武装匪帮。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和纵容下，这伙匪帮大肆破坏我察锡根据地。他们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察锡根据地的内应，袭击我机关、部队，杀害我干部，抢掳牧民财物，已成察锡根据地的一大内患。为了保卫和巩固我察锡根据地，乌兰夫和察锡地区领导决心要除掉这一内患。1946 年 11 月组织了对这伙匪帮的第一次进剿，参剿部队有骑兵第 16 师和察锡地区的地方武装，由 16 师副政委刘景平统一指挥。额匪发现我进剿后，就把匪徒化整为零，三五一伙地在草原和沙滩同我周旋。我进剿部队追踪十多天未得战机。这一祸根未除，在国民党支持下，他们继续祸害群众，不断对我袭扰，特别是 1947 年春孙兰峰指挥的国民党大部队向我进犯时，他们作为内应更为猖狂。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匪帮，根除察锡根据地的内患，1947 年 6 月乌兰夫和冀热辽军区决定，集中兵力进剿，予以彻底消灭。这次进剿组织了足够的兵力，作了周密安排，决心出师必胜。参战部队及分工是:冀热辽军区蒙汉联军骑兵师和步兵 5 团，在师长何农斌统一率领下，从东向西进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1 师由西南向东挤压敌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6 师

和察盟80团从北向南正面进击。整个进剿部署对额仁钦道尔吉匪帮成三面合围态势。6月12日战斗打响时，冀热辽军区步兵5团西进途中在克什克腾旗西边的沙窝子里与额匪主力遭遇，展开激烈战斗。额匪顽抗，我猛打。虽然国民党派来飞机空中支援额匪，但还是被迫步步西撤，直至退到正蓝旗沙窝子里被紧紧包围起来。我另一路进剿队伍内蒙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6师和察盟第80团，直插阿巴嘎反动头目补得巴拉的营地，生擒了补得巴拉。接着直取额匪老窝，发现他们已携眷赶畜转移，遂决定兵分两路追赶。在阿巴哈那尔旗额匪中心地带追赶上了正在裹胁着群众逃跑的额匪。乌兰夫和冀热辽军区领导对这次进剿作战定的方针是:主要打击额仁钦道尔吉等匪首，解除其全部武装，尽量避免伤害布利亚特群众，对一般匪徒要分化争取，缴械后，妥善安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我参战部队认真贯彻了这一作战方针。在追击中大力做分化瓦解工作，寻找有利战机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逐渐收缩包围圈。经过几天的连夜追击，迫使这部分匪徒步步南撤，进入正蓝旗后又向多伦方向退，退到闪电河时已大部被我解决。额匪主力与我冀热辽部队遭遇后，在激烈的战斗中边战边退，也被压到了正蓝旗，大部被我消灭。这时候国民党从多伦派出的援兵赶来，匪首额仁钦道尔吉带为数不多的残部随援军一起逃往多伦。

战斗结束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6师奉命把额匪裹胁的布里亚特群众、家属和俘获的一般匪徒及牲畜、车辆、财物等一并护送到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南屯一带作了安置。

解决了以额仁钦道尔吉为首的布利亚特叛匪，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欲借其为内应，大举进犯并摧毁我察锡根据地的阴谋，也彻底清除了额匪在我察锡根据地腹地骚扰破坏的内患。从此，这片自治运动联合会最早开展工作的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49年7月22日，乌兰夫在内蒙古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

在谈到内蒙古建军经验时说：“我们肯定，旧军队可以改造，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改变立场，要和群众结合，要建立与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要在斗争中去考验锻炼。”“对不同部队提出边打边训、先打后训、先训后打等方针，以求增强阶级觉悟，提高战斗力，从政治上、组织上给部队以改造和锻炼。”“由旧到新，不是像翻盖房子那样采用旧的基础，而是否定旧的，从旧的中产生出新的来，是脱胎换骨。我们提出的改造整编方针，从今天来看，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军队打出来了，锻炼出来了，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建军路线。”

这几段话，高度概括了以乌兰夫为主要领导的内蒙古人民武装的发展史。内蒙古解放军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程成长壮大起来的。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最早建立的骑兵独立旅，组建后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直接领导下，就调到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县一带整训。整训开始不久，接到了乌兰夫下达的剿灭国民党支持的地方反动武装的作战命令。他们立刻运动，迅即投入战斗。这支部队虽然是刚刚组建起来的，但初战得胜，仗打得很漂亮。完成战斗任务后，又按乌兰夫的命令回到指定地点继续整训。这支部队，组建后抓住了我党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平谈判中争取来的短暂和平时期，干部和部分战士都先后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办的军政干部学院学习，不少人都聆听过乌兰夫亲自授课，普遍受到了革命教育，绝大多数指战员认清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分清了敌我，懂得了为什么和为谁扛枪。政治觉悟提高了，自然就有了苦练杀敌本领的积极性，即使在和平阶段，他们也没有忘记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在政治学习的同时，他们抓紧军事训练，使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都明显得到提高。部队中出身旧军人的干部和战士，多数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有这样的军队，才称得起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需要上战场时，它才会毫不动摇地站在党的、内蒙古人民的立场上，顽强战斗，与敌厮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这支部队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6师。正因为有这样一支部队，当敌人向我察锡解放区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时，乌兰夫才敢于无限信赖地提出“16师与察锡共存亡”。16师是实践乌兰夫“先训后打”的代表性部队，但“先训后打”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能这样做。16师所以能做到这样，首要的是它的前身骑兵独立旅一建立就明确了是党的部队，是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再就是它组建时，恰恰是战后相对和平阶段。没有这两个条件作前提，“先训后打”就很难做到。这就是说，乌兰夫提出的“边打边训、先打后训、先训后打”等几种方针，是针对不同部队提出来的。部队“由旧变新”，发展壮大的路程不能千篇一律。

日本投降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组建的东蒙古自治军初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前，他们同东北我党、我军的关系是友邻、联防，只接受帮助，不接受领导。朋友和联防，不是上下关系，就只有在政治上给以影响，在军事上按其需要和接受程度予以帮助，不能按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西满分局、冀察热辽分局及相关军区曾派出不少得力干部到东蒙地区和自治军中做工作，但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对以旧军警为主收编、组建的东蒙古自治军各部队，只能基本上保持原状，不可做伤筋动骨的根本性改造。但是，各部队的领导状况、组建过程和人员构成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受我党、我军影响，即我党、我军派出干部的工作成效也各不相同。其中受我党、我军影响最大的是1师。

1947年9月13日，乌兰夫在1师留守人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表达了他对1师的看法和寄予的希望。他说:“1师现在是内蒙古共

产党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军队，这是否就等于是人民的军队呢?”他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却没有马上作出明确回答，而是讲了什么样的军队才是人民的军队。他说:“人民军队是被压迫人民穿上军衣拿起武器，为解放自己而组织的……立场应该是劳苦大众的立场，被压迫人民的立场。我们说，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人民立场是一致的……明确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这是人民军队的先决条件。”接着在谈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时他又说:“1 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那么，党怎样保障这一领导呢?”提出问题后他又明确回答说:“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说共产党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都能对军队实现自己的领导。”对于如何保证党的领导他接着说:“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共产党员，才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1 师内部有共产党员，但数量不大，还要加快发展共产党员。”“要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而且要使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在政治上要有一定程度的觉悟，要懂得并坚决遵守共产党的政策。只有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完全达到这一标准，才能称得起是人民的军队，才能真正称得起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 师全体指战员应当为这光荣的称号而努力。”

在讲到对 1 师的期望和要求时他说:“1 师要在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中起带头作用，要在建军工作、政治工作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充当模范，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骑兵第 1 师。”同时提出:要壮大 1 师，要在群众运动中扩大我们的部队；把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作为建军工作的主要环节；发展部队中的党组织，使部队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战斗中锻炼提高军事技术，坚定政治立场，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要做群众工作，帮助农牧民翻身，打起仗来是人民武装力量，平时是政治宣传员(队)；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旧思

想，牢固地树立新思想；加强蒙汉干部、新老干部和官兵之间的团结。这次讲话对 1 师，对内蒙古人民武装各部队军政素质的提高和发展壮大，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9 年 7 月 22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军区召开的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总结内蒙古建军工作经验时说：“1947 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时，军队站在我们党的方面，说明了军队已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指 1 师，当时 1 师担任会议警卫任务——作者）“自从在 1 师干部会上明确提出建军方针后，部队进步很快。1948 年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军队涌进了大批劳苦群众，部队成分改变了……部队质量有了提高。”“从旧到新，不是像翻盖房子那样采用旧的基础，而是否定旧的，从旧的中产生出新的来，是脱胎换骨。我们提出的改造整编的方针，从现在来看，事实说明是正确的。从前在政治上分不清敌我界限，打过仗后就清楚了……认清了敌人是谁，然后再加以训练，这就是先打后训。我们的军队打出来了，锻炼出来了，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乌兰夫讲得很客观，符合骑兵 1 师和内蒙古人民武装各部队从旧到新，发展壮大的史实。

1947 年 9 月 13 日，乌兰夫讲话所以对 1 师寄予那么高的期望，提出那么高的要求，不是没有根据的。1 师是东蒙古自治政府最早组建的一支部队，其基础是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日军将要垮台时起义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军人和军校学生，领导人主要是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军人。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在这支部队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表现好的青年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中包括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师级领导。也在这时候，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根据西满分局指示，在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以张策为书记的中共兴安省工委领导下，兴安省军区对所属部队（东蒙古自治政府时期组建的原东蒙古自治军）进行了军纪整饬，随后对师、团领导班子作了普遍调整。调整后

1 师的师、团主要领导大都是新入党的蒙古族青年。他们立场坚定，革命热情很高，成了 1 师实现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政策，执行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坚强核心。1 师虽然也有不少官兵来自日伪统治时期的旧军人，但是，有了这些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明显地加快了它由旧变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人民军队的步伐。形势恶变后，在阻止敌人进攻、在同叛军斗争、在收复失地的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好。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接迎、护送代表和代表会议开会期间的警卫任务。同时，1 师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党的立场上，对自治政府的胜利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些部队的情况就不同了。以骑兵第 2 师为例，“四三会议”后，虽然它也进入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编制序列，在名义上已是我党领导下的军队，但组建时收编进来的旧军警人员，多数基本上还是旧思想、旧立场。1946 年国民党军队向我哲盟解放区发起进攻，我 2 师师长乌力图偕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到通辽，拟调整领导，整顿部队，准备迎战时，突然发生了 12 团 1 连连长率队叛变投敌事件。随后，13、14 团也发生动摇；不久，15 团 3、4 连又叛变投敌。这些突发事件，打乱了我行动计划和作战意图，不得不被迫采取应急措施，把部队调到安全地带整顿。首先调整师、团领导，增派政工干部，建立政工制度，严格军纪。经过整顿，把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清理了出去，精练纯洁了队伍。接着在整训中，讲形势，学政治，进行军事训练，联系实际总结 2 师组建以来的经验教训，普遍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提高。这次整顿和训练虽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却使 2 师朝着真正人民军队的目标大跨了一步。2 师整训任务完成后，在兴安省军区司令员阿思根率领下，与 1 师一起奔赴前线，收复哲盟失地。2 师参战部队在作

战间隙继续整训，以巩固集中整训已取得的成果。战斗任务完成后，全面总结了整训和与 1 师协同作战的经验，干部、战士共谈心得，2 师部队面貌大为改观，士气大振。

再如在卓索图和昭乌达地区，投靠蒋介石的大蒙奸李守信和侵占我赤峰的国民党 39 军，自 1946 年夏开始，乘国民党反动军队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之机，多次派特务到我骑兵第 4 师策反。我骑 4 师师长和子章虽然在 12 月初抓获了到他那里策反的特务，并就地正法，但 12 月中旬他陪同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运昌到林东检阅部队，誓师反击，拟夺回被敌侵占的我开鲁时，还是发生了骑 4 师 35 团大部、37 团一部和 34 团一个连叛变投敌事件。出现这种严重情况后，我不得不改变行动计划，先作争取叛军的工作和整顿部队，暂时放弃夺回开鲁的计划。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斗争激烈，环境残酷的情况下，真假革命一下子就分清了。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敌人现了原形，只穿了一身人民军队的服装，戴了一顶革命军人的帽子，立场还没有改变或没有彻底改变的不坚定分子，在敌人的诱惑下发生动摇以至叛变投敌，这可以说是自然淘汰。相反，已转变立场，站在了人民方面的真正革命者，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也经受了考验，他们的立场更鲜明，斗争意志更坚定了。就在 35 团 4 连叛变，野蛮地残杀我革命同志，奸诈地诱袭我自卫军部队的危险时刻，35 团 4 连副连长思勤朝克图等，仍机智地同叛军斗争，终于团结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脱脸归队。乌兰夫当即接见了脱脸归队的同志，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了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同叛军斗争的革命精神。

叛变与反叛变两相对照，从两个方面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旧军队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前者说明了改造的必要性，后者说明了改造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时候改造，怎样进行改造，需要按照部队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1947 年 4 月 24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说:“加强自卫力量，改造原有的旧军队，建立与发展新的军队，均使之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4 月 27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第九条中规定:“建设与发展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军队必须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拥护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加强团结，严整纪律，必须保卫民族和人民利益，坚决粉碎大汉族主义者(系指国民党反对派——作者）侵略，争取自卫战争胜利。”乌兰夫报告中讲的和《施政纲领》第九条中的规定，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整顿和建设明确了标准。

在 1946 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中，内蒙古自卫军的一些部队出现了动摇，发生了叛变，这本是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仗一打响，假革命和不坚定分子亮相了。这决非革命不要他们，而是他们自我淘汰。这种情况的出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进行彻底整顿创造了条件。

按照乌兰夫“由旧到新”“脱胎换骨”的要求，1947 年 8 月卓索图盟纵队进行整训。这支部队是 1946 年“四三会议”后建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在卓盟的自治运动和减租减息等工作已展开，群众初步发动后，根据乌兰夫指示，经冀热辽分局和军区批准组建的。虽然纵队司令员是民族上层人物白云航，士兵和基层干部中也有些出身旧军警的人，但一组建就明确是党的军队，实际领导权由我党同志掌握，士兵和基层领导多为已觉悟的农牧民子弟。这支部队建立起来后，一直在卓盟各旗县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受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底子和工作基础都比较好。这次整训在军事上主要是进行战术教育，克服不讲战术的一轰而上的打法；在思想和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结合正在兴起的土改运动，在干部中进行“三查”(查阶

级、查思想、查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战士中开展“诉苦和坦白”，普遍提高觉悟。在整训过程中还有两次较大的扩军，吸收了一批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考验的农牧民子弟入伍，补充了兵员，改善了部队成分。

卓索图盟纵队在自身整训的同时，接受了整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7 师的任务。17 师是以海福隆率领起义的原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 1 路军官兵为基础编成的。1946 年 7 月，在我军围困大同时海福隆率部起义，当时影响很大。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亲自接见过海福隆和部分官兵。乌兰夫曾在张家口为他们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会。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在绥北、绥东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也曾打得不错。但后来形势恶化，17 师移动到了察哈尔盟白、蓝旗沙窝子里。在生活艰苦、斗争残酷的情况下，一些人经不起敌人的诱惑，产生了动摇甚至投敌。1947 年 8 月，把 17 师调到昭盟翁牛特旗乌丹镇，集中在北大庙进行整顿。卓索图纵队为完成上级交给的整顿 17 师的任务，抽调得力干部到 17 师深入连队，充分了解情况，认真做思想工作。根据 17 师的实际情况，经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和冀察热辽军区批准，决定撤销这个师的建制。对师级领导和各级干部作了妥善安排，清除了一些兵痞和大烟鬼，部分人员复员，留下的干部和战士编入了卓索图纵队。卓纵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和加强。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 4 师，是以日本投降后和子章在林东组织的保安队为基础，又收拢了昭乌达盟各旗的武装组成的。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各旗搜罗的旧军警。1946 年年底问题暴露后，限于当时的情况，未能彻底解决。这时候在昭盟的工作基础和 4 师部队的状况已有很大变化，并有一些进步的青年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有了乌兰夫讲的和《施政纲领》中定的对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要求，已具备了进行彻底整顿的条件。4 师的整顿工作在昭乌达盟

盟委领导下，按照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即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标准进行。具体做法是:先做思想工作，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结合 4 师组建和发展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经过对照检查后，进行组织整顿，清理了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的人。从师部清理出了约 60 人，全师清理出干部 154 人。整顿后 4 师全员由原来的 1600 人减缩到 800 多人，调整了团的建制，各级主要领导和所属人员也作了相应调整。在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连以上各级主要领导多数是共产党员，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改变了部队成分，战士大都是农牧民子弟，在他们中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 4 师真正成了党领导下的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子弟兵，基本上做到了乌兰夫要求的“脱胎换骨”、“由旧变新”。

其他各部队，也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了整顿和训练，都收到了显著效果。这次整顿，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1948 年 1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乌兰夫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任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中国革命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与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以及国际的有利条件，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全内蒙古人民，必须明确自己的新任务，争取新的胜利，争取解放全内蒙古。”对于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他说:“发扬内蒙古骑兵的英勇善战精神与骑术特长，坚决、勇敢、大量地歼灭敌人。要提高骑兵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加强学习，坚决维护土改，加强与扩大部队，参加大反攻。”为适应大反攻的新形势需要，乌兰夫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签发命令，令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根据乌兰夫的指示和命令，新式整军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各部队中迅速展开。

在新式整军中，各部队在党委和支部具体组织和领导下，普遍开展了以整思想、整作风、整斗志、整历史和评成份为内容的“四整一评”运动，号召干部和战士说心里话，引苦、诉苦、挖苦根。不少出身贫苦的干部和战士，在诉说中痛哭流涕，用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残酷。通过诉苦，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扛枪，为谁打仗，激发了官兵的革命斗志。

结合新式整军，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全军掀起了向陶高和嘎瓦仓卜学习的热潮。陶高是骑 1 师 3 团 4 连战士，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忘我战斗的革命战士。1947 年 10 月 13 日，在大虎山战斗中，为压住敌人火力，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为我军前进打开通路，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阵前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嘎瓦仓卜是陶高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基层政治工作者，深受连队干部和战士的拥护，曾多次受奖。1947 年 10 月 13 日，在大虎山战斗中，嘎瓦仓卜身先士卒，亲自端着机关枪率先冲入敌阵，保证了连队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他却疆场捐躯。乌兰夫得知陶高和嘎瓦仓卜的英雄事迹后，亲笔题书:“陶高、嘎瓦仓卜同志在蒙古民族人民解放战争中，奋不顾身，与敌作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共产党员的最好品质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表现，内蒙古革命同志应该向他们学习!”陶高、嘎瓦仓卜的事迹和乌兰夫为二位英雄的题词，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中迅即传开，有力地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在新式整军和陶高、嘎瓦仓卜英雄事迹的影响和激励下，全军各部队兴起了练兵热潮，特别是在骑兵战术和乘马射击、斩劈两项骑兵特有技术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思想上和军事上为大反攻和参加全国战略决战作了充分准备，打下了坚实

基础。

1948 年 7 月 30 日，乌兰夫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古高干会上讲话时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一万余人的内蒙古骑兵，这是内蒙古历史上第一支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在内蒙古地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蒋匪军，解放被侵占的内蒙古地方。至今内蒙古 11 个盟及宁夏蒙古，已有 8 个盟完全解放，1 个盟大部解放，2 个盟部分解放，仅宁夏蒙古地方尚完全处在敌人统治下。自去年 5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今年 5 月的一年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共歼敌一万多人。”他还说:“根据内蒙古军队的情况，目前建军工作应以巩固部队、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提高战斗力和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为基本任务。”这是作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乌兰夫，对内蒙古人民解放军过去一年战绩的简要概括，也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已由劣势转为优势，敌已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情况下，对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按照乌兰夫提出的基本任务和总要求，根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一丝不苟地忠实履行自己的使命。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是打出来的，是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的。建军初期，就同土匪打，同破坏停战协定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打。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阻止国民党反动军队向我内蒙古解放区进攻，在建立和保卫察锡根据地中，屡建功勋；在收复失地，恢复、扩大和巩固内蒙古解放区时，更战功卓著。现今在大反攻和即将展开的战略决战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乌兰夫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统率下，在有关战区和主力兵团统一指挥下，以威武之师更加昂扬地投入解放全内蒙古和全中国的壮丽战斗。

在整训和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骑兵第 1 师和第 2 师，光荣地参

加了辽沈决战。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东北主力集结在长春周围和长春与沈阳之间整训，作战略决战准备。我骑兵第1、第2师，也奉命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3月至8月骑兵第2师奉命在彰武执行封锁新民和沈阳之敌的任务。8月，骑兵第1师接替2师，继续封锁和围困新民和沈阳之敌。2师和1师在执行封锁和围困任务时，除打击和歼灭出城骚扰、抢劫的小股敌人，胜利完成了封锁、围困敌人的任务外，还保护了新解放地区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和群众生产。

9月，辽沈战役打响，骑兵第1师配属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指挥，奉命到指定作战位置，执行战役侦察任务和阻击西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有运动迂回，有追歼奔袭，也有死守阵地。他们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勇猛，灵活机动的特点，驰骋在柳河以西、大虎山以东，大新民屯以南、腾鳌堡以北的辽阔地域，多次与敌交战，都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确保了主阵地安全。

骑2师从辽西前线回兴安盟葛根庙经过短期整训后，奉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令，9月初赴长春前线参加辽沈决战。出发前乌兰夫到骑2师驻地葛根庙亲自作动员报告。在动员报告中，乌兰夫讲了东北和全国的大好形势，指出了在东北战场上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和命令，我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继骑兵第1师入辽西战场后，骑兵第2师又开赴长春前线，参加战略决战。这是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2师全体指战员要再接再厉，在东北战场上英勇杀敌，再立新功！2师全体指战员带着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重托，斗志昂扬地开赴长春前线。9月10日到达作战位置长春南黑林子镇一带阵地。长春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程子华赶到阵地，听取2师领导汇报，察看部署情况，并命令2师坚决守住黑林子镇，不惜一切代价阻击迟滞长春突围之敌，以待主力部队到达歼灭。黑林子镇在长春到沈阳和辽西的重要通

道上，原有简易工事，不足阻挡夺路而逃的国民党军队。为保证完成战斗任务，2 师抓紧加固和补修工事，同时尽快熟悉地形，进行作战演练。为提高内蒙古骑兵的杀伤力，哈尔滨军工厂专门赶制了一批骑兵专用战刀，送来交给 2 师。2 师壮士紧握专用战刀，乘马演练劈斩。这种所向披靡的威武阵势传到敌营，令闻者胆战心惊。“有 5 万精锐蒙古骑兵在长春周围”，在敌营不胫而走，慑敌不战而栗。10 月 10 日，长春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企图强行突围，战斗激烈。为防止敌人突围逃走，2 师奉命火速赶到范家庄、盛家屯和康家屯一带设防，并准备向突围敌军施行追击。但在我围城部队的猛烈炮火下敌突围未成。17 日，长春守敌国民党 66 军军长曾泽生被迫起义；19 日，郑洞国率国民党新 7 军军部向我投诚。长春围歼战结束。此时辽西战场正在激战，我围攻长春的主力部队快速转战沈阳。2 师奉命围歼在法库以南地区窜扰的敌一骑兵旅，欲与兄弟部队一起合围时敌人逃走。后在辽河北岸阿其堡与逃窜的敌 196 师运输团的一个营遭遇，即刻展开战斗，全歼了这个运输营，缴获了其全部武器和辎重。而后奉命继续向沈阳方向进发。11 月 11 日清晨，行至沈阳北部下坡子时，获悉沈阳已基本解放。11 月 12 日战役结束，骑兵 2 师胜利凯旋，回通辽休整。与此同时，参加平津战役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 11 师、16 师，为适应决战需要，乌兰夫请示东北军区同意，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成察锡军区，乌力吉敖喜尔任司令员、苏克勤任政治委员，统辖 11、16 师。11 师和 16 师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11 师由毕力格巴图尔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6 师由寒峰代理师长、刘景平任政治委员。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参加平津决战的部队配属华北 3 兵团指挥。其总的战斗任务是同察北骑兵旅和北岳军区地方兵团协同，解放张北、宝昌等察北广大地域，从北面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阻击察北敌南下援张，同时堵截张家口敌人突围北上后西逃，保证主力攻取张家口，全歼守

敌。11 师与兄弟部队配合攻取张北，16 师和兄弟部队协同解放宝昌。

1948 年 11 月上旬，11 师奉命赶到张北进入指定作战位置。11 日清晨，11 师前卫部队在张北城东南侧发现敌运输车队，经请示华北 3 兵团领导决定，协同兄弟部队先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扫清张北外围，然后取张北县城。按此作战意图 11 师与察北骑兵旅和北岳军区部队各自进入位置，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敌运输车队猛烈开火，敌多部运输车被击中起火，护送运输车的敌人未敢正面与我交锋，仓慌逃回了张北城。11 师和兄弟部队一鼓作气，乘胜把张北城包围。15 日拂晓对张北县城守敌发起攻击，守敌顽抗，仗打得很激烈。开战 10 多分钟后，我用炮火摧毁了敌人设在东城墙上的火力点，并炸开了城墙，担任主攻任务的北岳军区步兵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我 11 师骑兵也相继乘马冲进城里，与兄弟部队一起，逐街逐巷与敌拼杀争夺。经 10 小时苦战，除一小股敌人从城南门窜出又被我察北骑兵旅包围消灭外，大部守敌被歼灭在城内。张北一仗，我牢牢控制了张家口通向绥远的要道。为确保张家口守敌不能西逃绥远，我骑兵 11 师在张家口西北侧的狼窝沟、集沙坝一带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截击敌人。12 月 22 日，我主力部队在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 35 军。傅感到张家口已守不住，密令张守军突围西撤。守敌为了突围，向我围城部队西北部阵地猛扑，试图打开缺口，但我围堵严密，突围未成。此时流窜在张家口西北部的鄂友三骑兵旅两千余人，朝狼窝沟、集沙坝我 11 师阵地移动，妄想接应张家口守敌突围。我 11 师和兄弟部队把其挡在狼窝沟北山脚下，并给予猛烈打击。鄂部知难而退，致张家口守敌突围绝望。

我骑兵第 16 师奉命向宝昌进军，1948 年 11 月 12 日全师部队集结在宝昌以北约 40 公里的章盖湾村，作攻取宝昌城的战前动员。宝昌是张家口东北侧约 150 公里处的一战略重镇，敌人作为一个重要据

点布有 2000 多人的兵力把守。16 师进入攻取该城的作战位置不久，在辽沈战役中脱逃的苏和巴特尔率领的国民党东北骑兵第 1 旅 2000 余人窜入锡盟。为保我察锡根据地后方安全，乌兰夫征得华北 3 兵团领导同意，急调 16 师回师锡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截击苏和巴特尔残部。16 师回师刚上路，遇上宝昌守敌倾巢而出，在我军背后骚扰，策应张家口守敌，掳掠牛羊和粮食。根据敌情的这一变化，察锡军区令 16 师先消灭宝昌出城敌人，后取宝昌，再北上截击苏和巴特尔残部。13 日晨，16 师与宝昌出城敌人接火，经过激战，敌受重创后缩回宝昌。我 16 师打扫完战场，准备起兵围攻宝昌时，得悉苏和巴特尔残部南来，企图与宝昌守敌汇合扼守宝昌。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改变 16 师作战计划，先截击苏和巴特尔残部，缓取宝昌。12 月 23 日凌晨，16 师赶到苏和巴特尔残部所在正蓝旗与宝昌县交界的巴格来村，很快对敌分割包围。当敌人发现已被我包围后，拼命突围狂逃。我铁骑勇士追杀 40 公里，毙俘敌百余，缴获战马 200 多匹和大量武器弹药。苏和巴特尔带少量人马西逃。此时，宝昌守敌自感宝昌难守，弃城而逃。

24 日我主力攻下张家口，守敌除少数窜出逃入察锡草原外，全部被歼。我骑兵 11 师、16 师奉命追歼逃入察锡草原的残敌，不使其西逃绥远。11 师和 16 师的勇士们,纵马千里草原，迂回、包抄、追杀残敌。逃窜出的残敌大部被我歼灭，或被迫缴械投降。11、16 师胜利完成了追歼逃敌的任务。

1949 年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参战的骑兵第 11 师、16 师，为这一战略决战的全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乌兰夫对平津战役的回忆中所说:“他们发挥了骑兵部队勇猛、神速、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英勇杀敌，艰苦奋战，为平津战役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这是内蒙古骑兵部队的光荣，也是内蒙古民族的光荣。”

此后，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又担负了剿灭草原顽匪的战斗任务。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内蒙古一些民族败类投靠了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与人民为敌，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我内蒙古解放区大肆进攻，烧杀抢掠，做尽了坏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时候，他们又逃窜到内蒙古草原，残害人民，扰乱我解放区后方。其中人数最多，危害最大的是苏和巴特尔匪帮和胡图凌嘎匪帮。

苏和巴特尔匪帮是从辽西围歼战战场上逃出来的国民党骑兵第一旅。他们由辽西进入卓索图和昭乌达盟，在昭乌达盟又搜罗了韩桑杰股匪。韩匪在翁敖联合旗被我发现，乌兰夫令新组建的骑兵第 10 师剿灭。10 师迅速地就地解决了这一股匪。苏匪继续西窜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和乌兰察布盟，沿途被我围追堵截，最后他带残部沿中蒙边界线逃去了阿拉善。阿拉善和平解放后匪首苏和巴特尔归案受惩。

胡图凌嘎匪帮是国民党即将灭亡的时候，于 1948 年 10 月在张家口建起的“蒙边骑兵总队”。胡图凌嘎是西乌旗小王爷的老师，思想很反动。日本投降后他投向大蒙奸李守信，拉起土匪队伍，曾一度占我开鲁县城。1947 年 3 月我解放开鲁，他被俘，经教育后释放。后来他又同布利亚特叛匪额仁钦道尔吉勾结，组织土匪武装在多伦一带作恶。1948 年 4 月我收复多伦，他又被俘，经教育后再次释放了他。但他不思悔改，顽固不化，10 月又同叛匪额仁钦道尔吉一起组织土匪队伍，自任副司令。此后他带这伙匪帮，在锡林郭勒草原四处流窜，抢劫群众牛羊和财物，袭击我机关，杀害我干部，特别是 1948 年 12 月 4 日在东阿巴嘎旗沙布尔台袭击我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开会回程的察盟干部，致使我察盟工委代理书记肖诚和盟长苏剑啸等 27 名同志遇难。胡匪已成察锡草原的一大祸患，必须尽快除掉。内蒙古人

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委托副司令员王再天，在贝子庙专门召开剿匪会议，决定成立剿匪指挥部，由王再天任总指挥，调骑1师等部队到察锡盟集中力量剿灭胡图凌嘎匪帮。

1949年5月27日，乌兰夫发出命令，要求剿匪部队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胡图凌嘎顽匪。根据乌兰夫司令员兼政委的这一要求，骑兵1师全部开进锡盟。军区警卫团也开进锡盟配合1师剿匪。在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剿匪部队对胡图凌嘎匪帮展开了合围追歼。在这种情况下，胡匪东藏西躲，人员日渐减少。跟随他的一些王公、牧主感到末日来临，开始分化。被裹胁的人逐步觉悟不想再替他卖命。而我剿匪部队掌握了情况和匪帮活动规律，再加地方政府和牧民群众的支持，彻底剿灭胡匪的信心和勇气倍增。各部队密切配合，紧追不舍，紧缩包围圈，连续给以打击，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6月1日，胡图凌嘎带残余匪帮逃到古尔本木那尔山一带，与逃窜到那里的达布苏(反动喇嘛）股匪会合。6月5日晨，我剿匪部队在东乌旗临近中蒙边界处发现了胡、达匪踪迹，抓住不放，跟踪追击。匪帮越过边界向蒙古方向逃窜。我剿匪部队追过边境线，在蒙古边防部队配合下，全歼了胡图凌嘎和达布苏两股残匪。

胡图凌嘎匪帮被消灭后，彻底铲除了草原匪患。草原上的牧民们，从此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

中央军委命令，内蒙古人民解放军自1949年5月1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归东北军区领导。从此，内蒙古人民军队正式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内蒙古人民武装部队由初建时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后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内蒙古人民武装部队从初建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历时3年多。在这3年多中，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领导下，由小到大，由旧到新，由弱到强。进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古军区，辖 5 个骑兵师和 1 个警卫团，即骑兵第 1 师、第 2 师、第 3 师(原第 10 师)、第 4 师(原第 11 师)、第 5 师(原第 16 师）和军区直属警卫团，共 1 万多人。自 1947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到 1949 年上半年两年的统计，内蒙古人民解放(自卫)军共作战 260 余次，毙、俘敌 19000 余人，缴获各种武器 8560 余件。作为一支地方性的少数民族人民军队，它除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决战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帮助下，解放了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还剿灭了流窜内蒙古草原名目繁多的土匪。

十七、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和经济恢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全国革命迅猛发展，内蒙古地区全境解放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对内蒙古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同时也相应地调整了乌兰夫的职务。在这一系列决策和调整中，最重要的是内蒙古党的领导机关由“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升格为中央派出机关——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分局对中共绥远省委有指导之责，乌兰夫主持分局工作。内蒙古的党组织自此不再叫“内蒙古共产党”，而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种变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它表明内蒙古的党和人民的觉悟已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即从思想和组织上都已同全国融为一体。它不仅反映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两年多的工作成效，也标志着在内蒙古实行全区域统一自治的基本条件已趋于成熟。很明显，党中央的决策，包括对乌兰夫职务的调整，都是为了便于推动和促使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早日实现，以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统筹内蒙古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这是一个关系内蒙古地区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对于这个大问题，乌兰夫深感责任重大。他思想上十分明确，无论党和人民给他加多少个职务，压多少副担子，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在内蒙古，主要是做好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的工作，把握好党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

内蒙古和全国一样，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但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是国民党遗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困难很多。对内蒙古来说，绥远和平解放，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留下了更多的国民

党残余势力;此外,还有历代统治者造成的蒙汉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乌兰夫就是在这样一种既形势大好又困难很多的情况下,进入坐镇内蒙古分局又身兼多职的角色,担负起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内蒙古地区的领导重任。

在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建立前,他已开始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把内蒙古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城市和生产建设。1949 年 8 月 29 日,他在内蒙古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时着重讲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在分析了内蒙古的情况,讲了自己对二中全会精神的认识后,他说:现在“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牧)民、工业和农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内蒙古“工业极少,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在现有的小城市中只有些商业、手工业和极少数使用小机器的小工厂。”“内蒙古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是中国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要把内蒙古经济和整个中国联系起来看,要把内蒙古的农村、草地和沈阳、天津、北京、上海联系起来看,要看到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所起的直接作用,要看到全国的城市与工业对内蒙古农村、草地所起的直接作用,这就是城市领导乡村和草地。”“内蒙古的工业必须在全国工业恢复发展之后,才能在全国工业的帮助下逐渐发展起来。”“城乡结合问题在内蒙古也表现为与全国经济建设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在全国恢复和发展工业的任务中,内蒙古的经济应如何分工,并与之配合,为工业服务。我们自己应作什么,才对全国工业化有好处,同时又对内蒙古的民族经济、人民生活有好处,又能提高内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内蒙古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发展农村与草地的供销合作社……要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来努力发展农、牧、林业和(供销)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积累资本、培养干部

和提高技术，准备将来在全国工业的帮助下建设内蒙古的工业。”“总之，目前内蒙古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牧、林业和(供销）合作社上，由此积累资本从事工业建设；必须参加全国经济中的分工并与工业发展相配合，为全国工业化服务，将来在全国工业的帮助下建立近代工业。发展农、牧、林业和合作社，繁荣蒙古民族经济，积累资本，建立工业，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基本任务。”

乌兰夫在这次讲话中，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在内蒙古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几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这就是:城乡兼顾，工农牧业紧密联系；内蒙古经济是全国经济的一部分，置内蒙古经济于全国经济之中，并与之紧密配合，为全国工业发展服务，又求全国支援发展自治区的工业；内蒙古经济的重点(当时）是农、牧、林，而牧业是内蒙古的特点经济，它同农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种类一样要长期存在和发展；要靠发展农牧林，勤俭节约，积累发展工业的资本。这些观点很符合内蒙古的实际。它不仅在内蒙古的经济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950 年 1 月 22 日，乌兰夫在察锡盟工作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发展畜牧业和贸易合作社问题。在谈到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的中心任务时，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人畜两旺’。”“察锡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项工作离开这个中心都是错误的。经济繁荣了，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政治上解放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只有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文化得到提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发展生产的中心问题是发展畜牧业……农业有前途可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农业，畜牧业同样有前途可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畜牧业，（使）落后的草地变成进步的草地，把封建统治下的草地变成人民自己的草地，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的草

地。”在谈到贸易合作社时他说:“贸易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察锡两盟的畜牧业服务。”“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群众购买力提高，从而我们求得利润，积累财富，并用之于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国营贸易的基本方向是如何认真地扶持群众性的合作社。合作社不仅起交换调剂有无的作用，而且是组织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组织……经过合作社真正给群众解决了切身利益后，群众就体验到共产党的领导，新政权的建立给他们的好处。所以我们提出由经济到政治，经过经济工作与经济的发展，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在这次讲话中，乌兰夫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察锡盟的实际情况，除更充分地叙述了他在地委书记会上讲的那些主要观点外，又讲了繁荣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政治上解放和发展经济、提高文化的关系。阐明了政治上解放后，为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提高了，生活改善了才能算是真正解放的观点。同时对国营贸易提出了并非单纯的做买卖(交换、调剂有无)，而要通过经济活动宣传党的政策，让人民群众从得到的切身利益中，加深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认识，也就是他说的“由经济到政治”，经过经济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这一观点赋予了国营贸易组织和工作者以经济、政治双重责任，提高了他们对自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更加自觉地做好经济工作。

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乌兰夫考虑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问题。他在想: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的原则在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定了。随后，东北在行政区划调整时撤销了辽北省，原由辽北管的哲里木盟和热河管的昭乌达盟交给了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东部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中西部，撤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已

在拟议中。在这三省中，比较难办的是绥远，因为这里解放得晚，民族关系和社会情况都比较复杂，而且是整个一个省的问题。绥远和平解放后，乌兰夫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分局建立时，确定了分局对绥远省委是指导关系；不久，又批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西移，暂驻张家口。所有这些作法，显然都是为给解决绥远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应该说中央该做的事都已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看自己怎样去做工作。乌兰夫的基本想法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54 年 6 月 5 日，乌兰夫在中央民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发言中谈到蒙绥合并时有这样一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全境获得解放，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为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对内蒙古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给予了大力帮助，使各项建设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大大地改善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对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给予了正确领导和有力帮助。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来看，1949 年以前，只辖呼、纳、兴、锡、察五个盟。1949 年东北撤销辽北省建制时，将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及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内蒙古。这就使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的蒙古族聚居区都辖于自治区之内。这时摆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问题了。经中央决定，自治区首府于 1949 年末由乌兰浩特迁至张家口，1952 年 6 月迁到原绥远省归绥市，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领导西部地区的民族工作。

由于原绥远省在历史上是蒙汉杂居的地区，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民族关系。1949 年 9 月 19 日原绥远省全境解放后，虽然民族压迫制度

已经废除，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旗、县政权并存与不应有的农牧矛盾问题，仍然阻碍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互助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影响蒙汉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需进一步消除。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各族人民的团结，对祖国有计划的建设事业都是不利的。因此，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祖国建设事业出发，中共中央蒙绥分局于1954年1月13日向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提出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建议，深得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月28日204次政务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至此以呼和浩特为中心，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在700万左右的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上形成了。蒙古族人民几百年来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很明显，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是蒙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创造的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

这段话是事后讲的。取得这样的成果很有一段过程，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定了“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后，就酝酿如何实现这一既定原则。1950年1月间，周恩来总理通知乌兰夫进京专谈内蒙古自治区划界问题。乌兰夫偕刘春一同前往。周总理听了乌兰夫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从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的简要情况汇报后，就问了乌兰夫与内蒙古相邻省份习惯线情况。乌兰夫只说了“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照顾现实”这样两条原则。他的意思就是在“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个大前提下，在与毗邻省份具体划界时，要考虑和兄弟民族间长期形成的多方面联系及地域交错的实际情况，应顾及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和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可斤斤计较。周恩来总理很欣赏乌兰夫这两句话，一再称道“尊重历史，

照顾现实”，这个原则好。于是，他立时顺手在地图上划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轮廓。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界限，就这样大致上圈定了。

乌兰夫和刘春要离开时，周总理又提醒乌兰夫，内蒙古分局对绥远省不是有指导关系嘛，你们可以就这种关系找适当机会和绥远的同志直接谈谈，以使双方思想上都事先有所准备。同时还提醒说:“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划定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界限，关键在绥远。热、察两省是局部的，绥远是整个一个省，难度比较大。你们要知难而上，工作要细。乌兰夫很感谢周总理的关心和提醒，这次谈话长时间萦绕在他耳边。

“知难而上”，“工作要细”。在中南海谈话后的一段时间里，凡有机会和绥远的同志接触，乌兰夫就讲绥远的民族问题，目的是下毛毛雨，把工作做细。

1951 年 9 月 30 日，乌兰夫赴京参加建国两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 10 月 23 日开幕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华北局领导同志又给乌兰夫谈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迁归绥和蒙绥合并的事。11 月 1 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乌兰夫办完北京的事即赶回张家口转赴归绥，参加绥远省委研究绥远土改的常委会议。在省委常委会上，乌兰夫除讲了在土改中要注意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间在土地问题上的关系等意见外，同时传达了周总理和华北局领导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迁往归绥和蒙绥合并问题的指示。传达后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趁热打铁，和绥远省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商讨了实施意见，当即发电报报告了华北局，并请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乌兰夫觉得事情办得很顺利，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张家口，很快把喜讯传达给了分局和自治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以使他们分享喜悦。

12 月 31 日，乌兰夫赴北京参加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第二天，即 1952 年元旦到怀仁堂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团拜。毛泽东见到

他后就关切地问:“你搬家了吗?”他顺口答:“还没有。”主席转身问站在身边的薄一波:“这是怎么回事?”薄答:“有关领导同志思想不通，还不同意。”毛泽东当即严厉地说:“谁不同意?谁不同意就撤谁，有几个不同意的就撤几个!”这时候在场的周恩来出来说:“主席尽管放心，这事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我再去做工作。”随后，周恩来总理趁中央民委开会有关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都在北京的机会，亲自出面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专门研究蒙绥合并的有关问题。会上，思想不通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总理有针对性地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意图，批评了一些同志的错误想法，突出地讲述了毛泽东主席在蒙绥合并问题上“开两扇门”的思想。即:一扇门是蒙古人民欢迎汉人进去开白云鄂博铁矿，在包头建设钢铁企业;再一扇门是汉人支持蒙绥合并，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经周总理耐心做工作，使原来思想上不通的同志提高了认识，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迁归绥和蒙绥合并铺平了道路。在做通工作的基础上，乌兰夫和华北局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再次去归绥，与绥远的同志共同研究有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很快达成了共识。当即由乌兰夫将商谈的一致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及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同志。5 月 11 日，华北局根据乌兰夫的报告，征得周恩来和李维汉同志同意后，给中央写了《关于内蒙古与绥远工作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中明确地写了四条解决办法。其内容是:

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内蒙古军区一级机关全部迁驻归绥市;

二、接受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辞职申请，由乌兰夫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仍为副主席。

三、绥远省人民政府由政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但各有重点，省的一般行政事宜和非民族自治区工作的领导重点

在中央，辖区内各盟旗民族事务领导重点在内蒙古；

四、苏谦益、杨植霖参加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任委员，苏谦益任分局副书记，乌兰夫兼任华北局副书记。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上述四条。

紧接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作出相应决定，即:一、绥远省人民政府由本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双重领导，但各有重点，省的一般行政事宜和非民族自治区工作，领导重点在中央，辖区内各盟旗民族事务领导重点在内蒙古。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机关即由张家口迁往归绥市。三、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辞职已照准，遗缺由乌兰夫兼，苏谦益、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任副主席。杨植霖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根据党中央和政务院的上述决定，1952 年 6 月 27 日，乌兰夫率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迁往归绥市。当列车抵达归绥时，绥远省和归绥市党、政、军领导和机关干部及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前往车站欢迎。当天晚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苏谦益致欢迎词。乌兰夫即席讲话。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的干部及各界代表齐集一堂，充满着春意融融的民族大团结的热烈气氛。

7 月 5 日，乌兰夫就职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与副主席苏谦益、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一起参加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除了讲形势，肯定绥远省过去的工作外，着重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突出地强调了民族团结，要求各民族同心协力，满怀信心地迎接经济建设的新任务，响亮地向全省各族人民发出了为建设团结、富强的新绥远而奋斗的号召。

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归绥市不久，为了加强党对蒙绥地区的统一领导，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报请中共中央批准，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中共绥远省委合并，建立中共中央蒙绥分局，乌兰夫任书记，苏谦益任副书记。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同月中央军委决定，内蒙古军区和绥远省军区合并，建立蒙绥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把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先统一起来，在名称上保留着一个“绥”字，其目的是既解决统一领导，便于包括绥远省在内的内蒙古地区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部署与协调，又照顾一些干部对将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一时思想上还不完全通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能有一段逐步转变认识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先把党和军队工作统一起来，主要领导集于乌兰夫一身，这就便利了各方面工作的协调和过渡。在行政建制上虽然仍保留着绥远省人民政府，但已明确它由政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实际上绥远省已置于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之下，只不过是暂时保留着省的建制，而省主席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兼任，这就等于在行政管理上也已经统一了起来。

行政建制和领导关系的交错，是使绥远和内蒙古在组织和思想上能逐步融为一体，让双方都有一个适应过程。乌兰夫和以乌兰夫为书记的蒙绥分局，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华北局和党中央领导和支持下，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干部及群众中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教育。乌兰夫每在重要会议或群众集会上讲话时，都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讲民族问题。1952 年 9 月召开绥远省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作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会上除作工作报告外，又以“民族问题”为题作了专题报告。在报告中，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历史到现实，结合实际讲绥远省民族问题的现状和特点；在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把民族问题讲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新中国建立后在我国形成的新型民族关系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少数民族

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他的报告深入浅出，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启发、诱导、提高干部和群众对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认识。在这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他特意邀请到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座谈，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暨绥远省各族各界人民欢迎中央访问团的大会上，在内蒙古自治区暨绥远省、归绥市各族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 周年的大会上，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绥远省人民政府、归绥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 1952 年除夕干部联欢大会上，在 1953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6 周年大会上，乌兰夫都发表演说，除了讲形势和任务外，都讲民族问题，反复论述党的民族政策、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自治，以逐步提高干部和群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迁驻归绥后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干部和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1953 年 8、9 月间，乌兰夫主持中共蒙绥分局会议，传达并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关蒙绥合并问题的谈话，首先统一党内领导层的认识。在学习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蒙绥合并，“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的决策是正确的，周总理讲的“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原则是切合实际的。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分局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直属机关高级干部座谈会。乌兰夫主持座谈，并在会上发言。在发言中他说:“蒙绥合并是解决内蒙古和绥远民族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贯彻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措施。”同时指出: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机构重叠，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包括绥远在内的内蒙古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长远发展。经过充分酝酿，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于 1953 年先行合署办公。根据内蒙古自

治区领导机关迁驻归绥后，以乌兰夫为书记的蒙绥分局所做工作的情况，1954 年初，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建议。蒙绥分局在乌兰夫主持下认真讨论了华北局的建议，表示完全拥护，并决定提请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1 月 11 日至 17 日，召开了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乌兰夫出席会议并以省主席的名义提议讨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建议。经过充分讨论后，会议作出了《拥护华北局关于〈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议〉的决议》。1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这一《决议》。据此，3 月 5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省军政委员会、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一致通过 1954 年 3 月 6 日正式撤销绥远省建制，其辖区归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决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签署布告，公诸于众。随着绥远省建制的撤销，党的领导机关于 3 月 15 日由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又改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4 月 25 日，自治区首府归绥市改用蒙语原名呼和浩特。

在解决绥远问题的前后，为了实现“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依照“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除乌兰夫积极同有关方面沟通外，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在关心着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这就是:1949 年 9 月，将原由察哈尔省管辖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2 年 10 月，撤销察哈尔省，原由内蒙古自治区代管，行政建制上属察哈尔省的锡林郭勒和察哈尔盟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5 年 7 月，撤销热河省，将原由热河省管辖的翁牛特左旗、翁牛特右旗、喀喇沁旗和赤峰县、宁城县、乌丹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这时候，以呼和浩特为中心，东西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形成。

解放初期，为了加强党对行政管理上还不统一的内蒙古地区的领导，以促进全区域统一自治早日实现，中共中央在内蒙古设了其派出机关——内蒙古分局(在蒙绥未正式合并期间称蒙绥分局)。这时候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鉴于此，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改设省一级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仍是乌兰夫。从此，内蒙古自治区党的领导，进入了与其他省、市相同的组织序列。

此后不久，1955 年 11、12 月间，原甘肃和宁夏两省合并为甘肃省时，原归宁夏管辖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自治旗的部分群众，要求将他们的自治州和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巴彦浩特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和额济纳自治旗人民委员会(即政府)，分别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群众的要求。甘、宁合并后的甘肃省同意一州一旗的意见并上报了中央，中央就此事征求了内蒙古自治区意见。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巴彦浩特自治州(含阿拉善和磴口）和额济纳自治旗地处内蒙古西端，与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毗连。额济纳自治旗居住的主要是蒙古族的和硕特部。自 16 世纪中期起，清王朝在这里分别设了额济纳特别旗和阿拉善特别旗，直接隶属中央政府。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后来划归甘肃省。额济纳和阿拉善两个特别旗，同内蒙古其他盟旗一样，虽然历史上曾长期被分割分治，但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同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居住的地域又紧密相连。依照“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考虑，这一州一旗群众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乌兰夫很理解群众的心愿，在他主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了这一问题，一致认为应该满足这部分蒙古族群众的要求，故而决定请巴彦浩特自治州州长达理扎雅和额济纳自治旗旗长塔旺扎布来呼和浩特，一起面商有关问题。1956 年 1 月初，达、塔到

呼和浩特，乌兰夫亲自接见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关于这一州一旗情况的汇报，共同商量了有关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2 月初，派以王逸伦为首的工作组赴兰州，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同甘肃省委、政府领导同志共商此事。经过反复协商，就将这一州一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决定把双方的一致意见由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分别报告中央。4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将这一州一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这一州一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建立了巴彦淖尔盟，辖额济纳旗、阿拉善旗、磴口县和巴彦浩特市。

6 年以后，穿插内蒙古兴和县、察右后旗与化德县之间的河北省商都县，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毗邻交错的旗县不断发生边界纠纷和农牧矛盾，甚至曾出现双方农牧民间殴打伤人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 1960 年起，内蒙古自治区与河北省有关部门和地区曾多次派人调查、调解和商谈，但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民族团结和群众生产，乌兰夫对此十分关注。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由中共中央华北局派人牵头，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有关部门及地区负责人参加，组成专门工作组，深入实地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群众生产出发，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反复商谈后，达成了将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一致意见。经报请国务院批准，1962 年 7 月 1 日商都县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从此，彻底解决了这一地区的边界纠纷和农牧矛盾，加强了民族和地区间的团结。

自 1949 年春毛泽东拍板“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1950 年乌兰夫提出被周恩来认可的“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后，到 1962 年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历时 13 年，才落实了“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形

成了在我国版图上横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面积近 120 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在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 13 年中，有两个大跨步、两项稳过渡和一次小收尾。这就是:蒙绥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和西端历史上的两个特别旗划入，先后撤销察哈尔省和热河省，河北省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首先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这是我国蒙古民族发展史上极其灿烂的一页。它不仅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造福了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

1949 年底到 1955 年 7 月，乌兰夫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含蒙绥分局）书记的 4 年半中，和分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着包括绥远省在内的内蒙古人民，除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内蒙古地区统一自治外，取得的再一重大成绩就是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和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人民共和国的这段历程是艰难的。内蒙古这一作为祖国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就更加艰难。

就全国而言，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而它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困难，还有国外敌人的侵略和国内敌人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党、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应对了所有挑战，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经，战胜了经济困难，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根本好转。再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为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国际和平环境；在新解放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反运动，大张旗鼓地镇压

了反革命，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秩序，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社会环境。这三大运动的开展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的胜利，进一步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它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三大运动”的开展与胜利，使全国各族人民为之一振，极大提高了工人、农民和各民主阶层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恢复与“三大运动”及其他社会改革同步。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最高水平 1936 年的 20%，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也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国民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同祖国紧紧相连，它随着全国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其不同处就在于它是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内地更落后，各方面的困难更多、更大。凡是全国开展的工作内蒙古全部开展，但在工作中乌兰夫很注意内蒙古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这段时间里，内蒙古同全国各地一样，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三大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乌兰夫多次在党员、干部和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给他们以启发和教育。随着运动的深入，通过广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祖国观念，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内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城镇、农村和牧区到处都是抗美援朝的浪潮，工人、农民、牧民和各界人士同仇敌忾，誓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努力生产，积极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

义侵略。在这里顺便提一件感人至深的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侵略者展开激烈厮杀时，骑兵部队战马不足，周恩来总理向乌兰夫提出请内蒙古支援。乌兰夫考虑内蒙古牧区马有的是，但上战场需要训练，为应前线急需，决定让内蒙古骑兵一个师“下马”，把训练有素的战马让出来，送到朝鲜前线。乌兰夫这种从祖国大局出发，一切服从朝鲜前线需要的精神和做法，使周总理很受感动，对此举曾赞不绝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新解放地区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内蒙古地区主要是绥远省。当时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对中共绥远省委有指导关系，但绥远省行政建制依然存在。乌兰夫以内蒙古分局书记身份参加了绥远省研究新区土改问题的常委会议。在常委会议上，他结合内蒙古东、中部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就绥远新解放地区土改问题发表了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其中特别是对土地交错的蒙汉杂居区，在土改中如何妥善解决蒙汉族农牧民间土地关系问题，讲得十分透彻。乌兰夫的意见被吸收进了《绥远省蒙旗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草案） 中。《实施办法》（草案），除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精神和政策外，从绥远省蒙汉杂居，农牧交错的实际出发，又作了若干补充规定。其中主要是根据不同经济情况，按农区、半农半牧区的不同类型，分别规定了土改的不同政策和不同做法。这就是:农业区，按全国统一规定进行土地改革，但不分蒙古族小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等；在半农半牧区，适当调整蒙古族大地主的土地，保护畜群，保护牧场；在牧业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区，组织联合土改委员会，配备适当数量的蒙古族干部，发动蒙汉族群众联合起来进行土地改革，采取蒙汉群众一同号召，分别发动，先汉后蒙，联合斗争的作法。这些符合地区和民族特点的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了

乌兰夫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保证了不同类型地区土地(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既达到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特权，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目的，也缓解了农牧矛盾，促进了牧业生产，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

内蒙古的镇反运动和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都是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进行的。在镇反中，乌兰夫一再讲要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稳、准、狠，特别强调掌握政策，最重要的是不要错杀人。镇反运动不仅消除了社会上的反动余孽，也消除了长期危害群众的匪患，使农村、牧区的蒙汉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1952 年上半年，内蒙古同全国各地一起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乌兰夫多次作动员报告，在运动高峰期也曾出现下达打“虎”(指贪污犯）指标，限期完成任务的过头作法。但到运动的中、后期，对证材料、追退赃款、定案处理时，乌兰夫一再强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材料，严禁逼供信”。通过“三反”，使内蒙古自治区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防腐教育，普遍提高了拒腐蚀的能力。内蒙古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几乎没有像样子的工商企业，“五反”只在几个有些小型工商业户的小城镇进行。但在运动推开后，同样提出了私营工商户不少唯利是图的不法行为。问题虽然不像大城市揭出的那样惊心动魄，但其性质是一样的，也使党员和干部很受教育，提高了他们对党对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认识。私营工商户也受到了教育，增强了他们爱国守法的意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紧接着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使内蒙古的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牧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在斗争实践中更加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更加激发了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的热情，更加提高了他们建设新中国，建设新内蒙古的积极性。乌兰夫和内蒙古分局不失时机地把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了生产建设上来。1952

年 4、5 月间，乌兰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内蒙全区的中心任务是增产节约，其他各项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这次会议后，在内蒙古很快兴起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1950 年 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向全党和全国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口号和总任务。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发表的书面报告中讲“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达到这一目标。

乌兰夫是个善于思考问题又扎扎实实做工作的人。七届二中全会后，他及时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在内蒙古很快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了生产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后，在他的思想上更加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现实的奋斗目标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达到这一目标，正是为了给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内蒙古当时的情况是全区域统一自治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就内蒙古分局来说，当时直接管的只有锡、察两盟，东部几个盟设有分局领导下的东部区党委，西边的绥远省，分局对省委是指导关系，所以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分局既难统一部署，又难直接指挥，除直接领导的察锡两盟外，只能是提出要求，督促东部区党委和绥远省委去操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领导，在推进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和完成“三大运动”等项任务的同时，他一直为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运筹、操劳。1950 年以后他思想上的一条主线就是生产，可以说是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一有机会就讲，耐心地启发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让这一中心深入人心，成为自觉行动。

1949 年 12 月 27 日，在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他提出:绥远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整顿旧军队，剿匪除奸，安定社会秩序，着手恢复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目前在

绥远很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打下工业建设的基础。”

1950 年 1 月，他在察锡盟工作会议上讲:“察锡盟基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项工作离开这个中心都是错误的。经济繁荣了，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从理论上阐述了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牧业和农业一样要长期存在，“可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畜牧业”。

1950 年 8 月，乌兰夫去内蒙古东部区，在东部区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恢复发展农牧业生产是东部全党的中心任务”；同时要“整顿恢复城镇的工商业，发展供销合作”；针对当时东部区大旱的情况提出“要做好灾区的生产自救”。

1951 年 1 月 24 日，在内蒙古分局扩大的干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他指出:“在农业生产上不以开荒为主，以精耕细作为主”，“组织起来，使农业生产与副业生产相结合，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在牧业上“放牧自由”是牧业生产中的一项基本政策。……牧业经济较之农业经济的散漫性更大，要发展牧业经济，改善牧民生活，必须根据群众觉悟加以领导，才能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半农半牧区，由农牧并重的方针，改为“保护牧场，禁止开荒”。发展畜牧业不应当仅仅依靠蒙古族群众，汉族也要搞畜牧业，……这样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在生产中就产生了感情，因为有了共同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就解决了民族矛盾。对贸易与合作(销）社，他提出，“加强区内的物资交流，组织短距离的交流，使国营贸易很好地扶助合作社，并引导私商纳入轨道。”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不长的时间里，乌兰夫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这些讲话，一再强调在内蒙古地区的生产和经济恢复与发展中，要以农牧业生产为中心。与此同时，他除重申农牧业生产方面行之有效的已有政策外，又提出在半农半牧区“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提倡汉

族农民也搞畜牧业，通过生产和经济上的联系，增进蒙汉族群众间的感情以减少农牧矛盾而解决蒙汉民族间的矛盾。在农业生产上，他提出“精耕细作”和“农副结合”。并从理论上阐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前途，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他的这些新思路，很快被党员、干部和农牧民理解和接受，在内蒙古地区生产和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收到了显著效果。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52年内蒙古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已发生明显变化，并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时候，乌兰夫开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内蒙古地区各项生产事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1952年1月20日，乌兰夫在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内蒙古“在经济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因而鼓舞了内蒙古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劳动积极性。”“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实行自由放牧、增产增畜政策，大力提倡并推动防疫、打狼、调剂种畜、改善牧畜方法，打草、打井、搭圈棚，发放大量贷款，因而使牲畜繁殖率普遍上升”。

1952年4月30日，他在庆祝“五一”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大力发展了农业和牧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上，产量已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在牧业生产上，现在牲畜数字已较解放时增加将近一倍。”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我们提出并执行了“人畜两旺”政策。在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贯彻了自由放牧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牧业生产的措施。特别是我们的政府与群众的力量，组织了农牧业生产的相互支援。”

在半农半牧区，“实行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号召蒙汉农牧民直接在生产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从发展生产的原则出发；

以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半农半牧区农田和牧场所存在的矛盾”。“明确了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途，并摸出一套增畜保畜的经验和政策”。“内蒙古农牧业生产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采取了正确的贸易政策，普遍建立了为发展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国营贸易机构与合作社。”同时，在这次讲话中，还发出了在内蒙古全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特别是爱国生产、增畜竞赛运动的号召。

1952 年 11 月 21 日，乌兰夫在政务院第 159 次政务会议上汇报建国 3 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重点讲了经济恢复和发展。他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基础原来是极其薄弱的。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坚持贯彻了大力发展农、牧、林业，贸易、合作社等经济事业，为发展工业准备条件的方针。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3 年来，在各项生产事业巨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了农具、皮革、发电、粮米加工等小型工业，并在中央领导帮助下开始筹建大型工业。”“农业生产，在 1947、1948 年完成土地改革后，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贯彻‘组织起来，互相合作’的方针，大力提倡精耕细作，改进技术，兴修水利，发放贷款，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 年部分地区曾发生水、旱灾害，1951 年全区又遭受了相当普遍而严重的旱灾，致农业歉收。我们坚决执行了生产自救的政策，使灾区群众渡过灾荒，并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旱和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牧业区，在废除了封建特权，进行了若干必要的民主改革后，3 年来继续贯彻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自由放牧、增畜保畜’的总方针与‘牧工、牧主两利’的工资政策和使牧民休养生息的轻税政策，以及为进一步发展牧业生产，采取了打狼、打草、打井、防灾、防疫、防火等办法外，更积极提倡定居游牧，提倡和推行牧民间放牧经营的互助组织、走敖

特尔、试行合同制的苏鲁克、勘查与调剂牧场，改善饲养管理等具体有效措施，开展了爱国增产保畜竞赛运动，因而使牧畜得到增殖，由1947年到现在增加一倍，其中1949年到现在增加64%。”“在半农半牧区，继续贯彻了‘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批判了‘重农轻牧’、‘牧业落后论’等错误思想，明确了半农半牧区的发展方向，划清了农田牧场，使各族人民更加团结，生产得以顺利发展。”林区“实行了合理采伐，改善经营管理，普遍推广降低伐根，利用梢头木，保留母树，清理林场，采伐迹地更新，使林业有了迅速发展。”“3年来，由于各项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为改善，购买力显著提高。……财政情况也有了根本好转，1949年财政收支已达到平衡，其后每年都有一定结余，自1950年起，已从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的补贴状况转为向中央上缴……能有重点地投资在适合于自治区发展的工业、文教、卫生等建设上去，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自治区各方面建设的迅速发展。”

1953年1月1日，乌兰夫在《内蒙古日报》发表文章，全面总结了恢复发展内蒙古畜牧业经济的经验。文章一开篇就讲牧业经济的重要性，紧接着分析了历代统治者和日寇统治时期给内蒙古畜牧业造成的严重破坏。接着谈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已采取的措施。但因为受战争影响和土匪抢掠，到1948年还未能制止牧畜数量的下降。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经济，改善牧区人民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牧业经济的政策，其中包括保存牧主经济，在牧区民主改革中，提出了削弱封建，废除牧主阶级的封建特权，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自由放牧、增畜保畜”等适合牧区特点的政策。继而又提出“人畜两旺”，“保护牧场，禁止开荒”。1951年开始提倡“定居游牧”，实行“轻税政策”，国营贸易机

构和合作社扶助畜牧业等有利于牧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然后他接着说，由于实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提高了牧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加速了牧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 1952 年全区牲畜总头数与自治政府成立的 1947 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发展最快的呼伦贝尔盟超过了将近两倍。然后，他说:“恢复与发展畜牧业是一种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它不但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针，而且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内蒙古的畜牧业所以能迅速恢复与发展，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出四条主要经验，这就是:其一，在确定牧区各项工作的政策方针时，必须从牧区的实际情况和牧民的迫切要求出发，稳步前进；其二，组织工农牧业的相互支援，尤其是要以农助牧；其三，广泛吸取和推广群众饲养管理与畜牧兽医的先进经验，使技术与群众相结合，与群众一起共同解决畜牧兽医中存在的问题；其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增畜保畜竞赛运动。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发展畜牧业生产提出了八条要求:即:一、提倡和推行在牧业生产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二、继续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一方面坚持“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保护私有，鼓励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同时在畜牧业生产发展过程中要适当提高牧工待遇，改善牧工生活；三、提倡定居游牧，改善牧民生活环境，达到“人畜两旺”；四、在半农半牧区认真执行“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划定农田和牧场界限，避免农牧矛盾，解决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五、开展爱国增畜竞赛运动，奖励劳动模范；六、继续实行轻税政策，活跃物资交流，发放牧业贷款，从物资和资金上扶助牧业经济发展；七、办好国营牧场和种畜繁殖场，充分发挥“两场”在畜牧业发展中的示范与领导作用，提高牧业生产技术，大量繁殖优良种畜；八、加强对牧区的政治领导与文化卫生工作，大力宣传党在牧区的各项政策，提高牧区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牧民

的觉悟，发展牧区卫生事业，驱逐梅毒，防止疫瘟，增进牧民健康。

乌兰夫这三次在不同场合、不同范围的发言、讲话、汇报和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总结性文章，共同反映了同一种情况，这就是内蒙古各项生产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已取得很大成绩，经济和财政状况已经根本好转。在这三次发言、讲话、汇报文章中，列述的措施和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作法，其中的不少提法和作法都是长期有效的，不仅适合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适合于以后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段时间工作的成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经验上，都为以后的建设和发展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 3 年的努力，就全国来说，国民经济已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内蒙古当时的情况，就经济恢复来说，已达到并超过了预期目标，但全区统一自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完成。虽然就党的领导和政权隶属而言，已接近统一，但在行政建制上还有绥远省和热河省，西端的阿拉善和额济纳两个特别旗还隶属于宁夏。很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内蒙古地区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可这种问题的解决又急不得，只能有待条件成熟。而建设事业不能等，只好是一面解决统一自治问题，一面谋划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3 年 5 月 1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建设与发展内蒙古》的文章中说:“六年来，（指 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在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胜利地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团结并发动了各民族各阶层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稳步地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与文教、卫生等建设事业，基本上解决了民族生存与人民生活问题，初步改变了落后的历史面貌，蒙古民族已由人口

逐年减少，转而为逐年增多，人民生活由贫困变为日益富裕，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进一步发展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向着富裕繁荣的道路前进的时期。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关键是发展经济，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才有可靠的物质保证。而要建设与发展自治区的经济以及其他事业，就必须与国家的整个建设相配合，把自治区的建设计划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总轨道，在国家统一计划、统一步骤下进行工作。经济建设的具体内容，就是进一步大力发展工、农、牧、林业等各项生产以及贸易、合作事业。”

接着他就工业、农业、牧业、林业、贸易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分别谈了自己的构想。

对制定计划和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全党、全国在刚起步的时候都还没有经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边编制计划边进行建设，在实践中摸索着干的。对内蒙古有计划的建设，乌兰夫同样是没有经验，也是边学边做。他在 5 月 1 日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有计划地建设内蒙古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与全国相配合，纳入全国的总轨道。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他 5 月 1 日文章构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反复思考，如何摆布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1954 年 6 月 15 日，乌兰夫在中央民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除讲蒙绥合并外，着重谈了自治区建设，现节录如下:

这个时期是在推行区域自治 7 年多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使各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根本要求的新时期。因此，今后内蒙古自治区的基本任务是:遵循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及民族工作方面的总任务，与全国各兄弟民族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大家庭；在祖国大家庭的共同发展中，组织与发动自治区各族人民，以友爱团结、平等互助的精神，进一步发展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继续消除境内各民族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一基本任务，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统一要求下，自治区今后各项事业的发展计划是：

第一，经济建设，主要是工、农、牧业和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方面。

集中主要力量从各方面保证与支援包头工业基地的基本建设。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是国家在内蒙古地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建设事业，也是改变内蒙古自治区面貌的重点建设之一。与此同时，根据自治区的特点与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农牧业、林业、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交通运输等项事业，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不断增长。

一、地方工业：在服务于国家重点建设，促进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满足农牧民需要的方针下，使地方国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手工业均有适当的发展。

地方工业建设的要求是：面向广大农村、牧区，发展解决农牧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工业；尽量以利用当地的原料为主，在地方人力、物力所能办到的情况下，建立产销对路、与国家工业有所分工的中小型工业；围绕着国家大工业的需要，建立辅助加工工业。

二、农牧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主要是针对内蒙古地区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历史上农民沿袭下来的粗放经营的特点，大力提倡并扶助农民精耕细作、防旱抗旱、抢墒保墒、兴修农田水利、采用新式农具以及防治病虫害等。当前内蒙古牧区畜牧业生产的任务

仍然是:坚决保护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扶助贫困牧民，改善饲养管理，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增加牲畜头数，特别是大牧畜，改良品种，提高质量。

三、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内蒙古地区，特别是牧区，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可以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工业、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农牧民的生活；可以通过对社会商品计划供应及贯彻各项经济政策，逐步把资本主义经济及小商品生产纳入国民经济的计划，为国家工业化与自治区建设提供和积累更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只有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积极开展物资交流，才会逐渐地建立起牧区的经济中心，发展城镇、交通、小型工业和手工业，进一步繁荣经济和改变牧区面貌。这就是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首先建立起以贸易为主的经济中心，再逐步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中心——草原城镇。这样就会改变草原的荒凉面貌。

第二，文化建设。重点是牧区的卫生工作。卫生工作是直接关系着蒙古民族兴衰的重要工作。几年来，在“人畜两旺”的方针指导下，对大部分牧区的性病患者已全部免费治疗了一遍，现正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根治。性病的危害已大大减轻了，牧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呈现出人口增加的兴旺气象。但因在性病防治后，妇婴保健卫生工作没有随之做好，所以婴儿死亡率仍相当高。今后在牧区要积极开展妇婴保健卫生工作。建立妇婴卫生保健站(所)，是卫生工作一项重要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蒙古族的人口才能够进一步兴旺起来。

第三，培养干部。大量培养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心环节，同时也是保证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几年来，在“普遍吸收、大量培养、放手提拔、大胆使用”的方针指导下，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干部。他们工作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已成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骨干，有许多人已

经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为了适应建设自治区的需要，今后我们特别要注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和技术人才，同时要在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上，抽调大批的优秀干部转到工业建设，特别是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1953 年 5 月 1 日的文章和 1954 年 6 月 5 日讲话的精神和主脉是一致的，不仅明确了建设内蒙古自治区的指导思想和建设重点，也讲清了不同方面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主攻方向。乌兰夫的这些意见和构想，不仅对编制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与实施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自治区的各项建设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在全国已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在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情况下，乌兰夫先后作为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蒙绥分局和内蒙古分局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在解决全区域统一自治的同时，把行政建制上尚不统一的内蒙古地区引上“建设的新时期”，纳入了全国有计划经济建设的轨道。

十八、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的任务，主要是新解放地区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任务，同时经过 3 年的奋斗，完成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这时候党中央开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酝酿。1953 年 9 月 24 日公开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 年 12 月党中央下达了《1953 年国民经济计划提纲》。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面初步编制并开始执行，一面还在不断地讨论和修改，1954 年 9 月才基本定案，1955 年 3 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它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乌兰夫出席了讨论和审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党和国家的历次会议，参加了这条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和审议。1955 年 7 月 23 日，他曾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伟大的五年计划指引下，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艰苦奋斗，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中建设好我们本民族的地方。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实现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兄弟般的友谊。

乌兰夫赞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条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走向社会主义，乌兰夫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都早有所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开始宣传的时候，乌兰夫在1953年12月28日召开的内蒙古(当时称蒙绥)第一次牧区工作会议上，就系统地讲了他对牧区社会主义的构想。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生产关系时，他说:“牧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时，牧区的生产资料将改变为国家的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作为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牲畜，其中大部分将为集体所有，但仍将允许牧民保有一定数量的牲畜为个人生活消费之用。”在谈到生产力、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时，他说:“畜牧业生产将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畜牧业生产；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有些牧区将出现规模巨大的工业……将有比现在更多的铁路线贯穿草原；牧区将有比现在更多的、更好的国营牧场和种畜场，并将出现一定数量的规模不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点。”当谈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时他说:“牧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根本改变。草原牧民将有现代化的房屋，将有电灯、电话，将有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医院将在草原建立起来，人民疾病将得到防治，人口将日益兴旺；将建立起大批学校，孩子及成人可以上学，人民文化生活将大大提高，电影院、戏院将在草原建立起来。”

曾在“十月革命”的故乡留过学，吃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包的乌兰夫，因为受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限制，当时对牧区社会主义的这种构想，虽然是朴素的、浅显的，但他是以生产力为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步，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的，是接近牧区实际的。

至于对内蒙古牧业区的畜牧业经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乌兰夫也作了全面考虑。首先，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他说:“我想，牧区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牧区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和全

国是一致的。牧区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国家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的帮助。但是牧区和全国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与全国在具体步骤与方法上，也应有些不同。究竟牧区如何过渡，目前我们还没有经验，还不能详细地说明，今天只能概略地谈一下。”接着他就牧区的几种主要经济成份分别谈了“过渡”的形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营)，他说:“是牧区经济的领导成份，必须大力发展。首先是发展国营牧场，同时适应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国营贸易、供销社、银行等事业以及发电、采煤、牛乳加工、皮毛加工等必要的小型工业。”。对于个体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过渡到社会主义主要是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应进一步发展牧区的互助合作与定居游牧，已定居者提倡定居轮放与逐步种植牧草，建立饲料基地，使个体牧民的经济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后发展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他分析了个体牧业经济在牧区经济中占的比重和地位后说:“在牧区现有的人口中，有 90%以上是劳动牧民，……(他们）约占有牧区牲畜总数的 80%以上。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这 90%的人口和 80%的牲畜是牧区的主体……我们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这 90%的人口和 80%的牲畜上面。”

对于为数不多的牧区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也是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在目前牧区手工业极其分散的情况下，则应尽量把他们吸引到经济中心点，使他们与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发生联系，或吸收他们为工人，或者实行加工订货；手工业者人数较多的集中点，则按照生产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牧主经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还无经验，目前我们还是执行保存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与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恰当解决牧工、牧主

的关系，提倡合同制的苏鲁克。认真贯彻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改造旧苏鲁克制度，是对牧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必要措施。”针对有人提出对牧主“现在不斗、不分，将来是否也不斗、不分”的问题，他说:“必须明白，我们所以实行不斗、不分，保存牧主经济，是根据牧区的实际情况与畜牧业经济的特点而确定的。蒙绥(内蒙）牧区的牧主经济，因为我们实行自由放牧等政策的结果，牧主的封建特权已经基本废除。现在的牧主经济其经营方式主要是雇佣劳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牧主经济的发展在目前畜牧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对发展畜牧业经济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事实已经证明，执行了这一政策的地方，畜牧业生产均得到发展，人民生活都得到改善；反之……畜牧业生产就遭受了损失。”为了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他又进一步说:“我们对牧主经济采取保护的政策……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我们废除了封建特权，实行了自由放牧，以及实行超额累进税，实行两利(牧工、牧主）政策，发展互助合作等(对牧主经济）都有限制的作用。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可以估计，将来牧区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将日益发展，个体牧民将逐渐组织起来，牧主经济在数量上虽然会增加，但在比例上会减少。我们不必采取分斗的政策，就可以改变牧主经济的性质。因此我们说，现在不斗不分，将来也不斗不分。”对于牧区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他们过去多具有高利贷、超经济剥削的性质，凡为国营和合作社营经济所能代替者，应逐步代替之。”

以上是乌兰夫对牧区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初设想，虽然也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他是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既符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精神，也接近内蒙古牧业区的实际。

1955 年 1 月 21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牧区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首先对部分地区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各项政策结合不够，引起部分牧民误解，再加上对畜牧业生产的

不稳定性与风雪、疫病等灾害估计不足，发生牲畜大批死亡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重申了牧业经济的脆弱性，不稳定性，以及牧区工作要慎重稳进的一贯方针。并再次强调:“必须明确在牧区宣传与贯彻总路线，贯彻各项社会政策，其目的是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明确牧区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要有和缓的过渡形式。”他再次讲了牧主经济的特点和对牧主的政策，并明确表示:“对牧主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目前我们还不进行。将来在什么时候进行，采取什么形式，到牧区个体经济的改造(即合作化）已有成效，牧区工作基础已经加强时再作考虑。即便到那时，也将采取更加缓和的容易为牧主所接受的方式。”乌兰夫的这次讲话同在第一次牧区工作会议上讲的“过渡”问题是一致的。他一再强调的是“和缓过渡”，目的是“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1955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评邓子恢等“右倾”。10 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基调，对邓子恢等进行了批判，并作出《决议》，认定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0 月 7 日，乌兰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低调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讲了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强调了内蒙古农业区地多人少，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比较淡薄；牧业区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等。并说这种情况有利于互助合作的发展，而我们过去对其估计不足，致使合作化的步子走得慢了。接着他从多方面分析了农牧业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然后他说:“我们今后要大力发展各种互助组，积极稳步地发展合作社，计划至 1957 年参加互助合作的牧民，达到总牧户的 60%以上，畜牧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和发展到 50 多个，要求牧区每个旗(县）试办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

改造，我们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应当摸索经验，我们准备试办两三个公私合营牧场。对一般喇嘛，除继续进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外，打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把他们和(牧民）群众组织在一起办合作社……把不参加劳动的喇嘛，组织起来变成为劳动生产者的办法，是值得大力提倡并加以推广的。”同时他还说:“现在这种落后的畜牧业生产技术必须大力改进……为了畜牧业稳定增产，生产技术的改进已刻不容缓。”

在党内集中批判所谓“右倾保守”倾向的情况下，乌兰夫在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依然有分寸，有分析，实事求是，特别是他仍敢于提出“积极稳步”，“不宜操之过急”。还明确地讲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已刻不容缓”。这不仅讲出了他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真实见解，也显示了他对内蒙古人民、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乌兰夫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精神，影响着与他长期共事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含原蒙绥分局和内蒙古分局）一班人。接受牧区民主改革初期部分地区照搬农村土改的做法，斗牧主、分牲畜，给牧业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始终保持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在乌兰夫领导下，自治区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以此为指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直接掌握牧区的社会实际，全面分析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牧业经济的特点，在吃透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牧区实际）

两头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适合牧区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政策。

关于内蒙古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最早的说法，是乌兰夫1953 年 12 月 28 日在内蒙古第一次牧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对这一方针他解释说:“要积极，就是党委

要用很大力量来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要定期讨论检查总结，有专人负责做具体工作，要有计划地训练与培养互助组的干部；要稳步，就是必须根据畜牧业生产的特点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必须从牧民的生产需要出发，必须贯彻自愿的原则，必须用典型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办法，必须在牧区互助合作的现有基础上稳步地改进提高，掌握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的规律，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和生搬硬套，一切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到 1956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时，又概括为“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慎重稳进”。过了半年以后，9 月 17 日经乌兰夫审定发出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第一次作出比较系统的表述，这就是:“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 7 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五次牧区工作会议时，经过充分酝酿提炼，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凝炼成为“稳、宽、长”三个字。

对于这一“三字”方针的含义，10 月 8 日，乌兰夫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作了明确解释。他说:“发展(牧业生产）合作社的首要问题是坚持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可以长，允许因地制宜地进行工作。强调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按照群众的觉悟水平，采取群众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办事。使群众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感到突然，不引起大的震动。力求做到既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又稳定发展了生产。”这条方针，产生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又指导实践。它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保证了内蒙古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以后牧区的各项工作中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乌兰夫和以他为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一直在紧紧地把握着，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从 1953 年开始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到 1957 年，也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中，年年都有具体要求和部署。1953 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牧区工作会议时，乌兰夫提出在牧区干部和群众中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是发展互助组，试办牧业生产合作社(初级）要经过蒙绥分局与东部区党委批准。对牧主的改造，近一两年内只在呼盟和锡盟牧区选择两三个条件成熟的对象，经分局、区党委批准后进行试点，其他各盟目前一概不进行。1955 年 1 月召开第二次牧区工作会议时，按照乌兰夫讲话精神，确定牧业互助合作还是示范；对牧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进行。1956 年 3 月召开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时，把内蒙古自治区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提出要求。即:第一类农业区包围的牧区或靠近农业区的牧区，已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的，其任务是整顿、巩固初级合作社；第二类是人社牧户占总牧户 30%左右的地区，其任务是办好现有社，做好典型示范，发展和提高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做好建社准备，稳步发展；第三类是有一定工作基础，还未试办合作社或试办不多的地区，其任务是大力发展各类互助组，在提高和巩固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由苏木(乡）办试点社，积累办社经验；第四类是工作基础薄弱的纯游牧区，其任务是发展各类互助组，由旗或领导力量较强的苏木掌握，个别试办初级牧业合作社；第五类是额济纳和阿拉善两旗的牧业区，其任务是积极发展互助组，慎重地试办初级社。按以上设想，提出争取 1959 年基本实现畜牧业合作化。对牧主，提出由旗委研究列出名单，经地、盟委批准并报自治区党委备案。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搞试点。至于谁是牧主，只内部掌握，对外不公布。12 月召开第四次牧区工作会议时，全国“三大改造”正处于高潮之中。“高潮”的浪花在不时地冲击着内蒙古牧区，但以乌兰

夫为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依然坚持“慎重稳进”，提出“牧业合作社不要哄起一个高潮来实现合作化”，“要常年准备，分批发展，逐步前进”。同时决定:“今冬明春一律停止建社扩社、并社和转高级社，全力做巩固工作。”1957 年 7 月召开第五次牧区工作会议时，全国“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内蒙古牧区的牧业生产合作社(初级）才只有 632 个，人社牧户仅占总牧户的 24%，形势已很逼人。但是，乌兰夫和以他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牧业合作化的发展仍然很慎重，“稳、宽、长”的牧区工作方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的。同时还决定“今年原则上不发展社(牧业)”，“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增畜运动”，“大力办好现有的社，确实做到社社增产增畜，保证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整顿和巩固互助组……为 1958 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和今后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经试办合营牧场，牧主们普遍愿意接受这种形式，但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仍觉得经验尚不成熟，确定这年不再发展，全力办好现有的合营牧场。

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乌兰夫主持下，经过反复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个体牧业经济和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对个体牧业经济改造的政策，主要是自愿原则，自留畜和分配问题。关于自愿原则，曾三令五申:“合作社虽好，但不是强迫每个人必须入社，而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牧畜入社时，入社头数应完全按自愿，一般只要能繁殖的牲畜大部入社，或入社牲畜多于自留畜即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散畜入社与否，完全听取社员自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入社。……国家对农牧民私有散畜一律保护，并扶持其发展……合作社给予私有自放的养畜户以人力、饲草、饲料的照顾，给予自养自放的条件，使私有散畜得到发展。”关于自留畜政策:“乘马、奶牛、食用羊、拉车拉水

的必要役畜、社员心爱的牲畜、祭祀用的牲畜，都可以按社员自愿选留，数量不加限制。社员家庭成员的‘体己’牲畜，愿入者入，愿留者留，不得强迫。”关于分配政策:“要照顾到劳动力和牲畜两个方面……保证绝大多数社员并尽力争取所有社员增加收入，使劳多畜少、畜多劳少的户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益。”“在分配过程中必须注意从增产来增加社员收入，并按照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办事……劳畜分配的比例，分配的办法，都要经过计算来决定。为争取所有社员都增加收入，应把今(当）年生产成果的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生产投资应该少扣，公积金与公益金在建社的第一年一般不要超过总收入的 5%。”此外，对入社牲畜作价、社的规模等也作了规定。牲畜作价归社，“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原则。作价归社的牧畜价格，应当高于平均市场价格。价格偿还期一般不得超过三年，到期必须偿还。”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按居住的集中与分散，牲畜的多少，牧场的好坏、大小和是否有利于生产等情况，实事求是地来决定。游牧区一般掌握在 10 多户 20 户左右，最多不超过 30 户；定居区掌握在 20 至 30 户，一般不超过 40 户。已办起的 50 户以上的大社……可以分建为几个社，或者一个社下的几个分社，由分社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对牧主经济“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比对资本家更宽的‘赎买’政策和更温和的办法，逐步改变牧主的所有制。”改造的方法主要是“采取合营牧场和有条件的参加(牧业生产）合作社两种办法，由合作社代放苏鲁克也是一种办法，一般对大牧主采取合营牧场的办法。”参加合营牧场和牧业合作社的牧主的自留畜，“可以根据他们所提出的要求留下”。给牧主的定息标准:“分别畜种年利率为 2%—16%，对于种畜和优良品种，在利息上可以稍加照顾。采取比例分红办法合营的……牧主所得应略低于新苏鲁克所得。”对入社的牧主，“除应将其入社牲畜的 2%—30%作为股份基金外，允许其相当于社员平均牲畜的

一份与社员同样入社分红，其多余部分一般的采取作价定息的办法。牧主放的苏鲁克仍允许其继续分红。”对牧主本人“采取长期团结的方针，把他们包下来，他们中的若干人我们将适当安排，长期养下去，大部分将在长期改造过程中，采取种种自然的诱导的办法，将他们改造成为劳动人民。”

以上所述内蒙古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政策，都是在乌兰夫主持下，以他的主导思想为基础制定的。

纵观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内蒙古牧业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乌兰夫“稳、宽、长”的指导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是民主革命时期牧区民主改革时“三不两利”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它对内蒙古牧业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平稳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乌兰夫这一主导思想，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内蒙古牧区的具体化。“稳、宽、长”来源于总路线中的“逐步实现”“一化三改”。

“稳、宽、长”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本意图。应该说内蒙古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乌兰夫主持下之所以平稳，之所以问题比较少，其根本原因正是认真地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亲自写进总路线的那句话，即“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事业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是正确的。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于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认为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国家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其

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乌兰夫参加了这次大会和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讨论，他完全同意大会的分析和认识。乌兰夫在大会上发了言，除表示拥护这次大会的精神外，集中讲了我们党胜利地解决了我国民族问题。

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九、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

1958 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左”倾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行程中走的一段弯路。这段弯路乌兰夫基本上是跟着走过来的。他主持的内蒙古自治区与其他地方相比慢了半拍，行动比较迟缓。

在这段时间里乌兰夫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呢?

首先看乌兰夫在“大跃进”中。历次与“大跃进”有关的中央会议，除南宁会议外，乌兰夫都参加了。乌兰夫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低调的发言。南宁会议虽然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其他同志都没有参加，但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争取整风全胜，克服右倾保守，掀起生产建设的高潮》的报告，提出了“迅速掀起全面的、空前的生产建设高潮，实现工农牧业大发展”。会议结束时他作总结发言，又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赶上或者超过农牧业”。在内蒙古这是对“大跃进”最初的动员，也是最早的一次动员。

在成都会议上，乌兰夫向毛泽东汇报内蒙古工作和有关民族问题时，谈了他一再讲的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意在表达在内蒙古贯彻执行中央精神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不料，毛泽东听后没有认同，反而说:“要吃共产主义饭，不要吃民族饭”，“这族那族，要看哪个马克思主义多一点”;“地方要，民族要，不要主义”。乌兰夫对毛泽东很敬佩，很尊重，对他突然讲出这些批评的话，没有精神准备。但是，不管理解不理解，思想上接受不接受，乌兰夫都认真地听

了，认真地记了，而且回内蒙古后在党的会议上如实地做了传达。时过四十多年后，一位直接听乌兰夫传达的老同志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夫是一个坦诚实在的人，从不隐讳自己的长短，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成都会议精神时，连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也如实地讲了。”这位老同志还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乌兰夫的做法使我很感动，很受教育。”这件事说起来简单，但千万不能小视，因为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乌兰夫的坦荡胸怀。

尽管在成都会议上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为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还是在他主持下很快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六次全委会议。乌兰夫在会上全面传达了成都会议精神。在作总结发言时，他又强调说:根据成都会议精神，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业上面，主要抓基本建设、机械制造、钢铁生产，继续完成工业规划的任务。对地方工业他提出:为农牧业、为大工业、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乌兰夫发了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会议结束他回呼和浩特后，很快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他主持下由杨植霖传达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他在全委会上讲话时强调: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接着又在他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全区广播大会，更广泛深入地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他在这次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百折不挠地建设社会主义。1961 年基本建成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1962 年木材采伐年产量达到 840 万立方米；用五年时间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全国钢铁生产基地之一，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牲畜和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他在全区广播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说:八大二次

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7 月 7 日他又在第七次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牧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乌兰夫主持下，于 9 月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全面传达了北戴河会议精神，而后他在会上讲话时又强调:在全国出现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工业建设高潮和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点应转向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来，同时不放松对农牧林业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要求盟和旗、县委，贯彻工农并举的方针，以农牧业生产为重点。在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他又要求各地和各单位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迅速投入钢铁生产和秋收工作。在乌兰夫主持召开的这一系列会议的推动下，内蒙古的“大跃进”虽然动作迟缓，但终于还是动起来了。

内蒙古的“大跃进”同全国一样，也是从农业先开始的。本来看了《人民日报》报道的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消息后，乌兰夫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曾说:“让他们去放吧！咱们没有卫星，咱们也不放。”可是到 1958 年 7 月内蒙古收割小麦的时候，自治区党委议论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不甘“落后”，认为别的地方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努力争取做到。于是经他同意后，以自治区党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力争各种农作物放出高产“卫星”的通知》。而后就出现了一些高出当地平均产量几倍、十几倍的“丰产田”。《内蒙古日报》为此发了《谁说内蒙不能出现丰产“卫星”?》的社论。受此影响，农业上的“浮夸风”起来了，“大跃进”也随着“跃”起来了。年末召开第七次全区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时，把磴口、杭锦后旗、乌兰浩特、突泉、五原、开鲁、通辽、临河、阿拉善九个粮食亩产“超过”400 斤的旗县市，树为农业丰产红旗单位。

1958 年年底公布的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5%，粮食总产增长一倍，平均亩产增长 1.3 倍。“高增产”的结果，却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

随着农业的“大跃进”，工业也“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地“大跃进”起来。北戴河会议后，经乌兰夫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了《突击抓钢铁的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动员，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很快形成了 70 多万人参加的钢铁大战。就在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干部兴建了“书记炼铁炉”。乌兰夫参加了兴建破土，而后又参加起翻冷却铁坯的劳动。呼和浩特新城的城墙被挖空建成了炼铁的“土高炉”，各行各业的人集中在那里日以继夜地大闹“炼铁”。在这场全民投入炼钢炼铁的大战中，内蒙古全区建了 105 个小钢铁厂和上千个土高炉，年终宣布炼钢 1.3 万多吨，炼铁 8.8 万多吨。实际上真正炼出的钢、铁只占宣布数字的 50%多一点。这场混战打乱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得不偿失，教训惨痛。

好在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对“大跃进”中的问题觉察得比较早，纠正得比较及时，限制了其影响在内蒙古继续扩大和蔓延。“大跃进”的局面形成以后，于 1958 年 9 月乌兰夫就亲自挂帅，组成工作队去了基层，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调查研究，很快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11 月召开了全区工业书记会议，就赶紧收拢战线，压缩气氛。

1959 年 1 月，又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的一届三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为争取 1959 年社会主义建设更大、更好、更全面的成就而奋斗》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提出了计划要步步落实。3 月初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大跃进”中

出现的问题依然放心不下。3 月 3 日他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常委，请他们考虑，为什么大丰收后，反而出现了市场上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等供应不足的问题，原因在哪里?同时提示各位常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所有制和政策方面去找。乌兰夫在京期间，还给在机关主持区党委工作的杨植霖、王铎写信，提出:钢铁生产指标落实程度还不够，战线拉得过长，小高炉去年建设得很分散，条件不够，大部分不能投入生产。建议最好把现在分散在没有条件生产的地方的小高炉，集中在几个有条件的点，进行集中生产。5 月 21 日，他在各盟、市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上传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性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讲完《指示》后他要求:全区人民行动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充分挖掘潜在力量，提高劳动效率，保证以钢铁、煤炭、粮食、牲畜、木材五大指标为中心的生产建设任务提前完成。

经过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被“大跃进”搞乱了的内蒙古经济，到 1959 年上半年基本稳定下来，又开始渐渐步入了正轨。

再看人民公社化中的乌兰夫。1958 年 8 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闹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公社化。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似乎建立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就不远了。党内和社会上有那么一些求捷径追幸福的人，他们急盼进入“共产主义”，过“天堂”日子。正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风刮起来得很快，冲击力很强。乌兰夫主持的内蒙古，在这股风浪中是跟着走的，与闻风而动的地方相比，行动明显迟缓。

9 月 10 日至 21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根据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结合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特点和经济特点，作出了《关于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初步规划的决议》。《决议》中对有关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的规模和实现公社化的方法、步骤，以及民族关系与有关政策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了具体规定，以求在公社化过程中少出问题。为了加快建社进度又不影响生产，当时确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分两步走，即:第一步，上动下不动，先搭起公社的架子，抓生产；第二步，生产大忙过后，再腾出手来具体解决有关生产资料、财务和分配等问题。原本想这样可以搞得稳妥些，尽可能地少走弯路。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人沉不住气，总怕落在后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全区农村公社化，还有武川、察右前、达拉特、鄂托克、杭锦 5 个旗县建立了县联社。内蒙古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公社一级所有，政企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还搞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分配制度是供给加工资，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等，要向共产主义穷过渡。

人民公社一建立起来，即 11 月下旬，乌兰夫就派主管农业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到呼和浩特郊区农村作调查。王铎到了一个人口最多的人民公社——呼和浩特郊区桃花人民公社，一进村就看到了公社的混乱情况。经过深入调查后，王铎和原先在那里蹲点搞调查研究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昭衡一起，给乌兰夫及自治区党委写了报告。他们的报告把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问题基本上都反映出来了。经乌兰夫同意，把这份报告转发给了各盟、市、旗、县委，请他们研究解决。

这时中央也发现了大办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11 月在郑州召开

中央和地方部分主要负责人会议，紧接着又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不能剥夺农民，不能取消商品生产。毛泽东就这些问题讲了话。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后，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用以提高全党认识，统一干部思想，尽快纠正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乌兰夫参加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决议》。

中央这两个会议提出的问题，正是乌兰夫早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问题。会议一结束，他马上赶回呼和浩特，决心乘中央这两个会议的东风，切实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刮“共产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他提议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立即抽调各级干部组成检查团，分赴全区各旗、县，宣传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检查纠正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检查团人员总数达万人，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和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王逸伦负总责，分别编为 7 个工作队，从自治区一级机关抽调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厅局长任队长，率队深入基层，除帮助社、队抓好农村冬季生产外，主要是检查解决“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和办食堂、托儿所、敬老院中的问题，以及群众吃、住、休息、冬季取暖等生活方面的问题。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以来组织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检查团。由此可见，乌兰夫和以他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公社化中所发生的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尽快纠正的决心。

在派出万人检查团的同时，为全面传达、深入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乌兰夫先给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和在呼和浩特参加自治区组织工作会议、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传达了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接着

在他主持下，于1958年12月末和1959年1月初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继续传达中央两个会议精神，同时筹备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的一届三次代表大会，以更广泛深入地传达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特别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经检查团深入基层的一段工作，经过自治区党委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酝酿准备，于1月12日至17日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的一届三次代表大会。乌兰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为争取1959年社会主义建设更大、更好、更全面的成就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这次报告中，除全面总结了1958年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及对经济建设方面的要求外，还讲了整顿和巩固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等。经过在乌兰夫主持下接连召开的这些会议，经过上下一致地切实工作，基本上遏制和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中造成的各种问题，刹住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在我国存在了2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无论后人怎么去评说，当时经过整顿之后，在内蒙古逐步走上了稳定并正常发展的轨道。

内蒙古牧区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按照乌兰夫“慎重稳进”的主导思想建立和发展的。在成都会议上，虽然毛泽东没有认同乌兰夫讲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为过，更不能说违规。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9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在内蒙古农村按北戴河会议精神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特提议牧区暂时不建立人民公社。在当时的情况下，乌兰夫和以他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能有这样的认识和举措，充分反映了他们实事求是的负责精神。尽管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这样做了，但人民公社化的风头太硬，在全国和内蒙古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影响下，内蒙古牧区不少地方也自发地办起了人民公社。牧区凡是办了公社的地方，同农村一样，也出现了类似农村出现

的那些问题。乌兰夫得知后，没有责备下边干部，也没有给群众泼冷水，而是因势利导，及时把牧区人民公社引上了他一贯主张的“慎重稳进”的轨道。

1959 年 1 月初，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主管农牧业的书记处书记王铎汇报农村人民公社当前存在的问题。接受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发生问题的教训，为使牧区人民公社少走弯路，根据乌兰夫授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了《关于牧区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就牧区人民公社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主要是:一、加入牧区人民公社的总原则是群众自愿和有利于牧业生产，具体办法有四种:一是牲畜作价或评分入社，按比例分益；二是牲畜作价入社，付给利息；三是牲畜作价保本入社，不付利息，退社返还原本；四是牲畜作价入社，分期偿还。这四种办法采用哪种由群众自己选择。二、按需要给社员留乘用、役用和少量食用牲畜，具体留多少按当地习惯和需要定。三、牧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方针是: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为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生产，主要抓牲畜繁殖成活率，改良畜种，合理利用和改良草原，积极建设饲草、饲料基地，兴修水利，改良工具，加强饲养管理，防止兽疫等。四、牧区人民公社的规模依有利生产，便于领导和管理而定，一般不超过一个苏木的范围。五、公私合营牧场加入人民公社后，在公社统一领导下独立核算；牧主入社后为正式社员，不取消定息；庙仓的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入社给定息，喇嘛必须参加劳动，失去劳动能力的按“五保户”待遇。六、社员个人应得部分的分配，仍按原来的常年包工、分季包工、以产定工、死分活值等办法分配，定期预支，年终结算。工资和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推广。七、保证社员必要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公社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福利事业，不举办。八、有计划地建设居民

点，让游牧、半游牧的牧民逐步定居；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设住宅、畜棚和菜地、饲料基地等。九、牧区人民公社实行两级或三级制，一般为两级制，即公社一级和生产队一级，生产队既是经济核算单位又是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的基本单位。有这一《指示》作出的这些规定，在稍晚于农村建立的牧区人民公社，就少走了不少弯路。

为使牧区干部和群众理解这一《指示》中所作的规定，并自觉贯彻执行，也为使更大范围的人知道内蒙古牧区公社化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乌兰夫于 1959 年 1 月 15 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把牧区人民公社建立和发展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牧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应人民群众对建立人民公社的要求，及时地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鉴于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牧区的主要生产资料——牲畜不同于土地，劳动牧民中牲畜占有状况有较大差别。因此，我们在牧区人民公社化中，对经济问题的处理，采取了逐步前进的方针和多种过渡办法。一般允许畜股有一定数量的分红或定息，但是适当降低畜股的比例；条件成熟群众自愿的，也采取按劳分配的办法。这些办法是:牲畜作价或评分入社，比例分益，畜股分益大约在 20%—30%；牲畜作价入社，付给固定利息，除付息外，按劳分配；牲畜作价入社，分期偿还；牲畜作价保本入社，不付利息，按劳分配。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作了区别对待的规定，允许社员自留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少量牲畜。至于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等，目前还只是试点，在条件不成熟，经验未取得前，还不推广。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到 1958 年底，牧区的 2000 多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已改组成为 162 个人民公社。90%以上的牧户，80%以上的牲畜，都纳入

了人民公社的有计划生产之中。（牧区）人民公社的规模，小的二三百户、一般四五百户，个别牧户居住集中靠近农村的达到千户以上。

3 月 26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又把牧区人民公社问题作为一个题目作论述。现将其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的特点时，他说:

第一，牧区人民公社是在初级合作化刚刚实现，初级合作社还未来得及整顿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第三，牧区居住分散，而且这种居住分散的情况，在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有根本改变。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时，他说:

牧区人民公社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还是不完全的集体所有制……牧区人民公社是在初级合作社基础上建立的，大部分初级合作社在公社化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生产和分配单位，有一些还是由个体所有制走上公社化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规定了牲畜入人民公社的四种办法(如前所述)，这个指导思想是对的。但有个缺点，留了一个口子，即在群众自愿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价保本，按劳付酬。这一条规定不妥当……执行结果是 2/3 的社保留了畜股报酬，1/3 的社取消了畜股报酬。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动摇。为什么要肯定今天的公社所有制性质是不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呢?最基本的理由是，牧区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必须有一个过程。劳动牧民之间牲畜占有有较大差别……承认这种差别，有利

于提高牧民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公社的巩固……我们要求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达到这个要求一是发展生产，这是主要的；一是保留畜股报酬。因此，我在这里正式宣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规定的作价保本、按劳取酬的一条，改为“作价入社”“付给畜股报酬”。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时，他说：

我们的意见是，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应该是基本的生产队所有制和部分的公社所有制，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牧区人民公社要经过两个过渡：一是由不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到完全的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一是由基本的生产队所有制和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到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的过渡。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自留畜问题时，他说：

自留畜是社员的生活资料。牲畜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因此，在牲畜公有化中，必须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开，作为生活资料的牲畜应该留给社员。有一些地区在公社化运动中，根本不留自留畜是不对的。自留畜的数量以一个地区或一个公社为范围，可以掌握在5%—7%，最多不超过10%。总的精神是放宽一点。乘马应当满足需要。奶牛应当根据需要按户自留……食用羊可以根据需要留，也可以留一些母羊让社员繁殖……社员必须用的役畜，如拉水、拉粪的牛，应允许自留。此外，牧民祭祀用的牲畜和心爱的牲畜也应允许自留。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时，他说：

消费部分应大于扣留（即税金、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管理

费）部分，以保证社员收入逐步有所增加……社会消费部分一般不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消费部分的分配一般的应实行评工分，按劳动进行分配。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集体福利时，他说：

由于牧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在目前，牧区一般不要大量举办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为了满足群众子弟入学的迫切要求，凡是有条件兴办小学的公社和生产队，应尽快兴办；卫生保健设施是牧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有条件兴办卫生保健事业的公社和生产队，应尽快兴办。

在谈到牧区人民公社对牧主和庙仓经济问题处理时，他说：

牧区的牲畜入场（公私合营牧场）、入社要付给利息，实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这条政策仍然不变；庙仓牲畜也应当与牧主的牲畜一样付给利息；继续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庙宇，对年老体弱的喇嘛在生活上应给予照顾。

上述乌兰夫的署名文章、《总结报告》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对内蒙古牧区人民公社一些实质性的主要问题都讲明确、讲清楚了。其基本精神就是“慎重稳进”，“自愿原则”，“实事求是”，也就是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提出的“稳、宽、长”。把握了这样一种精神，并能真正贯彻执行，无论做什么，或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事情都会办得比较稳妥、顺利和靠实。在牧区公社化中，因为贯彻了这种精神，所以同农村相比，出的问题就少些，对群众利益的伤害，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破坏就轻得多。

二十、建设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兰夫关心的大事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建设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

1953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央决定在包头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就是 3 月 30 日确定的苏联援建我国的重点项目之一的包头钢铁公司。为筹建这一大型钢铁联合企业，4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下设立了五四钢铁公司(包钢的最初称谓）筹备处，由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维主持筹备处工作。同时建立了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并抽调了郄晋诗等二百多名干部到包头办事处工作。为保证华北地区这一最大的国家建设项目顺利启动和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华北局于 10 月特作了《关于加强包头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包头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地之一。按照国家计划，几年之后它将生产大量的钢铁、机器来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建设包头工业基地乃是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之一。华北全党和全体人民必须为建设新包头这一极其伟大、光荣的任务，贡献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力量。为了保证国家计划中关于包头工作的实现，特决定:华北局和蒙绥分局必须把包头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同时决定:建立华北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以统一对包头工作的领导。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正式组成，主任刘澜涛(华北局第三书记)，副主任刘秀峰(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华北局副书记、蒙绥分局书记)、苏谦益(蒙绥分局副书记)。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撤销，这个委员

会自然消失。这时候，乌兰夫除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外，已是国务院副总理，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重任，他责无旁贷。

包头，是历史上有名的塞外皮毛集散地。但原来经济并不发达，20 世纪 50 年代初还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居民也只有几万人。这里的气象条件也不好，平均海拔 1500 米上下，属于高寒地带，雨量小，风沙大。但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接壤处，北靠阴山山脉的乌拉山和大青山，南临滚滚东逝的母亲河——黄河，矿藏和水资源都很丰富，又有北京通向大西北的北京到包头和包头到兰州(当时待修）两大铁路在此交会。中央之所以决定在这里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要将其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有解决我国工业合理布局，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决定性的是有白云鄂博丰富的矿藏和取之不尽的黄河水资源，同时交通也比较方便。

乌兰夫很清楚，在包头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将一个塞外小镇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并非易事。在建设中，必将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发展工业，改变内蒙古经济落后的局面，是乌兰夫的夙愿，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曾有过遐想。现在，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来了，他还怕什么困难！他欣喜若狂，满怀信心地担当起了领导这新斗争任务的重担。

有关包钢建设技术方面的事，主要由中央和国家主管部门负责，由地方负责的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服务及后勤保障。在这方面，乌兰夫是尽职尽责，不遗余力的。

乌兰夫首先考虑的是，包钢和以它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很快就要铺开，这么大的一个摊子由谁来挂帅?他全面衡量，反复考虑，最后掂量出了苏谦益。他认为苏谦益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

苏谦益，是在内蒙古西部土生土长的一位汉族老同志。他 1932 年入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土默川搞地下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到晋西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先后在绥察行署和绥察区党委做领导工作；抗战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绥蒙区党委任副书记；全国解放后任绥远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蒙绥党的领导机关合并后任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副书记，是乌兰夫的得力助手。他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也很熟悉当地情况，有丰富的领导经验。挂帅包头工业基地建设，非他莫属。乌兰夫考虑成熟后，很快提请蒙绥分局通过，经报请华北局和中央批准后，1953 年 11 月，苏谦益到包头就任市委书记(仍任蒙绥分局副书记，工作重点在包头)，成了具体执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任务的总牵头人。

苏谦益对乌兰夫选他为实施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任务的总牵头人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我推开乌兰夫同志的办公室房门时，乌兰夫同志笑脸相迎。他手里拿着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红头文件，用手指了下办公桌旁的椅子，口里忙说:“好消息，好消息!”我们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坐在椅子上，乌兰夫同志忙把华北局红头文件——《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加强包头工作的决定》展开，送到我面前。接着又说:“老苏，包头将成为一座全国挂上号的现代化的工业大城市，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最大基地之一。”而后在谈到生产钢铁的时候，乌兰夫把“钢铁”二字说得很重，“钢铁，老苏！你知道吧！就是帝国主义拿它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钢铁，就是用来制造大炮和机器的钢铁。咱们也将要生产钢铁了。内蒙古不生产钢铁的历史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结束了……我们不仅要生产钢铁，我们还要制造机器。内蒙古生产的钢铁将要为国家、为全国各族人民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乌兰夫

同志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忽然他的语调平和了一些，满脸堆着轻松的微笑说：“包头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好像怕我听不清楚，又重复道：“包头地理位置很优越——北面是白云鄂博取之不尽的富铁矿和煤；南临黄河，有丰富的水资源；西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河套产粮区；东有富饶的土默川平原，有京包铁路交通之便……”我听着乌兰夫同志的述说，起先是高兴，渐渐地感到一种压力。因为他在为我描绘了那幅宏伟而美丽的蓝图之后，便将找我来此的主要意图说了出来……我顿时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乌兰夫同志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郑重而又亲切地说：“老苏，别担心！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做不成的事。再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大青山面对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也从来没有怕过吗?把那时候的勇气和干劲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这两位内蒙古的老革命、老领导，在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对由谁来挂帅的问题就这样达成了一致。苏谦益回忆的乌兰夫上述一席话，充分表现出了两位老战友相互之间的充分信任，也反映出了乌兰夫和他的老战友苏谦益共有的高度责任感。

有了帅，紧接着就是点将。定了由苏谦益挂帅以后，乌兰夫并没有减弱自己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关心。他一直在想，要很好完成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必须组织起一支与建设任务相适应的干部和职工队伍，特别是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要有各级领导骨干。经过他同苏谦益及其他领导人酝酿，又经蒙绥分局和军区干部管理部门的严格挑选，先后给包钢及其他骨干企业和包头市派去大批有干劲、有经验的各级领导骨干，其中包括不少少数民族干部。如后来在包钢及其他大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刘耀宗、乌力吉那仁(蒙族)、何树声(满族)、黄汉炎(壮族)、

朱言、赛胜阿(蒙族)、陈之向等，都是那时候按照乌兰夫的意图派去支援包钢、支援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这些干部在包钢、包头工业基地初建时期，不怕困难，勇于奉献，都成了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有功之臣。乌兰夫及时作出这样的决断，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很有远见的。这种决断和措施，对加速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的建设人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影响极为深远。

在选帅点将的同时，乌兰夫也很关心当地少数民族工人队伍的培养。对输送蒙古族青年到包钢当工人，培养蒙古民族第一代钢铁工人的问题，乌兰夫同苏谦益交换意见，二人一拍即合。此时，正遇蒙绥军区有一批军人要转业，乌兰夫让苏谦益找内蒙古军区领导商量，争取把这批即将退出现役的军人转到包头，支援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把他们培养成为内蒙古的第一代钢铁工人、产业工人。

按照乌兰夫授意，苏谦益很快到蒙绥军区，约见了副司令员孔飞、王再天和副政委廷懋等领导人，向他们转达了乌兰夫的意见。当时乌兰夫兼任蒙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军区的领导同志都很尊重他。他们听了苏谦益转达的意见后，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都说:“乌兰夫同志想得对，是有远见的。”孔飞说:“培养第一代蒙古族钢铁工人非同一般。骑在马背上的人去当工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我们的军队里有一部分军人要转业到地方，从中可以挑选一批年轻、有文化、觉悟高、身体好的军人转业到包钢当炼钢工人。”廷懋以军人的口气说:“这个任务保证完成，就按孔飞同志提出的办法从军人中挑选。”王再天说:“要选精兵，他们将来是包钢的骨干力量，就按孔飞同志提出的要求挑选，不能有半点马虎。”就这样由蒙绥军区很快挑选出了一批“精兵”，输送给包头，分配到了不同的建设和生产岗位。这批转业军人，在由鞍钢等调来的老工人帮助下，经过培训和实

际锻炼，很快掌握了各自工种的技术，成为包钢建设和生产的生力军。

1954年12月28日，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常委会议(蒙绥合并后改称内蒙古分局)，听取包钢经理杨维关于包头钢铁公司筹建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乌兰夫就包钢筹建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1955年6月，乌兰夫陪同朱德同志到包钢视察。8月27日，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由分局改自治区党委)，听取杨维经理关于包钢设计情况的汇报，就设计方面的问题提出指导和建设性意见。1957年2月12日，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关于包钢建设情况和问题的汇报，就包钢建设方面的有关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凡事开头难。在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筹备和初建阶段，乌兰夫一直注视着它的方方面面，一有难题他就出面。此期间一些难办的事，都是在乌兰夫帮助下解决的。

乌兰夫帮助解决的第一个大难题是白云鄂博“敖包”搬迁。

白云鄂博是一座宝山，可以说它整个是一座铁山，并且还不只是铁，而是一个由多种金属组成的共生矿，其中尤其宝贵的是稀土。早在1927年，白云鄂博铁矿就被我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1933年又发现有共生稀土元素。日本侵华期间，于1944年夏派资源调查队到白云鄂博，地质学家黄春江等在主矿床东、西两侧又发现新矿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根据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指示，中财委组织了对白云鄂博铁矿的普查和研究分析，基本上查清了矿藏状况。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周恩来率团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援建我国第一批重点项目时，就列上了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在包头附近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56年春，包钢白云鄂博矿山公司成立。在白云鄂博矿破土兴建时，不料，却遇到了当地牧民和喇嘛的阻拦。他们说白

云鄂博是神山，有他们世世代代祭祀的“敖包”，破了“敖包”会有灾难降临。日伪统治时期，曾试图开发白云鄂博，掠夺我矿产资源，被奋起抵抗的牧民和喇嘛制止了。现在他们依然不让建矿开发。包钢和包钢矿山公司的领导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没有办法，只好把包头市委书记苏谦益请去。苏书记也劝说不动淳厚执著的蒙古族牧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搬”乌兰夫。苏谦益亲自到呼和浩特求助乌兰夫，见面说明情由和意见后，乌兰夫笑了。他说:“不就这么点事嘛！咱们俩去就是了。”乌兰夫很熟悉牧民和喇嘛的特点，知道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他认为，只要耐心地做工作，把道理讲清楚，让他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苏谦益见乌兰夫是这种态度，心里就有底了。于是，他俩商量了如何做工作后，就一同去了白云鄂博。

到白云鄂博后，以乌兰夫的名义邀请有影响的喇嘛和牧民代表来开座谈会，由乌兰夫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座谈会上，乌兰夫首先肯定并赞扬了喇嘛和牧民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保护了祖国矿产资源的爱国精神，同时讲了全国和内蒙古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然后把话题转到国家要在包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需要开发白云鄂博这座宝山下的丰富矿藏。把喇嘛和牧民代表的注意力引到这方面以后，他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蒙古民族是一个有爱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国富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有不少先烈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接着他又以沉重的心情说:“过去为什么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没有钢，没有铁，不会生产机器。”而后，他又以激奋的语气说:“现在，我们胜利了，各族人民当了家做了主人，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的就是让国家富强起来，让各族人民过幸福生活，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国家已经决定在包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

业，把包头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这就需要把白云鄂博地下的铁矿挖出来，让它为祖国振兴服务。这是我们内蒙古人民的幸运，是我们蒙古民族的光荣。在这一支援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利益这个大局的立场上，高高兴兴地积极支持和帮助。”讲了这些以后，牧民和喇嘛们的心已经被打动了，该说怎么解决了。于是他说:“我看国家开矿和牧民祭‘敖包’不矛盾。白云鄂博的矿藏按国家政策去开采。草原上有的是风水宝地，‘敖包’可以另选一块宝地搬迁过去祭祀。这不就互不影响了嘛!”乌兰夫提出的这个办法两全其美。苏谦益和包钢及矿山公司的人赞成，参加座谈的牧民代表和喇嘛也接受。解决这个大难题的办法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就是“敖包”怎么搬迁。乌兰夫的基本想法是:只要有了“敖包”迁走，白云鄂博矿山按计划建设和开采这个大前提，搬迁“敖包”的形式可以从当地习俗，满足当地牧民和喇嘛的要求。按照乌兰夫的意见，包钢和包头市以及达茂旗有关方面，帮助当地群众做了充分准备，选定了白云查干为“敖包”新址。定了吉日后，隆重地举行了搬迁仪式。牧民和喇嘛高高兴兴地迁走了白云鄂博的“敖包”。至此，一场“敖包”风波，顺顺利利地圆满解决了，干部、工人和牧民、喇嘛皆大欢喜。事后，人们都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典范，是一堂生动的民族政策教育课，使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深刻教育。

乌兰夫帮助解决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包钢的“锅、米、柴”统一管理问题。

随着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逐步推进，乌兰夫及时考虑了在行政区划上怎样才有利于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和包钢以后生产。经过充分酝酿后，1958 年年初，在他主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把属于达茂旗的白云鄂博铁矿周围地区和属于固阳县的石拐沟煤矿周围地

区，分别设两个旗县级矿区，划归包头市管辖；同时，为就地解决包钢职工和包头城市居民蔬菜、副食供应等问题，决定将固阳县划归包头市领导。此前，达茂旗和固阳县都归属于乌兰察布盟，为顺利实施上述两项决定，乌兰夫特把乌盟盟委书记石生荣请来谈话，亲自作了部署。对此，石生荣有一段回忆，现引录如下：

1958 年年初，乌兰夫同志和苏谦益同志把时任乌盟盟委第一书记的我召到包头谈话。见面后两位老领导先热情地和我寒暄了几句，而后乌兰夫同志便开门见山地说：“请你来主要谈把乌盟的白云矿区、石拐矿区和固阳县划归包头的问题。包钢，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于 1954 年破土兴建，经过建设者们几年的努力，主体工程已搞起来了。1 号高炉——‘1513’这个钢铁巨人，预计明年就要开炉出铁。这是我们全区和全国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好事，一个大胜利。”他接着说：“可是，等于是锅的高炉在包头，等于是米的矿石和等于是柴的煤却都在乌盟。锅和柴米分别属于两家，做起饭来可就不方便了。自治区党委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把锅、米、柴统一起来，归为一家，以便于做好这个大锅里的饭，决定把乌盟的两个矿区划给包头；再就是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发展，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会越来越多。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嘴，都要吃粮和菜，特别是蔬菜，必须就近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治区党委同时决定，把属于乌盟的固阳县也划归包头。做这样的调整是从支援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有利于国家和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大局考虑的。我想你一定能理解这个意思。请你回去后给盟里的同志、两个矿区和固阳县的同志做工作，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在乌兰夫同志给我谈的时候，当时兼任包头市委第一书记的苏谦益同志时而示意表示赞成乌兰夫同志的话，时而插几句话加深我的理解。

对两位领导既形象逼真又深刻明确的谈话我完全理解。听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和乌兰夫同志的提议。我回去马上做工作。相信同志们都会深刻理解和正确对待，不会有什么阻力，请领导放心。”

我返回乌盟传达了乌兰夫同志谈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后，盟里和白云、石拐两矿区及固阳县的同志都很拥护，并说，乌兰夫书记把道理都讲清楚了。这是自治区和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需要，我们坚决按照自治区党委决定和乌兰夫同志的指示办。随后，白云、石拐两个矿区和固阳县即成建制地划归了包头市，很快完成了交接任务。同时，还按照乌兰夫同志支援包钢一些民族干部的意图，选调了曾任达茂旗旗委书记的巴彦都荣等十多名县处级蒙古族干部到包钢工作。乌兰夫同志对我们这次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

从石生荣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乌兰夫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想得周到，工作也做得很细致。这个问题的及时解决，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和发展，对包钢以后的生产管理，以及解决副食供应等，都有很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乌兰夫帮助解决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为单身青年职工组织家庭创造条件。

包头市区分为三大块，即包头老市区在东南，称东河区；包钢和市政机关在西北昆都仑河两岸，叫昆都仑区；军工企业在西北，靠近大青山，故名青山区。昆都仑和青山两区是随着包钢和六一七、四四七等大型军工厂的建设和发展而形成的新市区，都是在沙地或荒滩上建起来的。初建时三市区互不相连。昆都仑区距东河区 20 多公里，青山区和昆都仑区距离比较近，但也相隔十多华里。市区分散给群众交往造成不便，特别是两个新建的市区，尤其是昆都仑区的包钢，青年职工绝大多数是男性，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作为领导，不能只叫职

工建设、生产，而不考虑他们的终身大事。面对这样的现实，乌兰夫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主帅苏谦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职工，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我们不关心让谁去关心?他们来包头，到内蒙古，是支援边疆建设的，偌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崭新的工业基地，要靠他们来建设。他们不仅是建设者，而且是拔地而起的新兴工业基地的主人。总不能让主人，有功之臣，长期当光棍，住单身吧?那该怎么办?在考虑即将崛起的新兴工业基地——包头远景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开了窍。建棉纺厂，在男职工集中的昆都仑区建棉纺厂。苏谦益反复想了这个问题后找乌兰夫，向乌兰夫仔细讲了自己的想法。乌兰夫听后说:“你想得对。我也在考虑这事。我看解决这个问题得你亲自出马。你到北京去，找李富春和薄一波，只要他们二位同意，这事就好办了。”这事宜快不宜迟。他们交谈之后苏谦益就进京了，先求见李富春。没有料到，向李富春讲了他们的想法后，没有得到同意，理由是内蒙古不产棉花。苏谦益碰壁了，但没灰心。他又找薄一波。薄是苏的老上级，以为怎么也会好说点。没想到薄一波和李富春说得一个样。真是角度不同，各有各的难处。苏谦益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但他还是不死心。回到呼和浩特后又去见乌兰夫。他委屈地向乌兰夫述说进京遇到的一切，而后说:“看来这事还得你出面。”乌兰夫很痛快，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安排，就同苏谦益一起上了北京，直奔中南海见周总理。他们原原本本地向周恩来总理讲了自己的想法和苏谦益进京求助的经过。周总理听后称赞他们想得好，想得对。并说:“打仗的时候还要关心群众生活，建设时期更要关心群众生活。内蒙古不长棉花，河北、山西长棉花，纺织工业也不该都集中在内地。”就这样原则上定了在包头建棉纺厂。而后正式向中央写了建包头棉纺厂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带头在报告上批了“准建”二字。

一座 10 万支锭、2000 台织布机的棉纺厂在包头昆都仑区建起来了。青年女工最多的时候上万人，明显地缩小了包头青年职工的男女比差。企业青年组织和市团委、妇联等群众组织，通过组织联欢、舞会等活动，给青年男女搭鹊桥，尽量给未婚的青年男女提供接触机会，为他们组成小家庭创造有利条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起到了稳定青年职工情绪的作用，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批青年人扎根边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对边疆全面繁荣，将产生不可估量的长远影响。

经过几年的准备和启动，到 1958 年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到了全面铺开并逐步进入建设高峰的时期。这时候，乌兰夫对它就更加关心更加投入了。这年的 4 月 26 日，包钢焦化厂比预计时间提前一个月开工兴建。乌兰夫亲自参加开工典礼并剪彩。他在开工典礼大会上讲话时说:“今天包钢焦化厂提前一个月开工了，焦化厂是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厂的提前开工是包钢实现全面跃进指标的一个重要开端，是包钢建设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苏联专家努力帮助的结果，我热烈地祝贺你们。”他还说:“建成包钢，建成包头工业基地，对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面貌有重大意义……你们担负的建设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全区各族人民的支援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你们一定能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包钢，一定会快马加鞭，全面跃进。预祝你们获得更大的胜利。”乌兰夫亲自参加包钢焦化厂开工典礼并热情洋溢地讲话，给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们以很大鼓舞。6 月 7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 1961 年基本建成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7 月 19 日，他再次陪同朱德视察包头和包钢。7 月 25 日，他又直接发

信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们帮助督促各该省接受包钢定货的厂家按期或提前交货，以保证包钢建设的需要。同日，致函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请帮助解决包钢建设中的钢材、水泥缺口和所缺的有关配套设备。11 月 16 日至 26 日，就包钢建设中的问题接连两次直接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央将包钢建设列为专题解决，希望全国各省、市都大力支援包钢建设。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2 日，乌兰夫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又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了包钢建设中的问题。毛主席看了报告和听了汇报后说:“要想点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周总理为此约包钢和武钢领导同志谈话，对他们说:重点要保证。并提出包钢 1961 年基本建成，1962 年扫尾。六中全会期间周总理还专门召见包钢经理杨维，详细询问了包钢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并积极运筹解决办法。乌兰夫亲自出面请有关省、市主要领导人伸出支援之手，直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使他们更加了解包钢建设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求得他们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这就为及时解决包钢建设中的困难打开了通道，为加速包钢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之后乌兰夫还嫌不够。12 月 9 日，他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又重点讲了包钢建设和其未来生产问题。现将乌兰夫发言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央确定在内蒙古建设包钢是非常正确的。内蒙古自治区有着大量发展钢铁工业的良好条件，煤、铁储量都很丰富。除了包钢的铁矿基地白云鄂博已查明有十亿吨以上储量外，锡林郭勒盟、集二铁路两侧，又发现了四条矿带。据内蒙古地质部门报告，初步估计有铁矿、铜矿、锰矿和镍矿。这些矿藏大都在铁路沿线，可以露天开采，矿石含铁量较富。煤的储藏量全区有四千多亿吨，包头

附近和包兰铁路两侧都有储量很大的炼焦煤矿。可以说，内蒙古是理想的国家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加速包钢建设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包钢规模巨大，设备都是第一流的。包钢投入生产，不仅产量大、质量高，而且能够轧制大型钢材。这些产品对支援全国建设，特别是铁路、石油、桥梁和国防工程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支援配合和苏联的帮助下，经过五年建设，包钢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现在矿山基地已大体建成，有效容积 1513 立方米的一号高炉炉体已经建成。一号焦炉已经基本建成，炼钢厂已经开始兴建，初轧机和一个大型轧钢机于明年 5 月、7 月制成。

加速包钢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包钢的建成，可以与鞍钢、武钢等几大钢铁企业相配合，建立起我国工业体系的骨干，使各种类型的钢材都能够自己生产。加速包钢建设，对于内蒙古自治区也有其重大的意义。包钢可以带动自治区各方面的建设，使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起来，工人阶级成长起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交通，是贯彻党中央、毛泽东伟大民族政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和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拥护包钢建设，并全力以赴地支援包钢建设。

包钢的建设，目前是争取加快建设速度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工农业战线上都要分秒必争，那么对于包钢这样一个已经具备了初步规模，有可能提前投产的重要企业，更应该分秒必争。

包钢是在中央领导下、全国支援下建设起来的。要加快包钢建设进度，仍须中央加强领导和取得全国的更大援助。现在中央已经确定把少数地方管不了的骨干企业交给中央。我们建议冶金工业部进一步加强对包钢的领导，把包钢建设中的投资、材料、设备等统一管起来。希望中央有关各部把包钢建设列作重点进行安排。希望全国各地大力

支援包钢建设，使包钢能够在我国钢铁工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乌兰夫的这次发言，在全党和全国更大的范围内宣传了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向更多的各方面领导人介绍了包钢，加深了他们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了解，对争取各兄弟省市和中央及国家各有关部门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支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兰夫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对 1959 年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高峰的到来做了舆论和实际工作的准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59 年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高峰，相继而来的就是边建设边生产。这时候乌兰夫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就更加关心，更加重视了。1 月 4 日，新年伊始，他就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专请包钢总经理杨维和副经理李超汇报包钢建设问题。1 月 21 日又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专讨论包钢建设的有关问题。在讨论中乌兰夫指出:在内蒙古草原建设包钢，建设包头工业基地，要靠各兄弟省、市支援，各民族团结互助。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更要全力支援包钢建设。他特别强调: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时间，提前出铁，为国庆 10 周年献礼，早日结束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在这次常委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包钢建设的领导和支援工作的决定》。同时决定建立以苏谦益为主任，王逸伦（分管财贸工作的自治区副主席）为副主任，自治区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内蒙古自治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包钢建设。1 月 31 日，乌兰夫径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薄一波转交了两份关于包钢建设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副总理当即批交其他有关副总理，并明确由薄一波副总理负责处理所提问题。在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直接督促下，包钢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都及时得到了解决。

乌兰夫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包钢的关心和支持，鼓舞了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们，他们干劲倍增，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为确保包钢一号高炉提前出铁，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乌兰夫对包钢建设抓得更紧了。3 月 8 日，他又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包钢总经理杨维汇报包钢建设。8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乌兰夫特意到会，听取包钢副经理李超汇报包钢建设进度、生产准备和一号高炉出铁前的有关事宜。乌兰夫在会上肯定了包钢建设的成绩，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一号高炉出铁在即，包钢和包头市上上下下都在忙碌着，到处都是那么热气腾腾，一派生气。为确保 10 月出铁万无一失，乌兰夫 9 月 20 日赶往包头，听取了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关于一号高炉出铁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到现场察看，还在职工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说:“包钢一号高炉能够提前一年建成投入生产，标志着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号高炉即将出铁了，这对全国和自治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喜事。希望全体职工同志们更加鼓足干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认真学习苏联专家的丰富技术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建设本领。在出铁前夕，认真做好机器设备的运行试验和生产准备工作，保证一号高炉迅速顺利地投入生产，为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乌兰夫到现场视察，同职工见面并讲话，鼓舞了包钢广大职工和所有参加包钢建设的人，给他们增添了勇气、信心和力量。

10 月 15 日，容积 1513 立方米的包钢一号高炉举行出铁剪彩典礼，乌兰夫提前到达。14 日，他代表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应邀参加剪彩典礼的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帮助包钢建设的苏联专家。15 日，他同专程赶赴包头参加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典礼的周恩来、叶剑英、李维汉、包尔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出铁剪彩典礼大会。他与周总理等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

话中他说:“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庆祝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入生产剪彩典礼大会，使我们万分高兴的是，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庆祝大会，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无限的力量。”还说:“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入生产，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胜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结果。”而后又说:“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的大发展……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特别是对彻底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面貌，正在发挥和将要发挥它越来越大的作用。”最后他加重语气说:“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入生产，只是我们争取建设这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的重大胜利的开始。今后生产和建设的任务，是更加复杂和艰巨的。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更高地举起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奋勇前进!”

这篇讲话虽然简短，但铿锵有力，道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盼望加速经济发展，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愿和坚强决心。

又过半年之后，即 1960 年 5 月 1 日，包钢一号平炉提前建成出钢，5 月 5 日举行庆典。乌兰夫又满怀喜悦地前往参加庆祝大会。他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者们取得的这一新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说:“包钢一号平炉建成并投入生产，是继一号高炉出铁之后在自治区建设中所取得的又一次新的大胜利……包钢一号平炉建成和投入生产，大大提高了我区炼钢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随着包钢建设的加快，今后将生产出大批生铁、钢锭和钢材，供应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各项生产建设需要。它使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改变自治区的面貌，使我区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尽快赶上全国先进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殷切希望和新的要求。他说:“包头工业

基地建设已进入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同时并进的新阶段。因此，在继续加强领导，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提前完成包钢和其它重点项目的基本建设任务，保证使全部工程尽快按质按量建成投入生产的同时，还必须以足够的力量，保证搞好当前的钢铁生产，尽快地提高高炉、平炉利用系数，增大钢铁产量，提高钢铁质量，降低成本，使包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包头工业基地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在发展自治区经济建设中，包头要发挥其基地作用，在完成本年生产任务的同时，从技术装备、物资力量和技术与管理人才等方面，大力支援自治区各项建设，支援新厂矿，支援农牧业。为此，要求包头市的各级领导和包钢全体职工，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必须搞好当前生产和下一步的建设准备工作，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基建。在生产方面要迅速掌握技术，保证正常生产，使大高炉达到高产优质，使大平炉多出钢，出好钢……大量培养建设人才，不断增加技术设备，满足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在培养职工中，应特别注意培养与壮大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有计划地发展与培养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技术职工与企业管理干部。”最后，他向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者们发出号召：“为早日建成包头工业基地，以更大的步伐乘胜前进！”

乌兰夫这次讲话，表达了他对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殷切希望和新的要求。全体包钢职工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们，以高度的责任感更加奋发努力，以生产和建设的优异成绩回答了乌兰夫的企盼和要求。

包头工业基地，是包括包钢和六一七厂（坦克）、四四七厂（大炮）、二零二厂（核工业）等大企业为骨干支撑的。乌兰夫对这些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也都很关心，都很重视。他多次听这些大厂的汇报，都曾到这些大厂视察指导。在六一七厂筹建期间，他同到北京学习的该厂

筹备组组长陈之向在火车上相遇，不失时机地向陈之向询问了学习和厂子筹建的情况，并祝他好好学习老厂经验，搞好筹建工作，为内蒙古工业发展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六一七厂的坦克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后不久，即 1959 年 10 月 16 日，乌兰夫到六一七厂和四四七厂视察，听了厂领导汇报后，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坦克打靶。当他听到发发击中的隆隆炮声后，高兴地拍手叫好，并向在场的两厂领导讲述他在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三军时，看到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情景。他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外宾和领导人，知道受阅部队的坦克和大炮是内蒙古包头制造时，无不向他表示祝贺。他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讲述了这些以后，他向陪同他观看打靶的陈之向等厂领导说:“真正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是你们工厂的广大职工。”1961 年乌兰夫陪同陈毅元帅到二零二厂视察。他们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一再叮嘱厂领导和向他们介绍情况的职工，要奋发图强，加紧努力。并当场表示:内蒙古和包头市会竭尽全力支持二零二厂的各项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二零二厂需要什么支援什么。乌兰夫和党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到这些大厂视察和给予的支持，使企业领导和职工都很受感动，激发了他们勇攻难关，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

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是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进入和渡过建设高峰的。无论对“大跃进”中的过失如何评价，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是客观存在的。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们，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做的工作，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基础是牢固的，坚实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同乌兰夫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有效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十一、调整国民经济
渡过困难时期

建国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这段坎坷时期，在遏制和纠正“左”倾错误中，处事一向稳重的乌兰夫，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乌兰夫主持的内蒙古自治区行动比较慢，步子跨得比较小，损失比较轻。1958 年秋冬之交发现问题后，特别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纠正后，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遏制了“左”倾错误的发展，缩小了其在内蒙古的影响。接受 1958 年只保“钢铁元帅升帐”，而不顾一切造成损失的教训，自 1959 年年初开始，乌兰夫就强调统筹安排，全面照顾，工农并举，争取工农牧林大丰收。这一年，乌兰夫最关心的大事中，除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保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之外，再就是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在这方面，乌兰夫是用了心、下了力的。从备耕开始，他就抓得很紧。开春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整社备耕全区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抓整社和备耕，提出在整社的同时要迅速掀起生产高潮。2 月 27 日，他又去土默特旗在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整社必须促进生产，还要求精耕细作，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关注农业，特别是关注粮食生产，带动了全区上下普遍重视农业。经过春夏两季的努力，从东三盟(呼、哲、昭）的农业区，到大青山前后和河套平原，庄稼长得都很好。丰收在即，乌兰夫喜在心间。

7、8 月间，乌兰夫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

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和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斗争激烈，政治气氛很紧张。乌兰夫心里也捏着一把汗，但他却一直惦记着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打电话，问询包钢建设、农牧业生产以及粮食工作等情况。在庐山接连开的两个会议结束，乌兰夫回呼和浩特后，就忙起来了。8 月 22 日召开盟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电话会议，25 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由他简要传达了庐山两次中央会议精神。26 日听取包钢领导关于建设进度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安排了一号高炉出铁前的准备工作。9 月 2 日至 13 日，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全面传达了庐山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其间，于 4 日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前的准备工作。10 月，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联合召开的全区秋收广播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在动员时他响亮地提出:“我区的秋收工作即将全面展开，这是我区农村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们要动员全党全民的力量，千方百计地把今年空前丰收的大秋作物果实全部拿到手，确保秋收任务的胜利完成。”一个“压倒一切”，一个“全部拿到手”，说明了他对秋收的重视，表明了他的决心。他主意已定，任什么事都不能干扰、影响秋收。在农村，这是真正天字号的大事。对秋收的事作了动员、布置后，他又调转身子忙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的事，一直忙到 10 月中旬，把专程到包头参加一号高炉出铁庆典的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人先后送走之后，他又腾出手来抓秋收和粮食工作。

10 月下旬，大田的庄稼已大部割倒，开始进入打场和粮食征购入库的高峰期。这时候乌兰夫不失时机地把注意力转向了粮食收打和征购入库。为确保颗粒归仓，能按计划完成征购任务，从 10 月下旬到 12 月的两个来月期间，由他主持，在内蒙古全区范围内连续组织了四次粮食工作战役。每次战役都召开全区电话会议作动员，每次

动员都是乌兰夫亲自讲话。在第一次动员讲话中，他全面布置了粮食工作，要求盟、市和旗、县委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到第一线做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提醒各地注意抓组织领导，抓重点地区，抓工作进度，在品种上要注意抓小麦和油料。在以后的几次战役动员讲话中，他都是认真地总结上一个战役和精心地布置下一个战役，并特别叮嘱在抓粮食征购入库的同时，要切实落实农民口粮、饲料和种子用粮，要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乌兰夫亲自动员和督战，表明了他对粮食工作的重视。他的重视，对全区粮食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到年底，按预定计划圆满地完成了收打和征购任务。

在粮食收打和征购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乌兰夫特意抓了一下水利建设。12 月 15 日，在他主持下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水利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郝秀山(厅长是民主人士周北峰）关于黄河水利工程、美岱召水库和红山水库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其农业区多在十年九旱的高寒地区，解决水的问题成了农业发展的关键。乌兰夫一向重视水利建设，特别是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上述三项是内蒙古早期启动的大型和较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建成后对河套地区、土默川平原和老哈河流域产粮区农业的发展关系重大。乌兰夫认真听了郝秀山的汇报，充分肯定了这三项水利工程已取得的成绩，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发展水利的问题上，乌兰夫是很有远见的。这三项工程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建成投入使用后，促进了农业发展，长期地为内蒙古人民造了福。

1960 年 1 月 7 日至 17 日，乌兰夫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 月 24 日，在天津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闯的祸，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反弹又引发出的问题，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可是，这两次中央会议

依然死抱着“左”倾错误不放，仍津津乐道地大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些人还在起劲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空想喝彩。乌兰夫则未为所动。

这两次中央会议结束后，乌兰夫先后在不同范围的会议上作了传达。但是，贯彻执行还是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在实际工作上，他依然如故，工作重点仍然是抓农牧业生产和粮食。在传达上海会议的自治区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他特意参加了农牧、财贸两组并请盟、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联组讨论。在联组讨论会上发言时他充分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重点讲了粮食问题，要求主管部门和各地总结粮食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要全心全意搞好生产建设。在传达天津会议精神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除讲工、农、牧、林业的布局外，还是主要讲粮食问题和人民生活安排。他明确提出:农村人民生活安排是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逐社、逐队、逐户解决粮食问题，争取城乡人民吃饱，保证不饿死人。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夏锄、秋收，农时不可违。在上海和天津两次中央会议之间，经乌兰夫提议，于 3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了由盟、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区电话会议，专门作了春季农牧业生产的部署和安排。为夺取 1960 年农牧业丰收，乌兰夫在这次电话会议上讲话时，对于农业，他主要强调全力抗旱，确保全部耕地都种上、种好；对于牧业他强调继续历年开展的“百母百仔”运动，要求一抓到底。同时明确提出:“集中力量搞春耕、接羔，一切妨碍这个中心工作的事都不办。”其时，正是全国“左”倾思潮反弹，“五风”重又泛滥的时候，乌兰夫没有追风而是继续在为人民生活操劳，在奋力抓农牧业生产，争取 1960 年能有个好收成，以备顺利渡过已明显暴露的饥荒和困难时期。乌兰夫布置了春季生产后，就去了包头和内蒙古西部产粮区巴彦淖尔盟的河套地区，深入基层，掌握第

一手材料。经了解情况后，5 月 13 日他在巴盟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在充分肯定巴彦淖尔盟的工作，表扬了他们已取得的成绩后，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具体领导，每件事情都要抓紧、抓狠、抓细、抓深、抓透”。5 月 17 日他又到巴盟主要产粮旗之一的杭锦后旗，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在该旗四级干部会上讲话，主要是讲粮食和群众生活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有关粮食问题的几条原则，即:第一条，粮食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哪里有问题就解决哪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第二条，一定要按政策办事，三项留粮(口粮、饲料、种子）的规定要执行。第三条，食堂(指当时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律执行“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政策。第四条，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有意破坏外，因一时认识不清曾瞒产私分，现在坦白报告的，一律不处分。第五条，确实不是瞒产和私分，而是自己勤俭持家节约的粮食，一律不许追要，自愿交出的应给予代价，并要表扬奖励，愿意留的听便。第六条，今年粮食征购实行包干办法，除包干任务以外，多打的粮食由基本核算单位分配处理；因灾不能完成征购任务的，依法减征减购。讲了这六条后，乌兰夫给杭锦后旗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关心群众疾苦，安排好人民生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用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精神来工作。同时还要求他们:要坚决贯彻少种多收和多种多收相结合的种植方针，除了实现基本农田“过黄河”（亩产 400 市斤）的奋斗目标外，要力争多种点地，多打点粮，使应种的地都种上、种好，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支援国家的需要。乌兰夫这次讲话，不仅推动了巴盟的粮食工作和群众生活安排，对全内蒙古自治区的粮食工作和做好群众生活安排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6 月 10 日至 18 日，乌兰夫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上海会议是“左”倾错误碰壁后转变的会议。会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加速发展农业；同时强调计划必须留有余地。北戴河会议主要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主要强调了抓好粮食生产。毛泽东讲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乌兰夫很赞成这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

乌兰夫参加了上海会议后，于 6 月 24 日至 7 月 2 日，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按照上海会议计划留有余地的精神，调整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各项指标。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敞开思想讲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讲了按这一指导方针安排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工作，讲了千方百计争取 1960 年农牧业大丰收；对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强调要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基本建设要坚决缩短战线，进行工程排队，保证重点工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特别强调了要把解决粮食和群众生活安排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乌兰夫多次给在机关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打回电话，一再叮嘱有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安排问题。最让他系心的是粮食问题。特别叮嘱要注意粮食的收、管、用，提出开展群众性的节约用粮，提出要抓粮食节约，又要按粮食政策办事。他还特别关心城市第一线工人的生活安排。7 月 16 日他给主管工业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杨植霖打电话，提出 1960 年粮食要统筹安排，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提倡粮菜混吃，靠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保证厂矿第一线的劳动力吃饱。北戴河会议后，在乌兰夫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地在党内外传达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乌兰夫在二届三次人代会上讲话，突出地讲了抓粮、抓钢，以此为中心开展全民增产节约运动；大办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安排

好城乡人民生活；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生产第一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充分地讲了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好“吃”的问题；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缩短基建战线，保证重点建设；发扬实事求是、雷厉风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生产第一线。“左”倾的降温和蛮干的收敛，使乌兰夫思想得以敞开。他放开了手脚按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抓各项工作，特别是当时最紧迫的粮食问题和与其直接相关的农牧业生产，以求战胜暂时困难，顺利渡过困难时期。

开完上述两个全区性会议后，紧接着他又接连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就近请来乌兰察布盟、土默特旗和呼和浩特郊区负责同志，听他们汇报秋收和粮食工作情况，研究压缩口粮标准，决定建立自治区和盟、市、旗、县各级粮食指挥部，并决定各级粮食指挥部都由第一书记挂帅，以加强全区粮食工作的指挥和调度，及时统筹解决有关粮食工作的问题。把这些应急措施确定下来并布置下去以后，他就下基层到第一线去了。

9 月 13 日，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机关干部一起，到呼和浩特郊区毫沁营子公社麻花板管理区参加秋收。劳动结束后，他同社、队干部和社员座谈，听过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后他说:庄稼长起来不容易，要力争做到长好的粮食颗粒归仓；农村要把 80%的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要办好食堂，搞好社员生活；干部要和群众同甘共苦。乌兰夫到郊区同群众一起参加秋收，特别是同他们促膝交谈，使基层干部和社员感到温暖亲切，很受感动。乌兰夫在西部就近到基层调研后，紧接着又去了哲里木盟。他到那里的农村看过以后说:农民的 400 斤口粮(一年）一定要留足；饲料地按政策不计产量、不计征、不计购；牧畜的饲料要按标准留足。人民公社要大集体小自由，要给社员自留

地，使他们能有养猪和养鸡、养鸭的条件。接着他继续北上，到呼伦贝尔盟视察。在那里同农垦部部长王震商谈了在呼伦贝尔盟建立粮食基地的问题。经过到呼和浩特郊区和自治区东部视察，乌兰夫对粮食问题心中更有数了。12 月 12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又召开部署粮食问题的全区电话会议，乌兰夫讲话时进一步强调了粮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粮食工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牵涉每一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头等政治任务，如处理不好，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要求各盟市主要领导同志务必关心粮食工作，切实抓好。

在抓粮食，抓与粮食紧密相关的农牧业生产方面，乌兰夫自觉地先走了一步，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他的想法和做法，同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后提出的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抓农业、抓粮食是一致的。先走一步，情况就大不一样。在 1960 年全国最困难的时候，内蒙古手中有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基本上没有挨饿，还调出了部分粮食支援国家渡荒。

10 月 23 日至 26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中央和毛泽东听了各省、市、自治区汇报农村情况后，感到问题严重。为了纠正和堵住“共产风”，会议之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乌兰夫早已盼望解决的问题。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态度的这种变化发自内心地高兴。他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的第二天，即 10 月 28 日，就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谈了自己的认识，并组织常委同志们讨论。与会的各常委在乌兰夫发言的带动下，思想活跃，发言热烈，一致拥护《紧急指示信》的精神。认为《紧急指示信》中讲的十二条政策，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终于下了决心，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各盟、市，使他们能尽早掌

握中央精神和基层情况，做好传达贯彻的准备。乌兰夫和常委同志们的心情同样急切，于是决定当天晚上就开电话会议传达，还议定了传达贯彻的几条意见，其中主要是:

一、各盟、市组织检查团，深入公社检查公社化运动以来执行政策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发现的问题，立即停止“一平二调”，平调了的尽快退赔。二、各盟、市除掌握面上的情况外，要选择几个公社作为重点，直接派人去检查，结合面上检查的情况，分析研究哪些政策执行了，哪些政策没有执行，哪些政策被歪曲了，自己作了哪些错误的规定，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三、检查要同《紧急指示信》的宣传贯彻和粮食征购、群众生活安排、收益分配等当前工作紧密结合。《紧急指示信》的十二条政策深得人心，传达后，下边闻风而动。

11 月 3 日《紧急指示信》正式下达后，为全面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11 月 24 日至 12 月 4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为做到传达直接、快速，盟、市和旗、县委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扩大会议。乌兰夫在会上全文传达了《紧急指示信》，作了总结发言，还参加了讨论。会议第一天传达《紧急指示信》后，为引起与会者对“五风”等问题严重危害的认识，他强调指出:按中央指示检查，我们的工作上有不少问题，有的还很严重，其中首先是“五风”相当普遍，严重的地方已达到了破坏生产力的地步；其次是占用和浪费农村劳动力，有的竟超过农村劳动力的 50%；再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等。在这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要学好、吃透《紧急指示信》精神，坚定纠正当前存在的问题的信心，提高自觉性。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明年大丰收。在总结发言时，他全面分析了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形势，在肯定群众积极性和他们在农牧业生产上取得的成绩后，着重讲了过去在执行政策中发生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明确提出发展农村牧区生产力，

今冬明春农村牧区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贯彻《紧急指示信》，按其精神搞好整风整社，解决好粮食问题，安排好人民生活等。在乌兰夫主持下，会议经过认真学习，充分讨论，在吃透《紧急指示信》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实际，分别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和《关于牧区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队部分所有制，耕地、农具和95%的劳动力由生产队固定使用，坚决纠正“一平二调”，把过去平调的财物、土地、劳动力等全部退回给被平调的生产队。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是内蒙古自治区按中央统一部署，对农村牧区政策进行全面调整的起步，它为1961年及其以后的进一步调整，作了宣传动员和实际工作的准备。

《紧急指示信》的正式下达，解除了乌兰夫原来心存的不少疑虑，可以放开手脚按照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展开工作了。他以饱满的情绪，激情满怀地投入了《紧急指示信》的宣传贯彻，决心乘《紧急指示信》中十二条政策的东风，尽快刹住“共产风”，开辟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新局面。在这样一种心情驱动下，他不顾疲劳，不辞辛苦，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他即刻就近去了土默特左旗善岱公社了解基层情况，直接给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宣讲《紧急指示信》。土默特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也是他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他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更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群众也熟悉他。到了村子里以后，他自然地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群众和基层干部同他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向他提问和反映情况。他谈笑风生地给他们讲解《紧急指示信》中的十二条政策，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乌兰夫亲自了解了农村情况，知道了群众在想什么，知道了他们

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后，在善岱公社对社队干部说:“宣传贯彻《紧急指示信》,首先要从反‘五风’开始，重点是纠正‘共产风’。要通过贯彻党的政策把群众发动起来……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在《紧急指示信》里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五风’给党造成的不良影响，才能保证生产大发展。”他还对他们说:“要坚决纠正‘五风’，把公社整顿好。”在善岱公社实地调查后，乌兰夫返回察素齐，把土默特左旗旗委领导同志请来，就他在善岱直接听到、看到的农村存在的“共产风”等问题，从关心爱护出发，坦诚地批评了旗委主要领导同志。要求他们就农村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认真作自我批评，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检查自己，以启发教育广大基层干部。

进入 1961 年后，乌兰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已在内蒙古全区展开的整顿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和调整农村牧区政策方面，重点是继续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和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8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先召开工作会议是为九中全会做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九中全会定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在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乌兰夫对此感触很深。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中，他就多次从北京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同志，传达会议精神，着重讲了:请他们考虑三类社(问题多的）整顿问题，“大办水利”占用农村劳动力多的问题；提出制定计划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各项经济指标要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要把制造小农具、辅助贫困队和牧区建设的基金、经费使用好；粮食搞低标准，瓜菜代应该有个杠杠，不能太低了。在中央开会期间，乌兰夫及时传回的精神和提示，对在机关工作的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很有启发，使

他们对贯彻中央会议精神能早有思想准备。继中央工作会议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就忙起了传达贯彻。

1 月 24 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了简要传达。传达后他提出:传达贯彻中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要联系内蒙古的实际，着重检查自治区党委对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自治区党委对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和领导作风等方面的问题。1 月 25 日至 2 月 9 日，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全面传达贯彻中央两次会议的精神。因为八届九中全会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乌兰夫对其精神的传达贯彻十分重视。为了把九中全会和为其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好，在召开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之前，在乌兰夫统一组织下作了充分准备。他还特意让主管农村牧区工作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准备了《争取 1961 年农牧业丰收的意见》和《1958 年到 1960 年农牧业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状况》两个材料，提交会议研究讨论。同时还让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成员各准备了一篇如何贯彻“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言。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出现这一转折，是多数人盼望已久，是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的共同心愿，所以大家对八届九中全会的传达贯彻都很关心，都很重视。乌兰夫在全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九中全会精神时，特别突出地强调其核心内容和主导思想。这就是: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乌兰夫着重讲了各地汇报和议论时毛泽东的插话。毛泽东插话包括农村工作和计划问题两个部分，乌兰夫传达时把主要精神都讲了。这就

是:

关于农村工作部分，谈到退赔时毛泽东说:一定要坚决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谈到自留地问题时毛泽东说:希望多留一点，5%是否少了，7%怎么样?谈到养猪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谈到整风整社问题时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谈到“大办”时毛泽东说: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指 1960 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来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谈到社有经济时毛泽东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谈到粮食价格时毛泽东说: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交换来的。谈到成绩和错误是“几个指头”时毛泽东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搞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谈到日子如何过时毛泽东说: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

关于计划问题部分，谈到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时毛泽东说: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谈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毛泽东说: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休整一样。谈到 1961 年没有提“大跃进”时毛泽东说:1961 年可能是原地踏步，休养生息。谈到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时毛泽东说: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假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谈到调查研究时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开得比过去几次都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从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乌兰夫对毛泽东在插话中谈的这些观点很重视。他认为这是会议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传达得十分认真。

为了加深与会人员对中央两次会议精神的理解，1月28日下午，乌兰夫在全委扩大会议上谈了自己参加中央这两次会议的感受和体会。他说这两次中央会议，特别是为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民主气氛浓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讨论，通过回顾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次“大跃进”发生的问题，明白了不少道理，提出了不少新思路。他很有感触地说:“参加这两个会议，如同进了一次训练班。”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乌兰夫讲了他参加这两次中央会议的三条体会。这就是:第一，必须自觉地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农轻重次序来安排经济建设；第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在内蒙古自治区来说，必须树立保人、保畜、保丰收的思想；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每个干部都要有十足的革命干劲，有生龙活虎的工作作风。这三条，是乌兰夫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也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付出和磨炼。它凝重真实，意义深远。

2月9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他站在中央两次会议精神和客观认识事物的高度，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形势。他认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形势是好的，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不可低估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大跃进”以后出现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重工业上去了，农业没有跟上，轻工业和手工业被挤了，结果造成了城乡人民的粮食和日用品供应紧张，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浮肿病；再就是人民公社在政策上发生了偏向和错误，其中主要是“共产风”，影响了农牧民的积极性。面对现实，为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他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全党同志团结一心，坚决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按“十二条”政策认真搞好整风整社。与此同时，要按照中央两次会议的精神，安排好生产和群众生活，抓好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紧缩开支，压缩城市人口。总之，就是要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努力开辟群众革命和生产的新局面。

为开辟新局面，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乌兰夫就忙抓各项工作的落实。2 月 24 日、3 月 1 日和 3 日，在他主持下接连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分别研究了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林业、煤炭、轻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以及市场供应和建立粮食、副食供应基地等问题。3 日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他又亲自部署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安排。在部署时他强调，这两项工作，要同整风整社结合，在整风整社带动下进行。在整风整社中，要重点抓好退赔兑现和群众生活安排问题。有关生活安排的问题要给群众交底，依靠群众度荒。在农村，要特别注意每天口粮不足五两地区的群众生活；在城市和矿区、林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群众生活，保证按定量让职工吃够吃好。在粮食问题上，必须服从统一调度。3 月 9 日，再次召开全区电话会议，他再次讲了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

3 月 11 日到 23 日，乌兰夫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和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3 月 11 日至 13 日，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开会，称“三北会议”；

中南、西南、华东三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在广州开会，称“三南会议”。14 日，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员去广州，南北两会合到一起在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分别召开的“三北”“三南”会议和合并后在广州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都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三北”“三南”会议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届九中全会的继续和伸延。如果说 1960 年 10 月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农村问题严重，急速召开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反“共产风”，起草和发出《紧急指示信》是对“共产风”急刹车的话，12 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和 1961 年 11 月八届九中全会就是茅塞顿开，开始从整体上考虑如何系统地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以求尽快走出困境。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则是依照这一主旨，拟从人民公社体制入手，先解决农村的问题，以为整体问题的根本解决打基础。正是出于这样的动因和初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决定把这一《条例》草案直接发到农村党支部，组织全体社员讨论。

乌兰夫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组发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内蒙古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的情况，根据自己的体会，讲了调查研究与搞好工作的关系，很受与会同志欢迎和重视。乌兰夫很赞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认为这是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乌兰夫赶回呼和浩特后，先于 3 月 27、29 日，分别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和全区电话会议上传达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着重讲了《条例》草案和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为取得如何在内蒙古贯彻推行《条例》草案的第一手材料，给在全区

全面传达贯彻作准备。他于 3 月 3 日、4 月 2 日至 8 日，先后到呼和浩特郊区府兴营子大队和土默特旗北什轴公社塔布赛大队去作调查研究，并就调研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就社队规模、供给制、食堂、口粮分配等问题，根据与社员群众及基层干部座谈情况，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公社规模一般相当于原来的乡比较合适，但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致，也可以小于原来的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合适。供给制只给予“五保户”实行，困难户给予照顾，其余一律按劳分配。关于口粮等的分配，他认为应该将粮食、山药(土豆)、蔬菜一次分到户，以利社员安排生活和计划用粮。为在内蒙古全区广泛深入地传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按其精神检查总结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 4 月 15 日至 22 召开了农村、牧区三级干部会议。乌兰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并由他在会上全面系统地传达了中央广州会议精神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会议进行中他多次插话和讲话。在插话和讲话中明确指出:《工作条例》是《紧急指示信》的继续和发展，《紧急指示信》中的十二条政策主要是解决“调”的问题，即刹住“共产风”;《工作条例》中的六十条主要解决“平”的问题，即解决公社过分集权，不顾生产队和社员间的不同情况，一律拉平，强行搞平均主义。他说:“十二条”刹住了“共产风”，再用“六十条”纠正公社集权和平均主义，就能把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这两个文件把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调整过来，不仅对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巩固人民公社也有重要作用。在谈到调查研究时乌兰夫说:“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都要认真做调查研究。”

在乌兰夫主持下，这次会议总结了公社化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的经验教训，集思广益，拟订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贯彻执

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补充规定》和《内蒙古牧业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补充规定》和《牧区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发挥生产队的自主权，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实行作业小段和季节包工、包生产、包生产费用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取消公共食堂，废除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恢复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实行民主办社，反对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这两个文件，用规定和制度扩大了生产队和社员的活动空间和应有权利，限制了公社集权和干部瞎指挥。《补充规定》和《牧区条例》(草案）下达试行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遭到破坏的农牧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活跃了农村和牧区经济。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依然是农村问题，即以解决吃饭为主和与吃、穿、用直接相关的问题，只在会议后期涉及了一下城市和工业方面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了《条例》修正草案，决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实际上等于取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会议拟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三年内城市的人口减少 2000 万，当年减 1000 万。乌兰夫很赞成这次会议精神。他在这次会议上心情比较舒畅，精神上也比较轻松。这是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时，在内蒙古，特别是牧业区，动得迟步子稳；而在纠正错误时，抓得早，动作快。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曾多次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常委，提请他们认真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并在稳妥的原则下，早抓、快抓这方面的事，不要再等待中央下指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又召开了三级(自治区、

盟市和旗县）干部会议。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乌兰夫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如何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他强调抓好三件大事，即:一、组织发动全党、全民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制度迅速得到稳定，使农村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彻底解决。二、坚决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调整城乡关系，贯彻农轻重方针，增加农村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三、摆正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要拉长农业、轻工业和手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重工业要退够，然后按比例前进。要先保农业，再保轻工业、手工业，也就是保市场，然后才保重工业和其它。要按照这种精神，研究农轻重及其它的正常比例，按照计划搞建设。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全内蒙古自治区按照乌兰夫讲的上述精神和要求，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乌兰夫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习惯地称其为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工业问题、高校问题、干部轮训等。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产生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

这次会议民主气氛比较浓，大家的心情都比较舒畅。毛泽东承认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碰了钉子。他认为 1961 年的经济形势已到“沟底”，今后是“天天向上”。听了毛泽东这样说，乌兰夫和其他与会者一样，心中感到轻松、敞亮，特别是听了周恩来谈粮食，李先念谈市场和物价，李富春谈计划，薄一波谈工业，陆定一谈高教，邓小平谈对形势的估计等等，他心里更是感到明快、亮堂，好像是他们把他早就想说的话一下子都说了出来。他认为这次会议对“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讲得深刻、透彻，而且是着眼于全方位。在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方面，也表现出了更大的气魄和决心。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会议进行中，他不停地在想内蒙古怎么办。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几乎是每听一次中央主管领导人的专题发言，就给自治区党委常委或书记处的同志打一次电话，给他们传达和谈自己的感受和意见，恨不得让他们马上就有同他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在华北地区的小组会上他兴致勃勃地发言，除了讲在内蒙古建立商品粮基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耕畜，发展大兴安岭林区森林工业等外，着重讲了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问题。他说，牧业区是国家发展畜牧业的基地，应当加大国家对牧区建设的投资，把发展畜牧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给予全面扶持。工、农、畜产品价格之间比例要合理，现在牧民卖一张牛皮换不回一双蒙古靴子，卖四只羊的钱不够买一身毛衣，这对牧民是不公平的。他提出在部分工业品和农产品提价后，牲畜和畜产品的价格也应该适当提高。他的发言在华北组引起了重视和关注，并载入了会议《简报》。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正是秋收和征购粮的大忙季节。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后，于 9 月 22 日至 29 日，即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部署和安排了秋收和粮食征购工作。为保证在粮食问题上不出什么事，召开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粮食工作。在这一周中，乌兰夫把主要精力贯注在了粮食问题上。常委扩大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他插空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专题研究了粮食征购政策、办法和数量；26、27 日，又插空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粮食和煤炭的产、供、销，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干部和群众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认识；28 日，他在全委扩大会议上讲粮食问题，并主持讨论如何完成全区粮食征购任务；29

日上午，又插空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根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经再次研究后确定了全区粮食征购方案；下午，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再议论粮食征购方案，下达和具体落实征购任务。

穷家难当，吃饭第一。在困难已达“沟底”时，为了让内蒙古人都能有饭吃，乌兰夫可谓是费尽了心血。在他带领下，自治区党委一班人为此做出了最大努力。

把粮食工作安排部署好以后，乌兰夫于 10 月 4 日至 8 日，又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更大范围内传达贯彻 8、9 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委扩大会议上，对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贯彻，乌兰夫强调:中心是研究如何尽快地扭转内蒙古经济形势，推动自治区的经济建设更好地向前发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认清形势，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此基础上，安排部署并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主要工作。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经过学习和讨论，把全区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以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总结了内蒙古自治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方法。集中与会同志讨论的意见，乌兰夫在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他归纳了七条主要经验教训，即:一、制订经济建设计划，既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必须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要全面考虑综合平衡，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必须保持各经济门类之间的正常比例。二、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方面的建设搞过了头，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快过猛，吃商品粮的人多了，生产粮食的人少了，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造成了供应紧张。三、建设中有盲目性，基建战线拉得过长，建设重点不突出。四、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五、有些方面的工作考虑地区特点不够。六、集中统一和分级管

理的原则没有处理好。七、认真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不够。今后怎么办?乌兰夫在总结发言中提出: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按计划搞建设，全党团结一致，服从大局，依靠群众，战胜困难，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国民经济，争取自治区经济的逐步好转，积极为经济建设新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乌兰夫的这一初步总结，为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和进一步深入总结，奠定了基础，产生了良好影响。

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至是年年底，乌兰夫的注意力依然是粮食问题，并开始考虑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10 月至 11 月间，他除到土默特旗沙尔沁公社实地调查粮食征购和群众生活情况外，又几次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研究粮食问题。根据他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粮食部门的意见，于 10 月 26 日、12 月 3 日两次召开全区电话会议，由他讲粮食征购和农副产品收购，要求各盟、市一定要做好工作，千方百计完成今年粮食征购任务。为使明年工作能早有准备，12 月 6 日至 15 日，他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减少城镇人口和 1962 年工农牧业生产。他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和讲话中，把压缩城镇人口提到了关系社会稳定和各方面关系的高度，要求把它作为扭转被动局面的一项重要措施，务必做细做好。对于 1962 年的工作，他指出关键是争取农牧业丰收，同时搞好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手工业和煤炭、木材生产，搞活市场，保证民需。

由于 1961 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乌兰夫关注了粮食工作和农副产品收购，及时安排了以农牧业为主的第二年生产与减少城镇人口，不仅保证了“沟底”年的平稳渡过，也为 1962 年的调整和逐步扭转经济上的被动局面奠定了基础。

12 月 20 日，乌兰夫赴北京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又接着参

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12 月 20 日开始，第二年 1 月 10 日结束，其任务是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 年 1 月 11 日开始，2 月 7 日结束。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从中央到县有 7000 多人，所以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在特殊时期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振作精神，鼓舞干劲，在此基础上统一行动，再造辉煌。这次会议是在有了农村“十二条”和人民公社“六十条”，事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召开的，所以思想、政策等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开法也与以往不同。会议的主报告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会议一开始，就把经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书面报告》稿发给了全体与会人员，让大家看后讨论，提修改意见。然后再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修改好以后，在会议结束时让大家带回去。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晚上，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听过汇报后说:“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因为会议开始后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稿讨论得很热烈，于是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三天提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充分发言，认真讨论《书面报告》稿。

内蒙古参加这次大会的自治区、盟市和旗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有 100 多人，是大会的一个小组。内蒙古小组的会议在中央和大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乌兰夫主持。按照会议统一安排，内蒙古小组同整个会议一样，一开始就阅读、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稿。讨论情况也与整个会议一样，同志们看过《书面报告》稿后就兴奋起来，觉得它把自己早就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大家都很自然地被引入了对近几年工作的回忆和思考，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想往外倒，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乌兰夫因势利导。1 月 13 日，他传达了毛泽东建议会议延期后的安排，讲了自己对这次会议目的和重要意义的认识，动员大

家充分发表意见，把想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之后，又用了两周时间开小组会，深入地认真讨论《书面报告》稿，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提出修改意见。中央政治局和由它领导的《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与小组讨论同步，吸收小组讨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书面报告》稿。1 月 25 日，出来了几经易稿的《书面报告》修改稿。1 月 27 日刘少奇在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大会上作报告，但并不是读《书面报告》的修改稿，而是另外讲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工作作风等几个问题。对于国内形势他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引用了湖南一个农民的说法叫“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突破了毛泽东经常把成绩和缺点错误比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在讲党的作风问题时他说:“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刘少奇讲完后，毛泽东说:“明天(28 日星期日）不休息，我们争取 30 号搞完……如果 30 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个 31 号。总而言之，31 号无论如何要搞完。”听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后，与会者都更加振奋，讨论更加热烈。内蒙古小组的同志与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一样，听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更增加了敢于实事求是讲意见的勇气。在乌兰夫主持下，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发言更踊跃，讨论更热烈，似乎还有不少话想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在讲话中他说:“现在有一个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有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好了……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错误之气，

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听了毛泽东这番话，大家甚为激奋，全场雷动。他的这次讲话，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乌兰夫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内蒙古小组会上又作了一次动员。他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畅所欲言，多批评，多揭发，帮助自治区党委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代表自治区党委保证:对提意见的同志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棒子。他的动员，使内蒙古小组的会议更加活跃了起来。大家敞开思想，把心里的委屈、肚里的闷气都放了出来，给自治区党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31日，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表示内蒙古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一致赞成刘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决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加强团结，加强纪律，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2 月 6 日，在大家把想说的话都说了以后，乌兰夫就自治区党委和个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内蒙古小组全体会议上作了检查。在检查中他着重谈了 1958 年以来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一、在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上，计划过大，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脱离了实际。二、为了保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倾听下级组织和干部的不同意见，态度生硬、方法简单地批评指责下级，强迫命令，瞎指挥。三、思想上主观片面，自以为是，不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详细地了解情况，想当然地处理问题。四、为急于改变自治区的落后面貌，而不顾实际可能性，产生了盲目的积极性。五、反“右倾机会主义”扩大化，错误地批判甚至处分了一些好同志。检查了这些问题后，他说:“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我这个班长有责任。但我们绝不能白交学费，我和自治区党委有决心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决改正错误，和全区人民共同把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搞得更好。”2 月 6 日，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全体与

会同志一起参加大会，先后听了邓小平、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更加明确地认清了形势和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坚定了胜利信心。

2 月 7 日，开了近一个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胜利结束。这次大会，是一次总结经验的大会，也是走向未来的动员大会。对全国的整个形势作出了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估计，确定了 1962 年的任务主要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在整个会议期间精神很饱满，经过这次会议，旗、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鼓足了干劲。

2 月 8 日，乌兰夫召集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盟、市和旗、县委书记开会，布置回去后如何传达贯彻这次大会的精神。他特别强调: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同抓当前农牧业生产紧密结合。在农村，继续抓好整风整社，春耕生产，同时要抓好粮食征购的收尾工作。在牧区，抓好抗灾保畜、接羔保育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夺取今年畜牧业大丰收。在工业上，认真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为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扫除思想障碍；抓好调整工作，落实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逐步扭转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被动局面。

这次大会以后，乌兰夫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全身心地抓各项实际工作。他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后，先后在不同范围传达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几次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和常委会议上谈自己参加这次大会的认识和体会。3 月 16 日他特意到呼和浩特市委全委会议上去讲如何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他们:一抓学习文件，深刻领会精神；二抓好当前工作。对于当前工作，他说:关键是通过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抓好工农牧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安排和市场供应。24 日他又给自治区直属机关厅局长

以上干部讲，要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慎重地考虑我们面临的困难，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特别是大力抓好农牧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加强财政管理，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好市场供应和城乡人民生活，从各方面解决吃、穿、用的问题。5 月 22 日至 29 日，他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在讨论中他尖锐地提出:“不减人活不下去，这个问题很紧迫。”在谈恢复和发展农业时他说:“对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应该规定下来，对牧区小商品供应要特别注意，应有保证措施。”他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强调一定要巩固已定下来的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任务。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他强调做好生产队的工作，并提出这是扭转困难局面的关键。6 月 8 日，他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又重点讲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和发展国民经济。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争取农牧业有个收好成；采取一切措施精减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争取工业生产尽快转入正常；集中主要精力解决各族人民吃、穿、用等最迫切的问题。10 月 25 日他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紧接着又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他在全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提出，今冬明春主要抓:一、粮食征购、入库和供应；二、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三、搞好工业调整，工业为农牧业服务；四、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促进城乡交流。

从上述乌兰夫的这些主要活动可以明显看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紧紧抓住了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并坚持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工作，而其中最紧要的是抓住了搞好生产，解决吃穿用。无论是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还是调整

经济等，都是围绕着这一最关紧要的事展开的。正因为乌兰夫这样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地抓了各项工作，在 1962 年这一困难时期乍暖还寒的年份，战胜了种种困难，赢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整个形势的好转，为 1963 年以后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入轨，走向正常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年困难”和被迫调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内蒙古，虽然乌兰夫主张和坚持从实际出发，但它不会，也不可能脱开中央主导思想的总轨道，与兄弟地区相比，“左”倾错误对它的影响只不过有程度上的不同，不会有质的差别。前边几次说过，乌兰夫主持的内蒙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行动迟，步子慢；在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动手早，行动快。这一早一迟，一快一慢，情况就大不一样。“左”倾错误的泛滥，对内蒙古人民生活有影响，但要小得多，在“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肚子。

在困难和调整的三年中，乌兰夫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早在 1958 年底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后，他就高度重视，开始纠正。前边我们也已谈过，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 1959 年起他就更加重视农牧业生产和粮食问题，特别是接受 1958 年丰产不能丰收的教训，1959 年秋季他不顾庐山会议批“右倾”后的“左”倾反弹，适时地狠抓了秋收和粮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举动是英明的，它为以后渡过三年困难垫了底。1960 年到 1962 年的三年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要同抓农牧业生产、抓粮食、抓人民生活安排联系起来，都要使其以促进和服务于当时他重点抓的这几项主要工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1960 年，主要是后半年，特别是 10 月以后，在紧抓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上述几项工作外，通过贯彻农村政策“十二条”，先重点解决了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问题；1961 年，除继续抓关系人民生活的几项主要工作之

外，通过贯彻农村“六十条”和整风整社，重点解决了公社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平均主义，同时调整了国民经济各门类的比例关系；1962年，借“七千人大会”的东风，在前两年已做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依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以及其它各项事业又进一步做了全面调整。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乌兰夫和以他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完成了调整任务，胜利地渡过了困难时期，使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又重新进入了正常轨道。

在乌兰夫主持下，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明确规定了1961年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的比例关系和今后一定时期的发展速度，这就是:工业与农牧业的比例为5.5:4.5,其发展速度的比例为1.2:1;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为6:4,其发展速度的比例为1.25:1；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3:1；粮食征购额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为30%-35%。为达到这样的调整目的，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压到了2.2亿元，比1960年的12.6亿元减少10.4亿元，降幅高达82.4%。国民经济的积累率由1960年的56.25%，降到了1962年21.9%。到1962年底全自治区减少职工80多万人，城镇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148万多人。这些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数据，适合当时内蒙古国民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些大幅度调整的比例和数据中可以看出，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的调整决心，也表现出了当年他们实现这一调整任务的艰难。

在三年困难和调整中，乌兰夫还做了几项很值得一提的事。这就是:

其一，乌兰夫有很强的整体观念和国家观念，他总是先想到中央和国家的困难，把中央和国家的困难摆在前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

期。1962 年 4 月 30 日他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曾说:“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坚持内销服从上调。自己不够吃怎么办?一是增产，二是减人(压缩城市人口)。其它物资的调拨，必须执行‘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总之，要使自治区的财富成为全国的财富，首先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话是这样说的，事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先以粮食为例: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的粮食产量也在连年下降，但每年都数量不等地向中央上缴粮食，三年共上缴了粮食 10.49 亿斤。虽然上缴数额并不算多，但在困难时期这样做，反映出了乌兰夫和内蒙古人民对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一份心意。再看一下外调耕畜的情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全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力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当时作为农村生产力主要构成部分的耕畜，损失更大。为了帮助兄弟地区解决这一困难，内蒙古自治区年年向兄弟省、市输送耕畜，仅 1961 年 8 月至 1962 年 8 月就输送出了 5 万多头，帮助兄弟地区解决了燃眉之急。正是这种全局观念，正是在困难时期这样为兄弟地区“雪中送炭”，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为内蒙古自治区赢来了模范自治区的称号。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殊荣，更是对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达十九年之久的乌兰夫的充分肯定。

其二，困难时期关爱和救助南方孤儿。下边摘录一段乌兰夫关于这件事的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难关积极想办法。1959 年底，我在北京开会遇到了康克清同志，她对我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我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

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康克清同志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后来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年初他问起了我，我把与康克清同志商量的意见和内蒙古接收、安排的设想及准备情况给他做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很高兴，他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我说：“请您放心，一定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我们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 1960 年到 1961 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的只有 2、3 岁，大的不过 7 岁，来时多数身体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领。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黑圆胖的脸蛋，更加讨阿妈、阿爸们的喜欢。这批孩子现在已经 30 多岁了，他们讲着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人，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如不知道这段历史，谁能相信他们的出生地在祖国的南方。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办的这件事，就当时讲，为这批孤儿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就发展蒙古民族，繁荣牧区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乌兰夫当时为孩子们想得很细，是着眼长远，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是为这些孩子出生的南方省、市

排忧解难，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解除抚养这批孤儿的重担。此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繁荣牧区人口，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在这方面，乌兰夫脱出了纯血缘观念，给“民族”这一概念注入了鲜活的新意，即不论血缘如何，只要你从心理和生活等诸方面融入了这个民族，你自然就成了这个民族中不可争辩的一员。其实在民族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也不是纯以血缘为特征的。正是乌兰夫这种对孤儿的关爱和他的民族观，内蒙古大草原才接纳和养育了这批当时陷于困境的南方孤儿。在周恩来的支持和草原牧民的响应下，乌兰夫办的这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流传于世。

其三，困难时期心系知名学者、专家。在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和专家生活清苦，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情况后，他以邀请他们到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的名义，为他们提供休息、补充营养、恢复体质的机会。1960 年至 1962 年，他先后邀请几十名学者、专家到内蒙古参观访问。1960 年，首先请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组织的一批史学家到内蒙古，他亲自款待接见，给他们介绍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要他们放松精神，到处走走看看，吃好、住好、休息好。这批史学家在内蒙古逗留 40 多天，不仅领略了内蒙古特有的北国景观和风情，还亲身体会到了内蒙古人的淳厚、豪放、热情与好客的气质和情愫。更令他们难忘的是营养状况都有改善，普遍体重增加、体质增强。他们回去后，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特意给乌兰夫写信，代表到内蒙古参观访问的全体史学工作者，对他的邀请和接待表示感谢。这批史学家到内蒙古的消息不胫而走，“内蒙古的草原美”,“内蒙古的羊肉肥”,“内蒙古人真实在”等等称颂内蒙古的美言，由他们在京城传开。一时间出现了“内蒙古热”。一些久居京城没有到过内蒙古的人，都想来内蒙古看看。继此之后，乌兰夫又于 1961 年邀请范文澜、叶圣陶、曹禺等文化名家，1962 年著名作家老舍等

到内蒙古参观、访问，同样受到乌兰夫和所到之处的内蒙古人热情接待。此外，在此期间，自治区党政机关各部门，按照乌兰夫的意愿，还对口请过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来内蒙古，他们也都受到同样的关照。凡是三年困难时期来过内蒙古的人，使他们最难忘却的是他们的“体重的增加和体质的增强”。当时，不论带着什么样的使命到内蒙古来，人们都风趣地说是来“改善生活”，是来“抓膘”。那几年，在京包线上乘车的人，常常可以听到东来西往的乘客饶有兴趣地讲到内蒙古“抓膘”的趣事。这种情景已过去，这些故事已成历史，但通过这样一些具体事例回头看困难时期的乌兰夫，更显出了他在这样一些平常事情上表现出的不平常。

二十二、在再调整的三年和“四清”中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是在经过 1960 年以来将近三年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已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一次对我国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重要会议。

在这次全会之前，先于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随后，于 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又在北京召开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接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定了调子。

9 月 24 日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会议共开了四天，天天都是开大会，听中央领导人讲话或大区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发言。在这次全会上，乌兰夫心情沉重，只听别人讲，自己没有说话。会后怎么办?他做了认真思考，抉择依然是老办法，既保持一致，又从实际出发，干自己应该干的事。

10 月 8 日至 25 日，在他主持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由他全面传达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工作会议的第一天，他就明确提出要集中讨论农业问题和粮食供应、精简机构等。在分组讨论时，经他引导，与会人员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他所要求的方面来。为统一大家的认识，会议最后一天他作总结发言时，特别强调了: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是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集中全自治区的力量支援农牧业生产，加速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步伐，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到来打好基础。紧接着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又召开自治区党委

一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几个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文件。经过认真学习，联系当地实际充分讨论后，乌兰夫综合大家的意见，于 11 月 3 日在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大会上作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他突出地讲了 1962 年冬和 1963 年春要重点抓的主要工作，这就是:一、搞好粮食征购、入库和供应工作；二、进一步抓好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三、进一步搞好工业调整和为农牧业服务的工作；四、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促进城乡交流等。这两次会议的主题和侧重点，充分说明了乌兰夫当时重视的依然是经济工作。他的着眼点是国民经济调整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这也是毛泽东讲过的。而毛泽东注重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工作会议，是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途经河北、河南到南方，沿途找一些省委书记谈话时，发现多数省都依然在忙经济调整方面的事，只有湖北的王延春、河北的刘子厚汇报中谈到社会主义教育，即他关心的“阶级斗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正是毛泽东为把全国引上他所希望的“阶级斗争”轨道而动议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提出的“五反”，就是在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统称“四清”。其实，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因“包产到户”引起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可是，这次工作会议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却没有制定文件，只是在会上印发了湖北和河北两省委分别写的两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讲话时，对这两个省的做法和这两个报告大加赞扬，并

提出让各地研究、效法。同时他还讲了“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最后他又嘱咐大家说:“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很显然，毛泽东是想用这种方法引大家上社会主义教育，即“阶级斗争”的道路。可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愿,这种方法并不那么灵。

对谈经济工作反映灵敏，对讲“阶级斗争”反映“迟钝”，似乎是多数人的本能。乌兰夫就属于这个范畴。就在这个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发言时重点讲的还是经济形势。他说“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整个形势的彻底好转。”还说:内蒙古自治区要抓的主要工作是: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特点安排建设；二、在粮食生产上，今后的重点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三、注意牧区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四、狠抓农牧业生产的增产措施；五、继续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这同毛泽东没有明明确确讲出来，但实际上是这次会议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有距离的。

3 月 20 日至 30 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乌兰夫当选(连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代表大会之前，乌兰夫主持召开预备会议，由他传达了 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代表大会上，他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题为“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为争取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全面总结了自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来 6 年的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面临的任务，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行动起来，奋发图强，为实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新一届自治区党委产生后，在乌兰夫主持下，于 4 月 4 日至 11 日连续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根据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他同常委们一起，全面回顾和检查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着重研究贯彻中央方针、

政策如何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的问题，提出了今后要多做调查研究，认真学习，深入实际，努力实践。5 月 14 日，他又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特请农牧和财贸两个系统的厅、局党组负责人参加，听他们汇报了各自系统开展厉行节约和改善经营管理与发展生产方面的情况及问题，要求他们努力把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

2 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4 月间他南下途中看到保定地委关于“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后来被称为小“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非常感兴趣，给予了很高评价，提出了“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接着，他又批了几个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但仍没有引起普遍注意。于是，他下决心搞一个专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立时指定专人起草，并把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等主要领导人召到杭州，在他主持下开会讨论修改。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5 月 20 日发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下，5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召开第三次华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专就按中央这一《决定》的精神检查部署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作为指导三年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这一中央《决定》，核心内容是讲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按照这种理论，提出了一套与土改时无异的办法，用来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这使很多人感到很难理解，但又不能不跟。就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在华北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谈了自己对中央《决定》的认识，就内蒙古自治区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作了检查。他说:“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离中央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表示今后要把运动引向深入，适当的时候召开旗、县以上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决定》，提高旗、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认识，并组织力量到农村和牧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在华北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乌兰夫还就内蒙古自治区农、林、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向华北局并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讲了自己的认识和今后准备怎么做。但在实际工作上，他的注意力还是在经济工作和生产上。

9 月 6 日至 27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个《规定》（草案）和 5 月 20 日中央发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样，都是写了十个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习惯地称这个《规定》为“后十条”，称 5 月 20 日的《决定》为“前十条”。中央之所以开这次会议制定“后十条”，是因为“前十条”发出后，在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了政策界限不清，斗争过火，打击面过宽等问题，想通过“后十条”对一些问题明确政策界限和具体做法，以利运动健康发展。前后两个“十条”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观点，不同的是“前十条”抽象原则，“后十条”具体繁琐。两个“十条”曾同时在基层宣读，向人民公社社员广为宣传，对农村“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

由于乌兰夫的慎重，5 月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后，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上还没有动起来；6 月华北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虽然作了检查，但会后也没有马上动作。所以 9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的有些地方发生的问题，内蒙古还没有出现。由于这种情况，乌兰夫这次会上比较轻松。他在这次会议的华北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在全体会议上也发了言，两次发言重点讲的都是内蒙古当前

农牧业生产的情况及发展远景和拟采取的措施。此期间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时，也主要是谈的这方面的问题。在全体大会上发言时，他针对当时我国同苏、蒙两国关系紧张的现实，着重讲了边疆牧区建设和以加强牧区建设稳定边疆、影响对方强化边防的构想。为了引起与会者对他构想的重视和认同，他着重从发展生产和加强边防的关系上，讲了内蒙古牧区建设的意义。他说:“内蒙古拥有全国最大的草原，有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无论是从边防还是从生产上考虑，都应该把边疆牧区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都要贯彻执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贯彻这样的方针，才能加快速度，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后十条”是明确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个中央文件，在讨论这样一个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发言的侧重点依然是建设和生产，只不过是把牧区建设同当时所说的与“苏、蒙作斗争”联系在了一起。

11 月 2 日至 9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粮食过关、牧区建设和加强边防。乌兰夫在会上多次发言、讲话，并作总结。在他的发言、讲话中谈到粮食问题时说:“粮食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农业没有过关以前，我们国家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就不会缓解。因此，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谈到农牧业生产的方针问题时，他说:“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起，就是农牧并重，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支援国家闯过粮食关要有两条:一条是多拿出些商品粮给国家；一条是调出大量耕畜和肉、奶、毛、皮等畜产品给国家，帮助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在谈到边境牧区“反修斗争”时，他说:“我们的方针有三条: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边民生活，改善供应；二、政治挂帅，加强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三、军事准备，加强边防、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在作总结发言时他强调说:“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杭州会议精神，深入开展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把自治区的各项工作做好。”这里说的“三大革命运动”，是5月7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批示时提出来的，原话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几句话作为“经典”，后来又作为“最高指示”，在全国盛传过几年，当时很具有号召力和震撼力，乌兰夫特意引用了它。在总结发言中他还强调:“重点抓好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争取明年农牧业丰收，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其次是继续进行‘五反’、‘四清’和反修、防修、挖修的斗争。”

这时候有的地方已热火朝天，乌兰夫则认为，内蒙古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应同以往一样“慎重稳进”。直至1963年下半年，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搞国民经济调整和农牧业与工业生产。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他才刚刚考虑怎样搞试点，以取得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的作法和经验。

在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的前夕，乌兰夫才下决心在乌兰察布盟卓资县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为保试点成功，在他主持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决定，让自治区党委主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铎到卓资县，亲自参加并领导试点。要求试点工作把中央精神同内蒙古及当地实际结合起来，为在全区推开社会主义教育提供经验。这次试点，虽然执行的是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但在从实际出发，“慎重稳进”的一贯方针指导下，既

贯彻了“前十条”的基本精神，也没有出什么大漏子。对卓资县社教试点的情况，王铎有这样一段回忆：

1963 年 8 月，我到乌盟卓资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到 1964 年春结束，共搞了 5 个多月。参加试点工作队的，有自治区、盟、县三级干部 30 多人。这次试点主要依靠县、社干部进行，县委书记高崇林、副书记李振湖、张万金始终参加。同时，区党委组织部还在这里搞党员登记试点。

这次社教（试点）工作，按《前十条》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为主要内容。工作分准备、四清、建设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抓生产入手，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干部“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数干部，训练干部，进行阶级教育，访贫问苦，划阶级，组织阶级队伍；四清阶段，清经济，抓生产，开展对敌斗争；建设阶段，进行组织建设，整顿与发展党、团、民兵组织。

卓资县经过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以后，整个形势较好。但问题也不少，当时的说法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比较严重，表现在：①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全县 79 个大队，有四类分子 3217 人，35% 有破坏活动；②投机倒把、盗窃集体财物；③干部严重“四不清”。

社教试点工作就是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上述方法进行的。经过 5 个月的工作，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教育了干部，改善了干群关系，重新组织了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教育提高和重新登记了党员，进一步贯彻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政策，改善了公社的管理，推动了生产。

卓资县试点完了以后，自治区党委根据试点的经验，从 1964 年秋冬铺开第一批农村“四清”，计划每年一批，到 1967 年三批全部搞完。

王铎的这段回忆，客观地反映了在乌兰夫领导下，内蒙古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开始阶段试点和规划的情况，也说明了乌兰夫如何按照自己的认识，既同中央保持一致，又从实际出发，比较灵活巧妙地使“左”倾错误在内蒙古的危害缩到最小。

1963 年 11 月 14 日，经毛泽东同意，也是按毛泽东授意，在刘少奇主持下起草的“后十条”（草案）发往全国。与此同时，还发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的通知》。《通知》要求把这两个文件在全国向所有人宣读，“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同时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亲自参加宣讲。

根据中央《通知》和“前十条”精神及“后十条”要求，在乌兰夫主持下，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除全区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通知》要求宣讲两个“十条”以外，同时决定 1964 年春开始，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郊区桃花人民公社贾家营子和兴旺庄两个大队直接搞试点，宣讲中央《通知》和前、后两个“十条”，开展社教运动。为了搞好这个点，决定仍由自治区党委主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铎带队，直接领导。工作队队员都是从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和呼和浩特市委机关抽调的干部，政策水平较高，是一个高质量的工作队。工作队进村后严守工作队纪律，坚持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原原本本地认真宣讲“前十条”和“后十条”，扎根串连和贫下中农交朋友。经过教育、发动，群众积极性起来后，按照“后十条”规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步骤、方法、政策和注意事项等，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各项工作。因为“前十条”玄虚、神秘，人们搞不明白究竟是想干什么；“后十条”过繁、过细，很难达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只能尽力而为，把该做的事做好。

1964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传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

指示》。《指示》中提出:1963 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组织宣传队伍，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解释“双十条”。为此，“从中央委员到县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传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指示》下达后，各级领导都不敢怠慢，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宣讲“双十条”的高潮。

为了不被叫“消极怠工分子”，乌兰夫于 4 月 24 日到呼和浩特郊区桃花人民公社贾家营子大队和兴旺庄大队，即自治区党委直接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点上宣读“双十条”。当时，乌兰夫也搞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宣读“双十条”，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这样“玄”。所以他的宣读也是“照本宣科”。但是，他毕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在干部、群众中享有的威望，他亲自到点上宣读“双十条”，在群众和工作队队员中的影响很大。而他，这次到农村宣读，不仅是当了一次“宣传员”，还看到了农村的贫困情况和与贫困的农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队队员的情景。特别是他看到这个点上那些常年在他身边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干部后，内心里激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感情。但是，他却没有更多的语言说给他们，只是叮嘱:“认真做好工作，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还说:“运动一定同生产结合，要促进生产，要关心群众生活。”

乌兰夫到点上宣读“双十条”，给群众和工作队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这里蹲点的干部，后来曾常常谈起这件事，对他的叮嘱，至今还记忆犹新，受益终身。

乌兰夫主持的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行动迟缓，很快引

起了对“阶级斗争”反映敏锐的华北局主要领导的注意。3、4 月间，为推进内蒙古的运动，华北局特到呼和浩特召开书记处会议，按两个“十条”精神部署华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华北局主要领导多次插话批评内蒙古。

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乌兰夫依然故我。对于农村牧区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然是根据中央要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强调运动同生产结合，要促进生产；对于经济工作、农牧业和工业生产，更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抓。

4 月 1 日，他在全自治区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应该以较少的人力生产出较多、较好的产品，创造较多的利润。可是现在我们的企业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自己吃掉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是目前企业革命中应该解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有些同志却以为人越多越好，机构越大越好。至于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等，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用这种思想管理企业，是不可能把企业办好的。

5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和“三线建设”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着重讲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培养接班人和“三线”建设问题。

会上乌兰夫听了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和谭震林关于第三个五年农业计划的初步设想后，联系考虑了内蒙古的问题。5 月 20 日他在华北小组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农牧业生产和包钢建设等问题。对于农牧业生产，他再次强调走农牧结合的道路，方针是农牧并举，在坚持多种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6 月 10 日，他特意给周恩来总理和主管计划的李富春副总理递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20 周年，1967 年前内蒙古自治区应

列入计划的主要建设项目。5 月 30 日，乌兰夫再次在华北小组会上发言，着重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乌兰夫注意毛泽东提出的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即: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有反动活动)，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后来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列的搞好社教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改写成了六条)。乌兰夫在发言中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达到毛泽东主席所讲的四条标准，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必须集中精力，分期分批，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搞。冬春搞运动，夏秋抓生产。结合生产进行复查巩固，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整训工作队。”在这次工作会议期间，他还插空找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彭真，谈了加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力量，增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问题。

为传达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后，于 7 月 4 日至 30 日，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他除作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会议总结外，还先后专讲了培养接班人和林业问题。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他要求与会同志全面理解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及其意义，在讨论中要注意解决对“三线”建设的态度问题，搞清楚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包括国家的大“三线”，华北地区的“三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线”，提高对支援“三线”建设的认识和自觉性。在讲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时，他充分阐述了其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并强调指出:“要保证老一代马列主义者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积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专讲林业问题时，他谈了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的现时情况和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后，明确指出:

“发展林业，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有长期打算……必须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要依靠社队的集体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林业）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造林、育林的积极性。”在做总结报告时，他归纳了大家讨论的情况，重点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同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结合，解决内蒙古的实际问题。内蒙古地处祖国的北部边疆，是首都的北大门。要充分认识其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力加强内蒙古的经济建设和军事(边防）建设；放手发动群众，把城乡、牧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区干部和人民，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8 月初，乌兰夫按自治区党委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安排了自治区党委和全区工作后,8 月中旬先去北戴河参加华北局学习会，17 日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会议。这次华北局书记处会议开了 12 天，8 月 28 日结束，主要是研究华北地区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问题。紧接着于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召开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是毛泽东临时决定召开的。原因是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省和地区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集中力量搞一个县，运动由工作团领导，开展运动的县党、政领导权也交工作团。毛泽东先表示同意，并拟发文照办。后又就便征求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局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的意见，李雪峰、陶鲁笳提出异议。所以毛泽东决定召集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开会，重议此事。会上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同意刘少奇提出的做法，李雪峰改变看法收回了原来的意见。毛泽东会中讲了一次，他用李雪峰已收回的原来说法表示有分歧，但又说:“是个部署问题”,“是个方法问题”,“不是什么路线之争”。就这样，在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用“组成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这个县的各组织领导

权”的办法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没有乌兰夫，但毛泽东征求华北地区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对刘少奇提出的做法有什么意见时他在场。可是他没有说话，而且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越来越玄虚，越来越不可捉摸，但又无可奈何。他在北戴河和北京开完会回到呼和浩特后，于9月5日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如实传达了华北局学习会、书记处会和党中央召开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精神。接着，在他主持下又于9月8日至15日召开盟、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仍是传达上述华北局和党中央接连召开的三个会议的精神，并按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定下的做法和华北局领导的意见，部署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定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旗县为巴盟的临河县、乌盟的察右中旗、呼盟的布特哈旗。察右中和布特哈两旗的社教工作团，由自治区和所属盟抽调干部组成；临河县的社教工作团，由华北局和自治区、巴盟三级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第一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这三个旗县，以临河为重点。华北局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和自治区党委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高锦明都到这个县蹲点，领导这个县的运动并负有取得经验推动全自治区运动的责任。乌兰夫因血压高和心脏不适，留在机关管全区面上工作。临河要先行一步，要求参加临河工作团的干部9月在呼和浩特集中，10月进点。

在盟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包头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范易和哲里木盟委第一书记石光华发言谈城市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乌兰夫插话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不能影响生产，二要用马列主义把群众武装起来，再就是必须扎扎实实地把牧区边境工作搞好。9月15日他在盟、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除了讲很好领会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精神和全区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外，还特别提醒: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的中心工作，要注意围绕这个中心全面安排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9 月 18 日至 27 日，乌兰夫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8 日他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的名义作《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六大问题，即:一、大力发展农牧林业生产，争取获得一个更大丰收；二、工业交通部门，要进一步把各项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支援农牧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并积极配合包头钢铁工业和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生产建设，相应地发展煤炭、电力、基本化工、地方民用机械、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加强铁路运输和基本建设工作，加强邮电通信和地质勘探工作，同时要努力增加城乡人民吃、穿、用产品的生产；三、财贸部门应当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通过商品购销活动、信贷活动和财政收支，从交换和分配方面积极支援农牧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四、做好文教卫生工作，更好地为自治区经济建设服务；五、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六、加强军事、政法工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9 月 27 日上午，经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他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下午，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人民委员会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本届人民委员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提出本届人民委员会要抓好以下四件大事:第一，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基本胜利；第二，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到 1967 年达到的各项奋斗目标，迎接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第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的基础；第四，加强边境和牧区建设，抓好“反修”斗争。

为能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搞好内蒙古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乌兰夫经过认真考虑后，在他主持的自治区党委常委

会议上决定，10 月至 11 月间召开一次全区三级(自治区、盟市、旗县）干部会议。“三干会”召开在即，中央决定由乌兰夫率我国党政代表团赴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 15 周年庆典。国要出，会也要开，怎么办?乌兰夫掂量后决定，“三干会”按原定计划和设想照常开，由自治区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在他出国期间委托高锦明(是年 5 月由包头市委第一书记提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分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负责主持。

原定“三干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推进全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通过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提高全区三级领导骨干的思想，统一他们对社教运动意图、目的和做法的认识，以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内蒙古全区的运动搞好。

这时候华北局机关参加临河社教运动的干部已到点上。他们中的带队人和部分部、处级干部回呼和浩特参加了“三干会”。

会议开始阶段，与会人员听了领导讲话，学习了中央文件，多数人都在思考本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如何搞，讨论中发言也多是谈这方面的问题。受党内“左”倾思潮影响，为把会议推向高峰，高锦明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大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以表示自治区党委的“革命决心”，用以“引火烧身”。自此，会议开始走偏，部分人对过去制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如对牧区民主改革时的“三不、两利”政策，农村土地改革时对少数民族制定的特殊政策，社会主义改造时制定的“稳、宽、长”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中“慎重稳进”原则，以及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甚至同“阶级斗争”相联系。

就在这时候乌兰夫从国外回来了。他从身边工作人员和周围同志口中大致知道了会议情况，开始感到吃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10 月 26 日，他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三干会”情况汇报，

检查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在回顾自治区党委过去的工作时，他除按常规谈自治区党委工作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不足外，也讲了那些符合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依据，以及自己的看法，并没有批评和责备谁，反而从维护大局和党内团结出发，肯定了这次“三干会”取得的成绩和收获。11 月 6 日，他同样以上述心态，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大会上作了这次“三干会”的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中，他讲了会议的收获后说:这次会议使我们头脑清醒起来，使我们感受和认识到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概括地讲了以下三条:第一，我们过去有对敌情严重估计不足的错误；第二，暴露了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方面顾虑重重，怕这怕那的严重保守思想；第三，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侵蚀的严重性。在总结报告谈到今后应抓好的几件事时他说:第一，城乡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要抓点上的工作，要抓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基本环节，按照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要求，使运动达到高标准；第二，面上的工作要围绕中心展开；第三，要按照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培养新生力量，提拔接班人；第四，要纯洁司令部、纯洁干部队伍；第五，注意民族问题；第六，坚决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贪图享受、养尊处优的错误思想；第七，要把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当作自治区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八，活跃党内民主生活，锋利批评武器，开展不调和的思想斗争，坚决反对党内的不良倾向。

1964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就各省、市、自治区党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便，于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28 日召开了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还有话要说，中央工作会议 1965 年元旦后又接着开，至 1 月 14 日结束。

乌兰夫出席和参加了先后或说穿插召开的上述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很重要，都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196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乌兰夫很赞成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精神，在会议进行中，他就认真思考着如何贯彻执行，决心会后要尽全力动员和带领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为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而又穿插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时间很长，主要是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文中写了二十三个问题，故简称为“二十三条”)。在这个文件中，重新规定了“四清”的概念，即由原来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小四清”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的“大四清”；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作法上由扎根串连，工作团包揽一切，改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重申了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进一步明确地把斗争矛头引向了党内。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气氛十分紧张。与会人员多吃不透毛、刘之争是怎么回事，正如杨尚昆在日记上写的：“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部明白！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的确不只是“方法问题”，的确很多人还看不明白，需要“再听听”，“再看看”！当时乌兰夫也是这种心态。但他有自己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他被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所吸引，本来一贯重视经济发展的他，注意力更向这方面倾斜了。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大四清”还是“小四清”，是“大兵团”搞重点还是“点面结合普遍搞”，他的态度是：“只要中央定了，我按照内蒙古情况搞就是了，”任你谁怎么反来

复去地争吵，他都没有多加思索。对他来说，反正有一条“抓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只要是运动不影响生产就行。他始终死死地把住这一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改变。

历史进入 1965 年后，乌兰夫的主要精力更明确地放在了发展经济上，放在了“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未完成的任务”上，尽力为 1966 年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包括按“二十三条”标准开展的“四清”运动，他所考虑的也主要是如何促进生产的发展。

年初，乌兰夫在北京参加完两个会议回呼和浩特后，就按照上述主要思想忙了起来。1 月 26 日，他在自治区党委正在召开的全区牧区社教工作会议上宣讲了“二十三条”。30 日又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了在全区面上如何宣讲“二十三条”。3 月 15 日，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由各盟、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区电话会上，他以“实现领导思想革命化，促进生产新高潮”为题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提出:回忆历史，总结过去农牧业生产的经验，提高领导认识大有好处，挖掘生产潜力大有好处。抓生产上的各项具体措施，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加强经营管理，这些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提高领导认识，解决领导思想革命化的问题更为重要。只要把人的工作做好，把思想工作做好，鼓起干部和群众的干劲，生产就可以很快搞上去。

3 月 18 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联合召开全区广播大会，他又以“全区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当生产斗争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派”为题讲话，要求全区所有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为摘掉生产落后的帽子而奋斗，为夺取 1965 年农牧业生产大丰收而奋斗。4 月 1 日，他又在自治区党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实践》上发表《树雄心，立大志，掀起生产新高潮》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出:贫下中农和贫苦牧

民及不富裕牧民与全体干部，都应懂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关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改变生产落后的状况。

5 月 5 日至 30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他多次在会上讲话和发言。5 日在会上讲话时提出，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讨论“四清”、工农牧业生产、战备和机关革命化问题。19 日发言着重讲在内蒙古必须执行农、牧、林结合的生产方针，如果只发展农业，不注意林业，必然导致沙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农牧林结合的方针提出已经多年了，但有些人还没有认识，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24 日，他又提请与会人员在讨论中认真考虑为什么在内蒙古自治区要贯彻农牧林结合的方针，怎样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怎样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等问题。30 日他重点讲了机关革命化的问题，提出机关革命化实质上是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机关机构重叠，层次多，人浮于事，办事不灵，这就助长了官僚主义。实行机关革命化，必须从组织改革开始，多余的机构要撤，重复的机构要并，要“拆庙”“请(送）神”，只有拆了“庙”，才能请走“神”。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机关革命化。

内蒙古自治区 1965 年春夏两季旱、涝等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为早有准备，做到有备无患，8 月 2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办公会议，集中研究了防灾、抗灾和备荒问题。他在会上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抗旱、防涝、备荒、救灾。基本一条就是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把大灾变中灾，把中灾变小灾，把小灾变无灾。8 月 26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抗旱备荒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讲话，又明确指出:内蒙古今年的灾情是自治区成立 18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希望同志们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变坏

事为好事。

9 月 2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自治区直属机关 21 级(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乌兰夫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发扬革命精神，鼓足干劲，为争取‘四清’运动和精兵简政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充分阐述了“四清”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后，他号召内蒙古自治区的全体共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于这两项工作中去，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不断适应经济基础，适应工农牧业生产高潮的新形势。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乌兰夫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 1966 年计划。在会上听余秋里关于计划的报告后，乌兰夫精神振奋，情绪很好。9 月 27 日他就粮食问题在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他说:“解决华北地区的粮食自给对于战备至关重要。内蒙古自治区初步设想，到 1970 年准备上缴商品粮 20 亿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已经研究了措施，这就是:“第一，继续贯彻农、牧、林结合的方针；第二，根据农、牧、林相结合的方针，在具体措施上应该抓水、肥、土、种、机、林、草、管，主攻方向是水的问题；第三，学大寨，走群众路线。”

从上述近 10 个月中，乌兰夫抓住工农业生产和机关革命化不放，充分反映了在党内“左”倾思潮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想按照自己的见解，从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力争取把内蒙古的事办好。基于这种想法，乌兰夫决定到离呼和浩特不远的土默特左旗三两公社前朱堡大队(村）蹲点。同时他又让老战友王铎到巴盟五原县美林公社光明大队蹲点，以求用他二人亲自蹲点取得的直接经验指导全自治区的“四清”运动。乌兰夫为使自己的点确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开展运动，特选了性格耿直、敢说敢做、敢做敢当的时任武川县委书记的姚玉光任前朱堡“四清”工作队队长。在工作

队进村前乌兰夫交代说:“近几年土默特旗(未分左、右以前的旗名)的生产抓得不怎么紧,(“四清”)工作队进村后,要突出抓一下生产。”工作队进村不久,乌兰夫召来土默特左、右两旗的“四清”工作团负责人汇报,又特意给他们讲了土默特旗的历史情况,并提示他们:在这里搞“四清”运动有两项任务,一是解决好“四清”(指中央规定的“四清”运动的任务)问题,二是解决好民族问题。并明确地说:民族问题不解决,“四清”运动的任务只能算完成了一半。9 月 28 日他听了前朱堡大队“四清”情况的汇报后,又提示:在“四清”运动中,一定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蒙汉族贫下中农要一视同仁,要一起发动。乌兰夫的这些提示,为前朱堡这个点能沿着他的思路推进“四清”运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领导“四清”运动的直接经验,1965 年秋、冬,乌兰夫和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一起,在前朱堡蹲下来住了很长时间。在蹲点期间,他来到农民家做客,召开不同范围的座谈会,与社员和基层干部席地而坐,促膝相谈。由于他身居高位又平易近人,群众更感到他可亲可信,很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听。所以他在同群众和基层干部交谈中,了解了不少情况和群众关心的事。在群众关心的事中,乌兰夫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和民族团结,所以在蹲点期间,他和工作队对这两个问题都十分关注。当时土默川的农村经济主要是种田,而种田最关键的是解决水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乌兰夫请自治区水利厅常务副厅长、党组书记郝秀山帮忙。在郝副厅长帮助下,经“四清”工作队和社员的共同努力,第二年开春新打的自流井就哗哗地淌出了清水,使大片的旱田变成了水浇地。群众看着这淌不尽的自流水,梦幻般地实现了世代盼望的旱地成水田,欣喜若狂,无不感激乌兰夫和“四清”工作队。第二年春天,也就是 1966 年春天又遇上少有的干旱,抗旱抢种刻不容缓。乌兰夫

看到群众和基层干部心急如焚的样子，自己也很焦急。他让随他一块蹲点的机要秘书季春芳给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打电话，向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请示:鉴于内蒙古全区春旱严重，为保证按时完成春播任务，农村“四清”暂停，“四清”工作队就地改为抗旱救灾工作队，带领群众全力以赴，抗旱抢种。同时根据前一段“四清”中发现的一些有碍民族团结的问题，还请示李雪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四清”运动要注意民族问题，通过“四清”要达到增进民族团结的目的。李雪峰表示同意乌兰夫意见。事后不仅乌兰夫的点上这样做了，自治区党委还通知全自治区的“四清”工作队照此精神办理。乌兰夫采取的这一及时果断措施，缩小或者免除了春旱和风灾可能造成的损失，大旱之年取得了较好收成,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得了益，而乌兰夫却因此招致大祸，成了他“文革”初期遭迫害时的一大“罪状”。但他无怨无悔，为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担着风险为群众办了好事，而甚感自慰。

三年再调整硕果累累。因为乌兰夫一贯重视经济发展，总是千方百计地抓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经过又三年冲破层层阻力的努力，内蒙古的工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前三年调整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这就是:1963 年至 1965 年再调整的三年，内蒙古的整个经济稳步上升，全自治区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可喜局面。1964 年在全区播种面积少于前 4 年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超过了 1960 年以来任何一年的水平，最高增幅达 35%。1965 年虽然遭遇了特大旱灾，由于乌兰夫决定暂停“四清”全力抗旱，获得了灾年的好收成，粮食总产量比前 5 年平均值提高了 10%。畜牧业在历年增长的情况下，1965 年牲畜总头数增至 4176.2 万头(只)，比 1962 年提高 27.9%，达到了历年最高水平。工业生产及其它各项事业也迅速发展，1965 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分别达到了 59.6 亿元和 29.68 亿元，与 1962 年相比，分别增长 56.5% 和 51.2%。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 33.56 亿元，与 1962 年相比增长 41.99%，年平均递增 12.4%。其中，工业总产值 19.02 亿元，增长 61.3%，年平均递增 17.3%；农业总产值 14.54 亿元，增长 22.8%，年平均递增 7.2%。以上指数都超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而更重要的是经过三年再调整，各经济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已经协调，成良性循环态势，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十三、主持内蒙古工作的最后半年

1965 年末到 1966 年 5 月，是内蒙古自治区创建后乌兰夫主持其工作 19 年中的最后半年。这半年，正是我国政坛风云激荡，一场社会大动乱就要到来之前的躁动期。

当时，乌兰夫已被人暗中盯上，但他却全不在意。为迎接内蒙古经济建设新发展时期的到来，他正在紧张地日夜操劳。

那时候，他总的想法是:通过“四清”运动和正兴起的“学毛著”运动，调整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方面关系，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通过筹备庆祝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20 周年，全面总结自治区建立以来，特别是两年“大跃进”和两个三年调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认识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总目标下，提出符合内蒙古实际的奋斗目标和要求，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以求在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时期，把内蒙古的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水平；充实和加强自治区和盟市领导力量，改革机构和管理体制，实现机关革命化，以适应经济建设新发展时期领导工作的需要。按照这样的设想，乌兰夫在主持内蒙古工作的最后半年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65 年 10 月至 11 月间，乌兰夫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经过两个三年调整后内蒙古的形势已全面好转，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执行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动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 9 月 8 日至 10 月 12 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和 1966 年计划的主要精神，研究了“三五”期间和 1966 年内蒙古要做的主要工作。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除了

作传达时讲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外，在讨论中还多次发言，反复讲他经过长时间思考酝酿形成的关于内蒙古工作的一些新构想和新思路。他的新构想和新思路，集中反映在 11 月 13 日他在全委扩大会议将要结束时的一次长篇讲话中。按会议日程，这天是乌兰夫作总结发言，按惯例秘书班子已为他准备了总结发言稿，但他没有用给他准备的讲稿，而是按自己的构想和思路讲了革命问题、改变农业落后状态问题、整党建党问题、内蒙 20 周年问题和“小三”线建设问题。这五个问题的核心是革命和改变农业落后状态。讲革命是点题，是全篇讲话的灵魂；改变农业落后状态所占篇幅最大，讲得广泛深刻，且贯穿于整个讲话之中，与其它几个问题都前后呼应。

讲革命问题时，他援用了 1963 年 5 月 9 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提出的“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但是，对这“三大革命”，乌兰夫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三大革命，一个是阶级斗争革命，一个是生产斗争革命，今天我想重点讲的是这两个革命，至于三大革命中科学实验这个革命在生产革命中会贯穿起来。”他还说:“要正确地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就是把这两个革命搞好……抓住这两个革命不放。”这里乌兰夫用的“革命”一词，显然与当时人们所说的“革命”就是“政治”——“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有区别的。他讲“两个革命”，目的是想把当时人们不大敢抓的生产也包括到“革命”中来，恰好这又是毛泽东讲的“三大革命”之一，而他要重点讲的正是这个“革命”。为了在后边重点讲这个“革命”——生产斗争，他先讲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以求自然地把阶级斗争落脚在生产上，以便自然地讲他要讲的重点。为

使人们易于理解他的想法，他以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公社化为三次革命，依次列举了三次革命后内蒙古粮食总产量提高的情况。他说:“过去两个革命互相促进，农业生产上去了……(每次革命后内蒙古粮食总产增长）都是近 20 亿斤。这次革命(指“四清”)，生产肯定要上去，问题就是幅度多大?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好好总结过去几次革命运动虽然促进了生产，但增产幅度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当前的革命抓好，把两个革命配合好，既搞阶级斗争又搞生产斗争，功夫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下。”接着又说:“我在华北局提出来，这次革命的结果，就是到 1970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产量(内蒙古粮食总产）要求达到 120 亿斤。这就是说比过去每次革命后生产增长的幅度都要大……现在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条件?我说有可能，也有条件，关键在于我们领导。”就此，他回顾了自治区建立后生产发展的情况，得出了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的结论，提出了落后的表现为“单产低，总产不稳”。他以“大跃进”时出的问题为例，讲了粮食与整个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说:“粮食是基础，粮食产量不稳，工业上去了，还得下来。1962 年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业大下，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接着他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各有重点的”生产方针。再就是“耕作粗放，靠天吃饭，靠扩大耕地面积(开荒）增加产量”。同时分析了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着重批评了少数人至今不重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沿袭落后的耕作习惯，热衷于开荒，靠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还批评了一些人以内蒙古人均粮食高于其它地方为由，不承认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而后，他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耕畜、机具以及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变化，讲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有利条件。在他觉得对“搞两个革命，大力发展生产”的问题已说清楚之后，又提

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在民族问题上，民主革命时期各民族团结起来，推倒“三座大山”，打倒共同敌人，以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民族团结起来，进行“三大改造”，以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这些任务现在都已经完成了，经过两年“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又经过两个三年调整总结了经验教训，被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已经全面好转，内蒙古和全国就要开始进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时期。在新发展时期民族工作方面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基本任务是什么?需要作出回答，需要拿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提法。乌兰夫作为主管民族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我国五个自治区中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就在这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在他的这次讲话中，他把自己经过长时间考虑的想法讲了出来，想以此作为探索和有益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作为自治区，除了解决共性的问题外，还要解决特性方面的问题。经过两个革命发展生产，是“共性”;“特性”，就是要经过两个革命为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创造可靠的基础。接着他扼要地分别讲了“三个基础”的涵义，这就是:政治基础，核心是民族平等，一视同仁。他着重讲了发展党员、组织阶级队伍、组织建设司令部(领导班子)，既要有汉人又要有蒙古族人，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使民族团结不断加强。经济基础，核心是共同利益，着重讲了农牧结合，解决农牧矛盾，汉族人民擅长农业，蒙古族人民擅长牧业，把农牧矛盾变成农牧互相支援，使蒙古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让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成为民族团结的可靠基础。文化基础，核心是情感的沟通，他主要讲了作为人际间沟通的语言问题，蒙汉族人民生活劳动在同一片土地上，要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以便于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以逐

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以在文化方面为民族团结创造可靠的基础。分别讲了“三个基础”后他说，把创建“三个基础”的问题解决了，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要有意识地抓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改变农业落后状态的问题，他进一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先从多方面分析了内蒙古农业落后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接着又剖析造成落后的原因。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对性质和原因都提得很高，挖得很深。他说:“内蒙农业落后是生产上的右倾保守”，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领导没有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没有革命干劲。改变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说了性质讲了原因后，他又讲如何改变落后，摘掉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他首先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反对(生产上）右倾保守，要敢于“承认落后”；要克服内蒙古“人均粮食多”“余粮户”的自满思想；要把毛泽东思想和内蒙古实际结合起来，根据内蒙古的特点制定出适合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方针；要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掀起“群众性的生产高潮，群众性的(生产）革命运动”。乌兰夫不是空喊口号的人，在这方面他讲得很具体，很全面，归纳起来主要是:坚持农牧林结合的方针，重点解决水的问题，改变耕作习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及领导方法等。对农牧林结合的方针，他进一步强调说:它是毛泽东思想同内蒙古实际结合的产物，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坚持走这条路，就是“把方向搞对头，再加上干劲”。对于水的问题，他说:内蒙古十年九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战略重点是解决水的问题，要把水作为主攻目标。毛主席提出的全国农业“八字宪法”是“土”字当头，具体到内蒙古就得“水”字当头。他风趣又坚定地说，在抓水的问题上，我们是属猪的，咬住不放，咬他十年，打他十年歼灭战，非

攻下来不可。以水带动其它，让水以外的肥、土(壤)、种(籽)、机(械化)、林(造林)、草(种草)、管(田间管理）也都跟上。改变耕作习惯，就是改粗放为精耕细作，改广种薄收为高产多收，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保护草原，不能盲目开垦牧场。他形象地深入浅出地讲了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后，又专讲了改进领导方法。他把改进领导方法提到了机关革命化和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的高度，重点讲了领导干部下去蹲点，特别是蹲生产点，要在点上取得直接经验，以点带面，指挥全局。他说，我们一直提倡蹲点，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点蹲了一些，生产斗争的点没有蹲。对没有人蹲生产斗争的点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表示自己要带头去蹲生产点。他说:“要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首先要改变领导的工作方法。”他要求盟、市和自治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还特别提到了水利厅和农业厅的领导人，要他们下去蹲点，以点带面，分片包干，奋斗目标是过黄河(亩产 400 斤)，过了黄河再回来。这次讲话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为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创建可靠的基础，就是要坚决摘掉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的帽子。

乌兰夫这篇讲话中的这些观点和思路，是他在长时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其中有的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已为不少同志熟知并认同。在这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比较全面、系统地讲过之后，更深刻，更明确了。为了把这些既符合内蒙古实际，又同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9-10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一致的构想，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集体意志下达到自治区全党及各族人民，乌兰夫提议将其写入这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全委会议接受了乌兰夫的意见。但乌兰夫认为预先拟的《决议》稿没有充分反映与会人员讨论中的发言和他这次讲话的精神，他建议全委会议原

则通过《决议》稿，委托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在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再作进一步修改，然后正式发出。全委会议一致同意这样做。据此，11月20日乌兰夫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就《决议》如何修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乌兰夫在常委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这一《决议》的主导思想，即中心意思，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时期，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如何在内蒙古具体化。这是贯穿《决议》的一条主线。重点是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创建可靠的基础。创建这三个基础，是内蒙古自治区今后经济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这一点，在《决议》中要写清楚，讲透彻。常委会议同意乌兰夫的意见。为不负全委扩大会议的重托，尽力把《决议》稿修改好，常委会议决定建立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为组长的《决议》修改小组，在家常委和代常委都为修改小组成员。在毕力格巴图尔主持下，修改小组在吃透乌兰夫《讲话》和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反复讨论和认真修改了《决议》稿。第三次正式修改稿出来送乌兰夫审阅时，乌兰夫同意并签了字，恰好这天去哲盟检查“四清”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高锦明回呼和浩特，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参加修改小组为成员并执笔修改《决议》的工作人员将乌兰夫已签字的《决议》稿送请高过目。高看后又认真地作了多处修改。工作人员将高修改过的《决议》稿送乌兰夫看时，乌兰夫看后说改得好，并又当即签字，同意发出。按照乌兰夫讲话精神写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好三大革命，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迎接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就是经过这样认真讨论修改后发出的。乌兰夫的这一次讲话和全委扩大会议《决议》，都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

事求是精神，都很有新意和活力，至今仍不失是一篇好讲话和好文件。为重温乌兰夫在这段不平凡的岁月里，是怎样思考问题，怎样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顽强工作的，现将《决议》全文引录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于今年 10 月 25 日召开，至 11 月 14 日结束。在这次会议上，传达和讨论了中央今年九到十月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全会一致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贯彻了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藏富于民、藏粮于民的指示，以备战为中心，对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对当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都作了正确的安排。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并且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次全会上乌兰夫同志提出，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主要是把三大革命搞好，其中最主要的是抓好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促进生产大发展。根本问题是改变农业单产低和总产不稳定的落后状态，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要抓好民兵建设和后方基地建设。有了这些东西，就有了人民战争的物质准备，再加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对人民群众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又有了人民战争的精神准备。这样，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两大革命中，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三个基础。这就是在政治上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列主义的、由各族干部组成的各级领导核心，发展党的组织，在发展中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党员；同时要组织起由蒙汉各族工人、贫下中农、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组成的阶级队伍，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并且坚定地依靠他们，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共同对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我们就有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在经济上要认真贯彻执行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各有重点的方针，变农牧矛盾为农牧互相支援、互相促进；特别是使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汉各族人民，既能经营农业也能经营牧业，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就必然产生共同保护牧场、共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一致要求和行动。这样，我们就有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经济基础。在文化上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并要尊重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习惯；特别是要强调学习蒙古语文，尤其是在干部和领导机关中通行蒙汉两种语言文字，以便更有利于进行文化交流和生产经验的交流，更有利于蒙汉各族劳动人民感情上的接近，更有利于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我们就有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文化基础。全会完全同意乌兰夫同志的上述意见，认为这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主席指示，搞好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措施，必须动员全党全民和各行各业，都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而艰苦奋斗！

1966 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前一年。做好 1966 年的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从现在开始就要广泛深入地动员全区的党员、干部和 1200 万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学解放军、大寨、大庆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6 年计划，夺取工农牧业生产大丰收，坚决完成当前生产救灾的战斗任务，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向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献礼，也为

实现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迈开胜利的第一步，使 1966 年成为自治区各方面大学习、大革命、大总结、大宣传、大发展的一年，成为自治区各个战线全面跃进的一年。

一、大学习

要在全区范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抓好大革命、大总结、大宣传、大发展的各项工作。要把学习毛主席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进一步认识自治区成立的 20 年，就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 20 年，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民族观反对资产阶级民族观的 20 年，用以进一步克服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促进各民族干部的共产主义化，增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

在大学习中，一定要坚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学好；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应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并且带动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学好，特别是要在用字上多下功夫。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大振革命精神，以适应国内外革命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大革命

现在，我区三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中。在阶级斗争方面，农村、牧区和城市的四清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这场革命搞好，搞到底。要认真贯彻二十三条，放手发动群众，按照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保证质量，绝不能走过场。在生产斗争方面，以农业为基础，以水利为中心的生产建设高潮已经出现，一定要积极组织大力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全面发展，以实现生产大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已在全区展开，一定要把它领导好，更好地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三大革命的前面，把三大革命领导好。同时在三大

革命中，使每一个人都要受到锻炼和改造。

要把三大革命领导好，领导必须首先革命，要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当前在干部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缺乏革命干劲和不断革命精神；存在着松松垮垮、疲疲塌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深入基层、不深入实际、不抓样板、不总结经验等坏作风；旗县以上领导机关中，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机构庞杂，层次过多，人浮于事，指挥不灵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同当前革命斗争形势不相适应的，必须进行革命。要取得三大革命的胜利，把生产搞上去，摘掉农业生产的落后帽子，就要首先改变领导的精神状态，特别是要大抓旗县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为此全会要求：

第一，抓好干部思想革命化，特别是领导思想、领导作风的革命化。主要是大反右倾保守思想。大鼓革命干劲，大树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敢于创造、敢于革命的战斗化作风。同时要进一步发扬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各行各业全面推广乌兰牧骑式的革命化、战斗化作风，更好的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

第二，抓好组织上的革命化。主要是结合完成精简任务，调整、充实、加强旗县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核心，同时注意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旗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都要配备起一到三名合乎条件的年青干部。经过这些工作，使各级都有一个革命的、有战斗化作风的、精干的领导班子。有了革命的领导班子，就会有革命化的机关，这样就会大大改变现在的领导状况。

第三，抓好领导工作方法的革命化。坚决改变一般化的领导方法，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亲自树标兵抓样板，亲自动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指导全局。各行各业都要广树标兵，要求在 1966 年内自治

区树立一个盟、每个盟树立一个旗县(市)，每个旗县树立一个公社，每个公社树立一个大队，作为各自的先进样板，大队也要树立自己的样板；全自治区树立五十个左右工交基层单位，100 个左右财贸基层单位各具特色的先进样板。领导改变工作方法，通过大抓样板，广树标兵，把全区“学大寨，树标兵，把一带二、一片红”和“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三、大总结

大总结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的中心问题是，20 年来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是怎样贯彻执行的。20 年来，我们全区各个战线上都有不少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各级、各部门都必须认真进行总结。通过总结，弄清 20 年来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有什么需要记取的教训；通过总结，进一步说明怎样把毛泽东思想同内蒙古的实际相结合的，进一步说明党的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政策是怎样贯彻执行的；通过总结，把各级领导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教育和鼓舞各级党政干部和各族人民，有力地推动当前全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

大总结要强调各级领导亲自动手，要同大学主席著作紧密结合起来，要同解决当前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会议要求自治区一级各口、各部门，都要各就自己主管的工作，于明年“五一”到年底以前，分别写出一到两篇有分量的总结文章；各盟市要就自己地区突出的工作，写出一到三、五篇有分量的总结文章；各旗县也要至少写出一篇各具特色的总结文章。这些文章，要分期分批在各级报刊上发表。

四、大宣传

内蒙古自治区过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

大成就，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总路线的胜利。自治区过去的20年，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两条道路斗争的20年；是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观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的20年；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它各项方针政策取得巨大胜利的20年；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不断革命不断发展的20年；是工农牧林业以及各行各业经营管理上破旧立新的20年；是内蒙古蒙古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和精神面貌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这20年，是极不平凡的20年。

大宣传主要是宣传20年来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取得的胜利，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越性，宣传20年来自治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把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宣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一场斗争来看。通过宣传，要使全区各族人民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鼓舞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要使国内外敌人，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受到一次有力的打击。

把传达贯彻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就作为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宣传的开始。宣传工作，要在不同时间采取不同形式在党内和各级干部、各族人民群众中开展。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宣传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工作，凡是有可能的，都要在明年“五一”庆祝自治区成立19周年时进行一次预演、检阅。

迎接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号召和献礼的口号，明年“五一”以前只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口头宣传，不登报纸。向人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的提纲，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负责编写，要在今年年底发到各地。

为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而建设的五个重点项目，以及出书、出戏、出舞、出画、出歌等等计划，自治区计委、宣传部、文委等各

有关部门，会后要逐一检查，项项落实，保证按期按质量完成。

所有庆祝筹备工作，都要以解放军、大庆、大寨为榜样，要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

为了确保完成庆祝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各项筹备工作，会后要立即建立庆祝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筹备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五、大发展

迎接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要使自治区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大发展。实现大发展，首先就要同那些阻碍大发展的思想作斗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当前在我们相当一部分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以及各级机关中，任意损失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大少爷”“败家子”作风，同主席的教导，同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取得这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坚决反掉不珍惜国家和集体财富的歪风邪气，认真贯彻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实现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全面大发展铺平道路。

在农业上，要坚决反对那种习惯于广种薄收，看不到农业生产落后，不重视提高单产，满足于自给有余等不想革命，不敢革命的右倾保守思想；在牧业上，要反对靠天养畜的思想。坚决贯彻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各有重点的农牧业生产方针，大树敢于改造大自然，敢于承认农业生产落后的革命精神，决心提高单产摘掉落后帽

子，决心改变靠天养畜的旧思想。这是生产上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与少慢差费甘居落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扫除农牧业生产大发展中的障碍。

农业大发展，主要是提高单产，为摘掉农业生产单产低和总产不稳定的落后帽子而奋斗。具体措施和要求是:以水利为主攻方向，大抓水、肥、土、种、机、林、草、管，要使全区的水浇地达到 2000 万亩，使稳产高产基本农田达到 1000 万亩，其中争取有 500 万亩单产“过黄河”（即单产 400 斤）。

畜牧业，大发展要首先按照以水为主、水草并举的方针，大力抓好草原建设。具体奋斗目标是:开辟 4 万平方公里缺水草场，完成 100 眼机井、3000 眼深筒井的建设任务，大力推广林网草田轮放牧场的建设，为改变草原建设落后状况创造一个良好开端。在发展牲畜数量的同时，大抓提高牲畜质量，具体要求是:全区有一到两个盟改良畜超过百万头以上，有 20 个左右旗改良畜超过 10 万头以上，有 100 个左右公社改良畜超过万头。

在林业上，实现盟市、旗县、公社三级都有苗圃，实现 70%-80%的大队有苗圃，实现 50%-60%的生产队有苗圃。牧区社队，有条件的，可办小型苗圃。完成 300 万亩的植树造林任务，使林业更好地为农牧业生产服务。

工业、财贸、文教、卫生、政法和人民武装等部门，都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牧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紧紧围绕为农牧业生产大发展服务中，按照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和多快好省的要求，使各自的事业取得革命性的长足发展。为此，必须按照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横扫这种资产阶级“大少爷”“败家子”作风，普遍深入地开展一个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群众运动。

中央各厂矿企业，特别是包钢和大兴安岭林区以及其他国家重点企业，都要出色地做好各项工作，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自治区、盟市、旗县各级，都要按照国家要求，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大力抓好后方基地建设以及与其有关的其它工作。搞后方基地的建设，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力争早日按质按量地完成建设任务，以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

全会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民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干、苦干、穷干、巧干，拿出各项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重读这一《决议》，就其鲜明性和务实精神，以及改变内蒙古农业生产落后面貌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与气势来说，依然还是活灵活现，感人肺腑。无怪当年乌兰夫《讲话》和《决议》在内蒙古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响，以至从反面盯着他的人当时也不得不为此而大动脑筋。

这一《决议》发出后，内蒙古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学习和传达贯彻。自治区一级各主要新闻媒体都积极配合，及时宣传。1966 年元旦，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新年广播讲话》，《内蒙古日报》作为《代社论》原文发表，再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主要构想和全会《决议》的精神。全会《决议》和全委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广播讲话》直接同全区各族人民见面，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区广大党员与群众，地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已开始进入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临战姿态。

乌兰夫为实现他提出的，也是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定下的任务和要求，他和自治区党委在大力抓贯彻落实。他重点首先抓的是《决议》上写的“五大”中的大学习、大总结和大宣传。

1966 年初，首先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呼和浩特市掀起了学习蒙文、蒙语的热潮，并很快波及到全区。随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兴起，在乌兰夫主持下，自治区党委常委带头学习，并在学习的基础，起草并发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决定》中除了讲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解决从内蒙古实际出发的问题”。为能完整、真实地了解乌兰夫当时的认识和思想状况，现把《决定》中的这段文字引录如下:

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内蒙古实际之“的”。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志，长期在内蒙古工作，但不研究内蒙古的实际，既不了解内蒙古的昨天，也不了解内蒙古的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首先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内蒙古的实际，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当前主要是认识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认识内蒙古所处的战略地位，认识我们经济落后特别是农、牧、工业生产落后的问题；认识内蒙古的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干部和群众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通过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有力武器，从实际出发，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清除资产阶级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三大革命运动，解决进一步巩固发展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只有真正认识了内蒙古的实际，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所作为，才能踏出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乌兰夫是真心实意地想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让更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内蒙古的实际，解决内蒙古

的实际问题，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可是，就是这段文字，在“文革”中竟被颠倒为“反党叛国”，“要踏出一条修正主义的路”。

大总结和大宣传是联在一起的，而这两项都是围绕着筹备内蒙古自治区建立20周年展开的。早在1965年10月18日，乌兰夫利用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便，就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的多重身份，邀请中央一级新闻、出版、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代表性人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亲自向到会的人士介绍了内蒙古的情况，讲了庆祝内蒙古自治区建立20周年的重要意义，并邀请他们到内蒙古访问、考察，帮助总结自治区成立以来的经验。11月18日，乌兰夫又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专事讨论了筹备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有关问题，并决定建立“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筹备委员会”，由他本人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此时，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率领的文化工作队已先期到达呼和浩特，随后应邀来访问考察的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记者以及有关领导人等，都陆续来到呼和浩特。为欢迎这批来自首都的贵客，并向他们介绍内蒙古的情况，内蒙古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筹备委员会于1965年12月20日至23日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上乌兰夫一连讲了一个整天和三个半天。年近六旬的乌兰夫所作的这次没有讲稿的长篇讲演，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到内蒙古的各个方面，时间跨度由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到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达40年。在这样长时间的讲演中，他始终精神旺盛，特别是他讲述的创建和建设自治区过程中的那些动人的事迹，紧紧地吸引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谁都怕稍有疏忽哪一句话会从自己耳边滑过。这是一场生动的内蒙古革命史讲座，也是一次内蒙古地区和民族特点及风土人情的广泛探讨，更是将要启动的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经验大总结的总动员。这时

候乌兰夫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他期待的是以史为鉴，认真总结以往经验，求得以后的路能走得更稳妥，更矫健。

12 月 24 日，针对讲演后人们提出的问题，乌兰夫又用半天，除回答提出的问题外，主要还谈怎样总结经验和组织报道与文化创作的问题。他主张，报道和创作主要是正面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要突出报道和表现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尖子。他说:“突出地报道鼓足干劲，就是批评甘居落后；突出地报道多快好省，就是批评少慢差费。”照此精神，在乌兰夫关心和主持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从北京来的主要新闻单位的同志，在内蒙古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很快行动起来。从 1965 年 11 月 20 日起到 1966 年 4 月 12 日不到五个月的期间，迅速掀起了一个内蒙古经济建设，特别是农牧业生产和管理经验大总结、大宣传的小高潮。新华社连续发出电讯稿，《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长篇报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5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刊出《革命化从承认落后开始——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从广种薄收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的长篇报道。编者按语中说:“承认落后，摘掉落后帽子，改变广种薄收的传统耕作法，走精耕细作，建设稳产高产田的道路，这是哲里木盟地区领导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12 月 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并配图刊出《牧区大寨——记乌审召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革命道路》的长篇报道，同时以“发扬乌审召人民的革命精神”为题发表社论。1966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以“智慧加双手，沙漠变良田”为题，发了赤峰当铺地大队(村）治沙造林，兴修水利，建设旱涝保收田的专题报道。1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以“用革命的发展观点指导牧区生产”为题发了社论，同时在第二版配发了《内蒙古日报》记者写的《草原万里行》长篇通讯。3 月 1 日，《人民日报》又以“树立长期建设草原的革命观点”为题，

以“二论用革命的发展观点指导牧区生产”为副题发了社论。3 月 10 日，《人民日报》再以“为什么要固定草牧场的使用权”为题，以“三论用革命的发展观点指导牧区生产”为副题发表社论，还配发了阿拉善左旗锡林高勒公社《固定社队草牧场的使用权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政策》的报道，并在文前作了“正确执行这项政策，调动了牧民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有利于充分挖掘草场潜力，也增强了牧民的团结”的提示。3 月 21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内蒙古用‘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总结工作”作通栏标题，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找差距挖潜力促进农牧业加速发展》的专题报道，并在编者按语中说：“一切工作做得好坏，主要决定于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工作就能大步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响应自治区党委的号召，将近一年以来，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自己的工作，大破形而上学，大破固步自封、满足现状的保守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全区干部群众，认真总结工作，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和缺点。近 20 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认为，同全国先进地区和先进单位比较，自治区的农牧业生产还存在着落后的一面。自治区党委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敲起了警钟，号召大家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改变落后，促进广大干部去掉盲目性，增强革命自觉性。”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以《重农不能轻牧》为题的社论。以上《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这些社论和报道，新华社都向全国发了通稿。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不足 5 个月的时间内，对一个省级地区连发 5 篇社论和如此多的专题报道，是罕见的。它对一个地区工作的推动力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出现在内蒙古，同乌兰夫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更值得在这里提起的是，这些社论和报道的意图和主导思想，都源于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那篇颇富新意的讲话，和以其思路为主导写出的全委扩大会议《决议》。这种情况不仅反映了乌兰夫为把内蒙古的工作推上一个新阶段所作的努力，也预示着在即将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新发展时期，内蒙古这一我国建立最早的自治区，又将捷足先登，要先行一步。但是很遗憾，就在它要起步的时候，降临了一场“十年浩劫”。

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会议之后，内蒙古全区上下都动了起来。自治区一级党政机关的业务部门和群众组织，都积极设法做发动工作。1966 年初，不少单位都向自治区党委申报召开全区行业或群众性代表会议。针对这种情况，乌兰夫考虑如何做到既能把群众动员起来，又不让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海”。他指示:凡召开全区性会议，一律报请自治区党委批准。此事由各口(当时分组织、宣传、统战、工业、财贸、农牧、计划、政法八大口）分头把关，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负责过滤和统筹安排。照此精神，经各口严格把关，又经办公厅过滤，最后筛选出的是全区贫下中农和贫苦牧民及不富裕牧民代表大会、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区农牧业先进生产者和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全区农牧业科学实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等四个全区性会议。这四个会议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统一安排后，提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审定。乌兰夫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时，一致认为，各口和办公厅把关、过滤很认真，这四个会都是需要召开的，已经是压得不能再压了。但乌兰夫又考虑，如果四个会分别召开，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哪个会都应该参加，假定一个会开三五天，加在一起就是半个月二十来天，如若开一周，就等于一连开个把月会，这样占用领导同志的时间仍然太多。于是他提议，这四个会同时召开，在开会过程中有分有合，哪个先开完哪个就先散会。并说，这次同时召开的四个会，就叫它“四合一”大会。到会的自治区党委

常委和列席的各口负责同志都同意这个办法，一致认为这样既可完成各自会议的任务，又节省了领导同志的时间，还减少了工作人员和会议文件，可以说是几全其美。“四合一”大会2月4日召开。头一天就是乌兰夫作题为《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狠抓三大革命运动，为改变农牧业生产落后状况而奋斗》的报告。报告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同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及乌兰夫在那次会上的讲话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只不过是为利于与会者理解领会和会后贯彻，针对四个会的不同情况又增添了一些具体内容。乌兰夫在会上作过报告之后，四个会分别组织了小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报告讲的切合时宜，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完成，内蒙古和全国经济形势已经全面好转，第三个五年计划头一年刚刚到来，“四清”运动在全区农村牧区和城市已连续搞了几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就要实施的时候，及时地提出了内蒙古的具体任务和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对全区各族人民努力改变内蒙古生产落后面貌，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鼓舞，也预示了内蒙古整个工作将要在总结已往经验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在今后建设的发展时期中，要在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创造可靠基础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乌兰夫的报告对“四合一”大会的成功，对四个会议分别圆满完成各自的任务，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四合一”大会的形式和开法，在内蒙古也是搬“文山”，填“会海”，推进机关革命化的一次创举。它的成功，对全区各族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斗争，起了全面发动的作用。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时期的到来，根据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会议精神，在组织建设方面乌兰夫也投入了不少精

力，下了很大功夫。早在 1965 年 5 月 30 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曾讲过机关革命化的实质，就是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并说机关革命化包括机构改革、减人和提高工作效率。那时候他就提出解决党政机构重叠、层次多和办事不灵的问题。并讲了“拆庙”“请神”，即撤并多余的机构，裁减冗员，以适应即将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在这方面他总的设想是:先充实和加强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通过机关革命化调整和加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机关各主要工作部门；先从首府呼和浩特抓起，逐步充实和加强盟市一级的领导力量。

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考察后，1966 年 1 月 29 日乌兰夫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决定由郭以青、沈新发、陈炳宇、云世英、潮洛蒙、布赫、浩帆、厚和、突克、云北峰、肖应棠、李斌三、和兴革为自治区党委代理常委，暂先参加自治区党委领导，经过一段实际工作锻炼和考察后，根据个人的情况，再定是否正式进入常委领导班子。经请示华北局同意后，代常委即行就任行使代理职权。上述 13 名代常委中，除郭以青、沈新发、肖应棠、李斌三年龄稍大外，其余多在 40 岁出头。最年轻的是布赫、厚和、突克，当年刚刚 40 岁。这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作为代常委暂时进入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后，工作积极热情，给自治区党委增添了活力。虽然没有多久“文革”风吹来后，代常委就被诬为乌兰夫“培植个人势力”而宣布取消，但其短短几个月工作的实绩，已充分证明了乌兰夫的构想和举措是正确的，并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历史已经证明，由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挑选，经组织部门考核审察后定下的 13 名代常委，其中 12 人经“十年动乱”磨难和考验，成为党的优秀干部。“十年动乱”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他们大都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骨干，其中布赫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

以后的史实，已充分证明当年乌兰夫不仅是慧眼识真材，而且敢于打破陈规破格用人。这正是一个掌管一方的高级领导人应该具有的胆量和气魄。

1965 年末和 1966 年初，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关于精简机构和机关革命化的精神，在乌兰夫主持下曾多次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如何调整和实现机关革命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党政领导机关长期形成了以党委为主体，分组(织)、宣(传)、统(战)、工(工业交通)、财(贸)、农(业)、计(划)、政(法) 八大口,由党委的书记、常委按口分管的普遍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着党政机关工作机构业务重复，党委包揽事务过多，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文山会海，办事效率低等弊端。对于这种多年习惯下来的状况，年年喊改革，讲机关革命化，但就是光说不做，甚至愈演愈烈。在经过两个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时期的历史当口，乌兰夫决心要率先采取坚决措施，对内蒙古自治区一级党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要做一次革命性的大调整，对传统习惯，即机关革命化的难点来一次挑战。

1 月 29 日，乌兰夫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按照他不只一次讲过的“拆庙请神”，就是按需要建机构，因事设人，多余的机构撤，重复的机构并，凡撤、并机构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精神，决定自治区一级设计划委员会、农牧林委员会、工业交通委员会、财贸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这五个委员会均为实权单位。委员会建党委，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党的工作。五委行政上隶属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政府)。各委员会的党委由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原自治区党委农牧政治部、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和自治区人委农牧办公室、经济委员会、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以及自治区人委原设的各厅、局一律撤销。另

按业务工作需要，在五委下分设若干专业局，在所属委领导下管理所属业务。凡撤销(合并）机构的干部，先由新设机构挑选，冗员在企事业单位安排。因为这是一个大动作，牵动面很宽，干部有升有降，大都要重新安排，直接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难免有不同想法。对于这种情况，乌兰夫早有预料，在酝酿时他就预做了思想工作，所以在决定实施时已没有什么阻力。这次机构大调整，确实达到了精简、效能的目的，不失为是一次大胆尝试。

但是，在新机构开始运行时，人们有点不习惯。本来这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可是“文革”风吹来以后，有人无限扩大，硬把乌兰夫的这次大胆尝试诬为“反革命政变”。

对于盟、市一级领导力量的充实和加强，乌兰夫准备在自治区一级机关的调整取得经验后解决。他的想法是先从首府呼和浩特做起，然后逐步推开。呼和浩特作为自治区首府，是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自治区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工作好坏领导都能看见，也都会影响全区。当时，呼和浩特因市委领导班子不团结，已影响工作。乌兰夫下决心从市委领导班子团结问题入手，以“四清补课”的方式首先解决这里的问题。他亲自听汇报，直接指导市委领导班子整风，在搞清是非、团结同志的基础上，解决了呼市问题。为巩固成果，乌兰夫亲自选了李贵到呼和浩特市委任第一书记，同时又派去了几位领导干部加强市委领导力量，对原有人员作了适当调整。李贵到任后，有魄力，有干劲，善于团结干部和联系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和乌兰夫的关心与指导下，使呼和浩特很快出现了上下一致，生龙活虎的局面，有望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时期改变呼市面貌，在全区起首府应有的带头作用。乌兰夫为了支持李贵和呼和浩特市委的工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曾表扬呼和浩特市委，他说，“以李贵同志为第一书记的呼和浩特市

委领导班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班子”。乌兰夫的表扬，鼓舞了市委领导和各级干部，加大了呼和浩特市各族人民对市委的信任度，给呼和浩特市的工作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令人惋惜的是，刚刚出现好的势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乌兰夫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成了灰烬。在“十年动乱”中受某些人鼓噪的影响，造反派把呼和浩特说成是乌兰夫搞“反革命政变”的“样板”。李贵被打成搞“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蒙冤多年。

为了逐步改善和加强盟、市一级领导，在乌兰夫的关心和提议下，自治区党委从自治区一级机关挑选了若干名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厅局级干部，分别派往包头、乌盟、呼盟等。就乌兰夫来说派这些干部到盟、市工作，既是为精简自治区一级机关，加强盟、市一级领导，同时，也是为使这些长期在自治区一级机关做部门工作的干部，到盟市经受全面工作的锻炼，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虽然他们到盟、市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随着乌兰夫遭迫害，他们即被视为乌兰夫“亲信”受到株连，但是，他们在盟市的这段短暂工作，不仅显示出了他们的作用，也表现出了乌兰夫的初衷和远见。

1965 年内蒙古大旱，第三个五年计划起步的 1966 年又是少有的大风灾和春旱。乌兰夫决心带领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同自然灾害搏斗，以人定胜天的气魄战胜风灾和春旱，为“三五”头一年赢得好收成。新年伊始，1966 年 1 月 7 日，他就听派去巴盟了解风雪灾害情况的身边工作人员汇报灾情。12、13 日又接连两天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抗旱救灾。他在会上说:“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抗旱救灾。经委、计委、财委、文委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统一部署工作，所有部门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做工作，否则叫不务正业。抗旱救灾的过程，就是“过黄河”（亩产粮 400 斤）的过程，就是搞粮食的过程。

“过黄河”水利是主要的，要突出抓水利。过去水利没有突上去，现在就突，这就是有灾抗灾，没灾防灾。”17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委(政府）全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又主要是说如何战胜灾害。2 月 7 日，他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精神的传达，决定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抗旱指挥部，由他亲任总指挥。11 日，乌兰夫亲自去土默特左旗，在旗委和旗政府联合召开的农、牧、林生产革命誓师大会上作了题为“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抗旱救灾，争取农牧业丰收”的报告。12 日，乌兰夫给李雪峰打电话，请他批准把“四清”工作队就地变成抗旱工作队。3 月 29 日，他在自治区党委和人委联合召开的抗旱救灾会议上讲话，谈了旱灾的严重性后提出:一、各级领导首先要把当前的抗旱救灾群众运动领导好；二、在当前农事大忙季节，各地在农牧业生产上都应当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旱抢种、抗灾保畜、接羔保育方面来；三、在抗旱救灾斗争中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4 月 6 日，他到土左旗前朱堡大队听了情况汇报后指出:要认真贯彻农、牧、林结合的方针，现在水的问题解决了(指前朱堡)，要设法提高粮食产量。9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在会上讲了他在土左旗前朱堡等地了解到的情况，谈了当前农业生产的问题，指出搞水利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打歼灭战。同时还指出，要立足大旱，把耕地全部种上，力争大旱之年夺丰收。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乌兰夫全力抓抗旱救灾和春播，努力争取 1966 年农牧业生产的好收成，为摘掉内蒙古农牧业生产落后帽子打个好基础的决心，现把乌兰夫授意由自治区党委和人委联名发的一个《通知》和一个《紧急通知》，以及自治区党委发的一个《紧急指示》转录如下:

其一:1965 年 12 月 10 日，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关于当前水利建

设和抗灾保畜工作的通知》

当前全区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草原基本建设运动已形成高潮，抗灾保畜和生产自救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的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具体工作跟不上运动发展的需要……

当前，大地已经封冻，水利运动的第一战役基本告一段落，进入冬季施工阶段，抗灾保畜和生产救灾，已处于紧张阶段。为此，要求各地:

第一、迅速落实水利计划，加快下拨经费和物资。有的盟市正开三干会，也应首先将当前工作加以安排，并派一定数量的负责干部下去具体领导运动。同时要派得力的干部到基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总结经验，具体部署适宜于冬季施工的各项水利工程，抓运动中方针政策的贯彻，具体指导运动……

第二、救灾工作要加强。要抓到生产队，一抓到底。发动群众找生产门路，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与此同时要弄清灾情，分别情况，采取措施。灾区口粮必须迅速落实下去，并教育群众节约渡荒，保证不冻死、饿死一个人。

第三、灾区抗灾保畜，应当进行一次总结检查，继续解决过不了冬春牲畜的草场困难。已经远距离走场的牲畜要派人前去慰问，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当前要集中力量解决由于运力不足而尚未落实的饲草、饲料。区内的饲料务必于十二月底前后运到基层，从区外购买的饲草,最晚要在明年二月底以前运完,作为一项战斗突击任务去对待。

第四、在搞水利的同时，要提前做好磙耙保墒、积造肥、选种、养冰蓄水等明春备耕准备,干旱地区还要做好抗旱丰产坑和坐水点种的一切准备，各地需要解决的种籽，要及早作出具体安排。

第五、进一步加强领导。迅速建立健全生产抗灾(旱）指挥机构，

加强指挥部工作，盟市、旗县要固定专人抓，指挥部的任务是既要管方针政策的执行，又要具体指挥各项任务的进行。此外还要组织较强的工作组下去，进行具体的督促检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组织百人检查团下去，重点放在西部地区，望你们加以领导和积极协助，以推动当前各项工作。

其二:1965 年 12 月 15 日，自治区党委、人委《关于在鄂托克旗打抗灾保畜歼灭战的紧急通知》

根据华北局抗旱检查组报告，伊盟旱灾严重，鄂托克、杭锦旗尤为严重。在两旗受灾牲畜中，最严重的是鄂旗北部七个牧业公社和杭锦旗的两个公社，约有 100 万头牲畜。目前这些地区人缺口粮、畜缺草料，草场急剧恶化，没有冬春营地，小畜只能吃半饱，大畜吃不到半饱，畜膘逐渐下降，三类畜不断增加，死亡现象已经陆续发生，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将发生大批死亡，百万头牲畜难以保住，情况十分严重。能否将百万头牲畜大部保下来，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此，自治区党委、人委确定在抗灾保畜工作中将鄂、杭两旗的百万头特重灾牲畜作为重点，以伊盟为主，自治区有关部门大力支援，在鄂托克旗打一个抗灾保畜歼灭战，力争把受灾牲畜保下来，现将有关事项作一通知如下。

一、在按计划积极完成伊盟抗灾物资调运任务的同时，要给特重灾的鄂、杭旗的 9 个公社，在春节之前突击抢运一部分粮、料、草和代饲料。从呼盟调草 1000 万斤，从宁夏运草 500 万斤。从临河、五原县、杭锦后旗各站调运粮、料 250 万斤。中央从南方安排的棉籽饼，分配给 218 万斤，粮食等有关部门应抓紧组织调运。

二、要做好调运物资的组织工作。粮、料由粮食厅进行安排，铁路部门积极安排车辆，运往伊盟粮、料 864 万斤(包括重灾区 250 万斤）应在 12 月底完成运输工作。草价原则上以群众自筹为主，每斤

平均定价在七分，超过七分的其超出部分由国家补贴。草的供应点由供销社负责安排，从车站到供应点的运输工作，由交通厅负责，汽车与铁路运输要密切联系，做到随到随转运。从供应点到畜群的运输由旗组织群众力量进行，其他有关支援灾区工作人员的吃、住等生活问题，由旗负责安排。

调出草、料的呼、锡、巴盟委、公署，应本着支援灾区精神，积极做好工作，在调运货源上优先给予保证。

三、草料费应首先发动群众自己解决，有些社队确实有困难的，银行应予贷款解决。

四、为做好歼灭战的指挥工作，要成立指挥部，由伊盟盟委书记或盟长任总指挥，赵真北同志任副总指挥，自治区粮食厅、交通厅、供销社、呼铁局等单位，要派负责同志参加指挥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设海渤湾市。

五、指挥部定于 12 月 20 日在海渤湾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安排有关打歼灭战的物资、运输等具体事项。请参加指挥部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届时参加。

其三:1966 年 1 月 8 日，自治区党委以“立即行动起来以战斗的姿态抓好巴盟牧区抗灾保畜工作”为题，的《紧急指示》

巴盟牧区，去年遭受了严重旱灾，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牧民和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同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去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中旬，中后联合旗又连续遭受了几次大风灾，有些牧场受到了严重破坏，部分畜群失散，不少母畜流产，有些地方的牲畜已开始成批死亡。这就大大加重了灾情，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这次大风灾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的袭击；一方面最主要的是盟委没有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

二届三次全委会关于牧区灾区暂不开展四清运动、全力抓好抗灾保畜和加强畜群管理工作的精神。这次灾害，也是巴盟在畜牧业工作上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一次大暴露，是长期忽视草原建设，沿用落后方法经营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必然结果。必须从中吸取教训。自治区党委要求你们，立即以战斗的姿态行动起来，同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力争减少损失。为此特作如下紧急指示：

第一、中后旗的四清运动立即停下来，把四清工作队改成抗灾保畜工作队，以战斗的姿态，全力投入抗灾保畜斗争。工作队不仅要保住受灾牲畜，还一定要把当地的畜牧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不完成任务工作队不能撤回。四清工作队中的巴盟西三旗的牧区干部，立即调回本旗抓抗灾保畜工作，其他队员，不论是从哪里去的，都要留下参加这场抗灾保畜斗争。工作队的干部，春节期间暂不放假，直到把吹散的受灾牲畜全部安排妥当以后，再考虑分期分批地进行补假。

第二、要放手发动广大牧民群众，搞好抗灾保畜斗争。领导工作要深入具体，扎扎实实，全神贯注，不怕艰苦。在抗灾保畜斗争中，要自力更生，发扬乌审召精神，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采取打井设圈，进行小倒场，采集代用饲料等有效措施，决心战胜灾害，一定要防止和克服消极依赖思想。要认真总结群众的抗灾经验，树立样板，并及时地加以推广。

第三、要密切提高警惕，预防更大灾害的侵袭。从现在到牲畜吃青，还有 4 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期间仍有受到更大风雪灾害的危险。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做最充分地准备，千方百计地做好抗灾保畜工作。对于外援草料的使用，必须保证重点。对于没有条件保活的老弱畜，要坚决处理。处理的老弱畜的骨、肉、血、下水，要充分加以利用，做到以畜保畜。

第四、在大风期间流散到达茂旗、四子王旗的马群，要继续派人

认真寻找认领。能在乌盟安排的，就留在乌盟，其余的要尽快赶往锡盟。乌、锡两盟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力支援，把受灾牲畜尽量保住。

越境的牲畜，要同有关部门联系，尽快要回来。要回来以后要严加消毒并分群管理个时期，以防带进疫病传染和蔓延。

第五、要注意人的安全，减少小孩子和老人放牧，特别是坏天气，一律不要让小孩和老人外出放牧；留在家里的小孩要托人看管；放牧员要有较好的防寒服装。

第六、巴盟盟委和有关旗委，对这次大风灾中的死人伤人和大批牲畜失散、死亡事件，要作严肃地检查，并报告自治区党委。

从 1966 年头 4 个月乌兰夫抓抗旱春播的劲头，从联名《通知》《紧急通知》和《紧急指示》的坚定态度，不难看出，乌兰夫认准了的问题，就一定抓住不放；但凡是他下了决心的事，就一定要办成。这就是乌兰夫的性格和作风。

1966 年的春天，我国政坛已很不平静，乌兰夫的处境已危在旦夕。当时，“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在干部中已不是笑谈。就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乌兰夫丝毫都不考虑对自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在为他提出的“改变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落后面貌”而罄力拼搏。尽管他那时的心愿和努力未能如愿，但其感人的精神却长久地留给了内蒙古各族人民。

1966 年 4 月 25 日至 30 日，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 19 年中，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4 月 30 日会议还没有开完，因过“五一”国际劳动节休会。5 月 1 日晚乌兰夫被中央召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进行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上乌兰夫横遭迫害。从此，他再没有回内

蒙古自治区工作。

这次乌兰夫没有参加完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是在中华大地上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一场势不可挡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召开的。在此之前，即 3 月 1 日至 16 日，乌兰夫去天津，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学习会；4 月 13 日至 16 日，他又去邯郸，听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 3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乌兰夫依然很镇静。4 月 1 日至 5 日，他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学习会，传达了华北局学习会精神后，即组织常委和代常委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习会上讨论时，乌兰夫带头发言，检查了自己过去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并引导大家联系实际，以把注意力转到从内蒙古实际出发，解决内蒙古的实际问题上来。4 月中旬在邯郸听了李雪峰传达后，乌兰夫已知道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形势已极为严峻。但是，乌兰夫听过传达后在华北局组织讨论时，在发言中却借机讲了内蒙古经济、文化落后，请北京、天津的同志能多帮一帮。这时候的乌兰夫头脑中还满装着内蒙古的特点，所考虑的依然是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和怎样把内蒙古的事办好。这次没有开完他就被中途召走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照他的这种想法召开的。

4 月 25 日，常委扩大会议第一天，乌兰夫讲话。他除了传达党中央的和华北局的有关精神外，主要是讲会议开法。他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大家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想法。要联系实际回忆检查过去的工作，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值得记取的教训。会议开得很活跃，特别是新进领导班子的代常委，都积极发言，大胆地讲自己的意见。但是，也有那么几个人，受人指使在盯着乌兰夫，注视着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发言。乌兰夫对于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统一自治区党委领导核心的认识，以备

在出现什么不利情况时，好像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时那样，经中央批准制定符合内蒙古实际的特殊政策。为达此目的，在会议进行中他每天都在中心组(第一组）发言。26 日和 27 日，他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培养民族干部的问题。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目的是要通过他们去联系和团结本民族的群众，以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各项工作的开展。28 日、29 日的发言，他主要是动员和启发大家给他提出批评意见，以沟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经验。30 日他在发言中，主要是通过回顾过去的工作，概括地讲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19 年来已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他提出: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要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祖国统一，创建坚实可靠的基础。30 日的这次发言，是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工作 19 年中在自治区党的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在最后主持的这次会议上的这次最后发言，语重心长，饱含着他对内蒙古人民的爱，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

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工作 19 年中的最后半年，是极不平凡的半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他“三不两利”的创举，保证了牧区民主改革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时他提出的“稳、宽、长”政策，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那么，1965 年 11 月在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的“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就是将要到来而没有到来的“新发展时期”推动内蒙古工作的行动纲领。这个美好的愿望，切实而宏伟的设想，被“十年动乱”给扼杀在了摇篮里。应该说这是一段历史的悲剧。对这一段历史的悲剧，乌兰夫终身抱憾。他晚年，也就是 1987

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40 年大庆时，为总结历史经验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有两段话很值得人们永远回味。现引录如下：

其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时候，我就想以此为指导，认真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记得我曾提出研究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内蒙古实际之“的”，要创造性地工作，要踏出一条符合内蒙古实际的路子。这是我在内蒙古多年工作的真实体会，从多次成功和挫折中深切认识了的一条真理。

其二：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全国是这样，在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也是这样。团结，包括全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自治区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这一团结加强了，祖国统一巩固了，有坚强的统一的伟大祖国作后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内部拧成一股绳，才能推动各项事业更好地发展。这也是已为实践证明的真理。早在 60 年代，我就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还提出要根据内蒙古的特点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普遍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素质，逐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很遗憾，这一工作被“十年浩劫”冲断了。

这两段话，印证了乌兰夫在内蒙古工作最后半年的心境。时过 20 多年后，他已 80 岁高龄的时候，回忆起这段往事，对其当年的构想未能实现还深感遗憾。这表明了他当年是花了多少心血，冒了多大风险，下了多大决心，才形成了那样的构想，做出了那样的决断和举措。这最后半年，乌兰夫的构想、宏愿和扎扎实实的工作，虽然都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狂风吹掉了，但其精神和影响却永远不能磨灭，反而因狂风的异常残酷而更加显示出了他的非凡。

二十四、拓荒内蒙古高等教育

长时期的革命和社会实践，使乌兰夫深知教育和人才的重要。他一贯重视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而且特别注意把握不同历史阶段办学和培养人才的不同重点。

早年，他曾萌发过“教育救国”，以“从教”来“拯救”蒙古民族的想法。后因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放弃了青少年时的这种幻想，投身到了火热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随着我国和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和他自己的成长，历史把他推上了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岗位时，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和培养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并把植根于思想深处的这种认识，充分地发挥在了他的实际工作中，可以说是获益匪浅。

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的过程中，在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的初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解决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等急需的军、政干部，在他领导和主持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先后创办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治学院、军政大学和内蒙古党校。这些院校采取快速短训的办法，培养了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在前方和后方都曾发挥骨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革命和当年各方面工作的展开和发展，在干部方面保证了夺取民主革命在内蒙古的彻底胜利。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乌兰夫即开始考虑培养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人才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文教工作，必须配合经济建设，有计划地发展。”之后，他又从不同角度，多次讲教育、办学、培养建设人才的问题。为能更清楚地看出乌兰夫在这方面总的思想脉络，下边摘录几段他的有关论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治区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各民族的发展和

繁荣，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发展工农牧业生产，举办各种学校。只有经济和文化发展了，才有可能培养出各种建设人才，反过来它又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

“自治区要建设，就要有自己的干部、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还要有开汽车、开飞机、搞地质、搞气象、办工厂等等各方面的人才，没有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一支……干部、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队伍。”

“过去内蒙古一座大学也没有，中小学也很少。”“要发展小学和中学，有计划地创办高等学校。”“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培养科学技术队伍……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在这方面高等院校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

从上边这几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乌兰夫认为: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人才，而培养人才也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他提出:没有人才，即干部和知识分子，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指出:高等学校在培养人才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然而，内蒙古过去没有大学，中、小学也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发展中、小学，有计划地创办高等学校。

乌兰夫所以多次反复地讲自己的这种认识和想法，就是要把它变成更多人的认识和想法，形成集体意志，并变其为现实。这就是说他希望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共同解决这一关系内蒙古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问题。内蒙古高等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正是按照乌兰夫的这种思路实施和展开的。

早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即 1952 年 5 月 5 日,内蒙古师范学院就在乌兰浩特正式宣告建立。头年 7 月，乌兰夫就以自治区

政府主席名义，任命富有办学经验的教育家左智为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责成他主持学院的筹建事宜。11 月，经乌兰夫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作出了建立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思想、观点，并有足够的从事于初中教学的文化科学知识，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蒙汉中等师资。”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学校，它填补了内蒙古高等教育的空白。对这填补空白的第一所高校的建立，乌兰夫十分重视。为帮助这第一所高校建立起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乌兰夫曾亲自出面向兄弟省、市的有关高校求援。经他的积极努力，建院的当年 8 月，就从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请来 20 多名优秀毕业生任教。这批到祖国北疆支教的青年教师，很快成了内蒙古这第一所高校的教学骨干，对师院教师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对内蒙古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乌兰夫之所以主张首先建师范学院，有客观上迫切需要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乌兰夫着眼于全区教育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师范是教育事业的母体，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培养师资，特别是承上启下的中等师资，它直接制约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乌兰夫在拓荒内蒙古高教中，恰恰是抓住了这最关键的一环。乌兰夫不失为教育的内行。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即东北沦陷后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时，他就曾在土默特小学以任教为掩护搞地下斗争；抗日战争中期，他又曾主持延安民族学院教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他主持内蒙古民族工作，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期间，他又曾先后兼任内蒙古军政学院、自治学院、军政大学和党校的校(院）长。尽管这几所院校当时只能是搞短训，还不具备办正规大学的条件，但对乌兰夫来说，这段经历都进一步提高了他对办

学的重要性的认识，并积累了办学经验。乌兰夫也很懂得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人才是由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很显然，没有小学和中学作基础，是无法办大学的。首先创办师范学院，就是从基础做起，以为大学准备足够的生源，否则办起了大学也是枉然。1953 年暑期内蒙古师范学院的第一期专科生临毕业时，学院为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对祖国日新月异发展的认识，特组织他们到工业城市沈阳、唐山和首都北京参观。乌兰夫知道后，特地在北京接见了这批到北京参观的师生，勉励他们到教师岗位后努力工作，并表示了对他们的厚望，希望他们对内蒙古教育工作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次接见是破格的，它反映了乌兰夫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内蒙古高等教育、对人才的重视、期待和渴望。

就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建立的那年 11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又建了第二所高等学校——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后改为农牧学院）。这第二所高校也是应急需而建的。畜牧业生产是蒙古民族擅长的产业，畜牧业经济是内蒙古的特点经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认真地执行了党对牧区和牧业经济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贯彻了乌兰夫提出的“人畜两旺”方针，畜牧业生产发展得很快，而包括兽医在内的畜牧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却十分匮乏。乌兰夫的视线及时捕捉住了这一矛盾，而且将解决这一矛盾视为发展畜牧业的当务之急。1952 年适逢高教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乌兰夫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了建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的问题，让自治区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主动同高教部和平原(原省名）、河北、山西等有关省领导机关联系，请他们就院系调整之便予以支援。高教部和有关兄弟省，得知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和乌兰夫的想法后，都伸出支援之手，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乌兰夫的关心和有关方面的热心帮助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很快建立了起来。1953 年 1

月 17 日，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举行建院一周年庆典，乌兰夫特意到会祝贺并即席讲话。在讲话中，他除讲了培养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勉励教职员工和学生努力工作与学习外，还要求他们牢记“教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办院宗旨和方针，为培养畜牧业生产、建设的专门人才做出贡献。该院遵照乌兰夫的要求，为使教学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于 1955 年 5 月提出建一院属畜牧场，以作为学生实习和科研基地。乌兰夫认为这是教学与实际相结合所需要的，有利于学生实习和学院畜牧业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提高，很快以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的名义批准了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建附属畜牧场。在乌兰夫和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下，畜牧兽医学院，以及后来的农牧学院，管理和教学都很快步入轨道，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农牧业生产战线，对农牧业生产，特别是对畜牧业生产的稳步、快速发展，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作用。

在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期间，建立的第三所高等学校是内蒙古医学院。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整整 9 个年头的时候，即 1956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医学院正式宣告建立。长时期的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内蒙古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蒙古地区，特别是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和人民健康状况极差，以至造成少数民族人口负增长，使内蒙古民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处于衰败，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自治区建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央全力支持和兄弟地区大力帮助下，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扑灭了鼠疫，控制了性病，制止了人口下降。在建国初期，针对内蒙古牧区当时的情况，乌兰夫提出了“人畜两旺”。为了实现“人畜两旺”，为了解除各族人民的病痛，正如乌兰夫所说“必须大力培养”包括医生在内的“知

识分子队伍”。内蒙古医学院，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应运而生的。内蒙古医学院同内蒙古人民健康直接相关，乌兰夫如同关心人民健康一样关心着内蒙古医学院。在医学院筹建过程中，他提议及时建立了以自治区副主席孙兰峰为首的筹备小组。在筹备人员的积极努力下，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任何一所学校要想办好，首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乌兰夫支持下，经卫生部教育司帮助沟通，从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和北京医学院一次就请来了 3 名副教授、16 名讲师和 38 名助教。有这批教师作基础，内蒙古医学院很快组建起了一支能担负教学任务的教师队伍，保证了这所内蒙古医科最高学府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一项工作中，乌兰夫都会考虑到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内蒙古医学院建立后，他就倡导设中(汉）蒙医系，后来又在通辽建立了蒙医学院，这对挖掘、整理和发展传统民族医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第四所高校，就是内蒙古大学。这是内蒙古惟一的一所综合大学，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最高学府。它的建立，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形成了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由专业学院到综合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这是内蒙古人民期待的，也是乌兰夫追求的，他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努力。

经过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发展，内蒙古各方面人才都缺乏的问题很快就突出了出来。乌兰夫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55 年初，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提出了创办内蒙古大学。这个提议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成和社会的普遍认同，无不认为是个好意见且切合时宜。随后，将这件事正式报请了国家高教主管部门。高教部很重视内蒙古自治区上报的意见，本拟批准建内蒙古大学，但恰遇 1956 年纠正急躁冒进，高教部又决定原拟批准建立的十多所高校暂缓建，这其中就包括内蒙古大

学。乌兰夫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着急，很快直接找了周恩来总理，向他说明内蒙古经济、文化落后，高教更落后，在全国和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内蒙古的高等教育必须相应发展，在内蒙古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内蒙古大学，正是势在必行。对这件事我们是经过充分考虑的，纠正急躁冒进，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该上的也不让上。周总理被乌兰夫说动了，他让高教部重新考虑内蒙古大学的问题。高教部重新考虑后，同意了乌兰夫的意见，内蒙古大学成了 1956 年国家批准的惟一一所新建大学。国家批准建内蒙古大学的消息传出后，内蒙古人，特别是内蒙古教育界的人，有难以言表的高兴。他们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最高学府。内蒙古大学所以能获准创建，全凭乌兰夫主席的重视和努力。

凡事开头难。内蒙古的高等教育是平地起家，内蒙古大学筹建时，虽然已有了三所专业学院，但都是近几年新建的，底子都很薄。在这样的基础上建一所综合大学，无疑困难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内蒙古大学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1956 年 3 月决定建立内蒙古大学筹备委员会时，乌兰夫亲自出任了筹委会主任。同时决定王逸伦(分管财贸的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分管文教的自治区副主席）出任筹委会副主任。乌兰夫曾给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主任不是挂名的，是要干实际工作的。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从上述筹委会的阵容和乌兰夫的态度可以看出，乌兰夫对创办内蒙古大学是极为重视的。筹委会建立后，在乌兰夫领导下，内蒙古大学的筹建工作很快启动。为使在筹建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建校规模、专业设置、师资配备等，能考虑得更全面、更准确、更实际，1957 年 5 月，以内蒙古大学筹委会的名义，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教授等一起举行了一次座谈。座谈会由乌兰夫主持，开得很成功。与会者就建校的有关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使乌兰夫和其他未来

校领导对怎么办这所综合大学的思路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并初步形成了他们比较系统的概念。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建校的各方面工作包括招收第一期学生在内，都基本准备就绪。内蒙古大学就要正式宣布建立了，谁来作第一任校长?上上下下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德高望重的乌兰夫身上。众望所归，乌兰夫接受了这一要职，兼任了内蒙古大学校长，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遭迫害时被革职。10 月 14 日，内蒙古大学在新建的校园里，举行建校暨欢迎第一期学生入学典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以校长身份参加典礼，并以“内蒙古文教事业发展的新硕果”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建立内蒙古大学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内蒙古大学的任务和办校方针。他说:“内蒙古大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它标志着内蒙古文教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说:“内蒙古大学今后担负着两项任务，一方面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培养我们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我们党急需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担负起繁荣和发展内蒙古民族文化，进行多学科高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同时他还讲了依靠群众，勤俭办学，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和加强团结，并对内蒙古大学及其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提出殷切期望。乌兰夫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双重任务”和依靠群众，勤俭办学和加强团结的要求，不仅为一代一代的内大人所牢记，而且已成为内蒙古大学长期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

对内蒙古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乌兰夫如同对先前建立的三所专业学院一样，十分重视。在内蒙古大学筹建期间和建校初期，为能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乌兰夫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精力。最令人感动的是诚聘李继侗教授。李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

内外著名的草原学家，是北京大学这一专业的台柱子。北大将这样一位有学识、有名望的一流老教授割爱支援内蒙古大学，是很难下决心的。能把李继侗教授从京城名校请到当时还是塞外荒城的呼和浩特，就教于一所新建大学，没有德高望重的乌兰夫校长出面，断难办到。当时的乌兰夫校长身居国务院副总理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主席的高位，亲自诚请李继侗教授到内蒙古大学任教，可谓是新时代的“礼贤下士”。由于乌兰夫的诚意和盛情，感动了李继侗教授，也感动了北大校领导，不仅李教授来了，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一同到内蒙古大学从教。畜牧业经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特点经济，草原占内蒙古面积的绝大部分，草原学，在内蒙古大学理应是其主要专业之一。李继侗教授及其助手的到来，使内蒙古大学的草原专业很快建立了起来，而且在以后的发展中，内大的草原生态学和草原植被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始终走在全国同专业的前列。李继侗教授对草原学造诣很深，而且注重学问与实践结合。他曾说:“草原本身就是资源，就是财富，而不是荒地。”他特别强调“绝对不能随便在草原上乱开荒”。他这至深至理的语言，表明了他不单是在做学问，而且是深情地热爱和关心着草原。他的这种态度和观点是很符合实际的，且同乌兰夫的草原观完全一致。对此，乌兰夫深表赞赏。为了更好地发挥李继侗教授的作用，乌兰夫提议他任内蒙古大学第一副校长。虽然李先生上任前夕染疾不幸早逝，但他在内大建校伊始所作出的贡献，已为内大草原专业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也为其以后发展开辟了道路。为能把内蒙古大学办得更有特点，使它在培养蒙古学人才和繁荣民族文化方面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乌兰夫还亲自出面从中国科学院请来蒙古语言学家清格尔泰教授，从南京大学请来蒙古史学家韩儒林教授，让两位分别掌管内大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和蒙古史专业。此外，在乌兰夫支持下，经报请国务院批准，还特意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请来

一位蒙古语言学专家和一名蒙古文学专家到内蒙古大学任教。这些国内外的名家、学者，不是乌兰夫是请不来的。而他们的到来，对提高内蒙古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校声望，对教师队伍的壮大和学校后来的发展，都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影响。

内蒙古大学建立后，内蒙古高等教育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到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各方面建设都一哄而上，人才缺乏的问题更显突出，再加上“全党全民大办教育”的误导，在很短时间内，内蒙古自治区的高等学校由原来的 4 所一跃而为 20 多所。其中包括内蒙古工学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地质学院、建筑学院、中蒙医学院等等。这些新建学院，绝大部分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管理和经费等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有的一办起来就难以维持。好在没有多久人们就开始觉悟，实在维持不下去的下了马，但能勉强维持的，多不想舍弃这“大跃进”的“产物”，试图拖一拖再说。到 1961 年初，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开始了全面调整时，根据中央精神，乌兰夫对内蒙古的教育工作提出:“从实际出发，把教育速度放慢，必须采取措施，大力进行整顿、压缩。”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在“大跃进”中一哄而上的高校，做了排队和权衡，在自治区一级除保留既需要又基本具备办学条件的工学院和林学院外，其余的全部下马或退为中专。经过调整后，内蒙古自治区一级的高校，包括原有的四所和新建保留下的两所，共 6 所。其中除综合性的内蒙古大学和师范、医学两所专业学院外，其余三所高校，在专业上已涵盖了内蒙古农、牧、林、工等主要经济门类。这样的配置和格局，已基本上趋于合理，符合内蒙古当时“东林西铁南农北牧”的经济布局及其发展水平。这种摆布和格局，保证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内蒙古高等教育的稳健发展，也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乌兰夫主持内蒙古

自治区工作期间，内蒙古高等教育得以拓荒，并形成自治区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这一事实同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一样，对内蒙古自治区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谁也不会忘记，内蒙古现在已有的比较完整的高教体系，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但乌兰夫对内蒙古高教事业的贡献并不单单是拓荒，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始终关心着内蒙古高教事业的发展。他曾给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题词:“加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这几个大字，充分亮明了他的教育观，也说明了他为什么那样重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正是他对教育的这种基本观念，才使他总是关心内蒙古的高教事业。乌兰夫晚年，身居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作为内蒙古选民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会议时，遇见他熟悉的内蒙古教育界代表就总免不了要问一问内蒙古高等教育的情况。在六届一次全国人大开会时，1987 年 4 月 1 日，他在内蒙古代表团的会议上说:“内蒙古比较落后，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产力水平低，一个是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内蒙古是有很大发展余地的。”他还说:“科学研究与生产力结合起来，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987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 40 年大庆时，乌兰夫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来内蒙古参加庆典，于 8 月 17 日抽出时间到内蒙古大学会见老教师、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代表，同他们齐聚一堂，兴致勃勃地一起回顾了建校初期的情景和建校 30 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并亲切地鼓励大家要努力把内蒙古大学办得更好。1988 年 3 月 14 日内蒙古大学领导到北京看望老校长乌兰夫，并送去聘他为名誉校长的聘书。82 岁高龄的老校长高兴地接过聘书，谦虚地点头，并连声说:“好！好!”他听过校领导汇报内蒙古大学的情况后说:“内蒙古大学，无论人才培养方面，还是教材建设方面，都要立足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需要，要面向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在教学内容上，无论理科还是文科，

都要从这个立足点出发，从实际需要出发。只有这样，面对实际需要，教材才有用，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有发挥作用的基础，英雄才有用武之地。这就需要内大办出内大的特色来。没有地区特色，没有民族特色，就立不住脚，就打不出影响来。比如，对蒙古语言和蒙古历史的研究就是内大的优势；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的理科教学、科研，也是内大的优势。蒙古历史，就很有研究价值。”教学、科研与实际结合，为生产、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这是乌兰夫的一贯思想。他这发自肺腑的忠言、嘱托，是对内大的，也是对内蒙古高等教育的期盼。

二十五、心系民族文化

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沉积的人类文明之和。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是该民族、地区民众精神和气质的集中反映。而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又为民众喜闻乐见，是传播政治主张和知识，启迪、教育、感化和提高民众的主要手段。

蒙古民族能歌善舞，其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源远流长。而内蒙古的民族新文化，却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随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以后又随着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同当年内蒙古其他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一样，都同乌兰夫的关心和支持密不可分。

1945 年 11 月，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位有艺术天才的年轻人周戈来到了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不久的张家口。这位年轻人揣着一颗爱国之心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康生的“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抗战胜利后，他到张家口的时候，头上的“特嫌”帽子还没有摘。乌兰夫在延安时就知道这位年轻人，他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是“特务”，更不怕他“特嫌”帽子未摘，反而认为他是内蒙古革命的有用人才。为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乌兰夫决定让他筹建内蒙古文工团，同时，还给了他创作一台好节目的任务。这位年轻人不负厚望，很高兴地接受了乌兰夫交给他的两项任务，并以强烈的革命激情即刻投入工作，而且很快见到了成效。不久，内蒙古第一部革命题材的现代歌剧——《血案》创作成功。《血案》的主题是蒙汉人民团结起来，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民族解放的道路。通过剧中塑造的典型人物，生动地表现了蒙汉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同残酷杀害蒙古族同胞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的动人场面。乌兰夫看过周戈写

的剧本后很满意，要求即刻组织排练。在排练中，革命热情很高的年轻“演员”们，都很刻苦、认真、卖力。饰演剧中主要人物巴根的文浩，原本是乌兰夫身边的服务人员。他接受饰演剧中主角的任务后，不仅尽心尽力地排练和演出，而且感情十分投入，每当演到悲痛处，他就声泪俱下，把观众感染得也同他一样泪流不止，并自发地高呼:“为受害的同胞报仇!”“共产党是我们的恩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看过演出后，不少蒙古族青年被唤醒，或积极报名参军，或积极要求参加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在乌兰夫关心和指导下诞生的这第一个现代剧目和它演出的成功，标志着内蒙古民族新文化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诞生和兴起。同时，它也为内蒙古第一个属于人民的革命文化团体——内蒙古文工团的诞生作了准备。

1946 年 4 月，内蒙古文工团宣告建立。乌兰夫亲自为它命名并提出办团方针。对于文工团的名字，当时有人提出叫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文工团，以表明它是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下的革命文工团。可是乌兰夫没有认同，他说就叫“内蒙古文工团”。虽然这只是几字之差，但含意却截然不同。前者把文工团局限在了只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范围之内，而后者则是着眼于整个内蒙古，它寓意了这个“文工团”是属于内蒙古全体人民的。对于如何办文工团，办一个什么样的文工团，乌兰夫提出了四条方针:一、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普及第一，要做大量的启蒙工作；二、继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三、发展民族新文化，培养民族文艺干部；四、团的性质既是演出团体，又是学校。内蒙古文工团从建团起，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时期，都始终遵循着乌兰夫提出的这四条办团方针，活跃在横亘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地区。

1946 年冬，内蒙古解放区和全国其他解放区一样，不少地方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侵占，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此时，正在内蒙古东

部地区搞宣传演出的内蒙古文工团，供给极为困难，生活已到难以维持的地步。乌兰夫知道后，立刻和热北(今赤峰市西部）地区我党领导机关联系，请他们设法支援。热北地委很快给文工团的同志们解决了冬装和急需的食品等，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当时乌兰夫异常繁忙。他既要考虑和运筹保卫内蒙古解放区的战事，又要紧张地筹划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宜。在百忙中，他抽出时间直接过问文工团的生活问题，使文工团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他们个个都想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来回报领导的关心。就在文工团的同志们精神抖擞，求战心切的时候，乌兰夫交给了他们一项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为即将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也就是为欢庆即将诞生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准备节目。文工团的同志们十分兴奋地接受了任务，以高昂的士气，满怀胜利信心地迅即投入了新的战斗。没有多长时间周戈和孟和博彦就分别创作出了《额尔登格》和《嘎达梅林》两个优秀剧目。此外还有吴晓邦的舞蹈活报剧——《内蒙古三步曲》(也称《蒙古之路》)。吴晓邦是我国现代舞新舞蹈的创始人，著名舞蹈家，时任华北联合大学舞蹈系主任，是乌兰夫特意请来参加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庆祝活动，并为内蒙古文工团讲学的。这几个剧目，不仅时代性、思想性很强，艺术水平也很高，公演后观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发动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对鼓舞士气和坚定胜利信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不久，为了总结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自治运动和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经验，并鼓舞内蒙古人民继续团结战斗，不断夺取新胜利，乌兰夫提议由内蒙古文工团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合作，创作和拍摄一部反映内蒙古人民为追求翻身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电影艺术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这是内蒙古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片。为确保其创作和拍摄成功，时任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治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亲自

给作者和编导人员交代创作和拍摄意图，亲自主持讨论剧本，直接指派时任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的布赫担任该片顾问，并要求内蒙古文工团作为重点任务全力投入拍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他还亲自给有关盟的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全力支持，切实解决拍摄中的实际问题。由于乌兰夫如此重视，这第一部影片的创作和拍摄都很成功，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这部影片公开放映后，在内蒙古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对当时内蒙古革命和各项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部影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主持内蒙古文化工作的布赫曾著文作过全面评价。现将其有关部分引录如下：

《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是第一部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影片。

在 1945 年 8 月间，苏蒙红军配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者随即倒台。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翻身斗争的浪潮，动摇了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统治基础。为了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的解放斗争，于 1945 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后，派大批干部去做群众工作，在各盟、旗积极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纲领，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盟分会、旗支会。《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就是描写了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个旗的工作情形，怎样团结了群众，怎样争取了上层，怎样孤立了敌人，怎样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匪军的进犯。

影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正确地批评了少数蒙古族群众中，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造成的狭隘的思想情绪，并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反动本质。以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正确观点，剖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它明确地告诉我们：

历史上蒙汉民族相互残杀、战争，都是由蒙汉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蒙汉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八一五”以后，内蒙古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骑在内蒙古人民的脖子上为非作歹，对人民大施其欺骗的伎俩。他们表面上主张内蒙古要“独立”，反对汉人来干涉内蒙古，实际上或明或暗地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勾结在一起，镇压人民的翻身斗争。当时一部分蒙古族群众听信了封建统治者的谎言，认为国民党坏，共产党也不怎么样，蒙古人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投降了汉人。之后经过许多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蒙古族人民的，国民党是压迫、剥削和屠杀蒙古族人民的。这样群众逐渐觉醒了，发现自己受了封建统治者的欺骗，认清了共产党是蒙汉族人民真正的救星，国民党反动派是蒙汉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积极投入到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影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描写的就是内蒙古人民的这种觉悟的过程。

影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还较深地揭示了内蒙古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形，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内蒙古的封建统治者否认内蒙古有阶级存在，外地有些不了解内蒙古社会的人也认为草原上是自由天地。事实则是内蒙古存在着非常黑暗、残暴的封建统治。王爷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牧民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王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不如牛马骆驼。

《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是在深刻地体验了内蒙古人民生活习惯、思想情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同时又是在不断地修改、充实中拍摄成的。因此，它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色彩，蒙古民族风味。它抛弃一切不必要的琐碎的小事，抓住最主要的、典型的事件，用几个典型的人物，真实地反映出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实。

影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中的角色，有一部分由蒙古族同志饰

演。蒙古族同志参加电影工作，是内蒙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过去内蒙古人民在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牛羊被人拉走，牧场被人抢占，文化被人摧残，过着痛苦愚昧的生活。“八一五”以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帮助下，得到了翻身。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且在文化上也求得了解放和发展……

总之，《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是真正描写内蒙古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第一部艺术片，它说明了谁是内蒙古人民的朋友，谁是内蒙古人民的敌人，并对民族问题、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作了正确的解释。我想这部影片对各族人民都会有相当大的教育意义。

布赫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他不仅说明了《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本身的意义和作用，而且通过这部影片也说明了文化艺术在革命和其他工作中的宣传鼓动力，及其感染效果，从而表明了文化艺术在人们生活和斗争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由此可知，乌兰夫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新文化。

一位在乌兰夫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老文化工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乌兰夫是内蒙古新文化的奠基人。对此，凡是了解和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乌兰夫同志一手创办了和倡导创建了内蒙古歌舞团(原文工团)、民族剧团、京剧团、话剧团等专业表演艺术团体；创建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内蒙古博物馆、图书馆、民族曲艺馆、群艺馆、展览馆和乌兰恰特(红色剧场）等一大批文化设施的建设，也都浸透着乌兰夫的心血。”从这位曾担任内蒙古文化领导职务的老文化工作者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内蒙古的民族文化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组织建设，各项成就都是在乌兰夫的关心和支持下取得的。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期间，也就是以自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

放运动蓬勃发展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初建时期，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乌兰夫对刚刚出世的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的主要要求是:出剧目，搞宣传；要求新生的内蒙古文工团“把培养民族干部放在重要位置，要成为‘老母鸡’，发挥‘老母鸡’的作用。”在他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以内蒙古文工团为基本队伍的内蒙古民族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双丰收，即一方面创作出了一批优秀新剧目，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培养锻炼出了一批政治、业务双强的文化、艺术人才。这不仅为以后民族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建立、健全文化管理机构，完善不同类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准备了业务骨干和管理干部。正是乌兰夫的这种超前意识和远见，才有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内蒙古各级文化管理机构的顺利建立，才有了五六十年代门类齐全的文化事业单位相继出世，才有了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的空前繁荣。

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封闭、固守的文化，是封建落后、没有前途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兴旺、繁荣、发展，必须交流、借鉴，必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乌兰夫说:“蒙古族的文化是十分丰富的，现在，还必须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才能更进一步丰富起来。”他还曾说:“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各民族应该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接受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那么它的文化艺术就不能得到丰富和提高。”正因为他具有这样广阔的文化观，所以他既主张请进来，又主张走出去。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曾先后邀请广西《刘三姐》剧组、湖北《洪湖赤卫队》剧组、中国歌舞剧院《宝莲灯》剧组到内蒙古自治区演出;他还曾特邀我国著名艺术大师荀慧生、王金璐、马连良、裘盛戎以及山西晋剧表演艺术家王爱爱、马玉楼等来内蒙古作辅导性演出。他不仅颇有兴致地认真观看他们的演出，叮嘱内蒙古

文化界虚心学习，还接见了剧组的艺术家和演职人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以表感谢和鼓励。同一时期，乌兰夫还先后请我国文化界名人邓拓、叶圣陶、翦伯赞、老舍等到内蒙古访问、讲学，使偏僻、闭塞的内蒙古，文化大门顿时洞开，为内蒙古民族新文化充进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为了扩大内蒙古艺术家们的眼界，使他们增加见识并吸收区外与国外的艺术精华，早在 1950 年我国第一个国庆大典时，乌兰夫就曾带内蒙古文工团进京，与兄弟省、区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在怀仁堂同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演出。1955 年 7 月，派蒙古族女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宝音德力格尔此行不仅以一曲蒙古民歌《海骝马》震动全场，博得各国观众的一致赞扬，同时还满载而归，博采和吸收了国外丰富的艺术营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在他倡导下，派内蒙古歌舞团等艺术团体赴前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演出，既使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艺术走出了国门，又学习了兄弟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迎来了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百花盛开的春天。内蒙古自治区创建后的十多年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乌兰夫的关心和培育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期。这一高潮期的标志主要是:造就出了一批文化、艺术名家，并由他们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内蒙古民族新文化战线上群星灿烂、百花斗妍的可喜局面。在群星中，有代表性的如作家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等，剧作家周戈、特·达木林等，作曲家美丽其格、莫日吉胡等，舞蹈家贾作光、斯琴塔日哈、莫德格玛等。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哈扎布等，画家官布、耶拉等，他们由于各自的成就，都已远近闻名、蜚声遐迩。在斗妍的百花中有名歌:《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阳》《敖包相会》《海骝马》等，名舞《鄂伦春舞》《马刀舞》《鄂尔多斯舞》《盅碗舞》《挤奶员》等，名剧《血案》《金鹰》《慰问袋》《达那巴拉》《巴林怒火》《布里亚特的婚礼》等，还有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鄂尔多斯风暴》《草原晨曲》《草原上的人们》等。这些成功之作，反映和代表了那个火热的时代，深受群众的喜爱和普遍欢迎。

这些优秀的歌曲、舞蹈、戏剧和电影，乌兰夫都不止一次地听过或看过，多数他都提出过指导性意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他都曾主持或参加过讨论。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同乌兰夫积极倡导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艺术要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作品要具有民族特点，要有典型性，要代表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和最广大的人群；要交流，要兼容，要吸收所有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直接相关。这些优秀作品，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以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段内产生的优秀作品中的出类拔萃者，将会旷世流传。

为能更具体、更直接地说明乌兰夫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民族新文化繁荣的关系，下边摘录一段著名舞蹈家贾作光的回忆:

乌兰夫对内蒙古文艺事业非常重视与关心，他告诫我们说:“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要紧密团结合作，不要搞大汉族主义，也不要搞狭隘民族主义，蒙汉文艺工作者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展内蒙古新文艺。”他强调干部的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在内蒙古歌舞团工作时期，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歌舞团的方针、任务及演出剧目都亲自过问，有困难都积极地给予解决，他关心演员的疾苦，问寒问暖解决实际问题。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文艺团体和广大群众接触，无论是歌舞团，还

是京剧团、杂技团，有许多演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甚至演出什么剧目他都清楚。对节目的优点、缺点他都能提出改进办法，演出的晚会只要他看了就给予恰当的评价与要求，从不强加于人。我记得 1952 年内蒙文工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3 周年国庆节活动，我们带去的是内蒙古民族歌舞，整个晚会都是在乌兰夫同志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他特别强调民族形式，反映内蒙古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与新的精神面貌的作品。

当时，由于我对内蒙古民族生活理解不够，缺乏体验，从而在创作上不能准确地把握民族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语言及民族风格。我记得我跳反映牧民生活的《牧马》舞，出场亮相及整个舞蹈形象都缺乏鲜明性，更没有生活气息，十足的知识分子味。乌兰夫同志看后并未责备我，而是诱导启发，要我去深入牧民生活，去观察，去体验，去感受牧民放马的生活情景，要从艺术的创作规律角度研究一下，再创造出牧民的形象来，要我把牧民的感情化为自己的感情，不要用自己的感情代替牧民的感情。他告诉我“深入生活要改造自己，要爱牧民，要爱他们的纯朴生活，拜牧民为师，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乌兰夫同志的亲切教导，使我有了深入牧区的坚定信念。后来，我经过深入生活，向牧民学习，经过一段与牧民生活，我对牧民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的思想感情也有了新的变化。我把舞蹈形象注入了新的感情，粗犷健美一扫学生腔调。当我重新登上舞台，演出《牧马》舞时，一出场亮相就博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从此我在创作舞蹈时便时刻想到乌兰夫同志的教诲，深入生活，继承优秀传统，表现民族精神气质与时代精神。乌兰夫同志经常提醒内蒙文艺工作者要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为人民喜闻乐见，就必须深入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中汲取养料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创

作出为人民所接受的好作品。”我始终不能忘记乌兰夫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的教导和扶植。我在深入生活的时候，我时刻牢记，“在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决不能以自己的爱憎来代替少数民族的喜闻乐见。”乌兰夫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贾作光的这段回忆，说明了他自己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成就，同乌兰夫关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乌兰夫的关心和重视所产生的影响，绝非贾作光一个，而是整个内蒙古民族新文化事业。

乌兰夫最早倡导京剧现代戏汇演。他还曾提出创“蒙派”京剧。内蒙古的地方戏西部地区是“二人台”，东部地区是“二人转”。最早传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剧种是晋剧山西梆子。内蒙古过去还没有京剧演出团体。随着内地移入人口的增多，喜欢京戏的人也多起来。为了满足不同文化爱好的需要，也为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在乌兰夫的关心和倡导下，1959 年开始筹建内蒙古京剧团。为了使内蒙古京剧团能尽快组建起来，给该团选拔未来的艺术骨干，1960 年 5 月，乌兰夫邀请中国戏剧学校学京剧的毕业生来呼和浩特演出。随后他又在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陪同下，亲自到中央戏剧学校挑选了 19 名品学兼优的学员，调到内蒙古京剧团工作。这批受过正规教育、经过严格训练的优秀学员，经过几年实际锻炼后，很快就成了内蒙古京剧团的艺术骨干。乌兰夫很关心来内蒙古的这第一批京剧基干力量。1960 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乌兰夫特责成分管财贸工作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政府副主席王逸伦，亲自到内蒙古京剧团去看望演职人员，嘱咐他们注意劳逸结合，排练不要搞得过分紧张，要把生活安排好，并当场拍板，给从中央戏剧学校调来的 19 名学员，每人每月增发 7 元伙食补助费，每人添一件过冬的棉大衣。1962 年 6 月，乌兰夫又把被定为“右派”、当时处境十

分艰难的京剧名家李万春及其一家和他所带的京剧团由西藏调来内蒙古，以充实和加强内蒙古京剧团的艺术力量。李万春及其一家和他带领的京剧团很感激乌兰夫。他们视此举是对他们在危难中的搭救。乌兰夫表示对李万春先生及其一家、一团人的欢迎，6 月 20 日观看了他们到内蒙古后的第一次精彩演出后，特意接见了他们，并给李万春说:“热烈欢迎你们来内蒙古，欢迎李先生扎根内蒙古，为内蒙古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乌兰夫十分关心和重视京剧现代戏。1964 年 3 月 26 日看了内蒙古京剧团演出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后接见编导和演职人员时他说:“这出戏排得很好，你们走在前边了。”还说:“要多演几场，让呼和浩特市的青少年都能看上这出戏。”而后，他又针对京剧演现代戏说:“演现代戏方向对头，要坚决走下去。”1964 年夏天，文化部组织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其间于 7 月 2 日，国家民委邀集参加汇演的少数民族地区京剧团举行座谈会。夏衍在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最早发起现代京剧汇演的是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特别关心京剧现代戏。民族形式怎样融化在京剧表演艺术里，是个重要问题。现代戏汇演很重要。”乌兰夫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说:“农村牧区大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城市京剧舞台上，仍然还是刘、关、张，这怎么能行呢?这次汇演，没估计到有这么多反映少数民族革命、生产的京剧。”在乌兰夫的关心和倡导下，内蒙古京剧团在演京剧现代戏方面作了大胆尝试。他们先后排练了不少反映现代题材的剧目，如《巴林怒火》《嘎达梅林》《锡尼喇嘛》《草原烽火》《气壮山河》《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乌兰夫对这些剧目的演出看得很认真、很投入。他如此认真地看现代京剧，并非一般地看戏，而是在往更深层次思考京剧的发展。正是反复认真观看和思考，使他萌发出了“蒙派”京剧的想法。他给内蒙古京剧团的同志说:“要排演富有民族风格、地方特点的蒙古戏，形成

自己的风格。”“要搞蒙派京剧。”应该说这是一种大胆设想，其中包含着如何使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也包含着在内蒙古现代题材的剧目中，如何运用京剧艺术，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作用。很显然，他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信口而言，而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提出的一个值得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进行探讨的课题，而且具有举一反三的重要意义。

乌兰夫很关心乌兰牧骑的成长和发展。“乌兰牧骑”是蒙古语，译成汉语是“红色文化队”。它是内蒙古在旗、县一级设立的综合性文化工作队，面向农村牧区向农牧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创作、翻译群众演唱材料，搜集、整理民间文艺。它的特点是队伍精干，节目短小多样，活动快捷灵活，所以很受农牧民欢迎，被群众誉为“文化轻骑兵”，称它为“我们的乌兰牧骑”。这支活跃在内蒙古草原和农村的“文化轻骑兵”，正是在乌兰夫的直接关怀下诞生，并在他培育下发展起来的。1957 年 4 月 30 日，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乌兰夫以“十年来的内蒙古”为题发表署名文章，全面总结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10 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在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中，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有些工作不能很好地根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来贯彻党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有时往往发生搬用别的地区的工作经验的偏向。自治区文化局按照文章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对照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他们认为乌兰夫讲的切中内蒙古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文化工作中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自治区文化局组成工作组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作调查研究，发现该旗文化馆有坐等服务的问题，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的实际。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后，提出了在旗文化馆的基础上，增加少量演出人员，改为流动性的文化工作队，按蒙语称其为“乌兰牧骑”，

即红色文化工作队。是年 6 月 17 日，内蒙古的第一个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苏尼特右旗诞生。乌兰夫得知后非常高兴。他认为，就牧区和农村的文化工作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是一项新创举。同年 9 月，经他同意，以自治区人委名义批发了《乌兰牧骑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乌兰牧骑的性质、任务、编制和经费等问题。随后，于 1958 年和 1959 年，乌兰夫几次在讲话中要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加强对农牧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一定要抓好农村和牧区的电影放映、乌兰牧骑工作和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在乌兰夫这几次讲话的促使下，1960 年乌兰牧骑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乌兰夫主持下，1962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族文化和牧区文化工作的有效措施。1963 年初又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文化卫生工作的若干规定》。在这个《规定》中，提出了发展和提高乌兰牧骑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文化工作管理部门，按照要求加强了对乌兰牧骑的领导和训练。尚未建立乌兰牧骑的旗县不少都开始积极筹建，加速了乌兰牧骑的普及。乌兰牧骑的发展和其深入农村牧区为农、牧民献歌献舞的精神，引起了文化部的关注。1964 年，乌兰牧骑代表队应邀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观摩演出会上，乌兰牧骑代表队的出色表演和他们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看过演出后，在乌兰夫陪同下接见了乌兰牧骑代表，并勉励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要拿你们这把火在全国点起来。”乌兰夫听了周总理对乌兰牧骑的称赞和勉励后，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主席，便以主人的身份对受接见的乌兰牧骑代表队队员们说:“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队这次来北京演出，得到了称赞。乌兰牧骑这个专业队伍，在坚持走革命道路、坚持劳动、坚持同农牧民群众相结合、坚持为农牧民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当然，他们做得还很

不够，应当继续努力。”这既肯定成绩，又提出希望的短短几句话，充分反映出了他对乌兰牧骑既感欣慰又表关爱的心情，但其话意的重点则在于鼓励“继续努力”。一次观摩演出，乌兰牧骑名扬京城，同时也传遍全国。为了发扬乌兰牧骑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的经验推向全国，1965 年周恩来总理提议乌兰牧骑派出小分队到全国巡回演出。这次巡演十分成功，不仅向全国各族人民展示了乌兰牧骑这支文艺新秀的风姿，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宣传了内蒙古解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全国人民了解了久居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民族不仅勤劳勇敢、爱祖国、爱家乡，而且纯朴豪放、能歌善舞。他们充满民族和地区韵味的精湛表演，震惊了所有观众，给全国各族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乌兰夫对这次巡回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好就好在与全国交流了文化，学习了先进经验。”这次乌兰牧骑到全国巡回演出成功和载誉而归，不仅自身蜚声全国，也为内蒙古民族(地方）文艺赢得了在全国文艺百花园中的应有地位。它将是内蒙古文化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

关心民间艺人和民间文艺。居住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蒙古民族，受长期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他们以游牧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民间文化。它包括世代流传的民间音乐、舞蹈、美术、民歌、诗歌、传说等。民间的文化艺术，不仅给劳动人民以欢娱，还造就了一代一代民间艺术家，通过他们传承和发展了民间文化。乌兰夫既重视民间文艺，更重视民间艺术家。还在新中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 1950 年，乌兰夫就派人把著名的蒙古族民间艺人色拉希、毛依罕、孙良、阿兴嘎等请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通过他们整理、挖掘、继承和发展内蒙古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遗产。可是当时的文工团领导没有理解乌兰夫把这些民间艺人请来的初衷。

他们被请到文工团后竟没有人理睬，很长时间在那里没有事干。长期活跃在民间的艺人，遇到冷落后，曾一度兴奋而高涨起来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文工团领导没有向乌兰夫报告就把请来的这些民间艺人遣散了。乌兰夫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文工团领导，并让他们“三顾茅庐”，重新再把这些民间艺人请回来。这一举措，使这些民间艺人深受感动，他们的积极性重又调动了起来。同时，也教育了文工团领导，改变了他们对民间文艺和民间艺人的看法。为借此推动整个内蒙古民族文化工作，经乌兰夫提议，于是年年底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民间艺人大会。乌兰夫亲自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他除讲民间文艺外，重点强调的是如何正确把握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他说:“内蒙古文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的一部分，有其一般性；同时，因为内蒙古是一个民族地区，内蒙古文艺又有其特殊性。有时候我们强调了一般性而忽视了特殊性，生搬硬套其它地区的东西，不能很好把握民族形式和特点。有时我们强调了特殊性而忽视了一般性，不去吸收其它地区兄弟文艺的新的革命内容，也阻碍了内蒙古文艺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生搬硬套，一方面也要反对固步自封。为使民族形式和新的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今后内蒙古文艺必须大力向这方面努力。”这次大会不仅促进了民间文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乌兰夫这次讲话明确了内蒙古民族新文艺，以至整个内蒙古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方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文化战线，特别是民族新文化，硕果累累。无论是文学、艺术创作，还是歌曲、戏剧、舞蹈、电影等表演艺术，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或其他基础建设，都有长足发展，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这些成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状况，大

大缩短了与先进地区和先进民族之间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成绩，为内蒙古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打下了坚实和丰厚的基础。而这可喜的成绩，这令人欢欣的变化，都是在乌兰夫的关心和领导下取得的。群众出于对乌兰夫的尊重和爱戴，早期曾称内蒙古文工团为“云泽文工团”。20 世纪中期，内蒙古文化界又称乌兰夫为“内蒙古新文化的奠基人”。

二十六、民族工作战线上的十七年

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 月 19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0 月 22 日，在他主持下举行中央民委成立大会，由他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乌兰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自此至 1966 年夏“十年动乱”开始，乌兰夫长期担任我国民族工作方面领导职务，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管民族工作。此期间，正是共和国初建，社会变革和各方面事业恢复与发展普遍展开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民族工作更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乌兰夫从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民委副主任，到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民委主任，先后时跨 17 年。在这 17 年中，由他主持或在他参与下，解决了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首任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晚年在病榻上曾对前去探望他的乌兰夫说：“我的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你可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会缺下一块。”一位暮年接近垂危的老人，向一位同自己竭诚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很是语重心长。在这位我党元老看来，乌兰夫在我国民族工作上不仅贡献和影响很大，而且他

所发挥的作用是颇具历史意义的。

随着我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国内少数民族解放的问题也随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已由原来旧中国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旧民族关系，变成为新中国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民族关系。在民族工作上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培育、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新型民族关系；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少数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利；稳步推进社会改革，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认真总结民族工作的经验，充实和丰富我国的民族理论。在这些方面，乌兰夫都尽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建国初期，特别是晚解放和待解放地区，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和领袖人物，对我党和党的民族政策还都不了解，再加国民党反动派和少数民族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宣传，以及种种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隔阂，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对其民族政策还存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向少数民族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不仅是关系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实施的大事，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的当务之急。乌兰夫深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起的作用。他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了这份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

1950 年 4 月 28 日，在政务院第 30 次会议上，乌兰夫发言专讲了民族问题。他说：“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我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成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今后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消除民族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步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6 月 26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中央民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李维汉作《关于民族团结问

题》的报告。李维汉报告后，乌兰夫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基本解决了。但还有问题，就是真正把中央正确的民族政策完全贯彻下去。这需要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去长期地努力工作才行。”还说：“民族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干部彻底了解政策……宣传政策。”9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定乌兰夫担任建国一周年庆典招待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接待各少数民族到京参加庆典的代表。为了把接待工作做好，由他主持召开了参加接待工作的全体人员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的工作，是在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是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他要求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接待工作，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做好接待工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做。国庆过后，于 10 月 19 日中央民委为参加国庆活动的少数民族代表组织了民族问题报告会，由乌兰夫主讲。在主讲报告中，他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创建者和政府主席的身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重点讲了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内蒙古的贯彻实施。他现身说法，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讲了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以后，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已发生的巨大变化。用他的亲身经历，以雄辩的事实，告诉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要求得彻底解放，只有一条路，就是像内蒙古一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紧紧地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携手前进。乌兰夫的报告，使各兄弟民族的代表个个听得入神。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实例和榜样。先行一步的内蒙古，给全国各少数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辟了求得彻底解放的道路。而乌兰夫的报告，又是那么活灵活现、真实动人，听众个个都深受感

动。1951 年 2 月 5 日，乌兰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少数民族同胞发表春节广播讲话。此时正值朝鲜战场打得激烈，国内经济恢复在紧张进行之际。他在广播讲话中，首先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同胞致以亲切的节日祝贺，接着全面讲了我们新生的祖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而后以坚定的信念，明确指出：“只有新中国才真正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我们要珍惜这幸福生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保家卫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把我们共同的家园——新中国建设得更强大。”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感召，就在这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政府的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充分认真地谈判，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达成了共识。5 月 23 日，双方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乌兰夫和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签字仪式，同时还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为此举行的盛大宴会。随后于 5 月 27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又在张家口举行隆重的庆祝晚会，乌兰夫在晚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表示对兄弟的西藏人民致以由衷的祝贺。而后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西藏人民获得了和平解放。这是西藏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西藏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将和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共同建设新生活。”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对兄弟的西藏人民发自肺腑的期望和祝贺，也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又获得的这一新胜利的盛赞。10 月 1 日，乌兰夫怀着对建国两年来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喜悦心情，参加建国两周年庆典。同日，他给参加共和国诞生第二个周年庆典的少数民族代表作报告。这次报告主要讲内蒙古的情况和内蒙古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已走过的道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各方面的发展，以及生产建设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变化的情况。其目的在于，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和经济、文化等方面恢复、发展的经验介绍给兄弟民族的代表，以使他们前进的步子走得更稳更好；也是以活生生的事实让少数民族人民更加坚信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

上述乌兰夫在民族工作方面做的这些工作和讲话，都是立足党和国家全局，从全国各族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的。他以建国初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绩，国内民族关系已发生的变化，现身说法，讲述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和包括代表人物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了党的政策。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真正形成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培育和养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国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有关主要问题的解决，都同乌兰夫联系着。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两年多，于 1947 年 5 月 1 日，在乌兰夫带领下，内蒙古人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省一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这片土地上首先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变成了现实，为我党以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树立了榜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于 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根据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两年多的实践经验，明确规定了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遵照《共同纲领》的这一明确规定，大力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效。新中国建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性文

件，以使已经实行和将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有所遵循。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遵照政务院的这一意图，1951 年年末召开了具有代表会议性质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乌兰夫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领导，并于 12 月 31 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着重讲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在农业区已经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了大规模的增产运动；在牧业区稳步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增畜保畜运动；在内蒙古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广泛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建立了内蒙古民族的人民武装，发展了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他的这一报告，来自于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工作实践，乌兰夫本人又是主要实践者，所以引起了与会者的特别关注和重视，成了在这次会议上起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规性文件的主要依据。这次会议，根据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和解放后在其他地方初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充分讨论了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主要问题，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并产生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这一草案，1952 年 2 月 22 日经政务院第 125 次会议讨论通过，8 月 3 日又经全国政协政法组和民族组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同意，8 月 8 日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批准，8 月 9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明令发布实行。在为讨论修改和审议批准这一《纲要》草案而先后召开的上述三次会议上，都是由乌兰夫作的草案说明。他在批准这一《纲要》草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上作说明时，除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和《纲要》草案产生的经过外，着重讲了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和自治区的民族组成、自治机关、自治权利，以及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和上级人民政府对自

治区工作的领导原则等。

在谈到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时，乌兰夫说：“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依据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利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区和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意愿，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这就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谈到自治区的民族组成时，乌兰夫说：“由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居住状况，并不完全是那么区域整齐，界限分明，所以就出现了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问题……依据什么原则来处理自治区民族组成问题呢？……应依据各民族聚居区不同的民族关系、经济条件及历史关系并在民族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来处理民族组成问题……根据以上原则来考虑自治区的民族组成，那么自治区的类型将有并且事实上已经有如下三种，即：由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区；由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为基础，并包括个别人口很少的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由几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第三种类型的自治区可以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它有利于民族间的互相合作，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在自治区民族组成问题中……因为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可以包括一部分汉族居民区或城镇，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包括大部分的汉族居民，这是既有利于民族团结，又有利于自治区的建设的。”在谈到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时乌兰夫说：“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是与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当的一级地方政权，其建立和组织应该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基本原则；但其具体形式，可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意愿，使能适合各少数民族当前

发展阶段的面貌，成为实行区域自治的人民容易了解和乐于亲近的方式。自治机关主要应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组成，同时必须使自治区内其他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员参加。”在谈到自治区的自治权利时，乌兰夫说：“关于自治区的自治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这是自治区应有的权利，也是国家应该赋予的权利，是完全合乎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的愿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这些自治权利充分地正确地行使，就能够充分发挥各自治区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就能够加强民族的团结，从而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各上级人民政府对于这些自治权利，应该保障并帮助其实现。”在谈到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时，乌兰夫说：“基本精神只有一个，就是民族平等。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权利的行使，自治机关的巩固和自治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各民族人民觉悟性和组织性的不断提高，因此就有赖于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能够保障自治区内各民族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并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人民。”在谈到上级人民政府对自治区的领导原则时，乌兰夫说：“在领导方法上，各上级人民政府需要足够地估计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指示和命令，既符合于《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又适合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应该防止和纠正简单地搬用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办法。”

乌兰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上所作的这些说明，对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有效地启发和加深了与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对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策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顺利通过和批准，起了很重要的促成作用；同时，他在这次会议阐述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这些基本观点，既切合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又十分真切明确，对我国今后的

民族法制建设和民族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好的铺垫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发布两年多之后，为了促进这一《纲要》的贯彻实施，于 1954 年 12 月 30 日，乌兰夫在全国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当前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民族区域自治。他首先说：“我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无可怀疑的政策……但是，目前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了……我认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规定一个大体的期限，把应该建立的都建立起来，不能再拖延……我相信，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建立了自治区（州、县），并且自治机关有职有权，工作肯定会比现在好办得多。”接着又讲自治权利问题，他说：“第一要保障，第二要帮助……保障帮助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首先是保障和帮助自治机关能够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办事情。我们的国家采取对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就是在统一的政策下，给少数民族以权利，让各民族按照本民族的特点和人民喜欢的形式来办事情……给他们以自治权利，就能使他们灵活机动地办事情。”他最后说：“积极地建立起各级自治区（州、县），由自治机关按照当地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地保证和帮助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这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就会顺利一些，偏差会更少一些。”乌兰夫的这次讲话，对《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贯彻实施，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到 1955 年 7 月，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建制为县以上的已有 72 个，其中除原有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其余的 71 个中包括 26 个自治州和 45 个自治县。它们都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发布后先后建立的。此

外，还有正在抓紧筹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乌兰夫对这种大好形势甚觉高兴和欣慰。1955 年 7 月 23 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时曾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于最近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在筹建，这两件大事，标志着我国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又获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又过了将近一年后，1956 年 6 月 20 日乌兰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以《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为题发言，首先高度评价了 1955 年 10 月 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和 1956 年 4 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是新疆和西藏也是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共同进步的新的里程碑……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疆和西藏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接着概述了全国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已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而后得出结论说：“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确实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惟一正确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一基本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渴望的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平等、团结、统一和发展的问题。”同年 9 月 19 日，他又以“党胜利地解决了我国民族问题”为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再次讲了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他首先说党和各族人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共同任务是：“巩固祖国统一，发展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挥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把祖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经过长期努力，使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先进水平。”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伟大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并在解放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内容。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完全符合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是完全正确的政策。”随后，又从历史发展中分析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的必然。他说：

世代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用辛勤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共同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的接触往来中，发展了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进行了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相依共存的关系不断发展。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各民族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大敌当前，迫使各民族必须作一种选择：或者……团结起来，战胜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求得共同解放，建立足以保卫各个民族的强大的祖国；或者分立单干，各行其是，任人宰割，永受压迫。中国各族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祖国的忠诚儿女……从鸦片战争以来，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亲密团结，联合斗争，形成一种共求解放的强大力量，终于战胜了共同的敌人。由于在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在近三十多年来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发展了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依共存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因而在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之后，中国各民族选择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了这样的分析以后，他又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好处。这就是：

“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情况和特点来

发展自己的民族；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基础上，团结各兄弟民族在统一的大家庭内，互助合作，共同管理和发展共同的祖国，因而也有利于各民族自己的发展。总之，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对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是完全必要的、有利的，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如上分析和归纳后，他又强调说：“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实行区域自治，当家作主，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党和国家必须帮助他们充分实现这些权利。”

上述乌兰夫接连发表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讲话和发言，虽然都是工作性的，但观点明确，论述清晰，说理充分，给人一种实在、透彻的感觉，很富有感染力。他把民族区域自治各方面的基本问题都讲透了，不仅使民族战线和全党同志对这一基本政策的正确性、重要性，及其对祖国和各民族未来发展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刻、明确的认识，也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的理解和实行与维护这项制度的自觉性。从而，显著地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贯彻实施的进度。

1957 年 7 月 5 日，乌兰夫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代表国务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他讲了广西和宁夏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考察、协商拟建立这两个自治区的过程及所提方案的利弊比较之后说：

“这两个民族自治区的筹备和建立，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是坚决的、始终不渝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国曾经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是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独立、发展成长起来的，现在还

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封锁。因此，我国各民族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同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但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汉族地区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亲密合作，团结互助，求得共同的进步和发展。还应该看到，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虽然存在过民族压迫制度，但是各民族人民间的联系还是得到了不断发展的。各族人民长期互相联系和交往，充分表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我国实行民族区城自治政策，赢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团结在我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也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后，我国需要建立省一级自治机关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已建立了自治机关，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应该建立自治州、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已大都建立起了自治机关，实现了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民族区域自治。据此，乌兰夫郑重宣布：“至此，在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今后的任务，已由原来的推行转入了巩固、完善和逐步提高，由自治机关带领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人民，不断地推进社会和经济、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也就是乌兰夫于1957年8月5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所有自治地方，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主持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三次民族工作会议。

第一次是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字。至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全部解放。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自 1953 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大都以畜牧业为主，而畜牧业，又是他们擅长经营的特点经济。解放较早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比共和国早两年创建的内蒙古自治区，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恢复与发展，都先行一步，为解放较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和范例。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经济等方面的恢复与发展进行得更为顺利，在民主革命任务在全国范围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于 1953 年 6 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经验。

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又是集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于一身的乌兰夫，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除讲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的概况外，对于恢复和发展牧区的畜牧业经济，在总结几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方针、十项政策和六条措施。两个方针是：“慎重稳进”和“人畜两旺”。十项政策是：一、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二、扶助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扶助贫苦牧民生产；三、组织工、农、牧业互相支援，发展牧区贸易和（供销）合作事业；四、保护牧场，禁止开荒；五、牧区的税收要轻于农村和城市；六、稳步发展牧民间的互助合作；七、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八、注意培养牧业区的劳动模范，奖励技术人员；九、适当办与畜牧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小型工业；十、建立国营牧场和种畜场。六条措施是：一、保护草原，划分地界，合理使用草原牧场；二、搭棚、盖圈、储草、防止风雪灾害；三、扑灭狼害及其它兽害；四、组织定期交配，

大群分群放牧，小群合群放牧，互助接羔；五、改良品种；六、防止牧畜疫病。这两个方针、十项政策和六条措施，全面反映了民主革命阶段和三年恢复时期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牧业区社会改革和畜牧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被中央民委扩大会议全面接受，并经党中央批准转发到了全国。这些经验十分可贵。它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它来自实践，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真知灼见，是经带领群众实践的乌兰夫提炼、凝聚出来的集体智慧。它受到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区牧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拥护，有效地指导和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区的社会改革和畜牧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第二次是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不仅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变革方面步子跨得也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上完成所有制方面的“三大改造”。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 1953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和若干政策界限，但是，“左”倾思潮的影响“势不可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少地方都跨越几个历史阶段，一步“登天”，进入了“社会主义”。为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以避免产生更多的问题，1957 年 8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后，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对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他不仅亲临会议指导，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央民委主任的乌兰夫，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和座谈中反映出的问题和讨论中的意见，于 8 月 5 日作了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他集中地讲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发展，关于民族关系，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关于加强党对民族地区的领导。这四个问题，在民族工作上都具有根本性的

意义。为便于完整地了解这次座谈会，全面理解乌兰夫这一总结发言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现将其主要部分原文引录于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发展问题

我国各民族人民正在坚定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前进，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民族的情况必然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不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在其他有关的方面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场社会改革，使处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人民，逐步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各民族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必要的社会改革，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什么时候进行改革、怎样进行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人民及其有联系的公众领袖来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和汉族工作人员绝不能强迫。同时，在社会改革和其他工作中，都必须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如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党和政府的长期的一贯政策，即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要坚持实行。

现在，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了许多经济、文化建设，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要使我国各民族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各方面的情况也还会发生变化。在对待社会主义改造态度上，现在存在三种人：

有一种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暂时感到不习惯。这需要党和国家向他们做多方面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步习惯起来。第二种人，基本上也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怀疑不少，顾虑很多，担心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民族就不存在了。应当说明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不仅存在，而且还将发展，各民族经

济、文化水平会更高。在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民族政策将保持和发扬各民族优良的传统和习惯，只是改革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本民族进步和发展及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东西。这样，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民族才能兴旺昌盛。可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不仅存在，还会繁荣。第三种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本民族中的改革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其中有的人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但最好我这个民族的一切，包括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本民族进步和发展、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东西，都保持不变。这实际上还是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认识不符合民族发展规律，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在大变革，民族也在发展和变化。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立场，适应社会变革，努力促进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变化，否则就可能犯错误。

二、关于民族关系问题

宪法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 6%，但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60%左右，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亲密合作，互相帮助，求得共同的进步和发展。还应该看到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为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因此，我国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我们要时刻维护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分裂的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各民族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

系，和旧社会各民族间互相压迫、对立、歧视、排斥的民族关系完全不同。最近几年来，由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大大发展了。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势必促进各民族成员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风俗习惯、互相照顾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势必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互相支援，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汉族人口众多，居住集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因此，他们的帮助，对于各兄弟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几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大都勤勤恳恳地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爱护。虽然有一些汉族干部思想、作风上有缺点和错误，应当克服和改正，但是，不应该把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加以夸大。

现在有些少数民族地方已进去了一些汉族工人和农民，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内地招收工人和移民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有的移民闹事，因此，应当很好地改进工作，认真解决闹事问题。但是，不应该把移民工作中的缺点扩大，更不应该把极少数移民中的违法行为，错误地认为是整个汉族的事。

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的态度，应当是一欢迎，二帮助。为此，必须继续在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中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热情欢迎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

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员，对汉族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工作或劳动还存在许多顾虑，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由于：（一）过

去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移民垦荒”政策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还存在；（二）对今天祖国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中新的民族关系，对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对汉族人员参加民族地方的工作和生产的好处，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够；（三） 狭隘的排外情绪。这些都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发展的。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狭隘的排外情绪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各民族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隔阂不可能短期内消除，剥削阶级的影响也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外的敌人和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会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活动，而各民族发展的差别更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因此，民族关系问题不仅现在存在，而且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存在。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不断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而努力工作。

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

建国八年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还有一些应该建立的自治地方尚未建立起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建立之前，还有许多具体的准备工作；西藏自治区的建立，需要做更多的筹备工作；还有一些应该建立的自治地方，有的正在酝酿准备，有的尚待筹划。

第二、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还没有充分实现，有的自治权利甚至基本上还未实现。就全国范围来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真正做到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总的说来，就是自治机关有权管理本地方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各民族共同的国家事务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事务和本民族内部事务间的界限应该如何划分？我们认

为：关系到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问题和利益，必须由国家统一集中地去办理的，就是属于全国性的共同事务，包括国防、外交、粮食、铁路、关税、银行、邮电和中央直接经营的大型企业等。而另一些只关系到各民族自治地方局部的、特殊的问题和利益的事务，例如自治机关的行政工作，地方财政的管理，地方工、农、牧业等的建设，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就是地方性事务和本民族内部事务。具体地说，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了具有宪法所规定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以外，还有依法管理自治地方财政的权利，有依照国家军事制度组织地方公安部队的权利，有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除此以外，还有行政人事的管理权，经济计划、企业、事业的管理权，根据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特点执行政策的权利等等。为要充分实现这些自治权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法令。这方面的工作有的现在已着手进行，有的将要研究进行。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能否充分实现自治权利，除了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和法令以外，关键还在于上级国家机关对他们行使自治权利是否尊重和帮助。现在，有些上级国家机关和部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尊重不够，或者没有采取措施去帮助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这都是必须纠正的。

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标志，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对本民族内部事务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干部民族化，就是少数民族干部占一定比例。由于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内民族构成情况非常复杂，所以要定出一个统一适用的民族化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在干部方面，民族化不一定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在自治机关占多数。在许多情况下应该占多数，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占多数。这是因为既要保障实行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又要保障当地其他民族和汉族的政治权利，特

别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更是如此。同时，实现民族化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盲目地追求民族化，对本民族的人民是不利的。

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利，实现民族化的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必须明确，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所有自治地方，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对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给了很大帮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准备以更多一些的力量来支持和帮助各自治地方的建设。各民族自治地方，也应该根据本地的特点和主观客观各方面的条件，制定经济、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并逐步地去实现。但是，任何不顾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原则的过急过高的要求，都必须防止。

在充分实现各民族自治地方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保障杂居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即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刚过后，乌兰夫在这一总结发言中，针对民族工作上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态度十分明确地讲了自己的意见：

“各民族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必要的社会改革。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什么时候进行改革，怎样进行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人民及其有联系的公众领袖来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和汉族工作人员绝不能强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民族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不仅现在存在，而且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存在。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不断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为维护祖国统一和

各民族的团结而努力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自治机关有权管理本地方和本民族的内部事务”;“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真正做到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能否充分实现自治权利……关键在于上级国家机关对他们行使自治权利是否尊重和帮助”;“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标志，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对本民族内部事务能否真正当家作主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利，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明确，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所有自治地方，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任何不顾客观上的可能和经济上合理原则的过急、过高要求，都必须防止。”

乌兰夫这些论点，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的一贯政策和原则，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又冒出了某些“左”倾思想。不肯人云亦云的乌兰夫，在这次座谈会上这样一讲，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和民族工作战线上的同志，又感到心中亮堂了。但是，人们却没有料到，周恩来总理也都同意的这些意见和观点，后来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左”倾思潮步步升级的干扰下，竟没有能够顺利贯彻。其中有些论点，尽管符合实际，又深得群众拥护，却遭到了无端批判。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无损乌兰夫的形象，反而提高了他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次是 1962 年由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和李维汉、习仲勋主持，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全国人大的少数民族代表、全国政协的少数民族委员，以及有关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一

些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它具有民族工作代表会议的性质，与会人员中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会议从 4 月 21 日到 5 月 28 日，开了一个多月，到会人员普遍讲了话，部分人达到了畅所欲言，使我们党和国家主管民族工作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对近些年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达到了发扬民主，增进团结的预期目的。5 月 25 日，乌兰夫应邀在会上讲话，主要讲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建设自治区的基本经验。他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15 年来所走过的路，就是根据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总路线、总政策，逐步深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多项政策的过程。内蒙古所取得的各项成绩，都同实事求是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密不可分。内蒙古自治区 15 年来的经验证明：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内蒙古自治区创建和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稳步地进行社会改革，是内蒙古解决民族问题、走向发展繁荣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工农牧业生产和其它经济及文化事业，是逐步改变内蒙古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不断加强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团结和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基本条件；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内蒙古自治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乌兰夫对这些他亲身体会的经验阐述得深刻明确，入情入理，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同和欢迎。与会人员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既肯定了民族工作的成绩，也诚恳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其中有很多涉及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乌兰夫和李维汉等领导人同与会人员一起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整理成书汇报提纲，及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听过汇报后说：中央同意汇报提纲，认为会议对这几年民族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错误的分析是正确的，所提有关调整政策、纠正错误的意见也是适当的，中央同意在全国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会后，于 1962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以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名义送中央的《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中说：“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对今后五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自治县县委和民族杂居县的县委，要求他们研究执行，并仿照此次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切实解决问题。这次会议在全国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时期召开，对纠正受“左”倾影响在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问题，对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全国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渡过了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在这十多个风雨春秋中，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民族方面的问题，建立新中国的新型民族关系方面，在建立自治机关，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方面，都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9 年 3 月，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却发生了西藏地方政府在外人插手下的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事件。对西藏地方政府武装叛乱，乌兰夫当即表示了谴责，揭露了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的阴谋和农奴制度的野蛮与黑暗，用新中国新型民族关系和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启发教育受蒙蔽的藏族同胞觉醒。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更加感到总结民族工作的已有经验，由感性到理性，提高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认识，把握民族工作的规律，更加自觉地推动民族工作不断向

前发展的重要。于是，他的注意力有意识地向这方面倾斜。自 1959 年起，他接连发表文章和讲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讲民族问题。现在从乌兰夫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讲演中，节录一些论述民族工作的文字，以展示他那时在民族工作上的基本认识和想法。

其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 10 个年头，也即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12 周年之际，于 1959 年 5 月 1 日，乌兰夫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上发表《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的署名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论述了我国各民族的不可分性及民族团结的必然性及其意义。现将该文的部分段落引录如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交流不断发展，于两千年前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是在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制度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帝国主义的侵入，加深了各族人民的苦难。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长期的共同的革命斗争，把我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反动统治，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十年来，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及 19 个自治州、54 个自治县。在全国建立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少数民族在自治地方，根据宪法规定，充分享

有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一切杂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内，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定重大事项，都是国家的主人翁。

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迅速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祖国观念，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祖国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十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正在逐步得到改变……

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是同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解放十年来，国家每年都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贷款、救济款，设置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卫生医疗补助费等，并且在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直接投资进行重点建设，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已经在我国各民族间普遍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民主改革完成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这种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平等互助，团结协作，共同劳动，共同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多，联系愈来愈密切，彼此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互相

影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各民族成员在同一人民公社、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上，而且还表现在各民族地区之间联系的空前加强上……

过去我国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经过十年的大变革，有的已经根本改变，有的正在迅速改变。汉族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了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汉族地区的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变。所有这些，使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越来越多。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我们必须采取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的态度。

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并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

当然，我国现在还处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距离各民族的融合还很远。各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在各民族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才能逐步地达到各民族的融合。列宁又指出，"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在目前我国各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等方面的差别，而且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也还很不平衡，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一切工

作中，还必须从各民族的发展特点出发，为消除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而努力。各民族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发展繁荣的时期。也只有在各民族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摆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争取在今后 15 年、20 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实现了这个任务，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达到我国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毛泽东同志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我国六亿五千万人口中，汉族人口约占 94%，并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汉族在我国各民族中起着先进的主导的作用，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负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光荣责任。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6%左右，但是总数也有 3、4 千万人口，并且分布的地区广大，约占我国总面积的 50%到 60%；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内，各种资源非常丰富，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少数民族对汉族人民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民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使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

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了实现

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跃进，必须继续向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特别是应当向各民族干部进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使他们自觉地克服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其残余。

毛泽东同志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我们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一方面要继续警惕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有任何疏忽。不管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倾向，都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

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应当照顾各民族的特点，正确处理在人民内部发生的各种民族问题。在一切包括有不同民族成员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农村中，都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相帮助、互助学习和共同进步的原则。对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的特点，应该适当照顾，充分发挥各民族成员的特长，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互相尊重；各民族间应当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经常交流各种生产建设经验。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各民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

其二，在民族工作上，乌兰夫一直是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内蒙古自治区对全国民族工作来说，起着“试验田”的作用。而这片“试验田”，在“十年动乱”前，始终都是由乌兰夫直接营造和掌管。出自这里的经验，无疑都是乌兰夫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和意义非同一般。

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5 周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 1962 年 4 月 13 日组织了党员干部报告会，由乌兰夫主讲。乌兰夫集中讲了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他首先说内蒙古自治区 15 年走

过的历程，雄辩地证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钥匙。”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概括起来就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内，在党的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这一政策是：“调动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彻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他最后强调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也是全国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在祖国大家庭中，它有同兄弟省市一样，都是大家庭一员的共性，同时由于它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它区别于其他兄弟省市的特性。把共性和个性讲清楚之后他说：“只有把共性和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自治区同祖国的关系，充分认识自治区的地区特点和历史情况，并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处理区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乌兰夫在这篇演讲里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经验”为题的第二部分中，分八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二、培养民族干部；三、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军队；四、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五、稳步进行社会改革；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七、发展繁荣民族文化；八、不断增强干部团结与民族团结。这八个方面，囊括了内蒙古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十五年来的全部经验。其中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阐明了乌兰夫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思想。现将有关部分引录如下：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就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就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由自治民族自

己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由于内蒙古统一的区域自治的实现，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充分调动了蒙古族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参加革命、建设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被正确地纳入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总任务的轨道上，使内蒙古的民族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而逐步得到解决。

二、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当家作主。自治区成立以后，积极地稳步地改造了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同时，团结了包括王公、喇嘛等上层人物在内的一切赞成实行民主自治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放手使用了各族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经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造，把各级政权改造成为人民民主政权，通过各项社会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断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三、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全区 1100 多万人口中，蒙古族人口为 130 多万，汉族人口近 1000 万，其他少数民族近 20 万。这是内蒙古人口的一个特点。根据这种情况，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各民族人民，特别是蒙汉民族人民的团结，欢迎汉族人民的帮助；对区内聚居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对散居的少数民族保障民主权利……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建立了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三个自治旗；在杂居区建立政权时，依照人口比例，照顾了人口少的民族有适当数目的代表参加。这样，使区内各民族都享有了平等权利，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蒙汉民族的团结，把自治区 1100 多万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建设自治区。

四、当家作主的权利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财政等各方面。只有在这些方面实现了民族平等，才能真正体现出当家作主权利……

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利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应当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关于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方面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内蒙古自治区为了完成这一基本任务，15 年来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一、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注意发展生产，并不失时机地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认为，不论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也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在 15 年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如一地重视了对自治区工农牧业生产和其它经济事业的领导，并在 1954 年完成了统一的区域自治的历史任务以后，及时地把领导重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实行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方针，组织了农牧业的爱国丰产运动；执行了“保护发展工业，供给军需民用”的方针，发展了工业生产。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也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我们坚持了“农业、牧业、林业、合作贸易互相结合”的方针，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并有力地限制了旅蒙商的超经济剥削，加强了工农联盟。根据“为农牧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恢复与发展了工业生产。到 1952 年，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为转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据国家在我区大工业建设的情况，我们制定并执行了“保证重点，支援国家建设，就地取材，为农牧业生

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了工业建设；同时，抓住了农牧业业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一有利条件，积极推动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到 1957 年底，便顺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1958 年以后的三年中，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发展。目前，正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目前暂时性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总之，自治区的前进历程，也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各项生产得到不断发展的历史。

二、只有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出发，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否则，势必造成事与愿违。

1958 年以来，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发生过一些“左”的错误。

三、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服从党的统一政策和国家的统一计划，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一）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摆正国家与自治区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在久远的历史中，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和祖国形成了共命运、同呼吸的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如果没有全国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对自治区的统一领导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又是自治区取得辉煌建设成就的根本保证。自治区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成就，也是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贡献。我们不要只看到 15 年来自治区向中央上调了许多物资，例如仅粮食一项即达 100 多亿斤，更要看到从 1952 年到 1961 年的 10 年当中，中央在自治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 26 亿 400 万元，占全区同期基建投资总额的 53.1%。此外，中央还派来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调来了

大批的建设物资和设备。国家在我区投资建设了包头工业基地和大兴安岭森林工业基地。如果没有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不可能有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把祖国和自治区的关系摆对，牢固地树立全局观点，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就要经常地向全体干部和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二）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自治区的建设速度，必须服从全国的建设速度。不能只看到自治区建设的需要，更要看到全国建设的需要。要严肃地对待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必须首先千方百计保证完成。类似这几年当中存在的计划层层增加，挤占国家计划，搞计划外的基建投资等分散主义行为，必须严加禁止和反对。

（三）支援和保证国家在我区的重点建设。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是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国家在自治区建设的包钢，内蒙古第一、第二机械厂以及森林工业等项目，使自治区的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成为发展自治区地方工业的纽带。必须从各方面来支援和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必须把内蒙古自治区确实建设成为祖国的农业基地和畜牧业基地，这对于国家在自治区的重点建设是最基本的保证。

（四）物资调拨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在国家和自治区的关系方面，最容易在粮食和其它物资的调拨上发生问题。因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做到内销服从上调。自己不够吃怎么办？一是增产，二是减人。其它物资的调拨，必须坚决执行“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总之，要使自治区的财富成为全国的财富，首先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四、坚持贯彻以农牧业为基础的根本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大办畜牧业，这是发展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键……根据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发展农牧业生产，是自治区当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

其三，1962 年 12 月 23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回顾了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贯彻实施党的民族政策的全过程与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总结了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提炼了规律性的认识。这次演讲，乌兰夫讲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听的人也很兴奋，每个人都很聚精会神。中央民委对这次讲演十分重视，曾派人帮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整理记录稿。乌兰夫认为记录稿整理得文字精炼，语义准确，甚觉满意。现将演讲文稿的第四部分，即《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段落引录如下：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有人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我们说民族区域自治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完全符合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情况，能够最妥善最完满地解决蒙古民族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而且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和道路。也就是说，除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外，任何别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都不可能解决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

（二）为什么说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和道路呢？

我们说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和道路，这是我们党和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我国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中所形成的国内民族关系的特点制定的，是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在单一制的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少数民族都可以在自己聚居地区建立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一方面和其他地方政权机关一样，是中央和有关上级国家机关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必须服从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它又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自治权利。这样，它既可以保证国家的统一，把各兄弟民族团结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互助合作，共同发展，又可以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从远古以来，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从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各民族中间逐渐发展到密切不可分离的程度。近一百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内封建压迫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使我国各族人民更加亲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长期历史的发展，使我国民族关系形成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90%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只占 6%左右，并且各少数民族大部分和汉族杂居或交错聚居，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大都是杂居或交错聚居。

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这些特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

主席就主张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红军长征期间，毛主席就已经确定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今天这样的规模。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党就领导我们把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第一个成功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过区域大小不等的许多民族自治地方，对于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原则，团结和动员少数民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虽然没能延续下来，但却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有益尝试。在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时候，党和毛主席确定了建立单一制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由于党的这个决策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密切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团结斗争，共求解放，亲密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共同利益，所以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三）、（四）略。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国家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包含着国家同人民、中央同地方、整体同局部、上级同下级的关系，存在着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某些人民内部矛盾。这些关系，与国家同汉族人民、中央同一般地方、上级国家机关同一般下级国家机关的关系相比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需要国家更多的帮助和

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一些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在工作中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能够使这些具有特殊性的矛盾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自治地方既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单位，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单位。民族自治政权既是一般地方国家政权，又不同于一般地方国家政权，具有国家赋予的一定的自治权利，可以得到国家和上级机关的必要的特殊帮助和照顾。

国家为了帮助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迅速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帮助。从 1953 年到 1962 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自治区国民经济计划 40 多亿总投资中，国家给予的资金占 50%以上，同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也给予更多的照顾。这是近十年来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能够突飞猛进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激发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好地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建设自治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多方面尽力支持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自治区每年平均向国家上缴粮食 12 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自治区每年上调耕畜 8 万头左右、羊 100 万只以上。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正确处理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是几个甚至是十几个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的地区，如何处理好这些地方的民族关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件大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妥善地处理这一类民族关系问题的最好办法。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有居多数的汉族人民，还有回族、满族、朝鲜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兄弟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处理好了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关系。一方面，由于蒙古族人民实行了自治，在自治区内处于主体民族的地位，就会欢迎、

尊重世居在自治区的汉族人民，并欢迎汉族人民迁移到自治区来帮助建设；另一方面，由于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汉族是居于主体民族地位的，同时自治区又充分保障汉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所以汉族人民也就会更安心地在自治区居住，愿意到自治区来安家落户。其次，由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各兄弟民族人民对蒙古族人民的自治权利是尊重的，并且更加尊重蒙古族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其他优良的民族特点，而蒙古族人民由于自己实行了自治，因而也就更加注意团结和照顾各兄弟民族的人民。同时，蒙古族人民也帮助自治区内的其他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帮助他们进行建设。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自治区内各族人民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和睦了。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保证自治地方的工作，能够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

根据自治区 15 年的经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凡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相结合，就可以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取得工作成绩；凡是忽视民族特点、地区特点，一般化地进行工作，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我们自治权利，是我们能够在工作中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保障。

什么是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呢？ 我认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区，在这个聚居区内，居住着比较多的汉族人民，还居住着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因为蒙古族人口和汉族人口的比例是 1:7，所以我们常说的要注意 7:1 的关系。

（二）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语言文字不同，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

（三）阶级构成复杂：有工人、农民、牧民、猎民；有被消灭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牧主阶级，有民族上层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四）有多种经济：工、农、牧、林、猎、渔都有。全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耕地8000万亩，牧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70%以上。

（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分割统治的状态。革命胜利以前，内蒙古地区被分割划成了热、察、绥三个行省，部分旗划到宁夏，地图上没有内蒙古。而且东部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了14年，叫兴安总省；西部地区被伪蒙疆政府统治了8年。在解放以后，经过大小十次合并，才逐渐完成了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六）内蒙古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资源丰富，人口稀少，气候比较寒冷。

（七）内蒙古国境线长。包括同苏联和蒙古接壤的国境线共长达4200多公里。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十五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就是在充分估计和照顾这些特点的情况下进行并取得成就的。今后仍然需要继续注意这些特点。

四、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是长期存在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民族问题的存在是长期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全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完成、阶级没有消灭以前，也就是说，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民族问题将继续存在。既然民族问题还存在，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自然也需要存在下去。

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一种基本制度，只要国家职能还存在，民族区域自治也就应当继续存在，并且应当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总归是要消亡的，所以作为人民民主制度一部分的民族

区域自治也必定是要消亡的。但是国家只有到了社会主义过渡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到了阶级消灭了，无论对内对外国家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时候，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同国家一起归于消亡。但是这决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事，而是很久以后的事。民族区域自治的存在是长期的。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了，各民族政治上已经平等了，民族区域自治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是同党的政策相违背的。

从上边引录的乌兰夫关于民族问题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客观地反映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想法。将其概括起来这就是：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民族作为一客观存在的实体，作为一个概念，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没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它将长期存在。同样，与其相伴而生，相厮相守的民族问题，必然也将长期存在。对于我国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同我国历史相联系，我国民族问题，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很久以前，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依共存，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自 19 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特别是 20 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和与其相勾结的我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各民族间更加形成了相依为命，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地共同奋战，推翻了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一个各民族共同的大家庭。从我国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并培育、养成了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型民

族关系；以平等、团结为前提，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认为：在我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平等、团结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前提，有了这个大前提。各民族才会亲同手足，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惟一正确的基本政策。实施这一基本政策的核心是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真正让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自己处理自己民族的内部事务。自治机关建立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是繁荣发展自治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业。这就是乌兰夫对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也可以说是他的民族观。他的这些认识和观点，是我国民族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民族理论。乌兰夫坚信这些都是符合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的，是正确的，并为之实现坚定不移地作了最大努力。

二十七、一段历史的陈述

1966 年 5 月 22 日至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人们习惯的称这次会议为“前门饭店会议”。

前门饭店，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西口，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是首都享有盛誉的大饭店之一，不少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曾在这里召开。华北局这次工作会议的内蒙古组、山西组和会议工作班子下榻在这里，内蒙古的与会人员大都住在五楼。这个会议与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进行，乌兰夫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交错参加这两个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产生《五一六通知》，对“十年动乱”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时间上与其交错召开工作会议的目的，是想借它的“东风”让华北地区紧跟这次会议，在党内极左思潮步步升级中创造奇迹。乌兰夫就是这次会议“创奇迹”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等《五一六通知》的红头文件，华北局工作会议于 5 月 22 日至 31 日先开了 10 天预备会。这 10 天主要是“传神”，即用林彪的“造神”、“政变经”和江青的极左“武装”与会人员的头脑，为后边的正式会议作思想和组织准备。预备会期间，大多数与会人员只感到情况异常，却搞不清他们的真实目的，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只有少数“左派”领导干部知道底细，表现出异常得意的样子，可以说是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6 月 1 日正式会议开始。内蒙古组的正式会议在华北局工作组的掌控下，自 6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开了 50 多天，大致分为:“揭盖子”，矛头直对乌兰夫，小组会上背对背，乱箭齐发；中型会，面对面，步步紧逼；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中的“左派”领导带头，系统揭批；短

兵相接，高嗓门，人身攻击；强迫作不情愿检查；华北局工作组领导和会议实际主持人作结论性批判。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要么颠倒是非，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给乌兰夫罗织了五大“罪状”，戴了三顶“帽子”。五大“罪状”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号，自主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作者注）为纲，进行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三顶“帽子”是：一、“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二、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三、“走资派”。会议的主宰者，妄图用这样几根大棒，把乌兰夫打翻在地，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在逆境中，乌兰夫刚直不阿，他坚信真理和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他曾多次给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问题他们这些人说了不算数，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在党内极左思潮急剧膨胀，追潮者给他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他除在前门饭店会议的批判会上有限度地当面辩驳外，还利用向帮助自己整理书面检查的身边工作人员讲述情况的机会，激愤地诉说了历史的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使乌兰夫讲述得集中、明确，便于整理不情愿的书面检查，工作人员按照前门饭店会议上大、中、小会的所谓揭批，即对诬蔑他的不实之词，梳理出了七个大问题，这就是：一、所谓“闹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二、所谓“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和“搞反革命政变”；三、所谓“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四、所谓“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是‘老右派’”；五、所谓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牧区搞“稳、宽、长”，“强调稳定、团结和发展生产力，主张和平改造”；六、所谓“反对在牧区开荒，封闭了大量新开垦的土地”，是“搞独立王国”；七、所谓“什

么人都搜罗，什么王公、贵族、大喇嘛、清朝的亲王、日伪的官僚、国民党的将军等，无所不有的都包下来，对这些人包庇、重用、讲团结，居心何在？”乌兰夫针对梳理出的这七个方面的不实之词，同帮助自己整理不情愿书面检查的工作人员，依次述说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原本想法。

在谈到诬蔑他“闹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方面的问题时他说：

“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是陷害！是胡说八道!”但他又很快平静下来，慢慢地说：“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苏联红军和苏蒙联军帮助我们解放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中部、东部地区。当时国内、国际形势都很复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我党的战略方针是：‘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在苏联红军和苏蒙联军帮助下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了的内蒙古中、东部，直接同东北、华北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中央指出：‘适当地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古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可是，当时斯大林和乔巴山对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不相信我们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他们的国境，试图把内蒙古搞成他们与国民党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他们支持一些日寇统治时期的伪官僚，同时吸收了一批有民族、民主革命愿望，积极追求民族解放的蒙古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分别在内蒙古西部的西苏尼特旗和东部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海拉尔，搞起了三个独立和半独立的政府。这同我们党以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方针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不一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得知这种情况后，马上派我去解决。当时，我以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绥蒙政府主席又是蒙古族的特定身份，出面做工作比较方便，但更为有力的是有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直接领导和支持，所以比较

顺利地先后解决了这三个独立和半独立政府的问题，很快把战后内蒙古民族问题纳入了中国革命的总轨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两年，就按照我们党的既定方针，团结了内蒙古民族各阶层，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他说：“在西苏尼特旗搞起来的那个政府，叫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它的主席是原蒙疆自治邦高级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他们不仅宣布了独立，还派出代表团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请求援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时，只带了奎璧、陈炳宇等几个蒙古族老同志，到西苏尼特旗后又叫去了克力更。我们经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与民族政策，争取和团结了他们中的进步青年，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并同苏蒙联军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通过重新选举的办法，插进一些我党干部，我被选为这个‘政府’的主席。我们从组织上控制了这个所谓‘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后，又经过做工作，把它迁到了我党我军占领的解放区张北县。然后，我到张家口向晋察冀中央局如实地汇报了解决这个‘临时政府’的情况。中央局当即把我汇报的情况转报了党中央，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以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晋察冀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由我主持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我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联合会介于党和群众组织之间又带有政府咨询机关的性质。通过它向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宣传我党主张和政策，发动群众，赈济灾民，领导内蒙古民族运动。有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后，所谓的‘共和国临时政府’，就自生自灭了。”

“接着是解决在乌兰浩特（当时叫王爷庙）建立的那个‘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问题。这个政府的主席是日寇统治时期的伪满洲国兴安总省主席博彦满都，成员很复杂，官僚占多数，也包括一些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政府建立前，几个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

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支持下建的）的人，重建了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并收编了一批伪满洲国军警人员建立了由该政府领导的东蒙自治军。在这个政府的《纲领》中只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它是半独立性质的。这个半独立性质的政府一成立，东北我党我军就派人去做工作。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特别是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但是这个政府把我党我军一直是作为朋友，接受帮助，不承认领导，在局部地区还发生过磨擦，最突出的是在热河省北部地区的林东，曾发生过武装冲突。好在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解放要求，主张东西部蒙古人统一起来搞民族运动，还派一位叫包玉昆的作为代表到张家口联络。我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建立后不久，就派秘书长刘春以我的代表的名义，和克力更等一起去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开展工作。随后，党中央又让我去承德，同时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东蒙自治政府也派代表到承德，在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直接领导下，以会议形式谈判解决东西部开展自治运动的统一问题。因为这次谈判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 1946 年 4 月 3 日开的，所以后来人们称其为‘四三会议’，也叫它‘统一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经过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我党同志向东蒙代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民族政策和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方针，既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又进行了必要的思想斗争，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在它的统一领导下，内蒙古东西部统一开展自治运动。在当时，中央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我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就是内蒙古的民族运动，内蒙古的民族运动就是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它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的问题解决后，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

古人民革命党自行宣布解散。通过这次会议，用谈判的方法，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半独立性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如实地报告了党中央，同样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他说：“会上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不按‘反动党派’处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革命时期，为了团结蒙古民族同胞和各阶层，参加正在全国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1925 年 10 月在张家口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1927 年蒋介石叛变后，这个党的主要负责人白云梯也叛变了。不久，由共产国际主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召开会议，揭露了白云梯的问题，改组了该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当时决定把白云梯等留在外蒙，可是他们潜回了国内，仍以党的中央领导人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给内蒙古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以后共产国际宣布取消了这个党。原来意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经早就不存在了。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东部的几个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又重新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以该党‘东部本部’的名义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其中明确地提出了把内蒙古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张。这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它发生在战后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我们做工作，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错误主张。同时，在他们的《宣言》中，也有明显的亲苏（联）、亲蒙（蒙古人民共和国）、亲共（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主张民族平等的民族民主思想。1946 年 4 月在承德举行的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会议上，他们的主要领导人认识和觉悟提高后，已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决定自行宣布解散这个刚建起来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反革命党派’，又怎么能按‘反动党派’处理它？”

然后乌兰夫又接着说：“海拉尔那个政府，叫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因为它范围小，影响不大，暂时搁了搁。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到了 1948 年内蒙古和全国的形势都有了很大变化，这时很自然地把它纳入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管辖下。而后撤销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建立了呼伦贝尔盟政府。”

他还说：“三个独立、半独立政府问题的先后解决，克服了当时内蒙古的那股闹分裂、搞独立的倾向，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祖国的北部边疆。一片稳固的内蒙古解放区，横跨在祖国的北部边疆。它作为我国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的辽阔后方，在解放战争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如果我有‘闹分裂’、搞‘独立国’的思想，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又有苏、蒙支持，我被选成了那个‘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主席，已是顺理成章，为什么还同闹分裂、搞独立的势力作斗争？为什么我还把那三个独立、半独立的政府一个一个地先后撤销？为什么在 1947 年内蒙治政府建立时，我还坚持在《施政纲领》中明确地写上‘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华民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建立）的组成部分，是区域性的民主政府’？说我‘闹分裂’、搞‘独立王国’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谈到诬蔑他提出的巩固祖国统一与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总纲领”时，乌兰夫说：“其实，他们闹我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民族分裂’。什么修正主义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呀，最终都要归到民族分裂上来。因为对民族干部来说，这个问题是‘致命’的。我明明讲的是进一步巩固与加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三个基础’，怎么就成了‘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总纲领’？真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稍停顿一下，他又接着说：“实在说，我最初想这个问题，还是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启发。1957 年春天，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他在里面讲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8 月，我和周总理去青岛参加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时提到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讲了在什么样的新基础上达到各民族进一步团结。他说：‘新的基础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祖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毛主席说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周总理从总的方面谈了民族团结的新基础。我听了他们讲的这些话以后，脑子里长期考虑着一个问题，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推倒‘三座大山’。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当时，在这个总目标下，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个争取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目标。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随着革命任务的完成，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都解决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转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来，这个共同目标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新的‘共同基础’。那么，在少数民族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怎样再具体化，我觉得需要作出回答，而且已经迫在眉睫。我讲‘三个基础’正是想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我联系内蒙古的情况和全国民族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久，但这是一个新问题，总还觉得很难一下子就考虑得很成熟。为什么我在去年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呢？当时主要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国家要在今年（1966 年）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二是很快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 20 年大庆，总结 20 年经验，把今后自治区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需要提出一个适应新阶段的规律性认识；三是从我在土（默特）旗蹲点看到的民族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一些领导人，包括华北局主要领导等在处理盲目开垦草原等问题上和 1964 年春华北局呼和浩特会议（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期间暴露出的华北局主要领导等忽视民族工作，以及受他们影响在‘三干会’（1964 年 10 月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上反映出来的同样问题，我更感到回答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考虑到这几方面的因素，就在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把它讲了出来。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稿子，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先讲了个大概意思。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让大家一起作这篇文章。我认为总的思路和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真是没有想到这一讲竟然引出这么多事。”

接着他又针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说他“有领土野心，划界时与邻省争地盘”的问题说：“内蒙古自治区现在管辖的区域是毛主席定的。他的原话是：‘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面貌’的概念，就是历史上说的漠南蒙古地区（漠北是外蒙古，即现在的蒙古国）各旗管辖的全部地域。用不着我有什么领土野心，有毛主席的决心就足够了。毛主席的这一决心，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党的民族政策。”

接着他又说：“内蒙古，200 多年来一直是个虚名，是个影子，作为行政区域它早就被抹掉了。清王朝对内蒙古实行分治，中央直接管各旗的王爷。20 世纪初，他们搞移民实边，强行垦殖，来草地的汉人逐渐多起来。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除对蒙旗分治外，汉人多的地方设县，又加了一层蒙汉分治。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分别以

承德、张家口和归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建立后，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称少数民族为‘宗族’。没有多久，干脆就把三个特别区都改成了行省，一个虚的‘内蒙古’，从此就被彻底肢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时候，更是为所欲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作为她一部分的内蒙古民族的灾难就更深重了!”

说了这些后，乌兰夫停了停，然后又接着说：“实现毛主席这一决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1947 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时，因为还是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中央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对自治政府的管辖区域只在《施政纲领》中笼统地写了‘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这还是概念性的。政府的名称也是‘自治政府’，没有‘区’字。1949 年 2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了我递交的一份《内蒙古基本情况》，其中涉及到管辖区域问题，议论中毛主席表示了要‘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其实，早在 1935 年，在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那时毛主席还对我说：自治区首府你在承德、张家口、归绥三处任选一处。我说在归绥（当时是绥远省省会，还在国民党手中）。毛主席说你们可以先搬到张家口，等绥远省解放后就搬到归绥去。自治区首府毛主席让我在承德、张家口、归绥三个城市选，这就意味着要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省，把历史上属于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的地方，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1949 年 9 月 19 日绥远省和平解放，9 月 21 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七个地区代表团，除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外，就是内蒙古。周恩来在审查代表团名单和有关文件时，在内蒙古后边加了‘自治区’三个字。从此，‘内蒙古’就

不再仅仅是个概念，而成了实实在在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区域，到 1950 年 3 月中央政府决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改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说到这里乌兰夫又稍停顿了一下，尔后接着说：“1949 年底，政务院批准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从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正在忙着准备搬家时，也就是 1950 年初，周总理通知我去北京研究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问题，刘春和我一起去的。在汇报中谈准备搬家的情况时我玩笑地说了一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搬到张家口，如同是‘刘备借荆州’。周总理说，该借就借，走一步近一步，你们最后的落脚点是归绥。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谈区划问题。毛主席一直很关心这件事，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已把大的原则定了，现在就是具体划和具体办的事了。与邻省的界线就按历史习惯线，你们看怎么样？过去有没有大的争议？周总理让我讲意见。我说：‘总的原则就是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照顾现实。’周总理表示赞成我的说法。然后他就胸有成竹地在地图上划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大致轮廓。而后他又提醒我：内蒙古分局对绥远省的工作不是有指导关系吗？你可找机会先同他们谈谈蒙绥合并的事。他还说先谈谈有好处，大家都有思想准备，为以后正式解决创造个有利条件。他还提醒我说：‘绥远的问题不同于热河、察哈尔两省，那两个省是部分，而绥远是整个一个省。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知难而上，找准时机，做细致的工作。’1951 年秋，我就参加绥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绥远土改问题的机会，和权星垣（时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秘书长）一起去了归绥。在开省委常委会期间，我插空子传达了周总理对内蒙古自治区划界和蒙绥合并的意见。当时反映很好，都表示赞成。于是，由我和奎璧代表内蒙古，由苏谦益和杨植霖代表绥远，就蒙绥合并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意见一致，当即整理出来就报告了中央和周总理及毛主席。没有想到，报出去以后，绥远的同志

又出现了反复。

说到这他又停了停，后接着说：“1951 年底和 1952 年初，我在北京参加中央民委的会议，元旦团拜在怀仁堂见到了毛主席。他问我：‘搬家了没有？’我说：‘没有，还在张家口。’毛主席转问当时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这是怎么回事呀？’薄说：‘有关的负责同志不同意。’毛主席发火了。他说：‘等的人脚心都发痒了，还不同意，不等了！你们传我的话，一个不同意撤一个，十个不同意撤十个，一百个不同意撤一百个，谁不同意就撤谁，有几个撤几个!’毛主席说的时候火气很盛，在场的人都不吭声，我也默默地听着。见这场面，周总理说：‘蒙绥合并的事，乌兰夫同志本来和有关同志已商量好了，不知怎么有的同志后来又变了主意。主席你放心，我去做工作解决就是了。’接着周总理就借中央民委开会的机会，把内蒙古、绥远和其它方面有关负责同志都请到一起，专谈蒙绥合并的问题。结果还真是有人不同意，他们说：‘在内蒙古地区，历史已形成了蒙汉杂居，汉人那么多，热（河）、察（哈尔）、绥（远）建省和汉人多的地方设县已多年，没有必要再改变这种现状。’还说：‘东蒙、西蒙都合在一起，从东到西地跨东北、华北、西北，那么长，管理不方便，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大？’周总理当场批评了这些同志，讲了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地说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不仅在内蒙古实施，在其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要实行。内蒙古是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处理好，给其它地区作个样子出来看。他还讲了在蒙绥合并问题上毛主席说的‘开两扇门’，这就是一扇是蒙古人欢迎汉人进来，开白云鄂博铁矿，在包头建钢铁联合企业，支援国家建设；再一扇门是汉人支持蒙绥合并，‘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他要求那些思想上还不通的同志很好地理解党的民族政策，

理解毛主席下这一决心的深刻意义。他还说，对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几次，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央决定和毛主席指示。就这样经过周总理亲自做工作，才顺利地解决了蒙绥合并问题。之后，中央又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1952 年 10 月，决定撤销察哈尔省，把行政建制上属察哈尔省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正式划归内蒙古；1954 年 1 月，政务院批准撤销绥远省建制，全部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5 年 7 月，中央决定撤销热河省，把热北、热东地区包括赤峰市在内的六个旗县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6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把甘肃省管辖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即阿拉善地区）和额济纳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62 年 7 月，又决定将原属河北省的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到这一意图的完全实现，历时十多个年头，可见其不容易。这当中蕴涵着党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深刻意义和毛主席深谋远虑的精神实质，饱含着周总理深入细致耐心工作的精神，我只是起了个上下沟通的作用，怎么就成了我有‘领土野心’、‘争地盘’？就算我有‘领土野心’，想‘争地盘’，能解决了这么复杂的问题？能办成这么大的事吗？如果说我要是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哪还用得着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么操劳吗！”

在谈到诬蔑他搞“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和“政变”方面的问题时，他以激愤的语气说：“我搞宗派干什么？我搞谁的‘政变’？”我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还用得着搞‘政变’？如果说有什么‘政变’的话，那只能是别人搞我的‘政变’，我用不着去搞什么人的‘政变’！就拿代常委来说，那是我考虑再三的，也和书记处的同志商量过，目的是想改善一下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的状况。”

说到这里他稍思忖了一下，又说：“我们使用干部，已经形成了

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如果有谁下了，那就一定是犯了错误。只要是摆上来了的，不管年龄多大和身体状况如何，也不论能力和工作怎么样，都得长期那么摆着。而那些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却长期被压着发挥不出他们的作用。进入60年代后，中央提出了这个问题，下边也有过些议论，就是见不到行动。我想先从自治区党委入手突破一下，改变一下自治区党委常委领导班子的状况。当时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的情况是：书记、常委总共有15个人，资格都够老的，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都有，最嫩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从1966年开始要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总理提出‘四化’目标，再有一年就是自治区20年大庆，这样的领导状况怎么能适应？当时我考虑，马上让一些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进领导班子很难，让那些年高体弱和身体实在不行的人出领导班子更难，所以我想原来的人不管情况如何，都还摆着，让一些真正能干工作的人，暂时先进来，解决燃眉之急，还可以观察和锻炼他们。那么，要让他们干工作，给个什么名义呢？经再三考虑后叫了个‘代理常委’，后来人们简称‘代常委’。这样叫的目的，一是为了主动，可以先观察一段，看一看哪个要是不行，再让他出来时比较好说；再就是加上个‘代’字，表明是临时的，办理组织手续可以简便些。这也算一项大胆的尝试。”

接下来又谈代常委的具体人选。他说：“我的这个想法先和书记处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中，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但最后都同意了。然后就酝酿具体人选。当时考虑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年富力强，确实是能干工作的优秀干部；二是工作需要，不考虑照顾；三是有培养和发展前途。在酝酿过程中，有比较和筛选，最后定下来13个人。这13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年龄偏大一点，但工作需要；二是年富力强，工作需要和培养干部双重因素都具备的；三

是有培养前途的两个最年轻的专门人才。这 13 个人的后两部分，都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苦环境的锻炼，年龄都在近 40 岁或刚刚出头，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优秀干部。预选名单确定后，经常委会议通过，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报华北局组织部同意的。”

说完搞代常委的酝酿过程和他的想法后，接着谈在自治区一级设委撤厅局，他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文山会海，中央不知道已经说过多少次，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光说不做，有什么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职责不清，责任不明，互相推诿，效率不高等等。其实，这都是因为‘庙’多、‘神’多造成的。什么叫官僚主义？这不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1964 年以来，中央又一再要求精简机构，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年轻化，内蒙古怎么办？我考虑过很长时间。这是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大难题。要真解决，就得拆‘庙’搬‘神’。人家好不容易经营起来一个‘庙’，又好不容易闹上了个‘一官半职’，谁愿意让你拆，谁愿意叫你搬呢？这是伤人、得罪人的事！怕伤人、怕得罪人，就只能修修补补，说说而已。可是这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后来又想，1966 年要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 年就是内蒙古自治区 20 年大庆，不能总是老样子，得干出点样子来吧？要干，就必须把指挥机关调整好，所以想首先解决自治区一级的臃肿问题。当时的基本想法是：精简自治区一级，充实和加强盟市、旗县；自治区党委、人委（政府）管大事，出政策，权力下放给综合部门，业务归口管理，加强综合平衡，当时的说法叫做‘只抓几条大辫子’。这一基本想法，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常委中经过了充分酝酿，意见是一致的。按照这一基本想法，又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作出撤销自治区党委的工业、农牧和财贸部（当时学解放军叫政治部）和人委的

农办、财办、文教办和经委，建立了工交、农牧、财贸、文教四个委员会，加上原来的计划委员会，共设五个委员会。政法因为情况不同，仍叫政法领导小组。委是实权单位，不设党组而建党委，统一领导各自范围内的业务和党的工作。原直属自治区人委的厅局一律撤销，按业务需要，本着精简原则设委属局。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改革，革命化的措施，表现出了自治区党委的胆量和决心。刚作了这样变动的时候，人们有点不习惯，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行，多数人都认为是成功的。我听到的评价是：头绪少了，人员少了，办事快了。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成了‘政变’？”

乌兰夫说他这种初衷时，讲得很坦然，尽管在会上已给他上了‘政变’的‘纲’，但他依然相信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

讲完机构调整后接着谈对各委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

他说：“人是最重要的，机构设置再合理，人不行同样搞不好。对人员配备，重要的是把原则定下来。应该掌握什么原则，我反复考虑过。当时，我提出的原则是：首先要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干劲。这一条不管哪个民族的，都必须具备。当然，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机构调整后的干部配备上，民族成份也是要考虑的。在干部自身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安排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志。如果连这条都没有，那还叫什么‘自治区’？至于具体到哪个岗位上安排谁，让谁干什么，个别人我说过个人意见，但总的干部配备名单，是组织部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权衡以后提出来的。记得我还告诉过高锦明让他和组织部好好滤一滤。在安排的干部中，哪个民族或哪个地方的多了几个，或少了几个，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安排上去的干部，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条件。”

说完了原来怎么考虑的以后，他稍稍思索了一下又说：“我看不

出在这当中我搞了什么‘宗派’，也不知道我让谁去搞什么‘政变’。”

说了这两句话后，他就沉默了。

乌兰夫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有极强的理智力，不大一阵儿他就从沉默中唤醒了自己。

接着又讲整顿呼和浩特市领导班子。他说：把整顿呼和浩特市领导班子说成是“政变”！太可笑了。尔后接着说：“到处是‘政变’，什么都成了‘政变’！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都成了敌人了！整顿呼和浩特领导班子，是自治区党委派工作组去的，市委领导班子调整是自治区党委决定的，华北局和中央组织部批的，这也叫‘政变’？李贵是党派去的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共产党，不是别的什么党，怎么就成了‘政变’的‘急先锋’？对呼市的领导问题，不仅我很伤脑筋，自治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没有少费心思。”

说到这里，他似乎是更深地想着什么，哽了一下，很快平静下来，又说：“呼和浩特市委领导班子的事是个老问题，几次派人去解决，都没有解决好，这次总算解决了。李贵去了干得不错，他很有信心把呼市的工作搞好，反倒说是‘政变’了。唉！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话长了。1949 年绥远省和平解放时，呼和浩特是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市，我们派进去的干部除绥蒙的少数当地蒙汉族同志外，主要是来自山西和河北的同志。领导班子的底子没有打好，一直就疙疙瘩瘩。蒙（内蒙古自治区）、绥（绥远省）合并后，归绥市改称呼和浩特市，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以后，呼市的干部有出有入，陆陆续续作过些调整，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 60 年代问题反而越积越多。这时候‘四清’已开始，自治区党委听过汇报后，我和其他领导同志都认为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彻底解决，不能再隔靴搔痒，修修补补。于是决定派自治区监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沈新发带队，组成得力的工作组，以‘四清’补课的形式，深入揭露矛盾，彻底解决问题。

经过一段工作，基本上搞清了是非，解决办法是调整领导班子，关键是选一个好的带头人。”

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时间已是深夜。

第二天，他又接着讲李贵到呼和浩特市委任第一书记的事。他说：“选李贵去呼和浩特，是很慎重的，是经过认真考察，认真考虑，最后才下决心的。对他，不仅是我看准了的，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也了解他，当时大家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李贵还是那个李贵，怎么到了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对他的看法就变得截然不同了？”

说过这几句话后，他像是又考虑或回想起了什么，稍停后又接着说：“呼和浩特市领导班子整顿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确定了基本解决办法后，我亲自物色，也告诉书记处其他同志物色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李贵我过去接触过，但并没有想过让他去呼和浩特任市委第一书记。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期间，有一天给季春芳（乌兰夫机要秘书）谈起这个事，他给我推荐了李贵，讲了李贵的长处、特点。这才引起我想过去和李贵偶尔几次接触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可以作为预选对象，所以就把他叫来先聊了聊。第一次叫李贵来聊，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些工作情况和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增加了些对他的了解，加深了让他去呼和浩特的念头。为了能选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很慎重的，除我和书记处的同志沟通，听他们的意见外，还告诉了组织部对他作全面考察。从我直接了解和组织部考察看，李贵确实是个好干部。无论是早先做公安工作，还是后来搞林业，工作都做得很好。这个人明显的长处是问题看得深，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善于团结人，这正是作一把手所需要的。内蒙叫作东林（东部的大兴安岭林区）西铁（钢铁基地包头），把大兴安岭林区管好，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去了以后，搞得井井有条。1962 年我和王铎去呼伦贝尔盟，专到大兴安岭林区看了看，听过他一次汇报。当时，林区工作上的困

难很多，但他并不叫苦，而是重点讲了林区发展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主要想法。使我最感兴趣的是讲林区要采伐、营林和森林工业综合发展，还有在采伐方针上是间伐还是皆伐的问题。在采伐方针上，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推光头，叫“皆伐”，林业部和林区部分同志坚持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利索；李贵等主张间伐，就是只伐成材的大树，把中间的幼树留下，二三十年后幼树成了成材树，那时再采伐，这样循环下去，森林采伐就可以永续不断。对采伐方针问题，他还专写了一份材料，我赞成他的意见。”

说了这些以后，他又归结性地说：“经过组织部考察、了解，我后来又找李贵谈过，也回想起了些和他有限接触的主要印象。经过充分考虑和考察，最后决定让李贵去了呼和浩特。”

说这些以后他又说：“在这个问题上，大致的过程和我原来考虑的就是这些。讲真话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会上说的这是‘政变’的样板，李贵是‘政变’的‘急先锋’。检查上该怎么说，怎么写，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谈完了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后，接着要谈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说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停止‘四清’和“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等。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无论谁说什么，反正人不吃饭不行！过去闹饥荒不用说，60 年代初人们挨饿，不少地方死了人，该还没有忘记吧？那时候内蒙古的情况好一点，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还多少给中央上交点粮食，但日子也不好过呀！这两年经济情况刚好转了一点，有人就把挨饿忘了，我心里很不踏实。今年年初，出现大风灾，巴盟牧区的牲畜受了很大的损失，我知道后很着急，急就急在‘四清’工作队搞‘革命’，抓阶级斗争，基层干部成了革命的‘对象’，生产没有人管，或者说是想管的人也不敢管。灾情这么重，没有人管怎么

行啊？我去土（默特）旗亲眼看到的情况，也不比巴盟好。土旗是全面开展‘四清’的重点旗，庞大的‘四清’工作队在那里抓阶级斗争，基层干部惶惶不安，不知哪天自己就成了‘四不清干部’，哪还有心管生产？今年春旱很严重，不少地方下种后不等出芽就被大风刮了出来。我真担心春天播不下种秋天没有收成，老百姓再挨饿呀！下决心亲自过问这件事。当即给旗里和‘四清’工作队干部讲了抗旱抢播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不能只抓阶级斗争还要管抗旱、抗灾和春播，还向他们提出了大旱之年夺丰收。同时，我还给李雪峰打了电话，告诉了他这里的情况，想引起他的重视。我还给他说了暂时停止‘四清’，把‘四清’工作队就地变成抗旱生产工作队，集中力量抓一段抗旱和春播。李雪峰表示同意。而后我让自治区党委在机关管面上工作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各地务必保证完成春播任务。在这段时间里，一有机会，我就讲抗旱、抗灾、抢播。为了让下边干部重视，我还极而言之地说过：‘种不上地，秋天没有收成，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还革什么命!’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些话都不只说过一次。这没有必要回避，问题是我的这种想法，我讲的这些，是不是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他还说：“其实我想，‘四清’既然是革命，它就应该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最后就要落到推动生产发展上。1965 年 10 月，我在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阐明了这一观点。同时，还说了我要带头去抓一个生产点，要求自治区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盟市、旗县的主要领导同志也下去蹲生产点，或联系一个生产点。我还把‘四清’和‘土改’、‘合作化’相比，说那两次革命都起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这次‘四清’对生产的促进，应该比那两次更大。特别是今年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我希望而且努力使内蒙古的‘四清’运动能朝着这

个方向发展，起到这样的作用。在那次讲话时，我还提出了内蒙古要摘掉以耕作粗放、单产低、总产不稳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落后的帽子，上半年把以抗旱抗灾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各行各业都要为它服务，全力抓好。我还说过搞不搞生产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我认为，这些要求和提法是符合内蒙古实际的，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亲身体会。如果说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我很难理解，也难作别的什么解释。”

他说到这里，戛然停了下来，表现出有难言的委屈和茫然。

沉默一阵又接着说：“像这样的事情，会上人们说得很凶，上纲也很高，在检查中怎么说、怎么写，也得好好地考虑一下。”

讲完这些后又讲‘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这一口号是怎么提出来的。

他说：“我一向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初期，我就是这样说的，也坚持这样做了。我多次说过衡量一次革命和社会变革成功还是不成功，主要标准就是看生产力发展了，还是没有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 1956 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人都要吃饭穿衣，生产是第一位的。牧区人民是靠牧业生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牲畜，发展牲畜是基本任务。根据牧区的经济特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牧区工作，我提出了‘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这一提法，在牧区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大跃进’影响，1958 年后，连续几年内蒙古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唯有牧业仍保持年年增长，这同‘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在牧区已深入人心直接相关。一条深得人心，给牧民带来很大好处的提法，怎么就错了？在牧区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时，我还这样说过：‘革命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如果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却把牲畜搞光了，那就违背了改造的目的。’难道这也说错了？真是叫人没法理解!”

说完这些话后，稍停顿了一会，他又慢慢地说：“这都是我的真实想法，一心想把牧区的工作搞好，也真搞好了，怎么就错了哩？错也该错个明白呀！我怎么就不知道错在哪了？”

而后他长叹了一声，轻轻地、慢慢地摇了摇头，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这一条在检查中是说还是不说，要说又该怎么说？”

要谈的第四个大问题是有关牧区民主改革方面的事。会上提出：乌兰夫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以此为据说他是“老右倾”。这是乌兰夫最不能接受，最感到恼火的事。他心里很憋气，但在会上又不能申辩，也不让他申辩。

要谈这方面的问题时，乌兰夫微微一笑，然后说：“这事搞得我不糊涂也糊涂了！真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啊。”

而后，他接着说：“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时，正是解放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在全国各解放区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实现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内蒙古解放区也不例外，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农村，都开始了土地改革。农村的土地改革，影响到内蒙古解放区的牧区，部分基层干部和牧民主动效仿农村土地改革的办法，自发地起来斗牧主，分畜群，还提出了‘牧者有其畜’的口号。这种做法在已解放的几个盟都轻重不同地发生过。因为牧畜不同于土地，土地是不能移动的，纯属生产资料，它不能吃也不会死。而牧畜不同，它是生产资料（畜生畜），又是生活资料（吃肉和收取绒、毛、皮），还有适于群养的特点。畜群分给牧民后，分散管理死亡率高，再加牧户

大量宰杀，使牧业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当时自治政府驻在乌兰浩特，1947 年 11 月间，我就近让科右前旗旗长杰尔格勒去搞牧区民主改革的试点。他到该旗惟一的纯牧业努图克（乡）乌兰毛都试点。这个地方林密草深，环境闭塞。临近农村土改开始后，不少逃亡地主和日伪统治时期的社会渣滓都跑到这里避难。他们见这里也要改革，就利用农村土改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同当地牧主结合起来，借机造谣惑众，破坏民主改革。在 1948 年初，这个努图克的满族屯，在一些逃亡地主、当地牧主和日伪遗留下来的反动分子欺骗、裹胁下，发生了 200 多人的外逃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内蒙古工委和自治政府领导下，科右前旗工委和旗政府，立即组成了以杰尔格勒为总指挥的平叛队伍。经过武装追击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把绝大部分受欺骗、被裹胁的牧民争取了回来。”

他接着说：“这一事件，引起了我和内蒙古共产党工委、自治政府的重视。我告诉杰尔格勒，要好好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分析研究，他们认为，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有斗争形势复杂、阶级敌人破坏的一面，也有我们政策和工作方面的原因。最大的教训是，在牧区搞民主改革，不能照搬农村土改的做法，而应该根据牧区和牧业经济的特点，制定符合牧区和牧业经济实际情况的政策。他们从实际出发，充分分析了牧区的情况和牧业经济的特点，认为牧主无论在经营方式、剥削形式和发展水平上都不同于地主。在少数民族的牧业区，应该是削弱封建，而不应该是消灭封建。不要像农民斗地主那样斗牧主，也不能像农村平分土地那样把畜群分给牧民。对大牧主的一切封建特权应废除，用提高牧工工资的办法，减轻牧主对他们的剥削，增加他们的收入，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牧业经济，让牧工和牧主都能得到好处。我听了杰尔格勒的汇报，认为他

们对满族屯事件处理得很好，所作分析和对牧区民主改革的意见都是对的。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为了很快刹住牧区民主改革中的‘左’的做法，稳定蒙古族各阶层的情绪，在我主持下，以党的工委名义召开了工作团长会议，让杰尔格勒介绍了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努图克民主改革试点的经验。会上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这就是‘三不’、‘两利’政策最初提出的来龙去脉。”

他接着说：“1948 年夏天，在东北局领导下，在哈尔滨召开了内蒙古高干会议，主要是总结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到会的领导骨干，认识了农村土地改革和牧区民主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的严重危害，决定纠偏，挽回已造成的不良影响。到会干部普遍提高了政策水平。我又进一步讲了牧区的‘三不两利’政策，对纯牧业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确定了三条原则：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革放牧制度；斗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要经过盟以上政府批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通过民主改革，解放牧区生产力，发展牧业经济。对于半农半牧区，也确定了不能分畜群，必须保护牧场。我讲后又经会议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在牧区执行‘三不’‘两利’政策。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在会上讲话时也强调了这个意思。会后把这些都报告了党中央，得到了中央批准。全国解放后，于 1951 年初，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又明确地讲了牧工、牧主两利的问题，当时说的是：‘保护牧群，保护牧场，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的经济生活，发展牧畜。’1953 年夏天，在中央民委的一次会议上，总结内蒙古和青海、新疆及当时的绥远省等地牧业生产基本经验时，把最初由内蒙古提出并实施的‘人畜两旺’和‘三不’、‘两利’等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提炼、归纳成了‘两个方针’、‘十项政策’、‘六条具体措施’。在十项政策中，第一项就说了：‘在牧区

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在牧区实行的这样的特殊政策不只是内蒙古，而是经中央批文推向了全国，各地都一致认为，这项特殊政策是符合牧区和牧业经济特点的成功做法。这在多种文件上都有记载。”

他谈了民主革命时这一项正确的成功政策和做法的提出、完善、肯定和实施的过程，停顿、思考了片刻后，心情沉重地说：“怎么这也成了错的？也成了‘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据？如果说这是成绩、功劳，也应是历史功绩；就按他们说的这是‘错误’，也是陈年老账了！在‘四清’中，他们提出在牧区搞民主革命‘补课’，要‘重划阶级’，我不同意，并作了解释。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去年年底自治区党委发了个牧区划阶级的《规定》，但在向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仍提了对牧主要执行‘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都是从牧区的实际出发。现在又提出来这个问题，不容分辩，也不让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为什么呀!?我不只是不理解，而且是越想越想不通!”

乌兰夫说的第五个大问题是牧区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事。会上在揭批中，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时，在牧区搞了“稳、宽、长”。华北局某位领导指着鼻子说乌兰夫：“反对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稳定、团结和发展生产力，主张和平改造。”并说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这些诬蔑他的不实之词，乌兰夫很坦然地讲了自己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实际工作是怎么做的。他说：“对于这方面的事我一直很慎重，可以说是没有少费脑筋。牧区人不多，牧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也不大，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它是最具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主改革时，开始吃过亏，从中悟出了道理，定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以后坚

持这种改策，保持了边疆稳定，畜牧业持续发展，牧区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中央的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早在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刚回到内蒙古的时候，中央就明确指示：‘我们党对内蒙古的各种政策，必须适时而慎重。’还说：‘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步改造。’这种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绝不只是对一时一事说的，而是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对蒙古伪军尚且如此，在处理其它问题时，自然就应该考虑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了。”

就总的方面说了这些以后，稍停顿、思索后，他又说：“内蒙古和全国一样，到 1952 年完成了战后恢复任务，1953 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内蒙古，包括当时的绥远省，农村和城市基本上按中央统一要求办就行了，但牧区就要从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牧业经济的特点，另作具体考虑。我记得是 1953 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会上议论了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原来‘不斗、不分’，将来是不是也‘不斗、不分’？最后对牧主经济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为了统一干部认识，我讲了所以实行‘不斗、不分’，保存牧主经济的政策，是按照牧区的实际情况和牧业经济的特点确定的。在民主改革中，废除了牧主的封建特权，实行了自由放牧和新苏鲁克制度，在税收政策上又实行了超额累进，使牧主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而牧主和地主不同，地主收取地租是超经济剥削，牧主经营牧业主要是雇佣劳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牧业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牧主经济对发展和繁荣牧区经济是有利的。而通过我们的限制性政策

措施，牧主经济和整个牧区经济的性质，都在逐渐变化。所以，我们说：现在‘不斗、不分’，将来也‘不斗、不分’。对牧主经济，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采取迂回曲折、稳妥温和的办法逐步改造。那时候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还没有成熟的意见，正在酝酿中。”

讲到这，乌兰夫凝神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广泛宣传及全国和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牧区部分人中引起了某些误解，牧区生活和生产用品供应上也有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思想波动。再加风、雪、疫病灾害，造成了 1954 年牧区部分地区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征兆。1955 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区牧区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再次强调地讲了‘畜牧业经济脆弱、不稳定’的特点，明确地提出牧区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要采取和缓的过渡形式。还讲了现在仍然执行保护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的方针，仍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对牧主目前还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时候改造，采取什么形式改造，要在牧区个体经济改造已有成效，牧区工作的基础已经加强的时候再考虑。即使到了那时候，也要采取和缓、容易为牧主接受的方式进行。”

说到这里，稍间歇一下，他说：“传达贯彻了第二次牧区工作会议精神和我在会上重申的方针及对牧主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态度以后，稳定了牧区各阶层的情绪，实现了 1955 年和 1956 年牧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到 1957 年夏天召开第五次牧区工作会议时，总结试办公私合营牧场的初步经验，认为这是改造牧主经济的一条路子，但还感到不成熟，决定先办好试办的牧场，从中摸出一套做法，待条件成熟后再普遍推行。这年秋天，我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时，在发言

中，把发展畜牧业的经验教训作为一个问题讲了讲。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先讲了‘坚持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同时也说了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牧区个体经济的改造和对牧主经济的改造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方面的改造，我提出了：‘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允许因地制宜地进行工作’，后来这个提法简化成为‘稳、宽、长’。对牧主经济的改造，当时还没有摸索出成熟的做法，所以没有细讲，着重讲了牧业合作化的问题。对牧业合作化，我强调‘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按照群众的觉悟水平，采用群众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办事’，做到使群众不感到突然，不引起大的震动，既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又能稳定地发展畜牧业生产。”

讲了这些，稍思索了一下接着说：“又经过了一年的试验和摸索，到 1958 年夏天召开第七次全区牧区工作会议时，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已酝酿得差不多了，我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这个问题。除重申过去已确定的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外，明确地讲了：部分牧主，经社员同意，本人自愿可以加入牧业合作社；对大部分牧主实行赎买政策，同他们一起办公私合营牧场，牲畜折价给定息，对他们实行和平改造。还讲了改造牧主经济是为了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在改造过程中要稳定地发展生产。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会议和我在这次会上的讲话是决定性的，把基本政策和基本做法都定下来了。会后正式报告了中央和毛主席，并下达全区执行。这些方针政策和做法，都写进了由国家民委党组起草，经中央转发全国的《关于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中。”

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又多在边境地带。牧区人民纯厚朴实，

在战争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创建过程中，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乌兰夫对牧区人民的感情特别深厚，对牧区工作格外关心。一谈起与牧区有关的事，他就十分有兴致。在讲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时，他几乎忘记了是在让他写检查，全身心都深深地沉浸到牧区社会主义改造这场大变革的酝酿、决策和实施的回忆中。尽管乌兰夫在会场上面对一些人怒目而视，咬牙切齿地上“纲”、上“线”揭发批判时，不得不静静地、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那里听，但是，在北总布胡同 2 号他的家中为准备写检查而忆述 20 世纪中期全国都在沸腾中发生的，而造成波动和损失最小的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是如何从牧区实际出发思考、运筹时，仍自然地流露出了欣慰的心情。

乌兰夫谈的第六个大问题，是有关保护草原方面的事。讲过“稳、宽、长”之后，他针对诬蔑他反对农垦部在内蒙古牧区开荒，1962 年下令关闭了大量新开的地，是把内蒙古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等，讲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真实想法。

乌兰夫微微一笑后说：“他们说得不对！我不反对开垦，只是反对盲目开垦。”

说了这两句话后，他戛然刹住，沉思了片刻，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本世纪初，没落的清王朝统治者，为弥补‘庚子赔款’的亏空，实行所谓‘实边’新政，到内蒙古强行开垦，大量蒙古族牧民失去牧场，草原遭到严重破坏。那次盲目的大开垦，不仅留下了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后患，还造成了不少地方严重沙化。这是封建统治者干的贻害后代的蠢事，我们不该重蹈他们的覆辙。”

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历史教训。”

他说：“我和自治区党委其他主管领导同志，一直讲牧区以牧为主，要保护牧场，不能把牧场看成是荒地。同时，也不是说草原就绝

对不能开垦，只是说不能盲目开垦，不能在不适宜开垦的地方开，不要影响畜牧业的发展。1960 年夏季开始，农垦部到呼盟办国营农牧场，还是我建议，以自治区党委名义报中央请来的。因为在开垦时一哄而上，事先没有很好地勘查和全面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不管土层厚薄，也不管畜牧业生产的需要，只图机械作业方便，就那么一马平推地大面积开垦。结果引起了当地牧民不满，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为了解这个问题，1960 年 10 月，我去呼伦贝尔盟作了实地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实际情况比基层干部和牧民反映的还严重，于是就地召开座谈会，和当地干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解决办法。当时我重申了在牧区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一贯方针，强调了开垦草原不同于在一般地区开垦，因为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也是最好的牧场，所以在开垦时必须全面规划，合理布局，不能盲目开垦。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在草原开垦农田提出了七条原则。这就是：一、为发展畜牧业服务；二、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开垦宜于开垦的地，要考虑到牧民打草地和放牧地，不能发展了农业影响了畜牧业；三、要在有水利条件的地区开垦；四、绝对禁止开垦沙地、陡坡地，以免水土流失，造成沙化，已开的要迅速种草种树，加以补救；五、开垦农田要同时造防护林带，根本改变自然面貌；六、在牧区开垦办国营农牧场，必须同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七、交通不便的地方暂不大发展。要求按照这七条原则，检查 1960 年已开垦的土地，纠正发生的问题。”

他稍停了一下，尔后又说：“我把这次在呼盟岭北看到的情况和同下边的同志一起研究的解决办法和意见，给自治区党委写了一个报告。我那个报告，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常委们都同意，并以自治区党委的名义批转下发了各盟市，同时上报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包括华北局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在内，当时谁也没有说我这些意见不对！”

说到这里，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到呼盟看了，开了会，写的报告批转下去以后，不再继续开垦了。但是，1960 年盲目地大量开垦已造成的农牧矛盾、民族矛盾和土地沙化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再加经济上暂时困难，物资供应紧张，以农牧矛盾为焦点，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边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1962 年 7 月，我和李雪峰去了呼伦贝尔盟。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林区精简职工上。我主要是想帮助呼盟盟委解决因为盲目开垦造成的各种矛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处理什么问题，也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考虑的必须是巩固祖国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当时，出现农牧矛盾、民族矛盾以致影响边境稳定的原因，是盲目开垦。所以解决那里的问题，必须要从解决盲目开垦的问题入手。正当我考虑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接到了中央批转的《西北局关于解决在牧区办农场问题的报告》。真是久旱逢甘霖。这个文件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恰恰与我想的完全一致，可以借这个文件的东风，下决心一次彻底解决。当时的做法是：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改进工作。在肯定农垦工作成绩的前提下，对开垦中引起的问题，首先由我和自治区党委承担了责任，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原有的 26 个国营农牧场调整成了 19 个，撤并了 7 个，封闭了 200 多万亩已开垦的不宜耕种的土地，使其还草还林。在调整中，强调了做好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妥善安置农牧场的职工。因为工作做得比较细，基本上做到了各方面都满意。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成功的。”

乌兰夫谈他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和他当时的想法、做法时爽快而坦然。可是，讲完这一段后，他却沉默起来。过了一阵他突然振作起来，提高声音说：“这有什么错！还上‘独立王国’的纲!”

乌兰夫说了这些后，心绪回到了现实中。

乌兰夫谈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也是第七个问题，是有关统一战线的事。

针对说他什么人都搜罗，王公、贵族、大喇嘛，清朝的亲王、日伪的官僚、国民党的将军等，无所不有地都包下来，对这些人包庇、重用、讲团结，并质问他居心何在，乌兰夫讲述了自己的原本想法。

他说：“不错！我是这么说的，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会上说得还不够，我过去讲的、做的要比这多得多！问题是这样讲、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乌兰夫说这几句话时情绪激动起来。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稍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接着说：“这些都是大事，中央和毛主席都知道。我都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办的。当然，当时我都赞成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认为决策是对的。其实，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政策是怎么定的，执行这样的政策收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怎么现在一下子就变了！‘纲’还上得那么高!”

他又稍停了一阵接着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在这方面，党中央和毛主席不知讲过多少遍，直接针对内蒙古的问题所作的指示，也不是一两次。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情况特殊，所处战略地位不同，对于这方面的事，处理得好与不好，不仅关系内蒙古本身，而且会牵动党和国家全局。在这方面，我一直十分慎重，从来没有擅自作过主。”

“内蒙古包下来的第一批人，是日寇侵华期间在伪政权任过职，给日本人服过务的一些蒙古族中层、上层人士。他们中，包括有伪蒙疆自治邦的高级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伪满洲国兴安总省主席博彦满都，还有这两个伪政权的一些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头头，以及伪盟长、伪旗长等。前边已经说过，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都很

复杂。内蒙古的中部、东部地区是在苏联红军和苏蒙联军帮助下解放的，当时他们对我党、我军的力量还不很相信。受日伪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蒙古族同胞和社会各阶层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加之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压迫造成的民族隔阂，在内蒙古长期居统治地位的蒙古族中上层在群众中还有一定影响。而此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除了派出大量特务和名目繁多的先遣人员渗入内蒙古外，还拉拢伪蒙疆自治邦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及伪蒙古军头目李守信等大肆活动。混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伪满特任官、伪省长玛尼巴达拉等反动分子也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极力破坏我党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为有利于开展内蒙古工作，扩大我党、我军影响，中央确定了对蒙古族各阶层实行更宽的政策，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孤立、打击极少数最反动的分子。我赞成并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这一指导方针。”

“1945 年 11 月，在张家口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把当时集中在‘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一批蒙古族上层和分散在社会上的部分有影响的人，都吸收到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中。再就是 1946 年在承德召开‘四三会议’和 1947 年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五一’大会，先后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和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时，又吸收了一批人进自治运动联合会和自治政府及参议会，在内蒙古解放区出现了各阶层大团结的大好局面。当时，为了有利于对民族上层的管理、教育和改造，有利于发动群众，我还提出了‘拉住上层，深入下层’。这就是把那些在群众中还有影响的民族上层请上来、摆上去（作一定安排），有意让他们同群众隔开，而后我们下去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采取了这些符合内蒙古实际情况和斗争形势的做法，才使内蒙古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迅速发展。有了巩固而又地域辽阔的内蒙古解放区，才

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华北两大解放区战局的胜利展开。”

“这些事，都是在有关中央局、分局直接领导下做的，都报告过中央并被中央肯定了的。”

“再就是‘九一九’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时，又包下来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战争中的‘绥远方式’，是毛主席定的，是中央的战略决策。平津战役时，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后，在绥远有意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做工作，适当的时候和平解决。绥远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解放军总部直接掌握下，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出面解决的。在解放战争以秋风扫落叶地胜利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的形势下，经过傅作义将军给他的部属做工作，并周密安排后，于 1949 年 9 月 19 日由董其武、孙兰峰等率领原国民党绥远省党、政、军宣布起义，绥远省逐步实现解放区化，军队逐步实现解放军化。参加起义的县、团以上人员，除后来个别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以外，都安排了工作，都按统战对象待遇。‘九一九’起义后建立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时，我就是副主席，1949 年底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由乌兰浩特迁张家口后，对绥远省的工作就有指导关系，以后绥远省建制撤销，其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我对于‘九一九’起义后包下来的那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一直主张按照我们党言而有信的一贯原则，坚持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政策，在合作共事中关心和尊重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讲了这一段以后，乌兰夫很有感慨地说：“我认为内蒙古在统战工作上的做法是成功的，把社会各阶层和区内各民族都团结了。全国解放前，也就是在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前后，我们把凡是赞成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反对蒋介石在美国人支持下打内战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

们又把凡是拥护《共同纲领》的人都团结起来，更加扩大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又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种广泛的团结，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有效地保证了内蒙古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有什么不好!”

他还说：“在历次运动和思想改造中，因为工作方法失当或掌握政策失误，使一些朋友受到伤害，造成部分人对我们的政策有疑虑。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我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过：‘统战政策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长期不变的，1962 年我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15 周年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为一个问题专讲了统战政策，重述了对某些上层人士‘请上来、摆上去’的道理，我还特别提到了达理扎雅、孙兰峰、博彦满都等人的名字，讲了他们中有些人并不一定同意社会主义，但跟着走过来了，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还引述过毛主席说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们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们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按照这种精神，我强调说过：‘对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其他方面的统战人士，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方针’。”

他思索了一阵，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是讲信用的，说了话是算数的。特别是作为执政党，对朋友作出的承诺，更应该算数，这关系着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着我们事业的成败。基于

这样的想法，基于对党和党的政策的信赖，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才敢于向党内同志那么讲，才敢于向拥护我们的党外朋友重申党的政策，重述曾经向他们作过的承诺。按现在某些人的指责，那就不只是说我过去做的都‘错’了，而是否定了我们的一贯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按他们说的那些看过去，那不就乱套了吗！这事我看不那么简单。”

二十八、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成了党内组织程序。全会还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一跃而成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原居第二位的刘少奇被降至第八位。此后，只林彪一人称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都再不提及。给全国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是箭拔弩张，再不可逆转。

乌兰夫在与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已遭诬陷，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已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他对自己遭诬陷就不能接受，对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不正常现象就很不理解，这次中央全会更不正常，所以他就更加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徒有忧国忧民之心，而他惟一可以做到的，只有沉默。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乌兰夫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11 月 2 日，又撤销了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内蒙古大学校长的职务。这时还保留着他国务院副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已不能履行职务，但这却标志着中央对他还留有余地。

前门饭店会议后，被誉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就已经乱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就更乱了。内蒙古的“十年动乱”，是以“前门饭店会议”对乌兰夫的诬陷为基调展开的，所以运动一开始斗争矛盾就集中在了乌兰夫身上。内蒙古同全国一样，“红卫兵”运动兴起后，机关和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他们为了展示自己的能量，都想抓到乌兰夫批斗。所以在天下大乱后，内蒙古的一些造反组织在北京建起了“揪乌联络站”，乌兰夫随时都有被造反派抓走

批斗的危险。当此危机时刻，为了保证乌兰夫的人身安全，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批示对乌兰夫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11 月间的一个深夜，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受周总理委托，派人把乌兰夫及其夫人云丽雯和小女儿乌兰敖东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2 号家中接出，安排他们到北京西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招待所暂住。1969 年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提出“准备打仗”。为安全计，在疏散中乌兰夫被送到湖南省长沙市郊区接受军事监护。在军事监护下，乌兰夫在这里过了两年多的软禁生活。其间，他曾三次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党中央，申述自己在“前门饭店会议”上遭受诬陷的问题，请求中央抓紧对自己进行审查，能尽快做出结论，争取早日让自己出来工作。是年冬，中央决定解除对乌兰夫的监护，使他得以从湖南长沙回到北京。

1966 年至 1971 年，是“十年动乱”中最乱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乌兰夫虽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但在他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却是很深的。

在这段时间里，使乌兰夫最不能接受、最感到痛心的，是同他被诬陷、遭迫害相联系，在内蒙古发生的三大冤案。这就是：其一，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它卷进了乌兰夫的老战友奎璧、吉雅泰等一大批为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蒙汉族老干部；其二，发生在 1967 年春天的所谓“二月逆流”案，这次又卷进了乌兰夫的老战友王铎、王逸伦等和不赞成迫害乌兰夫的更大一批蒙汉族干部和群众；其三，发生在 1968 年前后的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高潮中的“新内人党”案，这次卷进了与乌兰夫一起奋斗，共同创建内蒙古自治区的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和一批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建设有过重要贡献的蒙古族领导干部和更多的无辜群众。在第三

大冤案中，硬给乌兰夫扣上了一顶“内人党总头目”的帽子，并毫无根据地说以乌兰夫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党组织就是“内人党”，内蒙古的军队就是“内人党的军队”。在这一冤案中，受害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致伤、致残、致死者都在五位数以上。在三大冤案的空前浩劫中，乌兰夫的子女和亲属也都受到株连，特别是他在内蒙古工作的大女儿云曙碧、大儿子布赫、三儿子乌杰，以及大儿媳妇珠兰其其柯和妹妹云清等，都吃了很多苦头。

乌兰夫在这段时间里的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场浩劫中，虽然我在‘前门饭店会议’以后不久就被保护起来，皮肉没有受苦，但有那么多老战友和好同志，甚至牧民，都因为我遭诬陷而受牵连。在没完没了的残酷批斗中，使不少人致伤、致残、致死，甚至家破人亡。几年来的你争我斗，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搞得天翻地覆。每当听到或想起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我都心痛如绞。”至于对“造反派”们依据诬蔑不实之词，在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中对他的污辱和上纲，也正如他所说：“有了‘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当面领略，这些已不足为奇，再算不了什么!”

1971 年冬乌兰夫被解除军事监护，到 1973 年 8 月党的十大召开的将近两年间，主要是在北京检查、调养身体，恢复健康，只偶尔参加礼仪性活动和接待亲朋故旧来访，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时他虽然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一直到 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职务，原来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虽然不曾免除，但解除其军事监护后也没有明令恢复。所以，在这一年多中，他依然没有实际工作可做。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乌兰夫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四届人大后，中共中央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还没有恢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隶属国务院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都没有了。周总理提出，这么大个国家，中央没有一个民族工作单位怎么行呢？他建议先在全国人大建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和一个宗教政策研究小组，并指定乌兰夫为民族政策研究小组组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我国宪法规定，是立法机关，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无忌、恣意破坏法制的时日，全国人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已体弱多病，是他艰难地领导党和国家的最后时期，也是“四人帮”由猖狂到覆没的时刻。在这两年多中，我国接连发生了多起牵动全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这就是：四届一次全国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整顿因“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混乱局面。随后，“四人帮”借题发挥，提出锋芒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反对经验主义”和“破资产阶级法权”。对这“一反”、“一破”，毛泽东开始有所察觉，批评了“四人帮”。可是，没过多久，中国还是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批判，全盘否定了邓小平抓整顿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刚复出工作的一些老干部又被打了下去，紧跟“四人帮”和派性严重的人又活跃起来，稍稍稳定了一些的局势又被他们搅乱了。

进入 1976 年后，影响我国全局的天灾人祸更是接连不断。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人们把对周恩来的沉痛悼念，化作对“四人帮”的愤恨。清明节上百万人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以诵诗、演讲等形式，怒斥“四人帮”。“四人帮”恼羞成怒，4 月 5 日，他们利用窃取到手的权力，镇压了这场维护正义的斗争，随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了

党内外一切职务。祸不单行。7 月 6 日，朱德逝世；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就在这国丧、民难的日子里，“四人帮”趁火打劫，加紧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可喜的是，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尚留在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叶剑英和李先念两位元老，同当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一起周密安排部署后，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举国一片雀跃欢腾。

在我国政局瞬息万变的这段时间里，身居“闲职”、处境艰难的乌兰夫，与其他处于困难境遇的老干部一样，心系党和国家的安危，一直在注视着势态的变化。每当局势顺转，那怕只是苗头，他们就高兴，就发自内心地支持；凡有逆转，他们就忧虑，就力所能及地抵制。乌兰夫是个心底纯正，规矩做事的人，在动荡期间，仍恪尽职守，做职责范围内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其中主要是，履行需要由他以副委员长身份出面的礼仪性的国际交往。1975 年，他作为副委员长先后迎送和陪同来我国访问的比利时、柬埔寨、利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首相或总统。在我国政局混乱的情况下，维护了国家的形象，促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我国的对外影响。1976 年，在国内局势更加混乱的情况下，他承担了更多的礼仪性外事活动。11 月 14 日至 29 日，他还率我国人大代表团先后出访伊朗和科威特。访问伊朗时，在宴会上他发表讲话说：“伊朗人民在历史上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波斯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十分珍视与伊朗的友好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中伊建交五年来，在我们两国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伊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深信，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伊友好关系，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为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

不断努力。”他的讲话受到了主人的认同和赞誉。在这一年中，他还代表国家，接受了冰岛、突尼斯、埃及等国新任驻我国大使递交的国书。

二十九、在中央统战部部长任上

1977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任命乌兰夫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8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8 月 19 日，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 3 月 5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3 月 8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乌兰夫又身兼多职，其工作重点在中央统战部。

乌兰夫受命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时，“四人帮”垮台只有八个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 9 个月，即 1977 年 7 月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时，才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工作，恢复他被错误撤销的职务，让他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8 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应制定“十年动乱”后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但是因为中央领导层认识不一致，致使这次大会没有能够实现政治路线上的历史性转变，以至造成了全国各方面工作的两年徘徊。在这两年徘徊中，乌兰夫在中央统战部和包括民族及宗教工作在内的全国统战系统，积极努力地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乌兰夫过去长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他对于党的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的方针及原则是很熟悉的，特别是在他创建和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期间，很有成效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在团结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上，曾取得过众所周知的成绩。但是，专职做统战工作，他却是新手，特别是对中央统战部机关和全国统战系统的具体情况，他是生疏的。作为部长，为把统战部的工作做好，为能逐步解决“十年动乱”中统战系统积累下的问题，他从调

查研究入手，先向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老同志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经过一番了解摸底后，他发现中央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问题确实很多，而且又涉及面很宽。其中特别是中央统战部的问题，早在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就不指名地批判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接着于 1964 年又点名批。先是在中央统战部机关批，以后又扩展到统战系统批，而且上纲很高。到“文化大革命”时，对他的批判就更激烈了，而且纲越上越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化大革命”中的这场批判，波及到全国。在横加罪名，“打倒李维汉”的同时，还给整个统战、民族、宗教战线强加了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全盘否定了这条战线建国后的 17 年。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下，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整跨了整个统战系统。在翻来覆去的斗争中，“四人帮”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没完没了地打派仗，搅得人们晕头转向，搞得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委屈。了解到这种情况又经过梳理后，乌兰夫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四人帮”捣乱和破坏造成的，解决的惟一办法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乌兰夫的领导下，首先在部机关开展了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通过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揭批“四人帮”，提高了大家的觉悟，逐步消除了派性，增进了同志间的团结，工作停止了十年多的中央统战部又重新运作起来。中央统战部工作的恢复，为解决部机关和统战部系统堆积如山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7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乌兰夫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陈锡联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30 周年大庆。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创建人，并曾主持其党、政、军工作 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在以他为主要领导的 19 年间，各方面工作都蒸蒸日上，并被誉为“模范自治区”。“文革”开始时，乌兰夫因遭迫害被迫离开内蒙古。

“十年动乱”中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自治区折腾得面目全非。在“四人帮”被粉碎刚刚半年多一点的时候，乌兰夫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重新踏上这片他曾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见到了长期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同志和父老乡亲，他百感交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又不便多语。此期间，他就便去了一趟享有粮仓之称的河套平原。当时，乌兰夫于“文化大革命”前亲自选定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十年动乱”初期代他受批判的李贵正在这里任盟委第一书记。两位老相知劫后余生，重又相见格外高兴。此时，他正想选一位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到中央统战部做自己的助手。见到李贵，更加坚定了还在萌动中的他这一想法。由内蒙古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向中央提出了调李贵到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建议。中央接受了乌兰夫的意见，批准调李贵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乌兰夫慧眼识才，李贵不负乌兰夫的器重，到中央统战部后，他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打开了工作局面。有了李贵这位得力助手，经过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乌兰夫对现状和过去情况基本了解后，对中央统战部原有干部及时作了统筹安排，健全和加强了中央统战部机关各业务部门的工作。在“两年徘徊”中，以乌兰夫为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积极地做了当时能够做的工作。其中包括筹办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等，而最具实际意义、社会影响面最大的，是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老朋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工人阶级合作，共渡难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作出过牺牲和贡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曾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并不只一次地说过，凡是在人民还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人民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十年动乱”中，各民

主党派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他们的领导人普遍地遭到了凌辱和冷落。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心目中的形象。“四人帮”垮台，乌兰夫就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一直很重视民主党派的工作。“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讲话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恢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及其活动。为能尽快地妥善解决这个问题，1978 年下半年，乌兰夫接连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研究落实有关政策，力争尽快恢复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和他们的活动。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也是乌兰夫的老朋友。一场浩劫之后，老朋友重又相聚，宾主都格外激动。每次座谈会都开得既活跃又融洽，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情谊融融的气氛中。座谈中，与会者发言积极，各自都表达了对“四人帮”破坏的无限愤慨，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和信任，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祖国未来的热诚期盼和自己的一片报国心。乌兰夫在每一次座谈会上，都诚恳地、热情洋溢地讲自己的意见。他的每次发言都激愤地揭批和声讨“四人帮”对统战工作的破坏，每次都重申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每次都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成绩和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的意见后，乌兰夫明确表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逐步落实各项有关政策和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他诚挚地请大家相信：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他要求各民主党派要整顿组织，恢复活动，把自身的工作活跃起来。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各级统战部门，要帮助民主党派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反复座谈、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乌兰夫提出对各民主党派的要求是：“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所长，贡献力量。”

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听过乌兰夫讲的这些意见后，都像是吃了定心丸，“十年动乱”中的未定惊魂终于定了下来。他们认为，乌兰夫讲的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听后都感受到是莫大的安慰。这几次座谈会之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兴奋地积极投入了恢复组织和活动的准备工作。一年之后，于 1979 年 10 月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召开了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召开了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1978 年 12 月 3 日至 15 日，乌兰夫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等老同志在发言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强调了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提出了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讲话中，他着重讲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思想僵化状态。同时，他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还讲了处理遗留问题，纠正冤假错案，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并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乌兰夫听了陈云等的发言和邓小平的讲话，感到敞亮、舒畅，从中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乌兰夫在发言中十分明确地表示，

自己对邓小平等的讲话发自内心的赞成。工作会议后，乌兰夫接着又参加了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上述中央工作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经过了充分讨论以后召开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自然地成了这次全会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讲话为指导，在这次全会上清算了酿成“十年动乱”的“左”倾路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会议，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的标志。

乌兰夫感到，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他参加过的所有中央重要会议中，心情最畅快、收益最大的一次。在这次会议的进行中，他与其他老同志一样，聚精会神地听了与自己心心相印的老同志们那些语意深刻、论理透彻、语重千斤的发言，特别是听了邓小平那掷地有声的讲话，不时地引起共鸣和遐想。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想到 1958 年“大跃进”及其以后 20 年来发生的很多往事，甚至更早一点，包括“三大改造”中发生过的事情，越想越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指导了这次会议的邓小平讲话的正确和重要。

他认为，邓小平讲话和这次会议之所以正确和重要，其根本点就在于他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过去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其实质和要害，这就是“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唯心主义随心所欲，搞个人崇拜和神化领袖。乌兰夫回想自己在这段曲折历程中的作为和遭遇，既感自慰，又觉愧疚。使他感到自慰的是：在“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党的伟大事业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是维护党的正确路线，支持党内的正确意见，并力求在自己管辖的工作范围内，贯彻执行党

的正确路线。使他觉得愧疚的是：尽管自己主观上想实事求是，想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影响。如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他也不同程度地犯了。他所在的内蒙古，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没有饿死人，但群众吃的也不是那么饱。当他想到这些后，也有有负于群众期盼的愧疚感。乌兰夫在这段曲折历程中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发自内心地拥护三中全会精神，在贯彻执行中是积极主动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兰夫立即投入了贯彻会议精神的紧张工作。他紧抓的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拨乱反正。在落实政策方面，他首先抓的是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五颗红星中的一颗。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对这个阶级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和一系列其他特殊政策。“十年动乱”中要“兴无灭资”，什么政策都不要了，把自己的朋友、同盟者——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统统列入“封资修”，全部都给打倒，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多年合作的关系。在“两年徘徊”中，乌兰夫就着手抓这一问题。

1978 年下半年，在乌兰夫主持下，中央统战部就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到民族资本家集中的上海等城市做调查。根据调查中初步发现的问题，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向中央提出了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八条意见。因为当时“左”倾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还未清除，再加上国家财力限制，一时未能解决。乌兰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以及过去曾宣布过的其他政策，都应该算数，中国共产党不能言而无信。他从党与国家信誉和长远利益考虑，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又亲自到上海调查，经同上海市有关领导反复交换意见后，又再次向中央提出关于落实民族资产阶级若

干政策的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的意见，并以急电发往各省、市、自治区执行。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落实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1979 年 1 月下旬，中央统战部专门召开了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座谈会。25 日，乌兰夫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他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对党的政策的破坏，传达了中共中央批转的《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一《请示报告》，是经乌兰夫到上海调查研究后形成的。在讲话中，他概述了报告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现将主要部分引录如下：

根据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的决定，我简要地讲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银行存款、公债、金银和其他财物被查抄了。被查抄的存款，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按照既定的赎买政策付给的定息，其他被查抄的财物也大多数是生活资料。这些都是属于宪法保护的合法收入和私产。任意把国家已经发给的赎买金抄走，这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也是违法的。过去几年，各地虽已陆续归还了一部分被查抄的存款和其他财物，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归还，主要是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大中城市。中央这次规定，他们被查抄的存款，无论金额大小，全部解冻，一次归还，并且按照银行的规定，发给利息；本人已经去世的，退还给配偶。至于其他财物，也要抓紧落实、退还。如果发现有人贪污、盗窃了被查抄的财物，要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普遍被扣减了高薪，或者只发生活费。高薪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一个方面，让他们保持比一般工人、干部高一些的生活水平，

目的就是要促使他们逐步地、不太勉强地改造成为劳动者，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少省市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扣减的工资已经基本上予以恢复，但也还有些省市没有恢复，或者只恢复未补发。中央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减了薪金的，一般应当恢复他们原来的薪金，并且补发过去被扣减的部分。

第三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城市把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私人房屋占用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明确属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房屋，应当受到宪法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中央规定，这种私人房屋仍然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被占用了的私房，应当归还给他们。在处理中，如存在实际困难，可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第四个问题，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资方代表，在企业中安排担任了各级行政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企业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不加区别地把绝大多数人下放车间或门市部从事体力劳动，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才干的人，用非所学，用非所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不妥当的……

中央规定，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适当调整：对确有技术专长的，应当授予相当的技术职称，如工程师、技艺师或顾问等，以用其所长，有业务管理经验的，可以安排适当的业务工作；不宜继续从事重劳动的，可以适当调整岗位和工种，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第五个问题，公私合营以来，我们即组织在职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参加企业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评比活动。实践证明，这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都是有利的，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也有积极的作用。为了调动他们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应当积极组织他们和职工一起参加劳动竞赛

和评比；对于生产劳动和工作表现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以表扬和物质奖励；对政治上表现好、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第六个问题，关于他们的生活福利待遇等问题，过去国务院都有规定。但有些规定，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没有认真执行。有的由于情况变化，需要作相应的修改。1957 年国务院曾对股金在 2000 元以下和 2000 元以上的工商业者的病假期间工资和医疗待遇，加以区别对待。现在定息已经结束，他们在企业中工作劳动的年限，一般都已超过 20 年，继续执行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宜。现在党中央规定，对他们病假期间的工资，一律根据生活困难情况或病假期间长短，按照本人的工资发给 50%-70%；已经按照职工待遇办理的不变。医疗待遇，则参照所在企业单位的职工办法办理。关于非因公死亡待遇问题，按 1957 年国务院的规定，在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非因公死亡待遇，要比后来 1962 年国务院规定的退休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死亡待遇低，这是不尽合理的。现在规定，都参照所在单位职工的待遇办理。以上这两个问题，国务院将会发出相应的通知。至于退休问题，应当继续执行 1962 年国务院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没有按规定办理的，现在要改正过来，被扣减掉的退休费，应当补发。

第七个问题，按国家的政策，定息到 1966 年 9 月已经结束，现在有些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以前应领而未领的定息，行不行呢？中央认为可以。

第八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党中央重申：要坚持重在本人表现，不能唯成份论。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歧视他们。

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决定，主要是这八个问题，现在已经下达执行。我们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协同各有

关部门，把这项工作做好。但工商界的朋友们也还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一部分人还戴着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因此，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还会遇到一定的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职工、干部中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宣传，并检查、督促落实党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负责人，像过去一样，协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一方面，在落实政策中，你们发现什么问题，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怎样，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向我们如实反映，不要不反映，怕反映。另一方面，协同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工作。我们相信，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大多数工商业者会正确对待党的政策。

乌兰夫这次讲话，概括了中央批转的《上海报告》的主要内容，代表党中央向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郑重重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讲得诚恳、明确，令人心服。这次座谈会起了交心的作用，使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从压抑中重又振作起来。

乌兰夫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期间，在落实政策方面解决的另一个影响面宽的大问题，就是纠正错划右派。1957 年反右扩大化，全国划定的右派达 50 多万。对右派的性质，起初，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建议还是“人民内部的左、中、右”，没有过几天就改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形成了后来多年的说法：“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被划定为右派的人，大多数是有见解、敢说话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一部分被判了刑，大部分在群众监督下长期劳动。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人，在最好的年华被剥夺了贡献自己才智的机会。这不仅是对他们身心的严重摧残，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按当时的规矩，右派只可以摘帽子（称摘帽子右派），不可以纠正和平反。所以在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有名气的

大右派陆陆续续地摘了帽子，最后剩下来的十几万戴帽子的小右派，大都是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科技人员。乌兰夫上任统战部部长后不久，就开始抓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后，1977 年 10 月间，就由中央统战部会同国家有关部，草拟出了一个征求意见后准备报请中央审批的文件。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这个文件最后没有定下来。这是一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乌兰夫一直放心不下。一年之后，他又过问这件事。1978 年下半年，由他出面邀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经过认真研究后，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原来拟的文稿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制定出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将这一《实施方案》批转全国，在批语中明确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为能及时妥善地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经中央决定，在中央统战部设了一个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办事机构。这个办事机构在乌兰夫领导下，认真细致地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会议精神和中央批转的《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全面展开了纠正错划右派的工作。由于乌兰夫的努力，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到 1980 年，纠正任务基本完成。戴帽时间最长的 10 多万小右派，包括他们家属在内的几十万人，终于得到了解救，结束了漫长的屈辱岁月。

乌兰夫就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的政策方面办的又一件大事是：为李维汉、徐冰等原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平反，摘掉强加在全国统战系统执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央统战部的元老，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党的统战工作上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自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就不断地受冲击。1962 年，中央统战部开展政策思想检查，

就不点名地批判了他。1964 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对他点名批判。当时就上纲很高，说他“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坚持一条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中央统战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把全国各级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全部都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投降部”。对李维汉、徐冰等领导干部更是横加罪名，各级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有不少干部遭到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乌兰夫领导下，经过揭批、清查“四人帮”和理清过去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 1979 年 2 月 3 日，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指出：1962 年和 1964 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对此，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3 月 16 日，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由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平反决定，并作了重要讲话。现将《讲话》的摘录如下：

中央已经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

这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决我们这条战线上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件大事，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完全符合全国统战系统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必将大大调动全国统战系统干部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政策观念，对于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统一战

线工作，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略。

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中有没有一条“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不能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而是要靠实践的检验，明辨是非。违反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在实践的检验下，终究是站不住脚的。

建国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

（一）开国之初，在党的领导下筹备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使我国各民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大团结，我国革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

（二）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我们党推动和组织了广大知识分子、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一整套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就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保持了社会安定，市场繁荣，生产力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持续发展。

（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加强了对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民族、宗教上层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协和机关、学校、企业中安

排了大量党外人士，改进了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促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在十多年的斗争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五）在民族工作方面，我们党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了祖国的集中统一，并且根据各个民族地区不同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包括和平协商改革的方法，胜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事业……我国各兄弟民族互相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六）在宗教工作方面，我们党全面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教育了广大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爱国人士，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使教会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七）在团结爱国华侨，加强对台湾和港澳的工作中，在支援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全国解放以来，中央和各级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党在实现总任务的伟大事业中一个方面的有力助手，成绩是很大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中，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三、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央统战、民委系统的李维汉、徐冰等一批领导干部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罪名加以迫害。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为革命工作了数十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们对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他们执行的

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不是什么“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下，许多长期同党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爱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迫害，其中长期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像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宝航等同志被迫害致死，现在郑重宣布为他们平反昭雪。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系统中，凡是遭到诬陷、迫害被扣上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叛徒”“特务”各种罪名的党内外工作人员，也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要彻底推倒，不留尾巴。

乌兰夫这次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的，语言干脆，态度明确，在统战系统震动很大。经过这次大会，原来不舒畅的同志舒畅了，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统战、民族、宗教战线上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战工作也不例外。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同时，乌兰夫已开始考虑统战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他在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就说：“统战工作的重点要坚决地、及时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统战工作必须牢牢地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四个现代化。”还说：“统战系统的运动（揭批“四人帮”、落实政策）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党外人士和统战系统干部的积极性正在调动起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统战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他还讲了实现统战工作重心转移要做的各项工作。为了适应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新情况、新形势，必须研究和解决包括方针、任务和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的新问题。根

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乌兰夫为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及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乌兰夫领导下，紧张地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后，于 8 月 15 日至 9 月 3 日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十年动乱”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它在统战工作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现将他讲的主要内容列述如下：

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使命和作用时，乌兰夫说：

在现阶段我国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时，乌兰夫说：

新时期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的主人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另一方面，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只要赞成统一祖国，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要团结……这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的更为广泛的同盟。按照中央的指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不宜叫做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应当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里所说的爱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

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不是一般名称的变动。对此，乌兰夫引用邓小平的话说：

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是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问题。

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时，乌兰夫说：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担负着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统一祖国服务的双重任务。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应当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各项工作都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我们必须牢牢地树立起统战工作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为了实现上述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应该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时，乌兰夫说：

现在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他们之间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斗争，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人民内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针对这些影响，还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教育。但总的说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应当适应这一形势，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严格遵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帮助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谈到今后统战部门的工作范围、对象时，乌兰夫说：

可大体规定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政协和各民主党派；

（二）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三）各方面的爱国者；

（四）知识分子工作；

（五）从原工商业者改造过来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六）对港、澳、台的统战工作；

（七）华侨的上层统战工作；

（八）开展国际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谈到落实政策和知识分子、民族、宗教政策时，乌兰夫说：

（一）关于落实政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的政策。右派摘帽和改正的安置工作，必须善始善终地做好。（二）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中央明确指示统战部门要管知识分子工作，我们要协同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地抓好这方面工作。统战部门在非党老中年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对象，主要是文教、科技、医药、卫生等各条战线的业务骨干。工作任务主要是：了解情况，综合研究，掌握政策，调整关系。（三）关于民族工作：当前民族工作，主要是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广泛开展民族政策的再教育，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各兄弟民族的团结，调动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要切实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要抓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做好民族院校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四）关于宗教工作的问题：我们的宗教政策，必须考虑到国际影响，就是说要着眼于发展国际友好往来，为促进国际反

霸统一战线服务。当然，我们必须警惕国际宗教反动势力的渗透。从国内来说，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对待人民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不能采取强制和取消的办法。我们要把宗教活动引导到地面上来，积极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认真做好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

乌兰夫的总结讲话，概括了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议定的主要问题。会后，按照讨论的意见，以乌兰夫总结讲话为基础，给中央写了以“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为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要求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再教育，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切实贯彻好多项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这次会议议定的问题，也即乌兰夫总结讲话中明确的那些问题，就作为中央精神确定了下来，成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指导方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经过三年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历史遗留问题已大部分解决，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调整，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特别是农村改革，效果尤其明显，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统战工作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为了总结 1979 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两年多来的工作和经验，推动统战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在乌兰夫的操办下，于 1981 年 12 月 21 日至 1982 年 1 月 6 日，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乌兰夫主持下，会议认真地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着重研究了如何尽快地、切实地落实已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面的各项政策，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等问题。党中央

很重视这次会议。在会议进行中，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到会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

在会议结束时，乌兰夫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题，作了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他满怀喜悦地讲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站在理论的高度讲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充满信心地讲了如何进一步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对于 1979 年 8 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他归纳了四点，即：第一，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第二，统战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团结得到了发展和加强。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在为祖国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积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三，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深入人心，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团结正在发展和加强；第四，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领域，统一战线已深入到了广大基层和部分农村。

乌兰夫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拨乱反正，归功于各级统战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党外人士的共同努力。乌兰夫的总结发言，重点是讲对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现将其主要部分引录如下：

在讲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时，他说：

“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结论。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经济文化还比较落

后，祖国还没有最后统一，国际霸权主义还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四化，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实现这些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调动千军万马，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加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社会集团和一切爱国力量之间的大团结。工人阶级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但是工人阶级在全国十亿人口中仍然是一个少数，共产党更是少数。因此，加强工人阶级同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的联合，在任何时候，都是直接关系着我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盛衰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排斥广大的同盟者、损害同盟者利益、否定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使我们的事业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认真记取。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一个战略问题，决不是可有可无或一时的权宜之计。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牢固地确定下来。

我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政治联盟。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和朋友、港澳朋友、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等各方面。这些方面的统战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必须切实做好。在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民主党派的问题。

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各民主党派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产物。他们具有爱国、反帝的光荣历史，具有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革命传统，并且包括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人才。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国家政权和各项经济文化建设，对

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社会主义一致性更加发展了。但是，各民主党派仍然保持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根本利益一致下的不同利益及要求，各民主党派仍然需要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代表他们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来自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和监督。坚持这种多党合作，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加强同这部分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团结，经常多方面地听到各方面专家和群众的不同意见和要求；能够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更好地治理国家；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这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因此，坚持和加强党同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仍然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

在讲到今后的统战工作时，他提出：

在新形势的要求下，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做出更大的努力。其具体任务和要求是：要切实抓紧各项统战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十分重视和加强对台统战工作；要切实抓好对党外人士的安排；要进一步调动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要努力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在民族关系、民族团结上，要争取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争取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乌兰夫的这一总结发言，对我国新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全面论述。他联系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

把新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成员和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任务等，都讲得清清楚楚，为巩固和发展新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从认识和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三十、操办全国边防工作会议

由乌兰夫操办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于 197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出席开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胡耀邦、韦国清、耿飚、余秋里、王震、李井泉、王任重等。

乌兰夫在开幕式上作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国防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闭幕时，他又作了总结发言。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很成功的会议，也是一次很难产的会议。它从提出到开会，时跨五个年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和两年徘徊，直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它的筹备过程记载着这五年的艰难和苦乐，记载着这五年的变迁和沉浮，也记载着乌兰夫为开成这次会议所做的努力。

乌兰夫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享有“党内民族问题专家”之称誉。由于他在党内外所具有的影响及其代表性，党的十大时，他即复出。尽管没有给他实质性的工作，也没有为他的蒙冤平反，但他已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有限度地做些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工作；到了第四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担任了副委员长，总算有了多做点有益工作的条件。1975 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国内情况稍有好转时，在国家危难中支撑政局的周恩来，考虑到一个有 50 多个民族的偌大国家，让“四人帮”搞得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工作机构都停止了运行，民族问题不能没人管。于是，他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设一民族政策研究小组，责成乌兰夫组建并主持。历经磨难，矢志不移的乌兰夫受命于危难之时。是年 9 月，他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 年大庆。临行之前，去面见当时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就便向他提出了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的想法。邓小平立刻明确表示同意，并说：“你们得走一万公里。”（意为到实地去调查研究）。两位被打倒又站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一决策，就是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源头。

乌兰夫非常理解邓小平说的“走一万公里”的含义。他趁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 年大庆的机会，带工作人员对“十年浩劫”后的民族工作情况做了大量的调研，以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做准备。不料，这时“四人帮”又燃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邪火，邓小平再次陷入困境，筹备中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因此而搁浅。

冬去春又来。“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二年春天，乌兰夫再次提出召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乌兰夫的建议，决定即刻着手筹备。过后不久，中央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祖国边疆，做好民族工作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安全和国防的巩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就曾说过：巩固边防，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而万里边疆居住的又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同胞，所以巩固边防，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也就是要做好民族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叶剑英曾延伸说：在边境居住的少数民族，有不少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在经济和生活上都有个相互比较的问题。故做好边疆民族工作，首先要搞好边疆经济建设，这是做好边疆民族工作的关键，也是巩固国防的前提。

有鉴于此，1977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要全盘考虑，原决定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不再单独召开，改为由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统一解决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问题。当时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边疆建设思想，即：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会议的

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总结交流边疆工作经验，制定边疆建设规划，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调动边疆各族人民的积极因素，建设边疆，巩固边防。并决定由乌兰夫和谷牧牵头，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在乌兰夫、谷牧领导下，各有关方面都积极地做了准备，起草了会议主报告稿，拟制了边疆建设规划草案。

1978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9 日，在乌兰夫主持下，召开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预备会，对主报告稿和规划草案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因为此时正在党内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党中央在集中精力解决端正党的路线、方针的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其他，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也只好后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恢复了党的传统，各条战线上普遍展开了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为开好这次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将近 4 年曲曲折折的筹备，在乌兰夫的操办下，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终于在 1979 年 4 月 25 日开幕了。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宣布会议开幕时，出席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来自边疆的所有与会人员，即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乌兰夫，在掌声中登台作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

乌兰夫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同时指出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损失。全面总结了建国 30 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报告中，他讲了六大问题，即：新时期边防工作的任务；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加速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强战备，保卫边疆；加强党的领

导。

在讲新时期边防工作的任务时，乌兰夫说：

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是安定团结的重要方面。今后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友爱，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加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战备建设，加强对敌斗争，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国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边疆。我国边疆，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要巩固边疆，加强边防，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把我们的边防建设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建设巩固的边防，必须发展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边疆地区，许多少数民族还存在一个同境外民族谁影响谁的问题。我国各民族人民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且要在经济上繁荣，生活上富裕，做到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在讲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时，乌兰夫说：

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夺取革

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的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依靠各民族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遭到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了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被他们颠倒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得到澄清；他们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正在得到平反和昭雪；党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民族关系大为改善，边防工作有了加强。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远，情况复杂，还有不少遗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按照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好。一切冤案、假案、错案必须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在内蒙古等地，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所搞的重划阶级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应予彻底推翻。重划阶级后受到批判的应一律平反，被无理没收的财产应予退赔。一时还不了的，应做好思想工作，采取分期分批退赔的办法解决。在人民内部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了这些以后，乌兰夫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认识论观点，从建国以来 29 年边防和民族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四条主要经验，即：

一、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政策。二、必须坚持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应当看到民族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是什么民族消亡的问题，而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我们决不可把民族融合作为当前的实践纲领。我们必须重视民族问题，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团结各民族的绝大多数。相信各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相信和依靠工人、农民、牧民。对于民族上层，也要按照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区别对待。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是我们加速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保证。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点，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四、必须坚持国家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加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靠当地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同时，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扶持、重点照顾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就更加艰巨。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国家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任务，也是加强边疆建设和巩固国防的重大任务。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达到繁荣边疆、巩固国防的目的，必须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起来，共同努力。

在讲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强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时，乌兰夫说：

我们要继续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不仅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中进行，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都应当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来学习。在民族政策再教育中，要检查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对于这个问题，乌兰夫用七个“一定要”讲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

（一）一定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

民的团结。要搞好各族人民团结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一个地区居于多数的少数民族，在处理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也要注意克服和纠正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二）一定要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社会主义的内容，必须具有民族的形式，在自治机关的人员构成、语言文字的使用、文学艺术的发展等方面，都必须认真注意民族形式。民族自治机关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区划，不能轻易改变。已经改变的，如果改得不合理，群众意见较大的，要恢复原来的区划。上级国家机关要切实贯彻执行《宪法》的规定，充分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三）一定要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认真办好民族院校。原有的民族院校，凡是没有恢复的，都要尽快恢复；并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增设民族院校。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迫切需要，所有民族院校，都要明确方针、任务，作出具体规划，既要培训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也要尽可能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到内地参观，开阔眼界，学习先进工作经验。（四）一定要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是体现民族平等的重要标志，也是党的一贯政策。（五）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对于搞好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六）一定要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民族政策。（七）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允许他们有进行正当宗教活动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要逐步有

计划地开放寺庙、教堂，使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公开起来。

在讲加快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时，乌兰夫说：

在今后八年内，国家拟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安排的全部建设投资将达四百亿元。为解决边疆地区的特殊困难，除正常渠道安排给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设备和材料外，还将在计划内随投资补助一些汽车、拖拉机、钢材和木材等物资。国家还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从今年起，要有三年时间搞调整工作，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到 1985 年，边境地区农林牧业、工业生产和交通、邮电、财贸、文教卫生事业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到本世纪末，随着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边疆地区的面貌将根本改观。发展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认真贯彻农、轻、重的方针，把农、牧、林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农、牧、林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我国边疆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牧业区，加快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发展，关系到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草原，争取多建一些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要利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兴办工业，特别是支农、支牧的小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注意首先培养和依靠当地少数民族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要采取得力措施，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关键是办好各级各类学校，采取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办学，加速培养各种人才。要特别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科学研究机构，建立健全农、牧、林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系统。

在加速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乌兰夫作出这样的论述后，他又明确提出在这方面必须遵守以下八条原则：

一、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国家支援的有利条件，多快好省地办好建设事业。

二、国家支援的资金和物资指标要安排落实。

三、国家拨给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资金、设备、材料和其他商品，不得减少、克扣和挪用。对违反这个规定的人要严肃处理。

四、国家安排的边境建设专项补助资金，要保证专款专用，专项专用，当年由于特殊原因确实用不完的，可以转下年使用。

五、列入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期投产，不准搞计划外项目。

六、要认真执行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不得挥霍浪费。

七、国家和有关省市援建的工矿企业，要积极培养当地的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使他们逐步掌握技术和具有独立操作的能力。对这些工矿的考核中，要把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八、要选拔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支援边疆建设，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树立支边光荣的风气，同时负责安排好支边人员的家属、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在讲加强战备、保卫边疆时，乌兰夫说：

边疆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屏障，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繁荣的边疆、巩固的国防。

在这方面，他分别讲了边防部队建设、公安部队建设、民兵建设和群众工作的问题。讲到边防部队建设时，他说：

要把边防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政治思想红、政策水平高、组织纪律性强，会做群众工作，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又有熟练的边防斗争技能，既能执行政治任务，又能执行战斗任务的坚强部队。要把政治思想工作结合战备、训练、施工、执勤等一道去做，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各项任务中去。搞好军事和业务训练，要做到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干部要能组织值勤，能指挥打仗。要认真落实各项战备措施，加强边防警戒。

讲到边防公安部队建设时，他说：

边防公安机构要根据对敌斗争的要求适当调整，合理铺设。在国家开放的港口，机场和陆地边境口岸，根据需要设立边防检查站；在地方口岸设立边防工作站；在边境管理区内原则上应以公社为单位设立边防派出所；在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设立公安检查站；在敌情复杂的沿海设立精干的海上公安巡逻队。组成一个与边防部队相互配合，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边防保卫网。

讲到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建设时，他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做好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建设，是巩固边防，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重要措施之一。边防部队和公安队伍要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下大力做好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搞好对敌斗争。要积极参加、大力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同各族人民一起为迅速改变边疆地区面貌贡献力量。认真搞好民兵的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充分发挥民兵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的作用。加强军民联防，把边疆各族人民群众都组织到保卫边疆的斗争中来，做到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村村是堡垒，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把边防建设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讲加强党对边防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领导时，乌兰夫说：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总体战，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才能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有效地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搞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巩固边防。

乌兰夫这一报告，是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主报告。在报告前已与中央沟通，它代表着党中央。整个报告都贯彻着党中央的精神。乌兰夫报告时，语言明快、论述透彻，情绪昂扬。与会人员听得声声入耳，感到句句都说在了自己的心上。“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制造的种种混乱，这一报告全都给拨正了过来。它为全面纠正和平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冤假错案从思想和政策上奠定了基础，为今后边疆建设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明确了方向和任务。会议分组认真讨论了这一报告。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发言积极热烈。他们倾诉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积存在心里的话，满怀信心地讲述了如何做好今后的工作。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会议代表，用亲身经历和本地区、本民族的事实，佐证了乌兰夫在报告中讲述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报告讲得全面，观点明确，是非分明，该说的话都说到了。他们说，“十年动乱”中，我们吃够了苦头，被压得长时间喘不过气来。听了乌兰夫的报告，心情格外舒畅。特别是听到他重申党的民族政策，更是感受到了党的关心和温暖。苦难终于熬到了头，祖国的春天又来了。这一报告的主题在建设，重点讲的也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边防建设。这标志着报告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建设上来。这正是边疆人民所期盼的，也是与会人员最关心的事。他们说，这同林彪、“四人帮”

搞“政治边防”，动辄“清理”“净化”“内迁”，搞得边疆人民不得安宁恰恰相反。这才是真正关心边疆人民，相信边疆各族人民；真正关心和重视边疆建设和边防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把边疆建设好，才会有巩固的边防。经过对乌兰夫报告的分组讨论，加深了与会者对会议精神的理解，也为主报告的修改补充提供了丰富资料。

在会议将近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会议情况和讨论的主要问题。到会的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同志听过汇报后都讲了话，肯定了这次会议，对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都作出了明确决定，批准了汇报提纲和乌兰夫所作的主报告。5 月 12 日，乌兰夫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在闭幕会上讲话，总结了会议成果，传达了政治局领导同志听汇报时的指示精神，使与会的同志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搞好边疆建设和边防建设的信心。

会后，中央将乌兰夫在会上作的主报告印发给了各地和各部门，要求贯彻实施。同时，建立了由中央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边防工作领导小组，定期讨论、检查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经过几年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民族政策再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文革”期间，被分割了的自治地方及时得到了恢复，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过去搁置多年的难题得到了解决;“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冤、假、错案，包括平息武装叛乱、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的遗留问题等，都经过缜密调查研究后得到了彻底平反。在这次会议上倡导的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的问题，得到了兑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计划经济年代定下的边疆建设规划得到了调整，边疆、边防建设事业在新机制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加强。在乌兰夫直接操办下，由中共中央召开的

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成了全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由“十年动乱”中造成的混乱，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有序治理的重要转折点。

三十一、主持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

1984 年 5 月 3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当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是由乌兰夫倡议，并在他主持下起草的。

我国本来法制就不完备、不健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无法无天，任意践踏和破坏法制，各个方面都被他们彻底搞乱了，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法制不健全、不完备和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的沉痛教训中，乌兰夫深悟到法制建设的重要。“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恢复了党的传统和正常秩序后，在百废待兴、百事待举的时候，乌兰夫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视。在决定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新的情况修改我国《宪法》的同时，决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0 年，主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宪法》修改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委员长彭真提议，修改《宪法》民族部分和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工作，一并由乌兰夫主持。为能尽快拿出高标准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草本，党中央决定建立以乌兰夫为组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乌兰夫接受了主持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使命后，迅即展开了起草这部重要法律的准备工作，并着手组建起草的班子。

为能拿出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好草本，乌兰夫首先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充分准备。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集中表现在他 1980 年 9 月 15 日在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认真做好民族立法工作》，和 1981 年 7 月 14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署名文章中。为准确理解乌兰夫关于民族立法的基本思想，充分了解他在这方面潜心研究的成果，现将他 9 月 15 日讲话和 7 月 14 日文章的主要部分选录于下：

9 月 15 日讲话主要部分选录：

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我们所要做的民族立法工作，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的立法工作，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繁荣的立法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我们所立的法，要吸收少数民族人民的合理意见，要符合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要体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必须组织少数民族同志参与民族立法工作。

我们国家过去也做过一些立法工作——其中包括一些民族立法工作，这些立法工作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看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还是很不完备和很不健全的，在民族问题上尤其如此。

1949 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专设一章规定了民族政策。1951 年，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952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和总纲里规定了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又在“国家机构”一章里专设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一节；同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则专设一条规定了当时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上述这些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就当时来说都是有成效的。然而，从此以后，民族立法工作就

停顿下来了。由于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忽视，我们国家在民族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上都长期存在着无法可依或有法， 不依的现象。

至于民族立法方面，从 1955 年以来，连一项专门的法律、法令都没有制定，以致在许多问题上只能以上级临时的决定和指示为准。对此，各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同志是有深切感受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自从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逐步走上正轨了。

回顾建国 31 年来盛衰交替的法制建设过程，应该说其中包含的教训是沉痛的。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光明的，在沉痛的教训的策励下，在光明的前景的鼓舞下，我们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把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搞好。

一、要重视民族立法工作

我们搞民族立法工作，遇到不少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我们这个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不管我们自觉不自觉、乐意不乐意，它必定带着旧社会的深刻的残迹遗痕。我国有延续两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近代是长达一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现代的社会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过来，而正是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革过来的。因此，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多些，不如准确地说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多些。这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至今还是一副沉重的腐朽、而顽固的精神枷锁。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从来不讲民主，而且通常是轻视法治和贱视“夷狄”的，少有例外。到了近代，国民党反动派否认中国有众多

的民族存在，把少数民族称为“宗族”或“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国民党反动派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对少数民族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少数民族是根本没有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可言的。

确认中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存在，并且确认少数民族应当享有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的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各族人民同求解放，共谋幸福，从而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的信赖和爱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少数民族极尽歧视和压迫之能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肆意践踏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甚至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说成是“人为地制造分裂”。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彻底清除他们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某些担负着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内，仍不重视法制建设，仍不重视民族政策。他们总是害怕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充足的自治权，总是认为少数民族没有管好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显然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我们的民族立法工作至今还落在其他工作后面，显然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系。今后，为了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我们必须努力排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所造成的障碍。

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如何，历来是我国政局是否稳定，边防是否巩固和建设事业是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不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就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富强。反之，如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得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充分保障，民族团结就一定能加强，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充分调动起来，从而也就一定能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富强。因此，对我们这个正在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而奋斗的国家来说，加强民族立法工作，在民族问题上确立完备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是久安之计。

二、民族立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

我国的少数民族族种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特点纷繁，一个民族的特点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又会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差别。总的看来，中华各民族的特点是千姿百态的。我们在制定适用于各少数民族的法规的时候，必须掌握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不同的特点，不能和适用于汉族的法规一刀切。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在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的时候，都必须掌握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既不能和汉族地方适用的法规一刀切，也不能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一刀切。总之，我们只能量体裁衣，无论如何，不能削足适履。做民族工作——包括做民族立法工作在内，头脑里要多一点辩证法才好。所谓民族特点，用辩证法的术语来讲，就是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共性存在于民族的个性之中，没有民族的个性就没有民族的共性。如果我们拒绝研究一个个地区的民族问题的个性，我们就不能掌握整个民族问题的共性，这样，我们就既不能制定好适用于某个少数民族或某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也不能制定好适用于各少数民族或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因此，我们决不可低估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点在民族立法工作中的意义。

三、民族立法工作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民族立法工作的目的，是要切实保障国内所有少数民族享有真正的平等权利和充足的自治权利。

民族立法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保障聚居的少数民族享有充足的自治权利的立法；第二，关于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的立法；第三，关于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权利的立法。

我要着重谈一谈的，是民族立法工作的第一个方面，即关于保障聚居的少数民族享有充足的自治权利的立法问题。

民族的自治权利，集中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上。所谓自治权，就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主权。没有充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就名不副实；有了充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才算是真正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比较完整的只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那是 1952 年制定的，到现在已经 28 年了。当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还不能就自治权作出具体而确切的规定。当初的若干规定——尤其是关于自治权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现在，我们国家迫切需要一个类似于《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而适应当前形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要规定的，主要是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共性问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心工作，就是草拟《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其尚未颁行的时候，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先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要规定的，主要是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个性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一项自治权，这项自治权早在 26 年前就载入宪法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完成了立法程序的自治条例一个也没有，单行条例也寥寥无几。民族自治地方成立以后，自治机关遵照什么法规来行使职权呢？如果只是遵照全国通行的法规，就照顾不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了，就体现不出民族的自治权，显示不出自治的优越性了。任何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有自己的个性问题，这些个性问题不是单凭全国通行的法规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由民族自治地方另立法规去解决的。

自治权的行使离不开民族化，可以说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

条件。因此，在具体讨论自治权之前，需要先说一说民族化。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主要是干部的民族化。干部的民族化也涉及许多方面，而首先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这就是说，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必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必须占有和当地主体民族的地位相称的比例；在自治机关的实际工作中，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必须有职有权。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组成情况互有差异，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给所有自治机关规定一个统一的民族干部比例，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必须体现出来。

需要实行干部民族化的单位，不止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他机关和团体，凡是需要体现自治权的，也都应当实行干部民族化。

民族化还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形式在内，那也是必须采用和发展的。尤其是民族语言文字，要得到充分的应用和顺利的发展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比较突出。

对于民族化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在法律上作出恰当的规定，这是毫无疑义的。民族自治地方按行政地位来划分，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旗）三种。行政地位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他们的地方性问题有大有小，他们的自治权也相应的有大有小，一刀切是办不到的。但是，假使和行政地位相仿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相比，那么，自治机关的职权就要大些、多些，这是没有疑问的。在一切地方性问题上，民族自治地方应该有充足的自治权才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保证国内各民族既各得其所，又和衷共济，从而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和财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已成为突出的、亟需注意和亟待解决的了。

谈到经济管理权，首先一个问题是资源管理权。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处理，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好多麻烦，甚至可能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如某些设森工局地区的林区所有制问题，某些设橡胶园地区的山地所有制问题，都要妥善解决，要让当地民族靠山能吃山，这样他们也就容易做到吃山要养山了。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既有利于国家富强，又有利于民族繁荣。放得不够宽的要继续放宽，搞得不够活的要继续搞活。只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宽、搞活对生产发展和民族团结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除了资源管理权之外，经济方面还有企业管理权也是重要的问题。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为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要充分肯定。但也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不够尊重，总想把赚钱的企业往上收，把赔钱的企业往下放。有个部门，几乎同时向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下达两项决定，一是要把几个矿收上来，二是要把另外几个矿放下去，都是同样的矿，差别在于要收上来的是赚钱的，要放下去的是赔钱的。这样一收一放，下面当然有意见。还有这样的情况：设在民族自治地方内而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某些企业，非但不能给民族自治地方增加财政收入、就业机会和可供调拨的物资，反而要民族自治地方增加“倒挂”之类的财政支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掌握这样的原则：上级国家机关需要在民族自治地方内设立企业、开发资源的时候，要听取自治机关的意见，要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要在企业的隶属关系、职工来源、“骨”“肉”关系、物资管理、产品留成、利润留成和税收分配等方面作出恰当的安排，以求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地大物博，这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必将显示出愈来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是有长可扬，有优势能发挥的。但是，假使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上没有充足的自治权，它们的长就可能变成短，它们的优势就可能变成劣势。从长远来看，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都是不利的。汉族地区的中心城市可以和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发展合营企业、补偿贸易、返回产品、返回利润和对口支援等经济合作关系，既保护竞争，又促进联合，这对双方都是大有利的。

我国的少数民族，就人口来说，80%多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还有不到 20%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中包括 17 个人口较少或居住较散的民族 300 多万人，以及居住在自己民族的自治地方之外的民族成员 600 多万人，合计 1000 多万人。这 1000 多万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后可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种是不能构成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对于前一种，要帮助他们尽快创造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至于后一种，“人民公社化”之前有民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民族乡全部撤销了。当初的民族乡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形式，尽管不可能而且不需要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旗）的行政地位，但也有民族化和自主权的问题。

关于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过去有一个法规，叫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我们要根据民族工作和这个法规实行 28 年来的经验，审查和修订这个法规，或者另行制定一个法规来取代这个法规。

关于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立法，这个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体制问题。新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体制，必须和它的职能相适应。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工作暂行方案，以后要继续研究。同志们可以各抒

己见，以便今后在修订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时候，对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体制作出恰当的规定，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能承担起新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

四、要维护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是法制，就要令行禁止，有法制的权威，否则，法制就丧失了它应有的信誉和效益。怎样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呢？有三句话，叫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谈三点：

第一、法规本身必须有足够的明确性和严密性。我们制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是非要分明，赏罚要严明。假使尽用些貌似稳妥的、富有弹性的字眼，如"适当比例""一定程度"等等，解释起来可大可小、可方可圆，执行起来可宽可严、可有可无，那法规还有什么用处呢？凡是需要写得明确些，就不要写含混了；凡是需要写得严密些的，就不要写粗疏了。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才真正能成为准则，才真正能具有不可缺少的权威。

第二、宣传民族立法工作的意义，宣传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的内容，宣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宣传工作就是民族法制教育工作。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干部及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民族法制教育工作，使人人知法守法。我们搞民族立法工作，是要由国家机关以成文法规来确认民族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政策的实施。只有做好民族立法工作，才能真正落实民族政策，否则，落实民族政策就是一句空话。这个道理，要让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知道。我们所要进行的关于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应该以民族法制为重要内容。我们在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不健全的状态下生活得太长久了，以致许多干部的法治观念相当淡薄。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好民族法制教育工作，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第三、要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一切公民遵守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过去，封建专制君主以言代法。不幸的是，这种以言代法的封建痼疾至今仍在一些同志的身上时有发作。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容许以言代法的现象存在了。上级也罢，下级也罢，“条条”也罢，“块块”也罢，要一律以法为准。在各民族自治地方，不但要以全国通行的法规为准，还要以本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为准。违犯全国通行的法规，固然是违法行为；违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法规，同样是违法行为。上级的指令，如果违法，就是无效的，下级有权抵制。如果上级强使下级执行其违法的指令，下级有权控告。我们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凡是违法的，都要依法追究、依法处治。否则，我们的法规就如同虚设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主要任务，除了立法，就是监督。按照现行的体制，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所要做的监督工作，是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遵守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有些地方人大也设立了民族委员会，这些地方人大的民族委员会也有相应的监督职能。至于各级人民检察院，自然都要做好这个监督工作。此外，我们还要通过法制教育，动员各族人民都来做监督工作。这样，把周密的监督工作和完善的立法工作结合起来，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就会不受损害了。

民族工作的新阶段确实已经来到了。它将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时推进和全面落实的阶段，它将是少数民族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得到牢靠的法律保障的阶段，它将是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国家统一进一步巩固的阶段，从而也必将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同繁荣的阶段。

我们要以做好民族立法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民

族工作的新阶段。

7 月 14 日文章主要部分选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国内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压迫的结束，开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时代。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铲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掀开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现在，我们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奋斗。

60 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民族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制定、实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不可分割的完整领土内，在最高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组成自治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行使自治权利；遵照国家的总方针、政策，根据本民族、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具体的方针、政策，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它既能维护全国所有民族的共同权益，又能维护全国各个有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

回顾 60 年来的经历，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惟一正确的基本政策。

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实现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各种设想和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党终于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受到各民族

的人民和领袖人物的衷心拥护。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任何背离这一道路的做法，都是违反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的，都是行不通的。

1949 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决定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把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策确定下来。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抉择，是由我国民族关系的下述特点决定的：

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自治区的历史基础。多民族的中国，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封建割据状态，而且在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中几经分合，而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由于中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总是内向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也无不理所当然地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晚近的几个世纪中，国家统一已经达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

第二，民族错居杂处和相依共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频繁迁徙，交相穿插，逐渐形成了既有大聚居又有小聚居、既有交错聚居又有杂居和散居的态势，并且在经济上建立了相依共存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分别建立民族国家显然是不相宜的。至于民族区域自治，则以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依据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条件，并且参酌历史情况，可以建立多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便于各少数民族行使在本民族的地方性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近代的中国是受着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

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起首要作用的矛盾。中国各民族如果各行其是，互不相顾，就会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乃至吞灭。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战胜敌人，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以后，特别是在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以后，为了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分化、渗透、颠覆、侵略，确保民族自由，合则存，分则亡，二者必居其一。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各民族人民都是坚持统一而反对分裂的。

第四，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

第五，各民族人民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

第六，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基础，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政治条件也有经济条件，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建设的需要。总之，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是历史的抉择。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逐步成熟起来的。

从 1930 年党中央提出居住在中国地域的弱小民族“可以完全自愿地决定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起，党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都申述过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

战争时期，党曾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过几个民族自治地方。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规模都不大，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恩来等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党领导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并于 1947 年 5 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我国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我是身历其事的。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才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蒙古民族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曾经长期在黑暗中摸索。族内族外、国内国外形形色色的敌人，曾经用"独立"和"自治"这类动听的言词来诱骗蒙古民族落进他们的牢笼。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蒙古有几个敌视革命的王公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闹过"独立"，受到蒙古民族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反对，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迫于时势，曾经许诺内蒙古实行"自治"，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许诺是一纸空文。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伪行"自治"，这是假"自治"之名，行叛卖之实。灾难深重的蒙古族人民，历史上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进行自发的斗争，前仆后继。这些自发的斗争，包括壮烈的嘎达梅林起义在内，不幸都失败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给蒙古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使处在黑暗中的蒙古民族看到了光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在内蒙古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培育了蒙古民族的第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坚持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造就了蒙古民族的大批干部，并且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刚结束，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当地蒙古民族的广大人民一致赞成走党所指引的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从而孤立和挫败了这个政府中的个别分裂主义分子。1945 年 11 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党所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了那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1946 年 1 月，在葛根庙又出现了“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党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这个政权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深入人心，抵制了这个政府中个别成员的分裂主张。当年 4 月，经过“四三会议”的协商，决定撤销这个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于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随着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内蒙古自治政府在 1947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给自治政府发出了亲切的贺电。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蒙古民族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有史以来不曾得到过的当家作主的权利，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了成熟阶段。

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和教训

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春天。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宽广的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截至 1981 年 6 月末，全国已建立自治区 5 个，自治州 29 个，自治县（自治旗）75 个。30 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党所倡导的民族区域自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从此，我国的少数民族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民族压迫制

度的枷锁，第一次作为国家平等的成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汉族一起结成了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们的国家是民族团结合作的国家。就全国性事务来说，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共商大计，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就地方性事务来说，国家赋予少数民族经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更是百年盛事、千载伟业。

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主要就是让能够忠实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当地民族群众，充分掌握当地民族特点，深刻理解当地民族心理的当地民族自己的干部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培养、坚决依靠和放手使用民族干部，我们就能变民族猜疑为民族信任，化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能成为国家联系少数民族人民的有力纽带，国家就能和少数民族人民息息相通、血肉相连，就能在保障民族的自立、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集中、统一。

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党和国家的总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是千差万别的。就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形态看，有些民族和汉族大同小异，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农奴制，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奴隶制，还有些民族中或多或少地遗留着原始公社制，合起来几乎可以构成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为了使这些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民族都共同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决不能把汉族地区或其他民族地区成功的经验当作通用模式，要求他们“齐步走”“一刀切”，更不能像列宁所反对的那样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而必须允许他们采取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和步骤，才可以收到殊途同归之效。斯大林说过：“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

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坚持辩证法，让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总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慎重稳进，按照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和步骤，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例如：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进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在有些藏族地区，对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解放了农奴。在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公社制残余而阶级分化不明显或不严重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所有这些，都是成功的方针和政策。内蒙古也有类似的经验。1947 年冬，昭乌达盟有些同志在蒙古族牧业区搞民主改革，照搬汉族农业区搞土地改革的一套办法，引起了牲畜大量死亡。内蒙古的党政领导机关纠正了这个错误，针对蒙古族牧业区的特点，在彻底废除王公特权的同时，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以及扶助贫苦牧民的政策，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推动了牧业迅速发展。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内蒙古的党政领导机关也注意了从当地民族特点出发。例如：对于牧业生产合作化，采取了“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方针；对于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采取了办公私合营牧场方式的赎买政策。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都是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取得的独创性的成果。

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结合起来。我们搞建设，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维持甚至扩大各民族之间发达程度的差别；只能走社会主义新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这样的差别。否则，我们就不是坚持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既是各民族实行政治合作的良好体制，又是各民族实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良好体制。统一的国家可以大力帮助

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组织各民族相互支援；而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可以通过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的积极因素，来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物的积极因素，这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就是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实现民族繁荣的道路。

第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统一的感情和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民族关系的好坏，历来是我国政局能否稳定、边疆能否安宁和国防能否巩固的重要因素。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人民就会深信自己既是自己家园的主人，又是祖国的主人，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就会高度发扬。

现在，蒙古族人民和内蒙古其他民族人民守护着祖国的北大门。维吾尔族人民和新疆其他民族人民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藏族人民和西藏其他民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做出了宝贵贡献。壮族人民和南方其它民族人民在保卫祖国南部边疆安全的斗争中建树了英雄业绩。总之，几十个兄弟民族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承担着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共同组成了铁壁铜墙。有些曾经被反动统治阶级驱赶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解放以前濒于灭绝的境地，解放以后都获得了新生，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连解放初期只有2000 多人的鄂伦春族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他们作为祖国主人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前程的民族的自豪感，都空前地增强了。

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归结起来说，是民族区域自治使祖国所有民族既各得其所，又和衷共济。30 多年来，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伟大成就。可以预言，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民族区域自治必将使祖国开出多姿多彩的物质文明之花和精神文明之花。

应该指出，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生过剧烈的波折，遭受过重大的损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问题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由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不足，特别是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国内的民族关系作出了错误估计，并且产生了急于消除民族差别的心理，以致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些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已经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了。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由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但和汉族地区一样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且不适当地搞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大汉族主义思想一样，在我们的队伍里都是应当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却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当作敌我矛盾看待，甚至把一些正当的民族感情和正常的工作意见也当作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错误地进行批判斗争，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在民族问题上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尤其严重，伤害了更多的民族干部和群众。在民族工作上的失误，还特别表现为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尊重不够。有一个时期把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和共产主义化对立起来，把自治机关的职权和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等同看待，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能真正落实，甚至宪法明文规定了的有些自治权利，也变成了虚文。以上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记取。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民族偏见，制造民族纠纷，诬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制造分裂”。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痛心地看到民族关系发生了逆转，民族区域自治落到了几乎名存实亡的境地，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都遭受了一场灾难。我们党代表着各民族人民的意志，先后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揭露和排除了民族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党和国家重申了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民族政策，并经常检查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国家每年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贴，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文化。

三、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而奋斗

现在，我国已进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方面的民族工作也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的民族关系，主流是良好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民族关系上仍然存在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近几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倾听少数民族的呼声，体察少数民族的心愿。当前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他们要求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一切工作都从本民族、本地方的实际出发；他们不同意搞成“自治不自治一个样”，不赞成在工作上和其他民族地区“一刀切”。

第二，他们要求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度和财政制度下，妥善保护和合理开发本地方的自然资源，维护本民族、本地方的经济权益，合理解决农牧矛盾、场社矛盾以及上级企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矛盾。关键是希望在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下，适当划分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同自治机关管理、开发当地资源的权限，确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他们还要求迅速地制止人口的盲目流入，妥善解决盲目流入人口的问题。

第三，他们要求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尽快地达到富裕和文明，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希望上级在财政经济上对民族自治地方放宽政策。

第四，他们要求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民族政策教育，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和扩大民族干部队伍，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他们希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坚决打击国内外敌人煽动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等反革命活动。

第五，他们要求抢救和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繁荣民族文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上述要求无疑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凡能较快解决的问题必须设法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积极地逐步加以解决。要相信我们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为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定，正确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指明了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各民族地区的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要坚决执行。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要根据《决议》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端正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而“文化大革命”又使这种思想混乱更甚。现在我们的同志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不能说都是正确的。这些同志应该明白：民族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也将长期存在。有些同志不免还带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还要注意防

止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尤其要反对分裂主义。我国各民族本来就是长期联合，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经过革命，更加强了这种联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谁要是企求变合为分，那就是倒行逆施了。我们要做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好了这个工作，就能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其二、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我们讲全面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条件。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中心环节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该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这就是说：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必须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必须占有和这个民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的地位相称的比例；并要切实保证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同时根据当地的民族构成情况，安排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所有在自治机关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各民族干部，都要符合党和国家选拔干部的标准，德才兼备；都要经有关方面充分酝酿协商，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现有自治权，显然还是不够完备的。全国性的事务，自然只能由国家统一管理。至于地方性的事务，则可以而且必须由自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自主管理。同行政地位相仿的一般国家机关相比，自治机关的职权要多些、大些，这是没有疑问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自治权已成为突出的、亟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了。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上，必须充分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权益——尤其是依照国家法律自主管理资源和企业的权益，上级国家机关在开发和利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时，要和自治机关充分磋商，作出妥善的安排，

做到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使当地群众得到实惠。为了促进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逐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差距，除了民族自治地方应自力更生外，国家将尽力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财政上、技术上的援助。

其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这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现在的宪法对自治权的规定是很不完备的。1980 年 9 月 15 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治权。目前宪法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中，可以相信，经过修改的宪法必将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29 年前，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法律中有些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在总结 30 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新情况，制定出一项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新法律。现在，有关方面正在为制定这项法律而认真进行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目前，有些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开始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了，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完善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很难落实的。我们现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是要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贯彻执行。只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

的法制建设，加强民族法制宣传，并坚决按法律规定办事，才能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因此，这项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久安之计。

60 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引着少数民族渡过了曲折而光辉的历程。它历经国内国外敌人的阻挠和破坏，以及党内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愈加显示出了它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乌兰夫的这篇讲话和这篇文章，对民族立法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时，都讲得很透彻；对民族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其对象、目的、原则和基本要求，以及对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达特点等，都讲得很明确。早在 1947 年 5 月 1 日，就在他主持下创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同样是在他主持下，制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我国最早制定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法规。继此之后，根据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在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原则规定；三年后，于 1952 年 8 月，同样是主要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又过了两年，195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依然是主要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专门条款作了明确规定。上述《纲要》和《共同纲领》及《宪法》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条款的提出和制定，乌兰夫都是积极倡导者，也是主要参与者。他的这种阅历，表现出了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有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他多年在民族地区工作，又领导全国民族方面的工作，对全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情况都很了解，又有求是、执著的工作精神，由他主持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党中央信得过，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也都是十分信任和放心的。

这时候的乌兰夫，已经是 70 多岁高龄的老人。为圆满完成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重大任务，不负党中央和千百万少数民族人民的期望和信任，他不顾年高体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起草过程中的每一步骤，他都亲自布置、亲自组织、亲自主持研讨，对每一项工作都抓得很紧、很细、很认真，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通过上述讲话和文章，广泛地作了思想酝酿和理论及舆论准备后，根据中央决定，在乌兰夫主持下，很快组建起了由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和由专业人员和专家组成的起草小组。在乌兰夫领导下，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即刻投入了起草这部我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的实质性工作。

工作一开始，乌兰夫就向工作人员明确交代：起草工作要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总结几十年来我国民族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从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出发。根据乌兰夫的要求，起草小组首先搜集了我国历来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条文和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条文以及相关规定，经选择整理汇编成册，同时把有关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资料也整理成册，印发给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成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研究参考，以为起草工作借鉴。当这方面的工作完成时，正值 1981 年盛夏，乌兰夫要到北戴河去疗养。为了抓紧时间加快工作进度，乌兰夫决定，索性把起草小组一同带去北戴河，利用疗养期间别的事情干扰少之便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同起草小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有关资料，首先议论和酝酿修改《宪法》民族部分和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总思路和大框架。在北戴河期间，他们上午讨论，下午游泳、休息兼思考。讨论主要总结几十年民族工

作，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教训。乌兰夫亲自主持，讨论中让大家畅所欲言。议论时不拘形式，各抒己见，乌兰夫也和大家一样，想到哪说到哪，可长可短，也可以相互插话，议论得很热烈，很透彻。这样的议论进行了 20 来天，越议论越深刻、越全面、越系统，思想越解放，认识越明确。在此基础上，先解决了《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问题。对《宪法》中需要修改的条款，在乌兰夫主持下，字斟句酌，逐条作了反复研究、推敲，在大家都觉得满意之后，将修改好的稿子交到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颇得好评。在修改《宪法》民族部分条款的同时，考虑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如何同《宪法》有关部分对应和衔接，并先拟出了大纲，然后按章节分工草拟条文。在分头草拟条文时，乌兰夫提出：初稿要写全、写细，不怕多，防备漏。要先把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将原则、政策和措施都详细写出来，然后再在全而细的基础上，系统化、精炼化、条文化、法律化。起草小组的同志按照乌兰夫的要求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条提纯、锤精，归纳出了一个全面、精炼、切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

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乌兰夫立即召集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人员开会，趁热打铁，讨论《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因为乌兰夫抓得紧，要求严格，前期工作做得好，与会人员对草稿比较满意，对草稿中的主要条目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初稿得到了领导小组认可。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征求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的意见，这是更大范围的认同，是保证法律条文切合实际，确能贯彻实施的关键一步。对此，乌兰夫对起草小组总的要求是：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又包括情况千差万别的各少数民族地区，要做到全能照顾到，让不同方面和不同地区都同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复杂性和艰苦性。但是，不论有多复杂，多艰难，我们的

工作也要做到，做好。按照乌兰夫提出的要求，起草小组下了很大功夫，分门别类，根据不同情况，或发函书面征求意见，或登门拜访，单独请来面谈，或把几个、多个有关方面的人邀来座谈商讨。千方百计，多种形式，反反复复，一遍一遍地征求意见，一次一次地修改草稿，认识逐步趋向一致，草稿越来越接近成熟。但是，还有一些难点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为及时解决难点问题，乌兰夫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比如少数民族地区招工、招干问题，当时国家为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劳动部规定全国企事业单位不许到农村牧区招收职工。但是从增加少数民族干部工人比例的角度考虑，在《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上写了："民族自治地方企事业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人员。"在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座谈会上劳动部来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不同意做这样的规定，他说"不许到农村牧区招收职工"是中央批准的，不能突破。在座谈会上给他作了解释，并向他说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要中央同意，最后还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可他还是不同意。这时，乌兰夫不得不给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请你回去向部领导汇报，希望你们部党组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提出你们部的正式意见。这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去汇报后，部党组当天晚上就开会做了研究，第二天另派了一位同志来见乌兰夫，说部党组对这个问题已做了研究，完全同意《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上写的条文。就这样解决了这一难点的问题。

在征求意见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的过程中，乌兰夫很重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意见，很体谅在基层工作的同志的心情。《民族区域自治法》关系着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今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依据。各少数民族地区都非常重视它的制定和实施，盼望着通过它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对它抱很大希望。可是，这是一部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它只能定基本原则，解决通用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问题都解决。对下边提出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意见，乌兰夫不仅细心听，而且还亲自说明作解释。如有的地方提出恢复低于县的民族自治地方。乌兰夫耐心地解释说，县以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范围小，不便于行使自治权。考虑到这种情况，1954 年制定《宪法》时才改为民族乡。民族乡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补充，应该注意它的特点，继续维持这个做法，不要再改变它。又如有的自治州提出，他们的自治州范围比较大，州下设有行署，要求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其地位和干部待遇等作出特殊规定。乌兰夫解释说，这可以在该州的自治条例中去解决，不必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就这一个别问题作规定。经这样说明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提法，乌兰夫非常慎重，而且特别注意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在 1954 年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上，简单地写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而几十年的社会实际则是主要强调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甚至把一些民族感情和不同意见也当作地方民族主义反了。基于这种情况，在讨论《民族区域自治法》时，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不要写了，但也有些同志认为，“两种民族主义”是客观存在，主张还是都写上。乌兰夫考虑，一些同志提出不写这个问题，反映了他们担忧和仍有余悸的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他认为，“两种民族主义”都不符合马列主义，都应该反对。毛主席过去曾多次讲到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但他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强调的主要是反大汉族主义。乌兰夫觉得，还是毛主席的讲法客观、实际，这次修改《宪法》和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应该按毛主席原来的提法写。他想了这些之后，为了处理得更有把握，特意给彭真同志写信讲了自己的想法。彭真认为乌兰夫

的想法很好，《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了乌兰夫的意见。于是，在《宪法》修改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草稿上，都写了“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种写法得到了普遍赞同。

在乌兰夫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从 1981 年着手准备，到 1984 年完稿，历时四个年头，先后易稿 17 次，小的修修补补不计其数。每次易稿乌兰夫都亲自动手，认真推敲，倾注了乌兰夫的辛劳。在他的这种精神的感染下，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一丝不苟，执著认真，拿出的草稿真正达到了高标准，在 1984 年 5 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得到顺利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通过和颁布实施，是我国法制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它对规范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对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有长远作用和现实意义。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后，乌兰夫对它的宣传和贯彻实施非常关心和重视。《自治法》颁布时乌兰夫已担任国家副主席，虽然国事很忙，但对《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仍摆在了他日程的重要地位。早在 1984 年，他就组织起草了《自治法》宣传大纲。1987 年 8 月，乌兰夫率中央代表团在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 40 年大庆期间，他曾是第一任校长的内蒙古大学请他去作报告。经过认真考虑后，他决定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成员底润昆代他去专题讲了《自治法》。底润昆按照乌兰夫的命题讲过之后，内蒙古大学的师生们很受感动，认为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老校长，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代他讲《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别具深情的关怀，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同年，在《自治法》实施四周年之际，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进一步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电视讲话，对如何进一步贯彻《自治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起

了有力地推动作用。乌兰夫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仍心系《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他不仅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贯彻实施情况，还提出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自治法》具体化，要求各自治地方都能尽快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真可谓是为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鞠躬尽瘁。

三十二、一届国家副主席

1983 年 6 月至 1988 年 4 月，乌兰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4 年 9 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主席、副主席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是国家元首，其职权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命国务院组成人员，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均选举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先后任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因特殊情况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彪集团覆没，“四人帮”被粉碎后，经过拨乱反正，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再次明确规定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在 1983 年 6 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和乌兰夫分别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李先念任国家主席时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政公务太多，他对乌兰夫说，接受国书（驻外使节的证明文书）和接见外宾方面的工作，就请你乌兰夫同志多承担一些。所以，乌兰夫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外事活动就成了他代行主席职权的一项主要任务。

这时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多年来外事工作上的“左”倾路线已进行了批判，在国际交往中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已初步打开。

特别是 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对我国的对外政策又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乌兰夫任国家副主席期间，遵循上述原则，在外事活动中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接受各国派驻我国新任大使，即全权外交代表递交国书，是乌兰夫在任国家副主席期间的一项经常性工作。看起来接受国书是例行的礼仪性活动，其实并非尽然，它包含着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有着极强的政策性，反映着我们的国际地位、对外形象和国家尊严，同时也是对外宣传介绍我国基本政策和基本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更是扩大我国在对外交往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与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初期，乌兰夫就几次随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苏联等国。“文化大革命”前，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期间，曾多次率团出访；在连任四、五两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他就经常参加外事活动，特别是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任职期内，他是副委员长，同时又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负责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那时没有设国家主席，代表国家接受新任大使递交国书和接待外宾的是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所以那时的这项任务就多由乌兰夫来承担。1983 年他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这项工作就成了他法定职务的份内事。他的这种经历给予了他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所以，在他代表国家履行外交和外事活动时，言谈举止，自如得体，风度翩翩，很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在接受国书时，除代表国家履行礼仪性活动和礼节性谈话外，他还利用这种机会，向新任使节和来访的外国贵宾介绍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宣传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有时他还问一些对方国家的主要情况和所关心的事，遇有他访问过的国家，还要谈一谈他对那个国家的良好印象。如1984年3月20日，在接受赞比亚新任驻我国大使乔纳递交国书时，了解到乔纳大使在国内曾任过副总理和执政党副书记的重要职务，并曾来我国访问过三次，于是在履行完礼仪、礼节性活动后，他又以高兴和亲切的口吻说：卡翁达总统派你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我国任大使，说明他对中赞两国关系很重视。在乔纳大使同他融洽交谈中说到中赞建交20年间，中国帮助赞比亚修建了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和不少公路与桥梁，还派去了很受赞比亚人民欢迎的医疗队，他对此表示感谢时，乌兰夫随即说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就是靠第三世界这些穷弟兄进入联合国的。乔纳大使听了乌兰夫这番话，甚是高兴动容。尔后乌兰夫又对乔纳大使说：你虽然曾经来过我国三次，但是这几年我国的变化很快、很大，我希望你在任职期间能到我国各地去多走走，多看看。乌兰夫的这番话马上拉近了这位大使同他和同我国的距离，起到了通过日常外事活动对外宣传我国，增进国际友谊的良好作用。

乌兰夫在任国家副主席的五年间，代表国家多次接见过外国代表团和高层来访者。其中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的有政府代表团、议会代表团，也有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代表团。高层次的来访者中，有政府首脑、有政党领袖、也有议长和王室成员。这些来访者，都是抱着各自的想法到我国直接观察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和变化的。乌兰夫把接见他们视为向外宣传的好机会，在接见中，除仪式性和礼节性活动与交谈外，往往都要针对不同对象，向他们简明

地介绍我国当前形势和基本方针与政策。如 1984 年春天，由一位精干的中年法国女士任团长、一位德国人任副团长，共有 44 人组成的欧共体议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乌兰夫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代表国家接见他们时，一见面女团长就对乌兰夫说：我们来自欧洲各国，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中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乌兰夫听她这样讲了以后说：“我们同欧共体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在很多方面是相近或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我们同欧洲的经济合作，前景是广阔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穷国，这几年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而且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我们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收入要翻两番，人均达到 1000 美元，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现在我们的国民收入人均只有 400 美元，离奋斗目标还很远。可是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只有 16 年了。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只有靠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引进技术和资金，否则目标就很难实现。”他又接着说：“现在我们同欧共体的贸易和资金、技术合作还不太多。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沿海地区放宽政策，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希望欧共体加快同我们的合作步伐。”“我们的对外经济合作面对着美、日、欧三大块，现在这三大块相比欧共体在后边。十几年以后，如果欧共体同我们的经济合作能走到前边，那是我们所希望的。”乌兰夫讲这番话时，欧共体议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很感兴趣。乌兰夫话音一落，女团长即刻表示：“欧共体能成为同中国合作的第一伙伴，这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这段对话，言简意赅，针对性很强。寥寥数语，讲了双方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介绍了我国的基本情况、奋斗目标和对外政策与方针，也诚恳地表明了乌兰夫本人的愿望。即刻引起了对方的共鸣。类似情况，在他接见来访贵宾中屡见不鲜，这充分表现了他政治家、国务活

动家的干练和风采。

乌兰夫在国家副主席的任期内，通过职务范围内正常外事活动，为打开我国外事工作的新局面，扩大我国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乌兰夫任副主席期间倾注力量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合情合理地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经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热切期盼。适应潮流，顺乎民意。1981 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即“九条声明”。1984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发表谈话，大胆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即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仍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一个统一的中国，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这样一种构想提出，作为共和国副主席、又曾与主政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在莫斯科同班、同桌留学的乌兰夫，于公于私，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一功在千秋的大业，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样一种想法的驱动下，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以他的切身体会和感受，连连发出动人心弦的呼声。

下边摘引他有代表性的几次讲话，借以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和想法。

其一，1983 年 8 月 23 日，他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六届一次会议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次代表会议上讲话，现将有关段落引录如下：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

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全国青年最崇高的使命。我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强同港澳台胞青年的联系，加强各族各界青年的大团结。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年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广大青年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本世纪全国人民的三大任务之一。青联和学联要在完成统一大业中，积极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其二，1984 年 4 月 11 日，乌兰夫在第三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上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的致词。在致词中，他高度评价了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和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祖国和家乡的革命、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了侨务工作的成绩，重申了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讲了我国进入新历史时期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后，乌兰夫强调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实现祖国的大统一、大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历史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伟大而艰巨的三大任务。完成这三项历史任务，是包括广大归侨、侨眷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荣任务。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乌兰夫说：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多年来人为的分裂局面，不仅使国家和民族蒙受巨大的损失，也给国外侨胞造成许多困难。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十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和具体设想。我们希望国外侨胞在爱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的大统一、大团结早日实现。

其三，198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各界纪念台湾光复 40 周年大会。乌兰夫作为国家副主席应邀出席，并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发表了以“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趋势和民族愿望”为题的讲话。为全面展现这次讲话的精神，现将主要部分引录于下：

今天是台湾光复 40 周年。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让我首先向台湾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台湾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亲同骨肉。1894 年甲午之战，清军战败，于 1895 年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那时以后的 50 年间，台湾人民始终心向祖国，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一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到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会合在一起，并且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结合。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使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1945 年 10 月 25 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员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中国正式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团结抗战的重大胜利。

在纪念台湾光复 40 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台湾仍然与大陆处于分裂状态。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

内忧外患遗留下的产物，是外国势力干预的结果，是违背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的。

多少年来，我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消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这个斗争的继续，也是历史的趋势和民族的愿望。现在，我们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已经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同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不是收复主权问题，而且祖国和平统一的政策，完全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台湾当局的利益，同时也照顾了有关国家在台湾的合法利益。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关系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由此而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国共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扫一百年来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国民党的声望也为之一振。两次合作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也是对国民党有利的。今天，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国共两党为什么不可以再次携手合作呢？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幸，也对国共两党有利。

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希望于台湾人民。我们期望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积极贡献力量。我们也期望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出力。一切为祖国的最后统一做出贡献的党派和个人，都将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称赞，并载入史册。让我们团结起来，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其四，1986 年 10 月 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纪念辛亥革命 75 周年座谈会。乌兰夫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应邀出席，并发表了很有撼动力的讲演。在讲演中，他首先以敬仰的心情，缅怀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率领民众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把我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不朽功绩；追忆孙中山先生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思想，并以此为指导，为实现我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然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说：

今天，当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75 周年的时候，缅怀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先辈的业绩，我们可以国家今天已取得的独立与进步告慰于先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因素，祖国大陆与台湾，仍然处于互相隔绝的不正常状态。海内外的全体爱国同胞，都不愿意让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继续下去。国家进一步的兴旺发达需要统一，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要求祖国统一，世界人民期望中国统一。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中华民族的骨肉团聚，为了对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各地的炎黄子孙，都应当齐心合力促进祖国的统一。

……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所有志士仁人，都怀有强烈的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由于严酷的历史条件没有给他们提供实践这种理想的机会，奋斗一生，赍志以没。今天，新中国在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想。但是，世界在前进，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自从十年动乱结束以来，我国人民团结一致，用辛勤的劳动，正在迅速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如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已列入日程。最近，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的决议，把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完整的战略规

划明确展现出来。它必定更加激发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我们的事业迅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中华民族正走上复兴的康庄大道。一切爱国的人，一切有民族责任感的人，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无尚光荣的使命。

乌兰夫的这篇演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反映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声。

台湾宝岛和居住在那里的两千万骨肉同胞，与祖国大陆长期人为隔绝，这一不正常状态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乌兰夫，更是时刻紧系胸怀，一有机会他就讲宝岛回归、祖国统一。这四次讲演范围宽，影响大，其共同点是以情感人。其中，前两次讲演的听众，一为各界青年和学生代表，一为归国华侨代表，他讲演的着眼点在于启发这两个有影响的群体；后两次讲演重在抓住了有利时机，即一为宝岛光复重入祖国版图 40 年庆贺日，一为辛亥革命 75 周年纪念日，这是两个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其一是洗雪国耻，其二是开创共和新纪元。这两个特殊日子，都会使我全国同胞思绪翻滚，心潮涌动。在全国人民心潮沸腾的日子，邀各界同胞的代表聚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讲，这本身就充分显示了其意义的重大。更何况乌兰夫的讲演又是那么有根有据，入情入理，既讲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现状形成的缘由和骨肉同胞思回归、盼统一的共同心愿，又陈述了合情合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略和办法，也设身处地以沉重心情表达了自己的期盼。与会的各界代表听了这样的讲演，怎么能不为之动心，怎么能不产生共鸣？这共同的沉重心情，这共同的殷切期盼，必将随着参加集会的各界代表漂洋过海，播撒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四面八方，由潜移默化，而萌育成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无穷力量。

三十三、在最后的岁月里

乌兰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时候，是 77 岁至 82 岁。1987 年 10 月至 11 月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因年事已高，和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主动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机构。1988 年 4 月，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他的国家副主席职务任期届满，由于他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享有的崇高威望，虽然他已步入 82 岁高龄，但仍又选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所以，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一直是在岗位上，处于繁忙的公务之中。思乡、怀旧，是老年人的本性。然而，乌兰夫的思乡、怀旧，却非同一般。他的思乡是心系家乡——内蒙古的发展；他的怀旧，是总想把自己和战友们一生奋斗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以鉴后人。当日历翻到 1987 年时，即他进入 81 岁的时候，似乎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光已没有多久，于是格外地关心起了家乡和写回忆录这两件事。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间，除忙职务内的事情以外，把自己的全部余力都投入到了上述两个方面。

我们首先看他是如何关心家乡——内蒙古的。

乌兰夫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见到成效，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形势喜人，农业生产进入了良性循环，人民生活已明显改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新局面。就全国来说，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已拉开距离，叫它竞争也好，追赶也好，如果有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远远地甩在后边。不甘心落后的内蒙古人，凡来北京都想见到乌兰夫，向老领导说说自己的想法，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以从中受到教益，得到启迪。没有机会到北京的人也有写信的，如高增培、赵真北等就曾写信向老领导述说过他们对发展内蒙古牧业的意见。乌兰夫很喜欢内蒙古来

人，很愿意听他们讲改革后的变化和发展。每逢春暖花开全国两会（人大、政协）召开时，前园恩寺胡同 31 号（乌兰夫宅第）就门庭若市，人来人往。

1987 年两会期间来人尤其多，其中包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巴图巴根、政协主席石生荣、副主席陈炳宇和顾委主任王铎等。乌兰夫除听他们主动讲自己的意见外，还向他们提问他想知道的情况。乌兰夫一向关心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经济工作，其中主要是工、农、牧业生产，而对蒙古民族的特点经济畜牧业尤其关心。正因为他的一向关心，坚持从实际出发，在牧区执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文化大革命”前，虽然有“左”倾路线的影响，但内蒙古畜牧业生产却一直保持了稳步增长。当他听到牧区改革又有像民主革命时照搬农村办法的现象，按户分了生产队的畜群，其结果是“十年动乱”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畜牧业生产，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时，心中十分不安。他一直在考虑这是什么原因，在改革开放中应该怎样解决牧区的问题。为了寻求答案，他多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自己的想法，但凡内蒙古来人也都同他们探讨。作为国家副主席、作为出生在内蒙古的蒙古民族的一员，尤其是作为内蒙古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有责任关心内蒙古，关心内蒙古的牧业和牧区人民。

4 月 11 日，天气晴和，阳光灿烂，乌兰夫整整齐齐着一身中山服，上午 9 点准时来到内蒙古代表团下榻处——坐落在北京安定门内大街的河北宾馆。与会的内蒙古人民代表，都聚集在宾馆的天井大厅，乌兰夫笑盈盈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握手互致问候，并一起合影留念。接下来，就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联组讨论。本来，他带来一份发言稿，但同代表们一接触，就很自然地谈论起来。他先谈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报告的基本点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就《政府工作报告》

中讲的民族问题，谈要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就是如何总结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40 年来的主要经验；而后，就直接插入了畜牧业改革的问题。谈起畜牧业改革，代表中的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说明情况，随着乌兰夫发言的思路，不断插话，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乌兰夫发言为主导，众人一起边谈边议，使联组会开得十分活跃。

下边抄录一段乌兰夫身边工作人员当时的记录：

乌兰夫：社会主义改造时，对牧主实行的是赎买政策，牧主的牲畜已经拿过来了，后来为什么又非要定他牧主不行呢？

沈新发：这种做法应该检查！

乌兰夫：不是检查的问题，而是应该再改变过来。有些人不懂得民族政策，不知道历史情况，这不要紧，可以到牧区去搞调查，亲自摸一摸，当上一段牧民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的经验就是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培养干部，政策问题解决了，干部决定一切。这是斯大林讲的，是有道理的。对于牧区的问题，就是要干部下去认真搞调查，如果现行的办法不行，就要好好研究，想出适合牧区的办法来。可能有人另有高明办法，那好哇！你把畜牧业生产发展起来！如果发展不起来，就说明你不行，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办法还是“千条万条发展生产第一条”。“文革”中批我这一条，那我要说，在牧区，“不发展牲畜”你干什么？在农村，“不发展粮食”你干什么？农业也好，牧业也好，只要政策对头，方法得当，发展不难，翻番也不难！

巴图巴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牧区，是当前牧区工作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乌兰夫：要把内蒙古的牧区建设成为全国肉类和畜产品的重要基地，这要靠改革开放，要根据牧区的情况搞改革开放。

巴图巴根：开始研究内蒙古改革开放时，提出了牧区改革要考虑牧区的实际，后来一介绍外地的经验，就失控了。把牲畜分到了户里，

出现了小而全（畜群小，不分类组群）的问题。

乌兰夫：应该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在牧区实行的政策对不对？趁庆祝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要好好总结，看一看在牧区现在采取的改革方法行不行，对不对？

王铎：我看牧区改革有一轰而起的现象，没有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牲畜，是混群轮流放牧，和过去按品种分群，有专人放牧不同了，影响牲畜改良，也影响怀胎率。

乌兰夫：一轰而起根本不是办法，是不是就一轰而起分下去，还是怎么办？这需要好好研究。无论怎么改，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发展怎么实现现代化？根据已出现的情况，好好总结一下，看哪种办法好，总之一条是生产要发展，牲畜要增加。不能发展生产，不能增加牲畜的办法不需要。不能改来改去牲畜越来越少，这不能叫社会主义，不符合改革的要求。对牧区改革的问题我讲这么些意见，供你们回去研究时参考。

在这次联组会上，对发展内蒙古畜牧业生产的问题，乌兰夫也讲了自己的意见。

乌兰夫：牧业经济很脆弱，这是它固有的特点。稳步发展畜牧业，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这一特点。“文革”后，直至目前，内蒙古的牧业总是下降，这是个什么问题？不能多增少增也可以，总不能不增还要下降吧！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改革就是要发展，不发展，还倒退，那还叫什么改革！总结内蒙古过去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工、农、牧业都得是这样。发展牧业，内蒙古有 13 亿亩草场，这是得天独厚的。怎样利用和建设草场，是发展牧业的前提。水是草场的命脉，我过去提过，草场建设水要放在第一位，对牧区说，真是水贵如油。过去讲“三打一搭”（打井、打草、打狼和搭棚圈），据说，近几年草原没有打井，原有的井还被破坏了。这就看出问题来

了。如果说内蒙古是“五年一大灾，三年一小灾”，那为什么“文革”前的畜牧业能稳步持续发展，“文革”后就不行了？现在也不行，还要吃老本？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内蒙古发展牧业的潜力很大，如何把客观的东西，故有的优势发挥起来，努力改变落后，这首先是要发挥人的作用。看来“文革”后牧业没有发展，反而后缩了，这并不是客观上没有条件，而主要是人的原因。王铎、巴图巴根同志，你们都是过来人，这种情况该是很清楚的。

王铎：对牧业发展认识不一致，有的说是过牧破坏了草场，有的说要讲经济效益，看出栏率高不高。

乌兰夫：看出栏率高不高把畜群结构给破坏了，还怎么高！基础母畜达不到一定数量，总增、纯增、出栏率、商品率、什么率都上不去。

王铎：在改革中，牧区的牲畜分到户里，又成合作化前的畜群“小而全”了。

巴图巴根：牧区在改革中，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现在又成了一家一户的“小而全”。

王铎：以后畜牧业的发展方向是专业化，按牲畜的不同种类和不同专业，干什么的就专干什么。比如，养奶牛的就专养奶牛。

乌兰夫：牧区的牲畜都一家一户分下去，又像老区土改时部分地区照办农村的做法，农村搞“耕者有其田”，牧区搞“牧者有其畜”，结果一夜之间把牲畜就搞没有了。现在，虽然不会像那时候一夜把牲畜搞没有了，但破坏了畜群结构，造成了适龄母畜空怀，损失就不得了！适龄母畜不生仔畜，还有什么总增、纯增和商品率！现在牧区是两个问题，一是改革，二是发展。处理好了，两者相辅相成，一旦搞不好，牧业经济就会受损失。你们回去后，要在这方面下点真工夫，好好动一动脑筋。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内蒙古念过一段“草牧经”。这种单打一的想法，在一定范围内干部反映强烈，如城市和厂矿企业的干部就曾说，牧业固然重要，如都念“草牧经”，我们该怎么个念法？显然这一提法欠周全。乌兰夫知道这种情况后十分焦急。恰好这个时候，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来访问他，请他给内蒙古的听众、观众讲一讲内蒙古工作的意见。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充分思考的基础上，从内蒙古的过去和现在向记者谈了自己的认识和意见。现将谈话原文引录入如下：

问：乌老，您好！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在欢天喜地、信心百倍地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奋战，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庆祝自己这一盛大节日。内蒙古是您的故乡。您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在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内蒙古各族人民非常想念您。借此机会我们代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全体编播人员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问候。在这节日的前夕，我们想请您给您的故乡——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人民讲几句话。

答：内蒙古是我的故乡。我是喝故乡水、吃故乡粮长大的。故乡人民培育了我。我在故乡生活、战斗、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同故乡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此时此刻我也很想念他们。我非常感谢你们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对我的关心。借此机会，也请你们转达我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问候。

问：乌老，您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创建者，又多年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内蒙古能够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答：内蒙古能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是有多种原因的。就基本的讲，我看主要是三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自身

的条件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我们的党，非常关心内蒙古的问题，建党初期，党就十分重视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大革命时期，在蒙古族青年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还选送了不少蒙古族党员到苏联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地区工作，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1936 年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暴动”，限于当时的条件，暴动的队伍虽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它使我们经受了锻炼，留下来的军事干部在以后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内蒙古的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党的力量很强的新三师，长时期在伊克昭盟的黄河沿岸坚持斗争；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东部地区的抗日活动也很活跃；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在这期间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干部，成了后来开辟内蒙古工作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开辟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党中央从延安和东北、华北解放区，派了大量干部和军队到内蒙古，并及时确定了先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待群众发动起来，工作有了基础，再建立自治政府的正确方针。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中所有关键性问题的及时决策，是内蒙古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建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首要条件。内蒙古能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蒙古民族和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有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日本投降后，蒙古族人民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渴望民族解放，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5 年 11 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经过 1946 年的“四三会议”，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内蒙古的军队都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统一了全区的革命力量，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建立和发展了以蒙古族为主的革命军队，经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控制了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都为自治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内蒙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和自治政府的成立，离不开全国总的革命形势。日本投降后，我党我军在东北和华北的力量占了很大优势，从全国革命的战略考虑，党中央决定扩大东北、华北解放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内蒙古正处在两大解放区的后方，解决好内蒙古的问题，在全国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两大解放区对内蒙古的革命斗争，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和自治区的成立，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是有条件的。内蒙古能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刚谈到的这三个方面是基本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不仅结束了内蒙古民族长期分裂的局面，使内蒙古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为我党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树立了榜样，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问：请问乌老，我们为什么要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呢？

答：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一部文明史，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内各民族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只有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国家才能富强，各民族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经过长期酝酿形成的，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国内少数民族的利益。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从内蒙古的实际情况讲是这样，从全国的情况看也是这样。我们采取区域自治的形式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正确性，内蒙古过

去 40 年的发展和成就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乌老，您认为 40 年来内蒙古取得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答：自治区的成立，实现了民族平等，少数民族人民行使了自治权利，成了社会的主人。40 年来，在发展、健全民主制度和自治制度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一个方面。再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40 年来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首先是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工农牧业生产；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逐步向“小康”水平发展。再就是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前，内蒙古没有高等学校，没有科研机构，连民族中学也没有。现在有了十多所高等学校，有了蒙文专科学校，民族中学就更多了，还建立了不少从事各项专业研究的科研机构，整个民族和绝大多数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有一条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在战争时期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就在张家口、乌兰浩特、赤峰、齐齐哈尔等地建立了军政院校，培养了大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革命胜利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相继建了综合性的内蒙古大学和不同专业的高等学院，又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不同专业的干部。

这些干部的培养，保证了过去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今后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看从总的方面讲，主要是这么一些成绩。

问：您离开内蒙古到中央工作已经许多年了，可是您在百忙中始终关心着内蒙古各项事业的发展，请您对内蒙古今后的工作提点希望。

答：经过 40 年的建设，内蒙古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一定基础，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内蒙古有 13 亿亩草原，8000 万亩耕地，东部有

森林，西部有钢铁和煤炭，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其他重点城市的工业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全区的工农牧业已经形成了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统一的经济体系。牧业是内蒙古经济的特点和优势。要注意这个特点，发挥这一优势。但是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和工业的支援，所以必须注意农牧结合，工业、农业和牧业要协调发展。

问：5 月 1 日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的纪念日，但是庆祝活动是在 8 月 1 日举行。那时的内蒙古水草丰美，瓜果飘香，正是最美好的季节。我们非常希望乌老能回到故乡，和我们共度佳节。

答：感谢故乡人民的盛情。我也非常愿意回内蒙古看看近些年的变化。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祝愿内蒙古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祝愿内蒙古各族人民精神愉快，生活幸福。

这次谈话，语言不多，但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在简短的谈话中，对过去，他讲清了内蒙古革命同全国革命的关系，区域自治的优越性，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40 年来的基本经验；对今后，他恳切地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此次谈话的核心和落脚点，高度概括和凝聚了他对内蒙古今后工作方针的基本想法和思路。这就是：把内蒙古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工农牧业要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畜牧业是内蒙古民族的特点经济，在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中，它独具特色和优势，而这一特色、优势经济，在发展中离不开农业和工业的支援，所以，只能是农牧结合，工业、农业和牧业协调发展。这里没有直言批评“草牧经”，却以正确的想法，从正面对其作了纠正。乌兰夫谈话先后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内蒙古日报》于 1987 年 5 月 1 日全文发表，在内蒙古自治区产生了很大反响。上上下下一致认为乌兰夫的谈话很重要，总结了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明确了今后发展的方针与轨迹，使人们明确了什么叫片面性，什么叫整体观念。

5 月 1 日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人们把 5 月称为“红五月”。1947 年 5 月 1 日，乌兰夫在内蒙古东部著名小镇乌兰浩特庄严宣告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使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同胞和各族人民开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样，5 月 1 日对内蒙古人民就更加了一层重要意义。1987 年的 5 月，乌兰夫心情特别好。“两会”开过以后，他时常谈起内蒙古的事，特别是常提起昔日的战友，如奎璧、吉雅泰、佛鼎、高布泽博、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苏谦益、杨植霖、王铎等等，他们都是为内蒙古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就在这时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的《老年世界》杂志编辑部致函乌兰夫，请他为该刊撰稿，给内蒙古自治区的老同志们说几句话，作为他在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对当年老战友们的寄语。乌兰夫欣然接受约稿，于是同工作人员商量该写些什么，经过几天酝酿，定下了这篇文章要表达三个意思，即先向老同志们致节日祝贺，再就是要尊重老同志，认真做好老干部工作；第三，是请老同志要保持晚节。大标题叫《与老同志共勉》。这篇文章写得简单明了，很富有感情。现将原文引录如下：

在欢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老年世界》编辑部要我给内蒙古的老同志们说几句话。我同内蒙古的老同志们一起战斗、工作了几十年，有些是半个多世纪。我们都是老战友，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几句话说什么呢？我看就说以下三句吧！

首先向老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愿老同志们晚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再一句话是，就各级组织来讲，要尊重关心老同志，认真做好老干部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也是党的工作开展最早的少数民族地区，老同志很多。在这批老同志中，不仅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也有不少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有蒙古族同志，有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同志，也有不少是在不同革命时期党派到内蒙古地区工作的同志。这些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老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勤奋工作，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创建内蒙古自治区，为贯彻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内蒙古，做出了重大贡献，创建了不朽的业绩。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党一向关心老同志，重视老干部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和新老交替，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各级组织和领导，应该把党的老干部政策和对他们的关心具体化，这就是说，要充分体现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并因人而宜地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创造条件。

第三句话是老同志要注意保持晚节，做到老有所为，使晚年生活得更加充实，更有意义。老同志对自己要有客观认识。我们年纪大了，体力和精力都不如青年、壮年时代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接受党的教育和经受实际锻炼的时间长，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我们老同志的优势。要老有所为，要使晚年生活得更有意义，就要善于发挥自己这一优势。发挥优势也要有条件，这就是养好身体，不断学习。有健康的身体，学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的新知识，才能更好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贡献要量力而行，我看主要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勤俭朴实、艰苦奋斗、团结同志、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等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好经验传给新一代；支持、帮助年轻同志工作，在加强民族团结、干部团结等方面，发挥老同志特有的作用。老同志在这些方面能有所为，就是很大的贡献，晚年生活就应该说是很有意义了。这第三句话，

作为我和老同志们共勉。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内蒙古的老同志中影响很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忆起当年峥嵘岁月的诸多往事，激励他们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保持晚节。

50 天后，《老年世界》记者又登门拜访，乌兰夫在寓所高兴地接待了记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首先兴致勃勃地讲了老年养生之道。现将记者就此所作报道节录如下：

我们对乌老说："您已 80 高龄，身板和精力还这样好，内蒙古的老同志既很高兴又很羡慕，都想知道您是怎样锻炼和保养的？"

乌老笑了笑以后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身体能保持到这样一个程度，就算不错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生活规律，饮食正常，再加上适当锻炼，把握住了这几个方面，身体自然就会好。"

乌老接着说："在正常情况下，我总是晚上 9 点多睡觉，6 点起床，非特殊情况，从来不打乱这一生活秩序。对老年人来说，睡眠很重要。睡眠也有个质量问题，我躺下几分钟就能睡着，也很少做梦。能做到这样，前提是心无闲事，什么时候也不想那些没有用的问题，这样保证能睡好。"

乌老接着又说："饮食是保持健康的一大要素。我食欲很好，喜欢吃各种蔬菜，粮食吃得比较杂，适当吃些瘦肉和蛋品，吃饭定时定量，不贪食，不暴饮。我已多年不吸烟了，酒也很少喝。烟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能贪。我忌烟以后，很少有痰，也很少咳嗽。"

当谈到运动的时候，乌老深有感触地说："运动很重要，但是运动要与年龄和身体状况相适应。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运动，在莫斯科时，经常打排球，回国后，战争年代在部队时，主要是骑马。马是小时候就骑的，这是一项被动性的运动，马一跑起来，全身都得动，是一很好的体育锻炼。运动要长期坚持，'文革'前在内蒙古的时候；

我还和毕力格巴图尔、孔飞、廷懋等同志一起，到体育馆去打篮球，有时还游泳、骑马。现在再剧烈运动不行了，近些年我主要是走路。按照我的体会，这是老年人锻炼的一种好形式。走路不受什么拘束，不要什么条件，有块地方能走开就行了，运动量没有限制，走的时间、路程可以按照自己的体力掌握。我每天早晨起床后，就绕着我这个院子走，一般是走四圈，觉得累了就停下来。走路身体各部位都可以活动，是身体的锻炼也是大脑的休息，长期坚持很有好处。”

乌老还说：“老年人不仅要注意体力锻炼，还要注意脑力锻炼。这就是说要注意学习，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适当地用脑子，可以延缓大脑老化，保持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如果终日无所用心，大脑就会衰退、老化。我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外，每天要用三个小时左右看文件；发给我的所有中央文件和国家机关的文件，都一份不漏地认真看；重要的地方还作些标注。这样，既了解了党和国家的大事，加深理解中央精神，跟上新时期不断发展的形势，又活动了大脑。但是，年纪大了，用脑的程度要适当掌握，觉得累了就休息。”

乌老说：“保持身体健康，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容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无谓地怄气。有的人心眼小，好生气，这对健康很不利。我这个人胸怀坦荡，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心宽体壮，看来这也是我身体和精力比较好的一个重要条件。”

讲过老年养生之道后，乌兰夫处于他对内蒙古老干部们的深情和关心，又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他同内蒙古老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及老同志们对内蒙古所做出的贡献。下边是记者的报道：

当我们的交谈将要结束时，乌老欠了欠身子，深情地提高声音说：“内蒙古的老同志，大部分是我在内蒙古时去的。我们一道工作了很多年，同志间关系处得很好。在这批老同志中，有蒙古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有当地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

建设时期，都不分彼此，更不讲谁是哪个民族，同志间很融洽、很团结。干部队伍的团结，带动了全区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在群众中，在民族之间，很少听说有什么纠纷。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大家彼此信赖，紧密团结，密切合作，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这些老同志，都在内蒙古战斗、工作了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有的贡献了毕生精力，特别是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坚持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在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中是立了功的，内蒙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他们应该受到尊重。”

最后乌老说：“我很想念当年在一起战斗、工作的同志们。”他还再一次地要我们转达他对内蒙古老同志们的问候，并说：“我和云丽雯同志向内蒙古所有的老同志，向已故老同志的夫人，表示慰问，祝他们健康、长寿！”

乌兰夫很少像今天这样欢快、高兴。同《老年世界》记者谈话结束后，他欣然挥毫，提书了：“祝内蒙古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几个遒劲的大字，以表达他对内蒙古老同志们的情谊和关心。

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1987 年 7 月 16 日，乌兰夫在《人民日报》等主要新闻媒体发表了《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他首先讲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由来，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及其意义，紧接着概括地论述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 40 周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已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后，从 40 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即：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四是培养干部。这四条基本经验，在内蒙古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时间上讲，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经济恢复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地域上讲，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这样。凡是在这四个方面把握好了的时候和地区，

事业就发展，工作就顺利，否则，工作就受挫折，事业就受损失。

在论述完这四条基本经验后，乌兰夫对内蒙古在当前和今后工作提出了四个经常需要注意的问题。这就是：

第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法是按照全国的情况制定的，内蒙古是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必须以自治法为依据，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自治条例和各项单行条例，这是一件需要抓紧办理的大事。制定自治条例是基本的法制建设，它标志着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发展水平和治理水平。制定出这些基本法规，自治权利有了法律保护，才能更好地运用和发展，才能以法律形式有效地推动自治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第二，要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汉族占大多数，大部分地区多民族杂居，历史上各盟、旗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这一特点，在加强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区内各民族间的团结和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和民族理论的学习、教育作为经常工作，使全区各族人民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从而自觉地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建设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要看到内蒙古的经济和科技文教事业已有了相当发展，但仍落后于先进地区这一事实。正视这种现实是要努力赶上去，要千方百计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科学研究，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要加速发展基础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族和整个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差距，有效地改变落后。

第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想到内蒙古地区辽阔，资源丰富，有 13 亿亩草原，8000 万亩耕地这一优势，充分认识它在经济发展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运用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和 40 年来的经验，

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认真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把蕴藏的巨大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牧业是内蒙古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在经济发展中，要注意这个特点，发挥这一优势。要注意农牧林结合，工农牧业协调发展，工业和农业要支援牧业，各行各业都要互相支援。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推动自治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起飞。总之，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决贯彻改革、开放、搞活这一进行四化建设的总方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蒙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四条，同样是乌兰夫在内蒙古长期工作中实践经验的结晶，是无价的精神财富。

1987 年 7 月 28 日下午 8 时，以乌兰夫为团长、习仲勋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庆典。次日晨 9 时一刻到达呼和浩特，在车站受到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党政军领导及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车站到代表团下榻的新城宾馆，约两公里的大街两旁，聚集的各族群众人山人海，夹道欢迎以乌兰夫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这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充分反映出了乌兰夫在内蒙古各族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在庆典期间，乌兰夫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与内蒙古各族人民一起参加了一系列庆祝活动。8 月 1 日，乌兰夫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央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除转达党中央和国务院向 2300 万内蒙古各族人民致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外，高度赞扬了生活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各族人民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一贯拥护祖国统一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传统；充分肯定了

40 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内蒙古今后的工作，热诚地提出了祝愿和期盼，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把内蒙古经济搞活，在各项事业上都取得好成绩。参加完各项礼仪性活动后，8 月 5 日上午，和自治区领导座谈，无拘无束的坦诚交换意见。在座谈中，乌兰夫集中讲了两点，一是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是说他这次是“回家”，想多走走看看。他敞开讲的是贯彻“自治法”，他说：“《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大法，只能定原则性的东西，贯彻实施，还需要各自治地方按照大法制定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某一方面的单行《条例》。《自治法》已颁布三年了，还没有见到哪个地方制定出《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没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依据。自治区党委要抓这件事，要明确责任，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条例》制定出来后，要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有了《条例》就按《条例》说话，办事就有根据了。”

当中央代表团完成任务回北京的时候，乌兰夫和其家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来又多呆了些天。在留下来多呆的几天中，他并不轻松。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先在下榻的新城宾馆先后接见了长期同他一起斗争和工作的老同志、已故老同志的遗孀、各界名流；还到医院探视了老战友李森；特意到他曾是第一任校长的内蒙古大学，同老教授和教职员工代表见面叙旧；专程赴他早期革命活动的基地土默特左旗，以及他出生并渡过童少年时代的塔布子村。在这些日子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已是 80 开外的老人，格外精神、兴奋。几乎天天都是连续接待来访者，或一天跑几个地方，大有走不完看不够的感觉。探视重病中的李森时，他俯在其耳边说：“在内蒙古革命的困难时期你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我都记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你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弥留中的李森被感动得湿着眼圈微微颔首。他到内蒙

古大学看望老教授时，频频同他们握手致意，嘘寒问暖。使老教授们都倍感亲切。并一再说：“老教授们在内大初建的困难时期，由内地来到边疆，他们对内大是立了大功的!”并叮嘱内大党委书记云布龙等校领导，要关心老教授。老教授们听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老校长这些话，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回到家乡土默特左旗和塔布子村，引起了他不少往事的回忆，其中最使他动情的是：看到被日寇烧了的他家土房残迹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此表示了他对侵略者的痛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无数抗日志士的崇敬和缅怀。来到了他父母的墓前，默默地驻足哀思。这两位老人不仅为祖国和民族养育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五名儿女，在革命艰苦、国家危亡的时候，他们支持儿女及孙辈参加革命和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支援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的大青山游击队。乌兰夫在双亲墓前默默无语。最令他疾首痛心的是：他由鄂尔多斯赴延安之前，父亲想见他一面，老人在黄河边等他数日，因情况紧急，父子竟未能相见；八年抗战胜利，儿子就要回来了，可老人却在胜利前夕，在我大青山抗日武装攻打察素齐，日伪顽抗，国民党空军配合，狂轰滥炸，老人担惊害怕，受风寒不治而逝。时过 32 年后，站在老人墓前的乌兰夫惟一可以使他宽慰的，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老人如在天有知，已可九泉安息。这一天，土默特左旗政府所在地察素旗镇，人山人海。他们是自发赶来想见一见乌兰夫的乡亲们。乌兰夫招手向乡亲们问好！围拢在他身边的乡亲都有一肚子想向他说的话，但他们只能用掌声和欢呼来表达。乌兰夫频频招手，高声告别：“乡亲们再见了！等自治区 50 周年我再来!”这时候，所有在场的无一不是沉浸在这浓浓的乡情中。

1987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年满 65 岁退了下来，中共中央调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到内蒙古任自治

区党委书记。王群上任前，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灿公陪同下，于 9 月 2 日上午 9 时，到乌兰夫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临时寓所拜访乌兰夫。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创建者乌兰夫，以长者和自治区老领导的身份在客厅接见了他们。

张灿公陪同王群到后，工作人员引他们进入客厅，张灿公将王群介绍给已在客厅等候的乌兰夫，乌兰夫热情地同他们握手寒暄。而后，慈祥而诚恳地给王群介绍内蒙古的过去和他所知道的现实情况。

乌兰夫办事爽快，说话也很爽快，一开口就直插正题。他说：“到内蒙古工作，最主要的是团结好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搞好自治区建设。”他详细给王群讲了内蒙古的历史情况和现在规模的全区域统一自治区的形成过程，其目的是说明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都是随着区域归并，由原来属于不同的解放区或省份归并过来的，即使蒙古族干部和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干部，也有原来属于不同地区的问题，再加临近解放区和内地支援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干部，这就形成了有民族间的问题，也有地区间的问题。这就是说，在内蒙古工作，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必须注意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不分地区地把广大干部团结在一起。把干部团结的问题解决好了，自治区建设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王群听得很认真，表示感谢乌兰夫同志的关心，一定按照乌兰夫同志的指示去做。乌兰夫接见王群时的这一席话，体现出对这位即将到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爱护和支持。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主要领导职务的李维汉，在病榻上对到医院看望他的乌兰夫说：我的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你可是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若不然在我们党史上民族工作就会缺下一块。乌兰夫经常提起李维汉对他的这一叮嘱和希望。

1984 年，乌兰夫完成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任务后，即开始考虑写回忆录的事。在他最后的几年，除忙日

常公务外，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大都用在了总结亲历的主要经验和写回忆录上。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时，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进入晚年，为抢救革命史料，特别是活的记忆史料，中共中央建立了以冯文彬为主任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征委的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对乌兰夫写回忆录很关注，及时地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对此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很关心和支持。

1987 年，内蒙古自治区创建 40 周年大庆就要到了，乌兰夫要著文纪念，注意力很自然地转移到了这方面。他经反复回忆、思考和酝酿后，以《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为题，写了一篇四十年四条基本经验的文章。他的四条基本经验是：一、坚持党的领导；二、一切从实际出发；三、加强民族团结；四、培养干部。这是内蒙古各族人民 40 年奋斗、40 年成就的总结，也是乌兰夫智慧和倾注心血的结晶。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特别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反响。这促使乌兰夫下决心抓紧写回忆录，决心要把一生奋斗的经验留给后人。

1988 年 12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这不幸的电波传出后，大漠南北，一片哀情。

人们在悲痛中忆起这位中华骄子、民族精英的丰功伟绩。是他，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从“十月革命”的故乡返回祖国，直奔革命遭严重破坏的土默川，把几尽扑灭的革命烈火重又点燃起来；是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和一批蒙古族爱国志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高举起抗日义旗，坚持八年抗战，迎来了抗日胜利的曙光；是他，在祖国和

民族处于光明和黑暗正在决斗，中华各民族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把内蒙古 200 万蒙古族同胞和区内各族人民引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道路，经过生与死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夜创建了内蒙古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人民的新生活和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树立了光辉榜样；是他，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 19 年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内蒙古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全国模范自治区；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 17 年的全国民族工作领导岗位上，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民族工作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他，开创了我国新时期党的统战、民族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新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人们想到这些时，对他更加怀念和崇敬。

乌兰夫开创的事业和他的英名，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